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政治学学科综合水平
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三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政治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9(2022.2重印)

ISBN 978-7-04-027694-7

Ⅰ.同… Ⅱ.国… Ⅲ.政治学-硕士-水平考试-自学参考资料 Ⅳ.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2932号

策划编辑 孙淑华 责任编辑 王 羽 封面设计 张 志
版式设计 马敬茹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印制 朱 琦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8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版 次 1999年12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3版
印 次 2022年2月第6次印刷
定 价 37.1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7694-00

前　言

为规范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工作，确保学位授予的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对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增设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自1999年9月1日起，参加相应学科的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并达到合格分数线者，方可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

进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旨在加强国家对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的宏观质量控制、规范管理，是国家组织的对申请硕士学位的同等学力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结构与水平认定的重要环节。1998年，我们组织专家编写并出版了《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政治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2003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修订。六年来，根据广大考生和有关专家的建议，在总结统一考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对本书进行了第二次修订。经过修订的新大纲（第三版）将是今后几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政治学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统一命题的依据，供各院校进行有关教学和辅导时参考，也可作为应试者复习和备考的参考资料。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09年6月

目　录

考试大纲

第一编　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制度 …… 1
第一章　政治的性质 …… 1
第二章　政治文化 …… 2
第三章　国家 …… 4
第四章　政党与政治社团 …… 5
第五章　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 …… 7
第六章　政治参与 …… 8
第七章　政治发展 …… 10
第二编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12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 12
第二章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14
第三章　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及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探索 …… 16
第四章　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命运 …… 17
第三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 …… 20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毛泽东思想 …… 20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邓小平理论 …… 23
第四编　国际政治 …… 27
第一章　导　论 …… 27
第二章　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 …… 28
第三章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主体 …… 29
第四章　国际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主体 …… 31
第五章　外交政策 …… 32
第六章　国际政治环境及其发展趋势 …… 33

复习指南

第一编　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制度 …… 37

第一章　政治的性质 …… 37

第二章　政治文化 …… 49

第三章　国家 …… 59

第四章　政党与政治社团 …… 74

第五章　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 …… 86

第六章　政治参与 …… 99

第七章　政治发展 …… 114

第二编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132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初步实践 …… 132

第二章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149

第三章　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及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探索 … 163

第四章　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命运 …… 174

第三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 …… 179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毛泽东思想 …… 179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邓小平理论 …… 220

第四编　国际政治 …… 277

第一章　导　论 …… 277

第二章　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 …… 292

第三章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主体 …… 314

第四章　国际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主体 …… 340

第五章　外交政策 …… 370

第六章　国际政治环境及其发展趋势 …… 384

考试样卷及参考答案 …… 417

参考书目 …… 423

考试大纲

第一编　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制度

第一章　政治的性质

第一节　政治与政治学

一、政治的概念

政治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系统化过程。

社会需要进行资源分配。分配必须是权威性的。资源的分配是一个系统化过程。资源的分配是一种博弈。在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原理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概念，具有以下特点：科学性、阶级性、革命性、实践性、发展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

三、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主要包括作为政治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以及政治学在中外发展的基本过程。

第二节　政治权力

一、政治权力的概念

政治权力是在政治关系中，权力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作用于权力客体的一种政治力量。它具有以下性质：第一，强制性；第二，专业性；第三，自主性。

二、政治权力的类型

主要包括强制性权力、功利性权力、操纵性权力、合法性权力和人格型权力。

三、政治权力的基础

主要指物质基础、知识基础、动机和制度等方面的因素。

第二章　政治文化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内涵

一、政治文化的概念

政治文化主要是指社会成员针对政治体系各层面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是公民对政治对象的认识、情感和评判。政治文化既是政治范畴，又是文化范畴，是影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政治观念；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政治文化具有结构性。

二、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治文化作为支持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几乎作用于政治体系的方方面面。

第二节　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认知体系，是某一团体对世界的认识（不管是准确的，还是扭曲的）；第二，意识形态与个人、集体的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是行动的思想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和集体的行为。

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现实性，总体性，阶级性，相对独立性，依赖性。

二、意识形态的功能

政治功能。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的利与弊。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滞后的意识形态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

一、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与特点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成员在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

特点：第一，互动性。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第二，创新性。政治社会化是对社会政治意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三，持续性。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二、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与功能

媒介包括家庭、学校、传媒、工作场所、选举活动和政治组织。功能在于稳定政治制度和社会、延续政治文化。

第三章　国　　家

第一节　国家理论

一、国家观的发展

主要有社会契约说、国家暴力说、国家要素说等。

二、国家的本质

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详细地考察了国家的起源，指出了国家是私有制出现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维护在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

三、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是政府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国家构建分为两个层面：国家体制的运作范围以及国家体制的能力强弱。前者是指政府施政范围与功能，后者则是政策执行的效能与力量。这两个层面的交集代表着国家的强弱程度。国家能力主要由五个方面的相互交织、互为条件的能力构成：资源提取的能力、经济调控的能力、合法化的能力、社会管理和一体化能力、服务能力。

四、国家的类型

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类，包括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资本主义国家中又分为自由民主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和威权主义国家。

第二节　国家的形式

一、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理解君主制制度、共和制制度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概念。

二、国家的结构形式

主要指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的单一制制度。在我国大陆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单一制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三节　国家机构

一、国家机构设置的原则

三权分立理论和议行合一理论对政治体制设置的意义。

二、国家元首

国家元首在不同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立法机关

立法机关的基本结构、职能。

四、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的类型：中国特色的行政制度、总统制、内阁制、混合型政府。任何一种政府管理都离不开官僚制。因此必须了解官僚制的含义、官僚制的特征、官僚制的作用。

五、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对于政治民主和法治的意义。

第四章　政党与政治社团

第一节　政党理论

一、政党的概念

政党即社会中一定阶级或阶级的活跃分子，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一种政治组织，社会承认它具有组织与扩张其主

张的合法权利，它也积极介入到政治生活之中，为取得或维持政权，或影响政治权力的行使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二、政党的类型

按理念的本质和角色来划分，将政党分为使命政党（missionary party）和掮客政党（broker party）。按集权的程度来划分，可以将政党分为分权型政党与集权型政党两类。

三、政党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政党的作用极为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是整个社会的领导核心。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是保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正常运转的核心机制。统观世界各国的政党，政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目标制定、利益表达、动员和政治社会化、精英的形成与遴选。

第二节　政党制度

一、政党制度的含义

政党制度也叫政党政治，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是统治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一种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某种政党制度。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主要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主要有共产党一党专政制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第三节　政治社团

一、政治社团的含义

在西方，政治社团即利益集团，是与政党有密切联系且不能被忽视的政治力量。利益集团是社会中的一些成员为了共同的集团利益而结合在一起，通过积极行动而达到共同目的的一种社会组织。在资本主

义政治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政治社团的作用

1. 利益集团在资本主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集中各种利益、政府的助手、制约政治权力。利益集团的弊病。

2.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团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社团是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是不同利益群体实现其特殊利益要求的工具。发挥政治作用的形式是参政议政和政府助手。作用是稳定社会和推动政治民主。

第五章　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

第一节　政治统治的理论与本质

一、政治统治的理论

主要包括精英统治理论、多元统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政治统治的本质

国家产生的前提与目的，决定了国家的政治统治实质上就是阶级统治行为，但不是统治阶级的一般行为，而是维护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最高行为。统治行为的内容集中表现在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

第二节　政治统治的过程与方式

一、政治统治的合法化

每一种政治秩序建立后，统治阶级都要力图使这种秩序合法化或获得合法性。在传统上，合法化的主要手段是意识形态。

二、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统治中，合法性不仅来自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经济福利的

实现。

三、政治统治的类型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区分，主要有卡里斯马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

第三节　政治管理

一、政治管理的含义

政治管理的范畴。政治管理与政治统治的关系。

二、政治管理的作用

三、政治决策

1. 政治决策的含义

政治决策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其基本要素包括决策信息的输入、输出和反馈等。

2. 决策科学化问题

主要是信息沟通体制和决策体制问题。

第六章　政治参与

第一节　政治参与的含义

一、政治参与的定义

政治参与的定义及构成政治参与的基本要素。

二、政治参与的限度

古典民主主义的参与观和精英民主主义的参与观之间的争论。

三、政治参与的方式与机制

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有投票、选举、主动接触和集团活动。机制有政党、利益集团等。

第二节　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一、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对政治参与的巨大影响及其表现。

二、社会环境与社会地位

在构成社会环境的诸要素中，教育、职业、收入、年龄、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和居住地，都与政治参与有关系。

三、政治制度对政治参与的制约

政治平等与自由、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公民的政治热情与态度。在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所有的政治变量中，政党的影响是最大的。

四、政治心理影响政治参与

人们参与政治是希望得到某些报酬。心理变量指来自个体的性格特征（遗传与后天习得）和知识结构。个性特征及知识结构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并由此而造成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第三节　政治参与的作用和发展方向

一、政治参与与民主政治

政治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的正常运转也同样有赖于政治参与。

二、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政治参与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关键原因。

三、政治参与与经济发展

西方社会政治参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四、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治参与从资本主义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参与，最后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的全社会的政治参与。第二，政治参与由少数人参与到多数人参与，再到全体人参与。第三，政治参与行为方式从单一化向多样化再向多层化发展。

第七章　政治发展

第一节　政治发展概述

一、政治发展的定义

政治发展实质是在利益和利益关系变化和发展的基础上，政治权力和权力关系、政治权利和权利关系、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相互关系的变化发展。

二、政治发展的表现形式

政治发展采取两种基本形态和方式，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在社会政治现实中，政治发展也表现为政治关系各种衍生形态的发展变化。

三、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

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在特定经济社会关系基础上体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运动。

第二节　政治现代化

一、政治现代化的概念与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亨廷顿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家道路。

二、政治革命与政治改革

1. 革命的含义与政治革命的条件

革命的含义。政治革命的条件要从主客观两个层次进行理解。

2. 政治改革的含义

对于政治改革的含义要综合各方面认识，同时要与政治革命进行比较。

第三节　政治民主

一、民主的含义

民主的语义考察。基本的民主流派：古典民主主义、精英民主主义、多元民主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

二、政治民主的价值

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民主价值的分析。

三、政治民主的基础

主要分析民主的经济基础和法制基础。

四、政治民主的制度化类型

1.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民主的经济基础是财产的私有制，政治制度上的多党制、选举制和代议制。

2.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其基本内容：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政治制度；第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第二编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第一节　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三个阶段。莫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评价

空想社会主义的贡献。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一、近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呼唤新的社会主义理论

19世纪30—40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及其特点。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二、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成分，把社会主义从空想阶段推进到了科学阶段。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历史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一次历史性

飞跃。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把社会主义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把工人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这两大运动合流，整个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四、《共产党宣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思想。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思想。关于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理论。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新总结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要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工人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首先是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建设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重要条件。民族独立是各民族和谐合作的必需条件。工人阶级只有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

社会主义是科学，就要求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要防止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第二章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一、列宁主义关于俄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帝国主义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十月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二、列宁对俄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实质。20 世纪 20 年代末苏联领导层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的后果。

第二节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在国际上的推广

一、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成就

苏联的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历史成就。

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弊病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过度集权。这一特征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

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多时达到 16 国。

苏联在国际上强行推广自己的模式。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国际上推广，其效果和影响存在差异性。

第三节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及其历史教训

一、20世纪5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20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冲破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赫鲁晓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匈牙利模式。“布拉格之春”。

20世纪5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主要成就与历史局限性。

二、苏联东欧剧变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

东欧国家的剧变及其特点。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及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1年12月苏联解体。

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苏联解体的原因错综复杂，必须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同时还要抓住关键，分清主次。苏联解体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第二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第三是西方从外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苏联原有的模式积弊太深。这并不是说苏联模式已经无药可救，而是说必须对苏联模式进行根本改革，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去代替旧模式。

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和改革中必须汲取以下三点主要历史教训：要警惕右的，但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改革必须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快自身的改革，避免给西方的和平演变找到可以利用的突破口。

第三章　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及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探索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理论。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节　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一、越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1986 年的越共六大。革新开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越南的经济革新措施。越南的政治革新措施。胡志明思想。

二、老挝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革新开放的政策与措施。

三、朝鲜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朝鲜劳动党。“主体思想”。主体社会主义。金日成。金正日。先军政治。冷战以来的朝鲜内政与外交变化。

四、古巴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古巴改革开放的主要措施。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

罗。何塞·马蒂思想。

第三节　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探索

一、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全球化。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

二、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

面对冷战后出现的新形势与新问题，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结合各自面临的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和积极的探索。

冷战后，一批共产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动荡与滑坡之后逐渐稳定下来，并积极谋求发展，一些党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还有所加强。有些党是国内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或第二大党，有些党是国内重要的参政党，有些党长期在地方执政，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共产党通过艰苦努力成了国内的执政党。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三、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几个有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

在冷战后时代，有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除各共产党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政党的民族社会主义、红色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等。

第四章　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命运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教训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共产党和多种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世界政治舞台和许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社会主义初步显示了优越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不懈地搞好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努力探索反映时代特点、适合本国国情和具体历史条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必须善于把握时机，勇于在历史转折关头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阶段。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要教训

必须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必须善于把理想和现实、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近期切身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必须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革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防止和反对大党大国主义。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当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标准来看，人类社会正面临一个科学技术革命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时代。从生产关系性质和阶级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已进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共处、竞争和斗争的新时代。

二、当代科学社会主义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新科技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经济全球化也为社

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也给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断地创造着条件。

三、当代科学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在当今这样一个新科技革命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共处、竞争和斗争的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挑战包括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民主化的挑战、当代资本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自身的挑战。

四、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战略

放弃战争引起革命的旧战略，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去争取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树立长期斗争的观念，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放弃短期突进的“左”的观念。放弃以某一国家为中心领导世界革命的观念，要立足于搞好本国建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调整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由对峙、对抗转向长期和平共处、对话、交流、合作、竞争，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在对外开放中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立足于求同存异，联合各类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要区别对待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各种政党，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第三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毛泽东思想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特点及革命的缘起。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爱国运动及其意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初期斗争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和意义。中共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及其意义。

第二节　国民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一、国共合作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及其内容。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形成。

二、国民革命的爆发与失败

五卅运动的意义。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北伐战争与工农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右派集团的相继叛变和革命失败的原因。

三、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

第三节　土地革命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一、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土地革命的兴起

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方针的制定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基本思想的提出

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土地革命路线。人民军队建军原则。

三、“左”倾路线的危害和革命道路的历史性转折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红军长征。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意义。

四、反抗日本侵略和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西安事变和团结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第四节　抗日战争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初期抗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特点。两条抗战路线和抗战初期的两个战场。

二、相持阶段的抗战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

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和国民党妥协投降的逆流。反“扫荡”、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及其成熟标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及其意义。《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四、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共七大的内容及其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第五节　全国解放战争

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提出。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

二、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自卫战争方针。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确定。第三条道路的破产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三大战役。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

第六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的确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党的任务。

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

军事上完成大陆的解放。政治上建立和健全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外交上积极发展同各国政府与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并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

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开展

力争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

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五、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邓小平理论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中共八大的召开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三、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五、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七千人大会。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中共九大。

二、林彪、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林彪集团的覆灭。江青集团篡党夺权阴谋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的危害。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

三、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

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组织上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经济上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四、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

中共十二大的内容和意义。各项改革事业的进一步展开。中共十三大的内容和意义。中共十四大的内容和意义。中共十五大的内容和意义。中共十六大的理论贡献。中共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四节　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精髓

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中国过去“学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利弊。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两个凡事”不是马克思主义。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达到实事求是。在摸索中“求是”,在试验中创新。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三、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

第五节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我国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基本保证。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

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三步走”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内容和重要意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根本任务和目标。“一国两制”的内涵和意义。

第六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

一、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品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品质。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在联系。

三、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坚持、继承、发展与创新。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七节 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思想，提出党在目前历史阶段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本质上是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围绕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在社会主义本质、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一国两制、和平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等诸多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第四编　国际政治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

国际政治的定义。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含义及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三个层次关系。

国际政治的总体体系及其特点。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现代国际法体系所确立的基本准则。

二、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学是新兴综合学科,其研究有多种方法。

三、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

国际政治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国家间交往的发展而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催生了现代国际政治。现代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第二节　国际政治理论

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

理想主义学派及其特征。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行为主义学派的基本特征。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特征。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及代表人物。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和特征。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第二章　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

第一节　国际体系及其特征

一、国际体系及其形成

国际体系的含义。国际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其标志。

二、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及原因

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原因。

三、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国际体系的整体性。国际体系的相互联系性。国际体系的不平等性。

第二节　国际政治格局类型及其特征

一、国际政治格局及其类型

国际政治格局及其构成。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类型。

二、国际政治格局的一般特征

国际政治格局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国际政治格局同世界经济格局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国际政治格局同国际秩序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国际政治格局演进过程中的过渡性特征。

第三节　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演进

一、二战以前的国际政治格局

战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战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时期。

二、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

两大阵营尖锐对峙时期(战后初期至50年代)。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时期(60年代)。两极多元下的相互制约时期(70年代至80年代)。

三、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及其特征

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重新组合和结构调整。各种力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多样。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依旧存在。

四、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

国际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在减弱“极化”世界的趋势。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将异常激烈。区域化的趋势将有所加强,区域化的区域界限将进一步扩展。

第三章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主体

第一节　民族国家

一、民族国家的含义及其基本类型

民族国家的含义。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必须具备的要素。当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类型。

二、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基本行为主体

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基本行为主体的原因。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

一、国家主权的含义

国家主权的定义。国家对内主权的含义及其特点。国家对外主权及其特点。国家对内主权与对外主权的关系。

二、国家主权观念的发展

国家主权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民族国家的意义。

三、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

国家主权面临的两方面挑战。

第三节　国家利益

一、国家利益的含义

国家利益的含义。国家根本利益的内容和要素。国家根本利益的意义。

二、国家利益的复合两重性

国家利益的阶级性与民族性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利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及其相互关系。

三、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国家利益是各国对外活动的动因。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国家利益的变化引起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变化。

四、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的含义。国际合作的特点。国际合作发展的新趋势。

五、国际冲突

国际冲突的含义及特点。当前国际冲突的具体特点。国际冲突的类型。国际冲突的结构性因素。国际冲突管理的含义。国际冲突不同阶段的不同处理策略和方法。国际危机管理的两种基本方式。

第四节　综合国力

一、综合国力的含义和构成

综合国力的含义。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物质力量及其构成要素;精神力量及其构成要素。构成综合国力各要素的层次性。

二、综合国力的评估与比较分析

综合国力的测试模式:克莱因公式;富克斯的强国公式;综合国力

的动态方程及其他测试模式。对这些模式的评价。综合国力比较研究应予考虑的因素。

三、综合国力对国家和国际政治的意义

综合国力提供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要求的基础和手段。综合国力对比态势决定国际政治格局。

第四章　国际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主体

第一节　国 际 组 织

一、国际组织的含义及其特征

国际组织的含义。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

二、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维护和平,防止战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和保障人权。

三、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国际组织产生的历史条件。当今国际组织的特点。

四、国际组织的类型

依据国际组织的宗旨和职能划分的一般性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组织。依据国际组织的地域特点划分的世界性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组织。依据国际组织的构成划分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五、联合国

联合国建立的经过。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

第二节　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

二、国际关系中的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关系主要角色原因。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

第五章　外交政策

第一节　外交与外交政策

一、外交的含义

外交的含义及其特点。当今外交的时代特点。外交的类型与方式。外交关系的基本形式。

二、外交政策及其结构

外交政策的含义及其特点。制定外交政策应予考虑的因素。

第二节　外交决策

一、外交决策的形成

外交决策的含义及其特点。外交决策的原则。外交决策的制约环境。影响外交决策的内部环境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当代外交决策的新特点。外交决策的类型:常规决策和危机决策。

二、外交决策的优化

外交决策优化的含义。外交决策优化的决策系统:信息子系统的含义和功能;智囊子系统的含义和组织形式;决策子系统的构成与职

能。外交决策优化的运行原则。

三、外交决策的效能

外交决策效能的含义。实现外交决策最佳效能的注意因素。外交政策实施的基本手段。

第六章　国际政治环境及其发展趋势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国际政治

一、自然环境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

国际政治中的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自然环境对国家综合国力构成的影响。

二、自然环境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和政策的影响

地理因素的影响。人口状况的影响。自然资源的影响。

三、自然环境对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各国实力对比的影响。自然环境对国家行为能力和国家利益的影响。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

四、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

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全球环境问题。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刻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和原因。

第二节　经济因素与国际政治

一、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南北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经济因素在当今国际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深入发展给当代国际政治带来诸多新问题。

二、经济实力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基础和保障

经济实力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

三、经济手段是实现国际政治目的的主要方式

经济手段可以使国家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势力范围。经济手段可以削弱和限制对手的发展。

四、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国际经济是国际政治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第三节　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

一、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其内容

二、科技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科技影响综合国力:科技直接影响国家实力。科技因素影响自然资源在国力构成中的地位。科技因素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科技因素对综合国力中的精神因素的影响。

科技革命的发展使现代战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更加复杂化。

科技革命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国际政治的全球化。

三、科技竞争是当今国际政治的新领域

第四节　文化因素与国际政治

一、文化因素日益参与国际政治

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影响综合国力;影响国家间的政治联系;文化差异和矛盾导致国际冲突。

二、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宗教影响国际政治的原因。宗教对国际关系的阻碍作用:宗教冲突造成部分国家落后;宗教矛盾和冲突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导致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

三、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意识形态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手段。

第五节　相互依存的发展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

一、相互依存与国际一体化的发展

相互依存的含义。相互依存时代国际政治的新特点。国际一体化的含义。国际一体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二、全球问题的出现与发展

全球问题的含义和特征。当前全球问题的内容。全球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三、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共同主题

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提出及其依据。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关系。

复习指南

第一编　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制度

第一章　政治的性质

第一节　政治与政治学

一、政治的概念

主要的政治观有：政治是一种上帝安排人世的力量；政治是一种治国之道；政治就是政府的活动；政治就是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

人们对政治的认识是随同政治发展而一同进步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是神圣的、特权阶层的事；而到了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政治扩展到政府的管理活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政治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系统化过程。对这一概念应作如下理解：

1. 社会需要进行资源分配

任何一个社会必须寻求一种途径以决定社会的资源和代价是如何分配的。这个分配过程就是政治。因此，政治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关键部分，没有政治过程，社会就不能运转。

无论是在原始部落社会还是在日益复杂的现代国家，政府和政治家主要从事的就是这项活动。决定“谁得到什么”的方法和技术可能

因制度而异，但是政治的这一基本功能是不变的。权利和权力的取得都属于“谁得到什么”的问题。所以，问题已不是一个社会是否存在政治，而是政治过程采用何种形式。

2. 分配必须是权威性的

权威性分配是指有可能影响社会上每一个成员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并不一定要直接影响社会上的每个成员，政策的执行通常是有选择性的。

分配必须是权威性的说法必然导致这样一个命题：那些最有权威和权力的人控制着政治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政治体系由少数只为自己谋利益的精英分子所控制，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很多的团体和个人都能参与最基本的分配过程。因此，权威性分配是指在大多数政治制度中，拥有权威和权力的政府机构做出决定。参与分配过程的还有政党、社团及政治个人。

另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一个政治体系不但是分配好处，还要分配代价。军队、警察和社会福利项目的存在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多数人总是追求他们认为公平份额的好处，同时却力图减轻他们支付代价的份额。政府靠征税和服役来分配这些代价。

3. 资源的分配是一个系统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受社会运动制约的一个部分。因此，政治决定是政治系统和社会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

我们把政治看成系统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政治并不是存在于它自己的独立的世界里。事实上，政治过程在履行着社会的关键性功能，政治系统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它从社会那里接受“输入”（要求与支持），把输入的信息处理后就做出某些“输出”（决定），决定的执行又反馈到“输入”单位。

这一系统模式对我们理解政治有何帮助呢？其中一个重要意义是说明政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输入（要求与支持）影响输出（决定），而输出又影响下一轮的输入，如此循环不断。另外，把政治看成一个系统有助于理解政治过程的关联性。政治活动不是在与世

隔绝的场所进行的，而是与文化、法律、经济等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又为政治活动提供某些规则。更重要的是，把政治看做系统使人们明白政府是“谁得到什么”的主要决定者。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一观点揭示了政治的基本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是派生的事物，受到更深层的社会物质运动的制约。要把握政治的基本特征就不能停留在政治本身，否则就会以表象掩盖本质。由此看来，过去人们从政府、权力及其他方面研究政治，都未能揭示政治的基本特征。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属性的命题。政治既然受经济活动的制约，那么因生产关系而形成的阶级关系必然要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

“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方式、任务和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内容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受制于社会物质运动，即受客观规律支配，因而是一门科学。

由上述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论，为人类认识政治现象作出了革命性贡献。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对政治的研究与人类的彻底解放结合起来，具有科学性、阶级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同时，在实践中也需要不断发展。

三、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1. 政治学的含义

政治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不同的时代人们对政治学的认识也不一样。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学的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关注政府的结构及影响政府构成的因素、政府的政策及行为；二是认为政治学主要是集中在权力及其影响力方面。

根据政治的本质，政治学是研究公共权力的形式及运作规律的科

学。这种概括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任何时代的公共权力形式及其活动方式都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公共权力。然而，在任何时代，公共权力都是存在的，政治学均应对之加以研究。因此，我们认为，对政治学概念的概括应该高度抽象，而不宜过分狭窄。

谈到什么是政治学，不能不涉及政治学的规范性与科学性两个方面。规范性活动的核心是“应当是什么”（what should be），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哲学。

由于政治哲学不能回答现实问题，政治学家们便企图把政治学发展成能解释和回答政治现象的工具，于是就有了政治学的科学化问题。18 世纪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科学的基础。

2. 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中国人对政治的研究源远流长，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大的时期。

中国古代政治学，集中体现在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在诸子百家中，对中国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

到了近代，中国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对政治的研究也落后于西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很贫乏，而且受到西方思想的不少影响。

1919 年之后，中国的大学开始了政治学教学，出现了一批政治学原理教科书，如李剑农的《政治学概论》。同时，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也被大量地介绍进来。与此同时，政治学者也开始了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史方面，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那个时代，也是至今研究中国政治的经典之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形成了阵容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队伍。这一队伍与实践相结合，开始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

3. 西方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政治学作为一门规范性的学科，起源于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至今，我们可以把西方政治学分为古典主义时期、传统主义

时期、行为主义时期和后行为主义时期四大阶段。

古典主义时期(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的政治学与哲学往往难以区分。古典主义时期政治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直接改造了西方世界,其思想价值至今为世人所重视。

传统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时期,宪法和法律被认为决定着政治家的权力与特权。到了20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些政治学家发现,在政府部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周围,各种非政府的组织和活动如政党、压力集团等对政策有很大的影响。于是,政治学的注意力从法律的组织机构转向政府机构周围的非正式活动。这种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是由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和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在其各自的《政府的过程》中完成的。

行为主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的勃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行为主义的着眼点是人及人的行为。与政治学的前两个时期相比较,行为主义政治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第一,行为主义关注的是政治活动者的行为,断然拒绝机构研究法。第二,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资料的量化是科学化的重要目标。第三,行为主义强调"社会科学的统一",即政治学要合理地利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资料来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第四,行为主义研究主张"价值祛除"(value free)或"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

后行为主义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如前所述,行为主义强调个人行为的研究,而不关心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但到6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反社会思潮,像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反文化革命,以及反越战运动,再加上美国的民权运动,迫使社会科学家尤其是政治学家认识到,所有的社会问题研究确实渗透着意识形态问题。在突出价值和道德研究的后行为主义之初,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尔斯的《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长期以来的沉寂。对政策的兴趣实际上表明了后行为主义者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关心。

由上述可见，在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上，政治学都有各个不同的取向和不同的研究政治的最佳设想。实际上，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思想家和学者都在探讨什么是政治这个老问题。

4.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是政治学史上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揭示人类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寻求解放全人类的政治途径。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使人们对政治现象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基于经典作家的政治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纲领性文献。列宁和毛泽东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出了宝贵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阶级问题、革命问题、国家问题、未来社会问题，以及体现于各个问题中的政治关系。这些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原理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概念，为改造世界作出了革命性贡献。

在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中国的革命道路本身就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同时也丰富了全人类的政治学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都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成果。

第二节　政治权力

一、政治权力的概念

不管如何定义政治，离开权力就无法认识和解释政治。现代政治学关于权力的形形色色的说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韦伯虽然较少地论及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更多关注的是作为权力的特殊形态的合法性权力或权威，但他的分析仍然开辟了现实主义

的新道路。韦伯认为政治或国家的核心就是权力，他说："总之，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即意味着争取分配权力并争取对权力的分配施加影响，这种权力分配或者是在国家之间进行，或者是在一个国家中的集团之间进行。"韦伯同样以权力来定义国家："如果行政官员在一个特定领域内持续贯彻其命令中，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权力的权力，那么这个带有连续组织的强制性政治社团就是国家。"而韦伯的权力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他认为"'权力'是指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排除抗拒其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

不管如何解释权力，都离不开强制力、作用和结果三个方面。因此，政治权力就是在政治关系中，权力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作用于权力客体的一种政治力量。对此概念应作如下理解：

首先，权力是政治关系的中介，即无权力便不能构成政治关系。政治关系的要素是权力主体、权力客体及政治作用。

权力主体是指占有或行使权力的个人或团体。权力主体主要指国家，即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政府。此外还包括政党、政治社团及政治个人。在现代社会，占有权力的主体可能并不行使权力，这主要是由于代表制的形成使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分离开来。

权力客体是指接受权力作用的群体或个人。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关系是相对的。个人或团体在某个范围或行动中表现得强有力，而在另一个范围或行动中就可能相对软弱。在现实政治关系中，无论是在国内政治中还是在国际政治中，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

即使在同一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位置也可能会互换。

政治作用是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主要是政治强制力，但这并不排除半强制力量和非强制力量的作用，因为政治权力的本质包含着生物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和心理的因素。生物方面（动物界）的因素决定了权力主要表现为暴力现象；经济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人们把追求政治权力作为获取更好的生活条件的重要手段，即政治权力是满足经济权力的最好工具；心理方面的因素决定人的服从与合群的天性，政治

权力起源于人的这种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政治权力的上述几个方面，决定了权力作用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强制力形式。这也说明，政治权力与其他领域的权力复杂地交错在一起。

其次，政治权力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利益。利益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物质上的，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或者兼有二者。比如美国的所谓“人权外交”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原则，最终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说到底是物质上的需要。

再次，权力主体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对比。谈论政治权力，不能不论及作为权力基础的资源，因为它们直接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强弱。

作为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的特征。强制性是指国家权力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暴力或准暴力性质；专业性是指国家权力分别由行政、立法、司法等专业部门执行；自主性则意味着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力有不受经济基础约束的一面，从而推动或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政治权力的类型

在政治过程中，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强制性权力、功利性权力、操纵性权力、合法性权力以及人格型权力。

1. 强制性权力

强制性权力是最为普遍存在的权力形式。在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政府首脑要求地方行政长官支持他的政策，否则将以降职相威胁；公民必须纳税，因为不纳税就会发生他不希望看到的结局；或者当一个小国屈服于大国的淫威而被迫妥协时，这一切都是强制性权力。强制性权力是指，甲要求乙做某事，乙因受到甲的威胁，虽然不愿做但不得不去做。乙是否服从甲的意志，取决于乙的决定：要么按照甲的希望去做，要么面对甲的威胁。如果乙按照甲的希望去做了，威胁成功了；如果乙违背甲的意志，甲就必须决定是否实施威胁。

在强制性权力中，“可信性”是至关重要的。强制性的威胁一旦发出，一定要让受威胁方感到，这种威胁是可行的，是实际存在的。这样才能保持政治权力的威力。

2. 功利性权力

功利性权力基本上与强制性权力相反，如果权力客体服从权力主体的意志，权力主体就会承诺给权力客体某种好处。这种权力被称为功利性的，是因为权力主体对客体提供的东西是实用的、有价值的。作为功利性的政治奖励，主要包括财富、职位、雇用、荣誉及权力（权力既可以作为手段，也可以作为目的）。

在现实政治世界，若干行动者都企图运用权力影响他方，达到完全控制对方的情况是很少的，经常是各方都取得部分成功，其中一些人的所得大于另一些人。权力运动的这种现象颇像非零和博弈。由此我们再次看到了政治的本质就是给予与索取的关系。

这并不是说权力是平等地分配的，相反，政治权力从未被平等地分配过。权力存在的本身就说明一个集体组织中的不平等关系，把统治（管理）他人的权力赋予某些人，并强迫被统治（管理）者必须服从。

3. 操纵性权力

在前两种权力中，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沟通关系，即权力主体向权力客体明示或暗示了威胁或承诺，以便让权力客体衡量一下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操纵性权力并不是建立在公开的沟通基础之上，而是以更巧妙的方式全部或部分地改变权力客体的价值观。实行操纵性权力的技巧主要有“洗脑”、宣传和社会化。

在罗伯特·达尔看来，操纵性权力主要表现为操纵性说服。“A不是向B传播真实信息而提供对选择的正确理解，而是企图操纵B的理解来说服B行动。当A在影响B时，在传播中故意歪曲、篡改或隐瞒A所知的事实的某些方面，而如果B知道了这些方面就会大大影响B的决定，这时就存在着操纵性的说服”。

4. 合法性权力

合法性是每一个政治体系都致力追求的。简单地说，合法性权力是为他人做决定的权力。如何实现合法性权力呢？主要是凭借强制力，通过信仰体系（belief system）来实现。所谓信仰体系，就是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服从某种统治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它为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有了合法性权力，决策者就无需借助威胁、许诺

或操纵而颁布与执行他们的决定，权力客体将会接受决策者的权威。

因而，在合法性权力中，关键是权威。在政治上，权威是人们对享有权力的人的地位的认同和对其命令的服从。我们说某人是权威，是指他在某个问题上比别人知道得多，如医生、科学家、建筑师、律师。当人们认为他或她是某个领域的权威时，就会接受他或她的判断而不会去证明其判断。医生不必向病人提供其诊断过程的详细证明，病人通常也接受医生的诊断或劝告。这样，真正的权威的决定不会受到怀疑。人们越是要求证明和解释，他们对权威的信任度就越低。

由于政治的制度化，政治权威通常存在于机构与过程之中。合法性通常需要某种特定的仪式或过程。在传统社会，皇帝的加冕或登基仪式标志着权力的有序转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选举过程就赋予了谁获得替别人作出决定的权力。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是给合法性权力补充能量的一种重要形式。

5. 人格型权力

人格型权力也叫影响力。如果权威来自人们对制度与过程的尊敬，那么影响力则来自人们对特殊类型的人的尊敬，这种人具有超凡的品质、个人魅力、启示力。

在日常生活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人能够运用他的人格的力量去控制他人。在政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形容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卡里斯马(Charisma)。卡里斯马原指古代的宗教先知、战争英雄，是马克斯·韦伯把它引入政治学的。韦伯把现代政治运动和宗教活动中的“最伟大的”英雄、领袖、先知、救星、救世主都纳入卡里斯马概念来考虑。

在分别探讨了权力的五种形态后，让我们再看一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每一个国家都要使用不同的权力形式来保证人们服从政府的政策，因而，强制力经常出现于政治过程。从本质上说，权力可能是有害的，强制力则肯定是有害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减少这种麻烦和强制力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权力必须以更复杂的面目出现。统治者为了更经济地、更有效地达到预期效果，会利用合法

性权力、影响力及功利性权力和操纵性权力。那么它们之间的主要关系是什么样的?

强制性权力和功利性权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软硬兼施”。比之复杂的是合法性权力与操纵性权力的关系。合法性权力常常来自宣传与政治社会化,人们通过政治学习而承认某一政治制度的权威。操纵性权力能导致合法化;同样,合法化也有利于运用操纵性权力。合法化领袖更容易被信任,很多公民并不怀疑官方对有关政治与军事事件的解释。在目前世界上很多政治体系中,都存在这种基本的信任。但是,如果官方利用这种信任,通过歪曲或仅选择有利于政府的事实以实行更多的控制,从长远来看,则会导致政府权威性的下降。这种现象确实不容忽视。

在我们分析影响力与权威时,已经强调过官职与个人的区别。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卡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他不仅能获取官职、组织政府,甚至在他去世后仍然保持巨大的影响力。

三、政治权力的基础

政治权力的基础是指取得和占有政治权力的资源或资本,主要包括武力、财富、技能、知识、动机以及制度因素等。

1. 武力

武力是政治权力的首要基础。武力本身是一种权力,但又不同于权力。政治权力靠强制力去实行,因此,武力主要应被看成后盾。在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之际,武力最强者得天下。革命要靠武力,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军队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如何保证军队服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军队的行为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权力及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国家权力。

在国际政治中,作为国家实力象征的武力更是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强权政治时代,“弱国无外交”的弱国首先是武力脆弱。当然,脆弱的武力是与其经济财富状况联系在一起的。

2. 财富

以财富的多少或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来解释政治权力，是一个古老的、著名的、流传甚广和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式。在诸多的解释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最具历史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活动产生的前提是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培育了政治权力。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着政治权力的性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各自不同的政治权力的性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权力制约着政治权力，因为一定阶级在经济领域内对其他阶级的支配权和控制权必然使其在政治领域中掌握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权。马克思在分析19世纪初的英国政治时指出，英国工业阶级无论在议院中力量怎样微弱，但由于它在工业革命中逐步掌握了经济资源，实际上主导了英国社会生活的潮流，因而它“仍然是时局的真正主人”。“寡头政治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

3．技能

两位获得大体相同资源或财富的人不可能行使等量的权力。一个经常可以见到的现象是，拥有大体相同的财富或社会地位的人在权力上会有很大的差别。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其他资源的差异而得到说明，比如合法性、人格魅力、知识等。但是，政治技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从马基雅弗利到今天，虽然很多人致力于这方面的分析，但政治技能在权力分析中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无论如何，政治技能对于个人权力的取得、政府的合法化宣传与社会化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

4．动机

动机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因为一个人是否有权力动机直接关系到他能否拥有权力，权力动机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他的权力的大小。两个拥有相同资源的人可能因为不同的动机而行使不同量的权力，一位可能会运用他的资源去增加他的权力，另一位可能不这么做。另外，一个人权力的大小不仅与自己的权力动机有关，还与被控制者的动机相关。

5．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在政治上就是以权力基础的身份出现。在政治上，我们说的知识不仅指一个人读书的多少，还指他占有的信息量和资料的多少。在信息时代，信息是权力的重要基础。作为政治权力的资源，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制度、关系等。这里的关系不但指个人的社会关系，还包括政党关系、对国家权力有影响的民族关系等。总之，随着政治过程的复杂化，必须审慎地对待作为政治权力基础的诸多因素。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需要的是技巧和专门知识，而不是权力的最原始的形式：暴力或武力。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技巧是操纵性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如何作出可信的威胁和让人信任的承诺同样需要技巧和艺术。一句话，成功的政治活动并不是显示令人生畏的力量，而是更多地运用技巧与知识的过程。但要记住，建立在财富之上的暴力永远是权力运动的最坚实的后盾。

思考题

1. 政治的含义。
2. 什么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
3.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4. 政治权力的含义。
5. 政治权力的类型有哪些？
6. 政治权力的基础是什么？

第二章　政治文化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内涵

一、政治文化的概念

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有其特有的模式和特点，这固然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系设置紧密相关，但也深受这个民族在特定

时期内普遍奉行的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化的因素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是普遍而深刻的。

20世纪50年代，由于战后世界政治局势发展的复杂性和政治学领域问题的多样性，美国政治学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有必要从事一种新的研究，以赶上日益发展的现实局势。195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规定，他认为："我们谈及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所有这些概念的困难是他们的意义过于弥散与含混"，而"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我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并将之称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或亚文化概念有很大的区别。政治文化是从行为个体的主观心理角度来研究影响社会政治行为过程的要素，而民族精神这样宏观的概念强调的是集体水平上的民族整体特征。阿尔蒙德的这一概念对政治学具有重大的学科意义。

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具有以下特性：

第一，政治文化既是政治范畴，又是文化范畴，是在文化与历史的长久积淀中形成的、支配与制约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政治观念的综合体系。

第二，政治文化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作为长期沉淀形成的一种心理意识，政治文化不会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改变，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滞留在人们的观念领域中，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持久的影响。

第三，政治文化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深刻的阶级性。一个民族在共同的地域、长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以及维系民族凝聚力的共同文化。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定价值倾向，必然要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也是政治文化相对于一般文化更为显著的特征。

第四，政治文化具有内部的结构性。一个政治体系中成员们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的信念、情感和态度，这并不是说政治文化就是铁板一

块，相反，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政治文化以外，每一种政治文化中往往还包括若干个亚文化。

概括而言，政治文化的内容包括三个基本成分：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评价取向。

1. 认知取向

即社会成员对政治形式、政治组织、政治过程、政治目的、政治手段、政治关系、政治产品等方面的知识，它表现为一系列的概念和判断。

2. 情感取向

即社会成员对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的情感，这是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活动中对行为客体及环境的内心体验，可以表现为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

3. 评价取向

即社会成员依据一套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或明确或含蓄地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所作的价值判断和评价。这主要包括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评价的心理过程两个部分，其中政治评价标准的确立尤为重要。政治倾向的这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为了对政治体系作出评价，人们就要对他们有所认识；政治认识可能受到政治感情的影响，也可能影响政治感情。

二、政治文化的功能

第一，政治文化规定了人们的政治倾向，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成为一种内化了的行为准则，直接影响政治行为的方式。政治文化构成个体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决定着个体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关系、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同时还决定着社会成员的政治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因此指导和决定着个体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对个体政治行为的起始、维持、变化和评价有着直接、内化的作用，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第二，政治文化决定了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模式。政治文化的性质、内容和作用，决定了它既是政治体制的内在核心灵魂，也是政治体制的外在环境支持。一种制度之所以能建立以及它特定的运作方式都体现着当时人的政治价值、态度、情感、评价等取向。此外，一种制度

一旦建立，又会使某种政治文化得到强化、削弱、改变，甚至培育出新的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视为政治文化的外在凝固形态，而政治文化不过是被人们内化了的政治制度。

第三，政治文化决定着体系内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政治机构及其行为规则只是政治制度的静态方面，政治的实际落实，即政策的制定及执行过程才是政治制度的动态表现。特定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效力。在这一方面，政治文化更是渗透到决策者、执行者的思想及行动中了。

第四，政治文化影响和制约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变革。政治体系是否容易发生重大变化与政治文化本身的性质和成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政治稳定的获得除了需要制度上的合理安排，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还必须有广大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和支持。所以，政治文化在社会成员心理意识层面上是否能形成对制度的拥护、对秩序的珍惜，无疑对政治稳定与否起到深度支持的作用。

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对于正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来说意义尤为重大。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本土化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就是：第一，吸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第二，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的合理因素；第三，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确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总之，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当务之急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第二节　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在“意识形态”(ideology)作为一个概念被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19世纪初创造出来不久，就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颇具贬义的名词，常常成为政治攻讦的工具和目标。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

随着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927年发表,以及德国哲学家曼海姆(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1929年发表(1936年译成中文),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重新流行起来。在意识形态理论家那里,意识形态是指某一社会团体对世界的认识体系,这种认识体系即世界观与个人、集体的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是行动的思想前提。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以一定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社会政治范畴,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应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该阶级和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思想理论依据。

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权合法性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总体性的观念,意识形态不同于政治心理。根据政治意识对政治现象反映的不同层次,可分为政治心理与作为意识形态最直接表现形式的政治思想。二者属于政治意识中的不同层次。但是,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民众的政治心理是意识形态存在的基础,而意识形态又影响着政治心理的形成。

为了比较全面地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必须弄清意识形态的特征。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现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却是指向现实的。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还是居非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都是为了维护或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

总体性。意识形态是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成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伦理、艺术、宗教、哲学等所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

阶级性。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功能。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其利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且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

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第二,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第三,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第四,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依赖性。意识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些表明,尽管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但它是第二位的,它不是决定性的、最终的。它对社会存在有依赖性,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此外,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隐蔽性。马克思通过对种种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分析,认为他们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以神秘的、扭曲的方式去反映现实世界。

二、意识形态的功能

1. 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

早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出现之前,意识形态就被政治化了。这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作为革命口号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资产阶级用来鼓动民众,同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有力工具。资产阶级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变成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就开始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化过程。

意识形态政治化固然显示了意识形态强劲的政治功能,即维护政权的合法化,推动大规模社会政治动员,实现政权的转移,但是极端的政治化也有其致命的弱点: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使意识形态的其他功能削弱;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体社会公众思想的模式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等等。

2.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在其载体和主体的某一特定团体的实践过

程中形成的，也是为该团体的整体利益服务的。既然这样，在社会经济过程中，意识形态具有怎样的经济功能呢？

在社会经济过程中，任何个人、团体的目标首先是保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其次是实现既有利益的增长。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具有下列几个基本经济功能：

（1）保护团体内部团结的稳定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作为某个团体的意识形态存在的，是团体成员共有的。因为它是团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认知体系，所以它有助于团体成员彼此达成认识上的一致与行动上的统一。

（2）论证团体集体行动的合理性。在经济生活中，任何团体采取的集体行动都不是盲目的，而是受其意识形态影响甚至支配的。意识形态的论证功能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对团体成员来说，使之确信采取与集体一致的步骤和做法是合理的、正义的，由此实现团体内部成员间的团结协作。另一方面，对其他团体以至整个社会来说，意识形态使特定团体的行为披上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外衣，证明其行动的合理性，减少其他团体的抵触和敌对，尽量争取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个角度讲，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会公开声称本团体行为的自我效用，而是强调团体行为具有普遍的效用，能够带来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共同的福利提高。

（3）动员团体全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行动的规模经济效益。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功能早已被许多人论证过。意识形态的动员功能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激发其所有成员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实现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是团体的长远目标对团体成员来说更具吸引力、说服力，以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做出短期利益的牺牲。

（4）约束团体成员的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出现。这个功能是 D. 诺斯反复强调的，也是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诺斯认为，新古典主义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虽然简单易用，但是忽视了“搭便车”现象（即在集体行动中或他人行动中，肯定存在个人借机占便宜的投机行为），因此不能严密地解释现实世界。因此，诺斯指出要用意识形态来弥补新古典主义的缺陷。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约束力只是

一种思想、道德上的“非正规约束”，是一种“软约束”，缺少执行和监督的制度保障。它的成功进行依靠个人对集体目标的认同及在个人成本—收益与集体成本—收益之间的权衡。因此，意识形态的约束力量是不稳定的，在执行集体目标的过程中，会由于逐渐与个人收益最大化原则的背离，逐渐失去效力。

3. 意识形态变革的滞后性及其影响

作为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需要合理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有力的“非正规性”规范。但是，意识形态变革的滞后带来了意识形态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间差。时间差的存在使得变革之后的意识形态常常成为束缚和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压制创新。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旧的制度、组织方式以及为这些物质存在辩护的旧的意识形态被打破。

（2）破坏正在变革团体存在的合法性。论证团体存在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但随着团体内部变革的进行，原有的意识形态与正在出现的团体新结构、新功能不能吻合。它的存在只是证明被改革的事物的合法性，否定正在出现的新兴制度结构与组织。

（3）造成团体成员的分裂，阻挠集体行动的进行。意识形态变革的滞后会造成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使在原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稳定合作关系出现裂痕。希望保存既得利益的团体成员会求助于原来的意识形态作为证明自身合法的工具；而那些主张打破现存利益分配格局的团体成员则会构造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这样就破坏了团体内部的团结和集体行动的顺利进行。

（4）助长“搭便车”现象的增加。“搭便车”现象的出现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结果。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约束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和占便宜的行为。但是，一旦意识形态变革滞后，造成原来统一的意识形态分裂并失去其强有力的约束，团体中的一些成员就会借机在集体行动中大肆投机，实现利益的非正常积累，攫取团体的控制权。

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

一、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与特点

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取向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学者们对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过程；一类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有意识地塑造其成员政治意识，传递政治文化的过程。

我们认为，政治社会化可以定义为：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成员在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具体说来，从个人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指公民获得社会既有的政治文化规范，包括政治信念、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的发展过程，是个人逐渐接受社会的政治文化规范，并使自己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的过程。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灌输、教育、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通过各种社会教育机构，获得利于政治系统有效运作、巩固和延续的社会环境。

由此可见，政治社会化有以下特征：

第一，互动性。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即政治社会化既是社会成员个人学习政治知识，形成政治观念和情感意识的过程，也是政治系统针对全社会成员有意识、有目的地通过各种渠道灌输、教育和传播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的过程。

第二，创新性。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社会的政治意识不断发展创新。因而，政治社会化是对社会政治意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第三，持续性。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按照传播方式可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政治社会化两种。直接的政治社会化指通过各种社会化手段向一定的对象传播政治信息，主观有目的地进行政治社会化，包括政治模仿、政治教育、政治专业训练和政治实践等，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政治宣传、政

治仪式等;间接的政治社会化指传播内容并不是政治性的,但它能诱导人们形成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行为模式,最终引起政治文化内容的改变。如家长关于政治问题的言谈举止、言传身教,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耳濡目染的政治影响。

从内容上,政治社会化可分为主流政治社会化与非主流政治社会化两种。前者指政府主导或支持的,旨在维持现行秩序,使人们接受现有的政治规范的过程。后者则是以传播非主流政治文化,甚至反对现有的政治规范为目的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活动。随着社会发展所逐渐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异质性,传播不同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也日益复杂多样起来。

二、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与功能

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获得政治文化的途径也是多方位的。执行社会化功能的机构按照组织化程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初级团体,包括家庭和同辈团体(如伙伴、朋友、同学、同事等)。初级团体复杂多样,因此难以形成整齐划一的政治态度。二是次级团体,如政党、工会、教育机构、公共宣传机构等。次级团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执行社会化功能更自觉、更深入,因此政府多利用次级团体向社会成员进行系统的教育、培养和训练。

政治社会化需要特定的媒介来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总的来说,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有:家庭、学校、同辈团体、大众传播、政府、社会政治组织、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等。

政治社会化既是塑造政治人格、造就政治角色的过程,也是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并且通过这两方面的作用对政治体系,甚至是整个政治生活产生广泛的根本性影响。因此,政治社会化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个人、政治文化和政治体系三个层面:赋予个人以特定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能力,传播、维持或改变社会政治文化,影响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

第一,政治社会化是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的关键因素,不仅培养公民参政议政的能力,而且塑造了公民的政治人格。首先,政治社会化决定着社会成员的参政能力,其中学校,特别是高等院

校，能够训练学生政治思辨和政治参与的能力。其次，政治社会化塑造一个人的政治人格。

第二，政治社会化传播、维持和改造着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手段和方式。相对于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是目的；相对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是手段。政治社会化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播政治文化，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实现政治文化的维护和改造。

第三，政治社会化是关系到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政治社会化的程度如何，关系到社会的政治文化是否能正确传递给下一代，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而直接影响到政治体系的稳定、巩固和发展。首先，政治社会化维持着政治体系的稳定。其次，政治社会化支持着政治系统顺利运行。最后，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发生变革的重要条件。

思考题

1. 政治文化的含义和特征是什么？
2. 政治文化的功能有哪些？
3.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4. 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是什么？
5. 意识形态滞后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6. 什么是政治社会化？
7. 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有哪些？

第三章　国　　家

第一节　国家理论

一、国家观的发展

理解国家的起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家的目的和存在的价值。国

家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有不同的学说和解释，下面扼要介绍几种主要的国家起源学说。

1. 国家神权说

神权说（ divine theory）或神源说（ theory of divine origin）是最早的一种国家学说。国家神权说有利于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重大影响。但是，国家神权说是不可以论证的，也是暴君统治的护身符。借神权而强化君权，是为暴君张目，导致不负责的政治。

2. 社会契约说

社会契约说是17、18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社会契约说是对国家神权说的直接否定。

社会契约说假定，国家之前是人类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 state of nature），所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都占有因自然法（ natural law）而产生的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因人们滥用自然权利，而使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得不到保障。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人们慢慢地经过明示或默示的同意，订立一种契约，以建立足以保障自然权利的国家和政府。这样，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 state of society）。以契约建立的国家，任务是遵守自然法，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如果统治者违背契约，人民有权推翻政府，由此得出主权在民的结论。为了防止统治者专横，洛克、孟德斯鸠主张分权制。

3. 国家暴力说

国家的存在就意味着政府的存在，政府是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机关。因而，不少学者从统治和暴力意义上来认识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认为，国家是暴力的化身，它的本质就是命令和强迫。博丹说："国家是受一种最高权力和理性所支配的家族及其共同事务的一种联结体。"

国家暴力说表明了一些国家的统治特征和统治手段，但并不能科学地揭示国家统治的本质，也就难以让人明白国家到底为何物。

4. 国家要素说

从汉语的语义学上看，国家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民族国家要素分为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三要素说认为国家是人口（居民）、领土（土地）、主权（权力）三者的联合体。四要素说是在三要素基础上加一个政府。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对国家的定义是："国家是一种政治团体；占有一定的领土，政治上存在一个政府，特别是有主权的或不受外来政府的统治而组织的任何人民的团体。"

二、国家的本质

形形色色的国家学说，大多只涉及国家的表面现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揭示了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详细地考察了国家的起源，指出国家是私有制出现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特殊暴力机关或"公共权力"是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为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设计的。具体地说：国家的产生是基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国家权力始终是用来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关系到国家的目的。国家在改变其剥削性质之前，国家的目的并非像统治阶级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全体人的幸福。当然，统治阶级也不会赤裸裸地说政权就是为本阶级服务的。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统治阶级会把自己的利益掩蔽在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名目之下。

国家权力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国家权力具有特殊的强制性。

第二，国家权力具有主权性。统治阶级为确保国家意志的威权性，总是要使国家权力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即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

第三，国家权力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国家的法律，要求全民共同遵守。国家权力以法律形式表现，使国家以第三种力量的面目加以仲裁，这样非常有利于统治阶级，使他们容易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把国家作为全社会的代表。

三、国家能力

在实践中，国家的职能能否顺利地得以实现，或者说国家的使命与

目的能否达到，往往是与“国家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能力是政府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国家构建分为两个层面，国家体制的运作范围以及国家体制的能力强弱，前者是指政府施政范围与功能，后者则是政策执行的效能与力量。这两个层面的交集代表着国家的强弱程度。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还是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论这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国家职能范围较广的国家还是国家职能范围较窄的国家，其国家大体都具备了较强的集中进行政治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以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以及促进社会相互依赖的能力。而且，越是后发展的国家，其现代化过程中，国家能力的大小就越加重要。国家能力主要由五个方面的相互交织、互为条件的能力构成：

第一，资源提取的能力，即政府可以合理、有效地动员和调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用于扩大目标、成就的能力。

第二，经济调控能力，指国家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第三，合法化能力，指国家运用政治符号在国民中制造政治共识，进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能力。

第四，社会管理和一体化能力，指国家对社会上的个人和集体越轨行为的防范和控制，特别是对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越轨行为的防范和控制。

第五，服务能力，即有效地向公众全面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不断扩大的政府产出和政府产出质量提高的能力。

四、国家的类型

亚里士多德以统治人数和服务对象为标准，把古希腊 150 多个城邦分为君主、贵族和共和政体三大类别。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 世纪，博丹以主权的归属取代统治人数的标准，把国家分为君主、贵族和民主三大政体。这一分类沿用很长时间。17 世纪和 18 世纪，又产生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类方法，历史上的国家被划分为奴隶制

国家、封建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1. 奴隶制国家

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作为生产者的奴隶，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除了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外，还有自由民阶层，其地位比奴隶要高，但也受到奴隶主的剥削。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奴隶制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对被统治的奴隶的专政。

2. 封建制国家

封建制国家的生产关系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者农民。因此，在本质上，封建制国家是封建主阶级对广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当然，不同的封建制国家在生产资料占有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西欧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领主占有制，中国实行地主制生产关系。由于这种区别，形成了不同封建制国家的不同特征。

3. 资产阶级国家

（1）自由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国家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倡导自由竞争，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放任主义，管理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的政府。这种政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在政治上，自由竞争的精神反映在建立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建立起稳固的代议制度。这时的议会的权力很大，处处制约着行政权力。因而，有人称这种国家为“议会制政府”。应该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民主，在这一时期迎合了资产阶级真正的需要。国家的作用是消极的，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守夜人”。

（2）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进入20世纪后，具有了垄断性，表现为垄断性财团的出现、垄断财团与政权的结合。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导致了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

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大范畴中，还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反动形式——作为极权主义典型的法西斯国家，以及把后发展国家推向现代化的威权主义国家。

法西斯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又称极权主义国家。法西斯主

义国家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反动形式。法西斯政权首先在意大利出现，后来又发展至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西班牙、芬兰和日本。法西斯国家的代表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种族论”、“国家至上论”、“领袖威权论”和“生存空间论”。

在统治形式上，法西斯国家由国家以军事或准军事的方式全面控制社会，整个社会被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政治统治对人的非政治生活也无孔不入，社会彻底政治化了。法西斯主义国家打破了国家与社会团体之间的所有界限，甚至打破了国家与个人人格之间的界限。

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并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主要国家被进步力量摧毁后，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

威权主义国家。威权主义国家是指那些既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继进入发达资本主义行列，这种现象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把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称为威权主义。威权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与威权主义的字面意义相反，政治威权较弱，因此鼓吹中央集权。传统权威已经崩溃，现代法治权威还没有牢固确立。由于缺乏权威，统治者较多地运用强制性权力和操纵性权力。权力更替往往带来动荡。

第二，政治权力集中于个人或少数精英集团手中，而不是政党手中；政党常常是统治者个人的工具。政治反对派受到压制。

第三，社会受到国家的有限控制，实行较开放的民间经济活动，有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而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

第四，在意识形态上，往往以民族主义来动员社会支持；当民族主义号召力下降时，有时会假借西方民主或社会主义进行政治动员。意识形态的先天不足使得威权主义政治缺乏认同，所以，威权主义国家往往是赤裸裸的权力统治。

自 70 年代以来，一些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政治转型，开始

了所谓的民主化浪潮，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拉美的墨西哥和智利都先后转型。

4. 社会主义国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类型的典型代表，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其基本特征有：

第一，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辅助于一定的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

第二，在政党制度上，加强共产党领导，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第三，在政府体制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议行合一”制，党管干部、党管政府、党管议事制度。

第四，在经济制度上多元的经济成分并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五，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国家居统帅地位，个人和社团拥有一定程度的空间。

从以上特征看，现行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强调集中和中央权威、经济上实行多元化的国家形态。

第二节　国家的形式

一、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即政府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用什么形式组成其实现阶级统治权力的国家政权机关。

就人类社会的实践看，政府体制可以分为两大类：君主制与共和制。

1. 君主制

君主制是共和制的对称，是指以君主为国家元首的政权组织形式。随着历史的演变，君主制政体可以分为若干类型。

专制君主制与等级君主制。这两种君主制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

会。在专制君主制国家，最高权力完全属于君主，“朕即国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都是典型的君主专制。等级君主制存在于土地领主制的中世纪欧洲，这里的等级君主制又叫做等级代表君主制，即在君主之下，有一个由僧侣、贵族和商人代表组成的等级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表决对君主没有约束力，但国家征税必须征得代表会议的同意。由此可见，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权组织形式的不同。应该说，欧洲的君主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某种限制。

立宪君主制。它是资产阶级类型国家的一种政体，是资产阶级国家以君主为国家元首，但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不同程度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立宪君主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时期，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实行妥协的结果。根据君主的实际地位和权力大小，立宪君主制政体又可分为“二元制”和“议会制”两种。

议会君主制是指政府对议会负责、君主的权力受到议会约束、君主为虚位元首而无实际权力的国家。在议会君主制国家，议会权力大为增强，议会成了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内阁由议会产生，而且必须对议会负责。与此相对应，君主的实际权力大为减弱，君主的职责大多是礼仪性的；有的君主连形式上的权力也没有，仅仅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二元君主制形式上存在君主和议会两个权力中心，君主权力受到议会和宪法限制，可是，实际上君主掌握着政府任命权、解散议会权、钦定宪法权等权力。二元君主制一般存在于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相对较强的国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帝国，当代的摩洛哥、约旦等。

2. 共和制

共和制是君主制的对称，是国家代表机关或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府体制或国家形式。选举产生统治者的历史源远流长，因而共和制具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和阶级性质。

资产阶级共和制。共和制是资产阶级国家采取的较为普遍的政权组织形式。它通常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实行限任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理想形式。从总统、议会和政府三者关系上看，资产阶级共和制又分为议会制、总

统制和混合型的议会—总统制三种。

议会制是指政府(内阁)由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组成,并在法律上对议会负责的共和国制度。当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后,内阁必须辞职或提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进行改选,以使新议会决定内阁的去留。议会制又称为内阁制。

总统制是指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政府不对议会负责的共和国制度。因此,独立选任的总统,不论是否得到议会的支持,都在法定的期限内任职。美国是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总统拥有相当多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同时,议会保留有较多的决策权,并对选民负责。

混合型的议会—总统制。总统由全民投票选举产生,有法定的任期,而不论是否得到议会的支持。总统拥有重大权力,总理由总统任命和撤换,但也要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这些国家都实行多党制。实行混合制是既要避免议会制下政府的频繁更迭,又要避免权力过分集中。

无产阶级共和制。实行议行合一,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由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国家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他职能部门均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二、国家的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就是国家权力如何按地理或区域来划分,其核心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按中央与地方的不同权力关系,国家的结构形式主要分为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

1. 单一制国家

单一制国家是指在由若干行政区域组成的统一主权国家里,权力和威权合法地集中于中央机构。具体的权力和责任可授权给地方政府和部门,但被授予的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并且可以撤销这些授权。

中国是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之内,在最高国家机关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以实行

自治的民族成员为主组成自治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充分行使自治权利。

在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和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特别行政区仍然是我国单一制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在中国，只有一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任何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不管它的地位有多特殊，都必须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特别行政区是根据宪法授权设立的一级地方政权，因而它与中央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2. 联邦制国家

联邦制就是指由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若干成员国或成员州构成的统一的国家。联邦制的主要特征是：联邦有统一的宪法、法律以及最高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联邦的地位高于成员州或成员国，联邦宪法对各成员州或成员国的权限有明确的规定。各成员国或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拥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并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对外享有一定的独立权。各州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两院制的联邦国会中，其中的一院通常由各州选出等额的议员组成。各州的政体和联邦政府一样。美国和瑞士的宪法规定，各州应采取共和政体，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宪法要求各省不得违反君主立宪制。

除单一制和联邦制外，历史上一些国家还存在过邦联制。邦联制中的中央政府拥有形式上的权力，缺乏实施法律的手段，诸如直接的征税权和直接的管理权。1777—1787 年的美国、1813—1866 年的德意志，都是邦联制。有人还把联合国和各种地区性的联盟，如欧盟、东盟看成是邦联式的国家。

第三节　国家机构

一、国家机构设置的原则

对当代政府机构的设立影响最大的学说是分权学说和“议行合一”思想。

分权学说。分权学说虽然源远流长，但最初的影响并不大，一直到

文艺复兴，特别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古老的分权学说才在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治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产生了新的内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传播。这一历史性工作的完成者是约翰·洛克。洛克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其中立法权是至上的，以此来支持当时已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代议制。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对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一直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国家机构所公认的原则。首先采用这一原则的是美国，美国宪法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相互制衡原则。

分权学说的实质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在分权学说中，资产阶级掌握的立法机构的地位高于一切。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完全为资产阶级掌握。因此，三权制衡也只是资产阶级统治者之间的制衡。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宪法中都贯彻了分权学说，只不过在制衡的具体形式上有所不同。

“议行合一”原则。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共和国，贯彻议行合一原则，即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合二为一，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法机关。“议行合一”原则在苏联和当今中国有了新的发展形式，但本质上不变。作为执行法律的机关——国务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系统的很多成员，同时又是人民代表。因此，作为人民代表的政府官员既立法，又执法。再者，执法机关由立法机关产生，并对立法机关负责。因而，我国的政权组织原则是以“议行合一”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

二、国家元首

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在实际上或形式上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在政府机构体系中实质上或象征性地居于首脑地位。任何性质的国家，都要设置国家元首。在君主制国家，国家元首称为国王或皇帝。在共和制国家，国家元首称为总统或主席。元首对于国家的作用有：第一，象征国家；第二，代表国家；第三，对内代表国家的统一。

三、立法机关

立法机关是指有权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机关。立法机关在不同的国家里的实际权力是不一样的，但这一机构的设置表明，一个合法

性政府至少需要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规定，立法机构的成员或代表由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

1. 立法机关的结构

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组织一般分为一院制和两院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两院制，更多的国家实行一院制。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机关实行一院制。在大多数国家的两院中，其中一个占主导地位，另一个（如英国的上院和法国的参议院）起牵制和搁延作用。但美国的两院制是个例外，参议院和众议院具有同等的权力。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内部，一般有两种组织，一是政党组织，二是委员会。在欧洲国家，议会内的政党纪律比较严格，议员很少违背党魁的指示去表决。委员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中居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美国，没有各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就不会有国会的运转。美国国会委员会的类型有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s）、小型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s）、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s）。常设委员会共20个左右，如预算拨款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其下设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s）。

2. 议会的主要职能

（1）立法权。这是议会的传统权力。立法权就是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

立法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第二类是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权力。一方面，立法机关自己制定法律；另一方面，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条例、决议和命令等，它们都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还流行一种“委任立法”制度。它是指议会只制定法律的一般原则，对于法律条文本身所具有的具体内容不作详细规定，而用明文委任行政机关另行制定决议、命令、条例、细则等具体措施。

（2）财政权。这也是议会的一项传统权力，议会因财政问题而出现。财政权是指议会对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赋税案、公债案以及其他有关公民负担的财政法案的审议权。上述提案只有得到议会的通过，才

能成为政策或法律。所以，财政权又叫财政同意权。

（3）监督权。监督权主要表现在批准对官吏的任命和监督政府的执法行为方面。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监督权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在议会制国家，由于政府对议会负责，而政府又是在议会中居多数议席的政党执掌，监督权要相对弱小。比较而言，在典型的三权制衡国家，议会的监督作用相对大些。国会委员会往往通过听证会和作证形式来监督一个行政部门的日常工作，有时会雇用侦探来调查行政机关活动的合法性，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会对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四、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是指那些有权力制定政策、执行法律法规的机关。

1. 中国的行政领导机关

对中国的行政机关应作广义上的理解。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国的行政机关是执政党设置的，共产党以执政党身份管理国家事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机关，设有各种职能口，如工业口、农业口、文化教育与卫生口、商业贸易口、财经口，等等。这些口均有执政党的高层领导人相应地负责。应充分认识政治局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政治局一方面在组织和思想上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在重大政治决策中起关键性的作用。政治局实行集体领导制。国务院总理为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主任和秘书长等组成，实行总理负责制。

2. 总统制的行政机关

在总统制国家，行政权力集于总统一身，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家行政机关首脑。

美国是最为典型的总统制国家，彻底地实行三权分立原则。总统与国会、法院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总统有权签署或有条件地否决国会决议的法案，有权推荐各级法官备政府任用；国会批准总统对官员的提名，并以“委员会批准制度”来制约行政部门的决定；法院审查总统和国会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

3. 内阁制的行政机关

内阁制发源于英国，并成了当今西方世界的主要政府制度。内阁是内阁制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其主要特点是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相结合，立法与行政权力都集中在内阁手中。

内阁由首相挑选若干大臣（部长）组成，入阁的大臣或部长即为阁员，他们对首相负责，阁员之间互相负连带责任。凡遇内阁首相提出辞职时，全体内阁成员必须一起辞职。

由于内阁制在一些主要的资产阶级国家比较流行，资产阶级学者对内阁制倍加赞扬，认为这种制度的优点是：

第一，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力合作，保证了政府活动的敏捷、迅速和有效。

第二，议会和选民都可以监督政府。

遇有紧急情况时，内阁可以实行应急政策。

内阁制的缺点是，议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不如总统制国家议会那么有力。

4. 混合型的行政机关

混合型的内阁—总统制下的行政权力比较特殊和复杂。

5. 官僚制

任何政府的运转都离不开官僚部门。官僚部门就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属的行政体制或职能部门。作为一种制度，官僚是指所有大型组织中由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韦伯把官僚定义为具有下列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

（1）等级制，即每个官员都拥有明确的特定权限，并对其上级负责；

（2）非人格化，即每个官员的工作是根据固定的规则而不是根据官员的好恶来确定；每项具体事务都必须保留文字记录；

（3）延续性，即行政官员是一个专职的薪金阶层，其职务稳定，并有望正常晋升；

（4）专业化，即官员都是择优录用，受过专门训练，并系统了解所在领域的全部知识。

韦伯认为，上述特征综合在一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管理的效能，使官僚同复杂的工业社会息息相关。

官僚机构的职能是什么？官员们究竟做些什么？其中一项最关键的政治功能是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实施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在政治过程中，官僚还是事实上的立法者。但是，官僚制的特征决定了官僚总是保守的。

五、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是指行使司法权的法院和检察院。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是否独立，关系到该国的政府组织是否完善、人民的政治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所以，很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或者"审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

1. 司法独立原则

西方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司法权的独立。独立原则是指：第一，非司法机关，非按司法程序，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和审讯；第二，法院在审判中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干涉；第三，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预；第四，法官在审判时，按"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办事，不受各方面意见包括检察官控诉的影响。

2. 司法民主原则

司法民主原则包括公开审判、辩护、陪审、回避、上诉以及所谓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刑讯逼供。这些原则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野蛮残酷的审讯方式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民主原则和平等原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它们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局限性。

思考题

1. 主要的国家观有哪些？
2. 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3. 什么是国家能力？
4. 威权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5. 结合中国的现实，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6. 影响国家机构设置的重大理论有哪些？
7. 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及其作用是什么？
8. 委员会制度在议会中的作用是什么？

第四章　政党与政治社团

第一节　政党理论

一、政党的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起源于近代西方国家。19世纪以来，随着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并有所发展，近代国家产生并趋向成熟。在此过程中，当社会中的民族内聚力开始足以容忍政治分裂，容忍为权力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竞争，并力图使其制度化时，政党便开始产生了。

那么什么是政党呢？政党同立法机关中的联盟、社会运动及利益团体有什么区别呢？政党即社会中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活跃分子，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一种政治组织，社会承认它具有组织与扩张其主张的合法权利，它也积极介入到政治生活之中，为取得或维持政权，或影响政治权力的行使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政党不同于立法机关中的联盟，它并不是立法机关的组成部分，其成员也不必然就是议员；它不同于社会运动或利益团体，政党通过提名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方式，选择执政者及影响国家政策，介入政权之中，而社会运动或利益集团比较关心政府要做些什么这个层面，或者说，更关心政府的具体政策，并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对之发挥影响作用。

政党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或政治组织的特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党具有的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是把政府形式上的结构与社会中的各种不同成分联系起来的“纽带”，这些成分包括个体公民和由他们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宗教组织及其他

组织。

第二，政党一般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以及一整套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设计的政治纲领。

第三，政党是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它有系统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原则。现代政党，一般都有从中央直到基层的组织机构。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通常设有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主席团等领导机构，有的在议会中还设有议会党团组织。政党通过这种发达的组织系统，将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使得自身具有较强的政治行动能力。

第四，政党的存在受到法律的保护，具有合法性。政党组织是以参与政权为核心目标的组织，在法律上确定政党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成熟，各国在法律之中都对政党的法律地位作了规定，从而赋予政党的活动以合法性。

二、政党的类型

当今世界各国很少有国家没有政党存在，对它们进行适当分类，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把握这些政党的特性及作用。

1. 按理念的本质和角色来划分

在政党的政治纲领之中，集中体现了政党所根植于其中的政治理念及运用政权的方案。据此可以把政党分为使命政党（ missionary party）和掮客政党（ broker party）。使命政党是一个以吸引人们皈依并信奉其理念为主要目的，而非以扩大选民支持而赢得公职选举为主要目标的政党。这种类型政党的一个典型例子即为美国的社会主义劳工党。

掮客政党的目标是要尽可能多地推选出候选人，而且这些候选人要尽可能地代表许多不同的利益以及政治理念。掮客政党以赢得选举为自己的核心目的。这种类型政党的最佳例子是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同使命政党相比，这两个政党都没有一个为党员或党的支持者所分享的政治理念。

2. 按集权的程度来划分

一般而言，多数政党都有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这样的层级划分。政党在各层次组织之间的权力分配也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

各政党推举候选人的方式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按照权力集中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政党分为分权型政党与集权型政党两类。

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都是中央集权型的。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的选区党部选出国会议员候选人,但两党的中央党部机构有权否决某些候选人获得提名。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采用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的比例代表制,中央党部机构推选名单上的候选人并决定其出现在名单上的先后顺序。

此外,如果以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为标准,可将政党分为左、中、右三类;以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态度为标准,可将政党分为拥护体制党即维护现行制度的政党,与反体制党即对现行体制持反对态度的政党;以政党是否执政为标准,可将其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以政党是否得到合法的法律地位为标准,可将其分为合法政党与非法政党。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划分、阶级斗争的产物和表现,以政党的阶级属性为标准的划分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政党的本质。根据这一标准,世界上众多的政党大体可以分为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及极少数代表封建社会中各阶级利益的政党。与其他阶级性质的政党相比,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无产阶级政党以广大工人阶级为其阶级基础,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的政党的根本特征。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战斗集体。每个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组织活动,缴纳党费,遵守党章和党纲,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三,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是工人阶级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工人阶级在实践中还可以组织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议会党团以及其他形式的社团组织;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还可以建立国家政权机关。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则是所有这一切组织的核心,把群众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工作统一起来,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三、政党的作用

政党作为政治组织,作为连接政府机构与社会的纽带,它必定承担

一定的政治功能，在政治系统之中发挥它的作用。

1. 目标制定

具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政治纲领，是政党有别于其他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政治目标及纲领，不仅反映了某一政党对待具体的、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的态度，同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能够充分表现该党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倾向。

2. 利益表达

政党需要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通过政治目标、纲领或政策等形式反映出来，并通过组织竞选等活动，在选举获胜组织内阁执掌政权的时候，使其利益得到实现或部分实现。这是政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功能。如果利益表达功能不发生变化的话，党纲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3. 动员和社会化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政党无疑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组织。通过竞选活动，政党将分散的选民个人组织起来，使他们作为一个团体而介入到政治生活之中。在政党形成初期，这种政治动员功能表现得更为明显，许多政党就是从社会运动之中发展起来的。从历史上较长的时间段来看，政治参与的扩大或参与方式的变革都会导致新型政党的产生，随后它们建立联盟，分享权力，进而致力于改变竞赛规则以及政治过程的内容。

4. 精英的形成与遴选

精英形成与纳新功能越来越成为政党所独有的一种功能。在许多政党之中，未来的精英人物在进入政府执掌政权之前，都必须在党的机关之中，或在议会里长期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除了美国和少数半总统制国家（如芬兰、法国）之外，无党派部长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为了承担起这些政治功能，政党所进行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举候选人。各国政党推选党内候选人的过程与程序也不尽相同。在一些国家中，所有公职选举中推举政党候选人的权力都集中在党中央，在另一些国家却恰恰相反，推举候选人的权力分散在区党部和地方党部。

第二，竞选。在西方国家之中，大多数政党都要积极地募款，支持其候选人参加竞选，以保证他能够顺利当选。

第三，组织政府。现代政府一般都由许多不同的机构组成，互相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非常必要的。政党在使政府运转有序并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其他活动。除了以上的三种活动以外，政党还进行许多其他的活动，如举办社交活动，使得上下能够打成一片；成立青年组织动员新的选民；资助童子军、夏令营和组织成人进修班；出版图书和不同的报纸杂志，等等。政党所属的民族、地区或语言群体，在选举中以自由选民的身份出现，从而使得选举个人化。

第二节　政党制度

一、政党制度的含义

所谓政党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或状态。也有人使用政党体系这一概念，两者含义相去不是太远。

各国的政党制度所采取的不同形式是由于各国的环境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有两党制、一党制和多党制等三种形式。西方学者习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统称为“一党制度”，并加上“极权主义”的形容词进行歪曲和诽谤。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是一种与传统政党制度在本质上并不相同的新型政党制度。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即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或状态。具体说来，就是通过议会选举和竞选活动，由各不同政党依法轮流执政，单独或联合掌握政权，以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群众，实现政治生活有序运转的政治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普遍存在的政党制度类型为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制。

1. 两党制

两党制是指两个同等规模的政党争夺职位，双方各有几乎相等的机会赢得足够的选民支持，以取得垄断性执政权的体制。英国和美国

是典型的两党制的例子。在两党制中，并非只存在两个政党，而是指有两个居于垄断地位的政党，除了它们之外，其他的政党规模和影响力都比较小，只能参与并影响政权，却不能单独掌握政权。

对政党制度的传统分析一般比较强调两党制的好处，认为两党制有如下优点：第一，两党制是一个较负责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当中，选民必须在两个可替换的政府中做出明确的选择，模棱两可、含混不清是不行的。第二，两党制比较公平，鼓励竞争，它鼓励政府更换，能够有效地防止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集团无限期地垄断行政权力，保障民主的持续和发展。第三，两党制被视为是鼓励温和政治活动的体制，为了赢得竞选，两大党都必须争取到为数甚众的中间阵营的支持。但是，实际上实行两党制的国家，政治稳定、政治风格稳健的原因，并不一定就是它们实行这种政党制度，还有其他一些历史、文化、宗教的因素需要考虑在内。

2. 多党制

多党制指两个以上的政党相互竞争，通常通过联合阵线组成政府的体制。

从传统的观点看来，多党制同两党制相比，有许多缺点。第一，选民不能直接决定由谁来组织政府，政府的组成并不是依据选票，而往往是由各党之间在选举之后进行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决定的。第二，某些居支配地位的政党的支持，对组成各届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样，这些居支配地位的政党通常能够获得远远超出它所得选票的影响力。第三，研究者认为纯粹的多党制是在鼓励意识形态竞争，政党之间的斗争以观念为核心，而不是围绕着政府权力而进行。第四，认为多党制常常导致政治不稳定，因为个别政党或政党集团很难在立法机构中赢得多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组成的联盟非常脆弱，容易产生党内纷争，或联盟内部分裂，继而导致政府的崩溃，这也是大多数人对多党制的看法。

这些批评并非对多党制的定见。简单地将两党制与稳定相联系，将多党制与不稳定相联系的做法受到了批评。一些学者指出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民主国家为反例。在这些国家之中，尽管存在的是多党制，执政的政府也经常是联合政府，但是它们的政治体制本身既稳

定，又有助于温和政治。

3. 一党制

一党制是指只存在一个合法政党，或者其他政党虽然存在，但在法律上不允许它们与执政党竞争政权的体制。各个国家的一党制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有的是争取独立的过程就是单一政党领导的；有的则是取得政权后将原有政党合并为一而形成的；有的则是宣布其他政党为非法或通过军管，先取消一切政党，然后再确立某一政党的合法地位。人们将这种一党制又作进一步的区分，将其划分为法西斯一党制与单党制或一党威权制两种形式。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实质民主，保障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一般实行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居于统治地位，代表工人和农民等劳动阶级的利益，掌握国家政权，实行统治职能。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它们所实行的政党制度也有各自的特色。

1. 一党专政制

这种政党制度起源于苏联，实行这种政党制度历史最悠久的也是苏联。十月革命刚胜利时，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是多党制，由俄共（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在当时，列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俄共是领导者。随后，在1918年夏天左派社会党的一部分人参加了叛乱，该党的一些领导人公开宣传要推翻俄共（布）的领导，因此，左派社会革命党全俄苏维埃宣布解散，形成了俄共（布）一党执政的局面。1977年的苏联宪法明确规定了苏联共产党为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系和政府的核心。

苏共的基层党组织建立在各个工作场所之中，如工厂、农场、军事单位等。基层组织之上有地区、省和共和国这几个层次的委员会与党的机构。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党代表大会，有近五千位党的代表参加大会，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又分成许多委员会，其中，政治局是最高决策机关。政治局之上有党的总书记，这是整个党和政府组织中的关键人物。总书记是党的领袖，也是国家和政府的领袖。

苏联共产党十分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党做出决策之前，党员有权进行积极的讨论，党组织也鼓励党员这样做，但一旦做出了决策，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不再有进行批评的权利。在苏联，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各机构都有平行的政党组织，它们由中央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会来加以监督，由他们来控制和运作整个政府机构。战后，东欧许多国家模仿苏联模式，也建立了类似的政党制度。

2.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与一党专政不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允许一个以上的合法政党存在，允许它们参政、议政，如波兰有三个合法政党：波兰工人联盟党、农民联盟党和民主党；在中国，除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

第二，其他的合法政党以某种形式与共产党联合，在波兰为人民阵线，在中国则为政治协商制度，这样祛除了政党之间的竞争。

中国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最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选择多党合作制度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第一，错综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是我国多党合作现象的物质基础；第二，中国反动统治的专制化程度和我国政治发展任务的艰巨性，这是中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政治背景；第三，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力，逐渐成为中国多党合作的主导力量，这是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三节　政治社团

一、政治社团的含义

在政治学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社团的定义。严格说来，我们这里的政治社团实际上是指政治性社团。政治性社团既指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利益集团，也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群体。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性社团普遍民间化，甚至政党也是一种民间性的政治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过程中，政治性社团就是指利益集团、压力集团和院外活动集团。

利益集团就是社会中的一些成员为了共同的集团利益而结合在一起，通过积极行动而达到共同目的的一种社会组织。利益集团的成员既可能来自同一行业，也可能来自不同行业。利益集团所追求的利益可能是特殊的，也可能是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其活动范围因追求的利益不同而不同，活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利益集团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性概念。但是，多数利益集团一般都关注政府的某项政策。

压力集团和院外活动集团是经常与利益集团一同使用的两个术语。压力集团是指为实现某种特殊利益而对政府施加政治影响和压力的团体。当利益集团成为政治角色而企图影响公共决策和公共权力、使自己的特殊利益获得实现的时候，它就成为压力集团。可以说，在政治学上谈到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就是压力集团。

院外活动集团也是指利益集团而言的。“院外活动”的本意一是指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要求，有意识地进行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二是指这种活动是由利益集团自己或其聘请的代理人进行的。最初，院外活动只是指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在议会走廊或门厅（ lobby）里进行游说活动，院外活动集团就是指进行这种游说活动的利益集团。今天，院外活动这一术语已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泛指对整个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门）施加影响或压力的活动。这样，院外活动集团就成了和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含义一致的术语。

二、政治社团的作用

1. 利益集团在资本主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作为“第二圈的政策制定者”，利益集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都有着重大影响。无论是在福利政策、经济政策还是在军事工业方面，利益集团的活动余地都非常大。而在外交方面，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处处可见。

对于利益集团在资本主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必须基于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实来认识。

（1）集中各种利益。

西方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利益集团的首要作用是代表和集中各种利益。利益集团是社会中的一些成员为了共同

的集团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组织。

（2）政府的助手。

利益集团在接近议会和行政机构的过程中，事实上在起着重要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作用。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要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它们搜集情报，并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各个方面提出论点来支持或否定议会或行政部门的观点。利益集团还起着监察员的作用。利益集团的个别成员可以请求该集团总部帮他们陈述困难，同政府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利益集团敦促行政机构采取行动，当他们急迫地要求解决问题时，还可以提出抗议。

（3）制约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的制衡不仅来自政府内部，还需要政府外力量的制约，这就是以社会力量来制约政治权力。在美国，政治的本质是两次选举之间的决策过程，因而，要给政治一个令人信服的概念，就必须考察各集团、各种利益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就意味着，在多元化的西方社会，利益因素驱使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压，这种压力有时会改变政府或统治阶层的政治偏向，而使政治决策更理性。罗伯特·达尔说，独立的社会组织（利益集团）不仅是民族国家统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为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需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

（4）利益集团的弊病。

首先，利益集团是政治不平等的产物，也是推动政治不平等的因素。社会民众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结成利益集团，这种利益要求产生于特定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基础、政治身份、社会地位、意识形态取向，而最根本的是一定的经济地位。事实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成员明显地与其上层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成员大部分来自专家和管理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中上层阶级形成利益集团的基本组织构架。

其次，利益集团的活跃降低了政府权威，造成政府内部的分裂。由于利益集团的影响日益加强，议员们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而成立各种地区的或专门问题的小组或集团为其服务，行政管理机构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行业性利益集团，造成选民对政府权威失去信心。利益集

团追求特殊利益使得集团间矛盾冲突加剧。高度自治化的团体还会导致分裂和不稳定,从而使政府面临很多治理的难题。

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问题,多年来,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一直关心如何控制作为“第二圈决策者”的势力,尤其是大公司、工会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在控制企业方面,制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克来顿法,建立了管理委员会。对工会的控制是通过了塔夫脱—哈特来法、兰特勒姆—格里芬法。在控制一般利益集团方面,主要是 1946 年通过的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要求那些被雇用来影响立法的人——不论是起促成还是阻挠立法的作用,都要进行登记,报告其雇主的姓名,报酬多少,由谁支付报酬等。

能否进一步限制或控制利益集团的活动呢?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证人民有请愿权和言论自由权,完全禁止院外活动无疑是违宪的。即使限制院外活动的立法也是违宪的。同样,制定立法以限制利益集团、公司或工会在支持或反对某项立法进行院外活动上花多少钱,也是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一种侵犯。联邦竞选运动法案中有一条限制个人独立地支持某一候选人的花费,最高法院 1976 年否决了这一条款。如果对影响立法的院外活动的宣传上的开支加以限制,最高法院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看来,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利益集团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过程中的弊病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2.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团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社团是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是不同利益群体实现其特殊利益要求的工具。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社团作用于政治过程中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相互之间的非对抗性和合作,也就是说,各政治社团所代表的特殊利益要求及由此形成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能够相互合作;其次是在党和国家政府的领导下活动,各政治社团代表局部的、特殊的群体利益,因而只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实现其特殊的利益要求。那么,政治社团是如何发挥政治作用的呢?

(1) 参政议政。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政治社团主要是以“议廊政治”的方式进行

活动，西方议员则是职业政治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职业性的，而是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的代表，人民代表大会的形成特别注重不同社会群体的构成。这一区别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社团的活动不同于西方国家，有可能以某一阶层代表的方式进入代表大会，直接参与政治决策。

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一般说来，各地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的负责人都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则为各政治社团提供了独特的议政渠道。政治社团的代表不仅可以成为人大代表，进入政协，还可能直接加入政治领导机构。

进入领导层。社团领导人进入党委，直接参加这些机构的日常活动，以便更好地反映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并就一般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加入共产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实践，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阶层的代表加入共产党，并由此进入党的机构或政府部门。届时，政治社团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将会更直接、更有力。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社团参与政治只能在党和政府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若政治社团的政治活动超出了党和政府的价值判断，超出了活动领域，社团的政治角色就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大多数政治社团都能很好地理解党和政府的意图，把握自己的位置，使社团的工作与党和政府的要求相吻合。这是因为，大多数政治社团的负责人具有双重身份：社团负责人和国家干部，他们更看重国家干部的身份，因而都能自觉地服从上级，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社团活动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超出规范。民政部有关负责人 1991 年在社团管理会议上曾指出个别社团偏离正确方向，有可能被利用于进行与党和政府目标不相符的活动，因而必须加强对社团的管理。

（2）政府助手。

按照我国的社团登记法，社团登记注册的条件是，必须有一个主管单位。各级工、青、妇组织直接由各级党委负责，其他社团则由党政部门负责。政治社团作为党和政府的助手，弥补了政治管理体制的不足。行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一直是政治管理的主渠道，但在经济改革之后，涌现了大量新的社会成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成了“体制外”力量，而

行政机构和单位渠道显然无力直接管理这些新生力量。政治性社团的发展起到了第三行政渠道的作用。这三个渠道的互动，形成了空间的、单位的和类别的立体管理网络，增强了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

总之，政治社团的政治活动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各人民群众团体进行政治活动，参与政治决策，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这种民主政治进而促进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而且，政治社团的活动促进了政治稳定。一方面，新生社会力量的代表进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内表达利益，这就减轻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生力量对制度的冲击压力。另一方面，政治社团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对社团成员在各方面的管理，增强了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因此，政治社团在社会主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思考题

1. 政党的特征有哪些？
2. 政党的作用是什么？
3. 两党制与多党制有什么异同？
4.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什么？
5. 中国为什么会选择多党合作制度？
6. 利益集团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是什么？
7.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团的作用有哪些？

第五章　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

第一节　政治统治的理论与本质

一、政治统治的理论

目前，在西方的政治统治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是精英统治论、多元

统治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统治理论。

1. 精英统治论

精英统治论起源于古代的能人治国思想。中国古代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以知识为标准把人群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西方,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哲学王”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思想,精英统治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完成的。

精英统治理论的创始人认为,无论是在君主制、贵族制还是在民主制中,其共同点都是由少数人或精英统治的。精英之所以获得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具备了社会所推崇的才能和品质。精英们的权力基础不一定是经济关系,军事力量、教士地位或管理专长同样可能成为政治统治的基础。在任何情况下,统治者总是企图运用已有的权力去延续其统治,从而使政治统治成为世袭特权。精英分子所以失去权力,是因为没有制度化地吸纳新的社会力量。

古典的精英主义者认为,人民主权论中的民治思想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直接行使统治权,即使在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决定了由政治领袖组成的小圈子进行实际统治。正是这个小圈子,操纵着代表制度。无论社会怎样变革,政治不平等都将存在。

精英统治论的核心是精英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实际上是企图以“精英”概念取代“统治阶级”概念。这对马克斯·韦伯和米尔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出现了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混合理论,即“民主的精英统治”,认为在西方多元政治中,虽然存在竞争性的政治集团,但政治集团之争应被看成是精英统治者之争,因为领袖们并不总是在征求其他成员的意见后做出决定。政治家制造政策产品,而选民则消费政策产品。“民主的精英统治”理论主要来自熊彼特(J.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显然,从古典的精英主义到今天的民主的精英主义,都是为了抹杀政治统治的阶级本质。精英主义者不能解释清楚精英统治(无论是在军事、宗教或政治方面)在阶级关系方面的经济基础。

2. 多元统治论

现代多元主义者认为,“精英统治论”低估了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自治和各社会团体相互控制的能力。达尔认为,在现实国家中,国家的统治权或为寡头所有,或为众多的利益团体分享。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实际意义就是权力为众多自治团体分享的多头政治。社会集团之间通过不断竞争和妥协来获得对国家的控制权,但谁也不能垄断国家权力。国家被认为是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政治组织,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是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工具。国家的政治职能就是要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偏袒其中任何一方。国家应该保证社会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竞争有序和公正地进行。

多元主义者把国家的政治统治看成是公正的仲裁,把国家视为“社会整体”的托管人、工具和代理人,其实质和精英主义者一样,否认政治统治的阶级性,否认国家实际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再垄断决策权,国家权力趋向多元化。但是,利益集团所代表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定的阶级利益,团体政治的实质仍然是阶级政治。各团体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那些由资本家以及实际上由资本家在背后操纵的利益集团才对政治过程有重大影响,才能分享政府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国家的权力仍由统治阶级垄断,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独享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3. 新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论

新马克思主义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张一种自由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又分为工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国家的经济职能、政治统治职能和文化职能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之上,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要大力促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又不得不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以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

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并存的思想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出来,因而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政治统治的本质

国家既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国家正是在社会职能对社会逐渐独立并上升为社会统治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产生的前提与目的，决定了国家的政治统治实质上就是阶级统治行为，但不是统治阶级的一般行为，而是维护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最高行为。统治行为的内容集中表现在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统治秩序是存在于阶级对抗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总和，它是社会各阶级经过特殊斗争和较量后形成的，是取得胜利的阶级强加于整个社会的统治行为。

国家的本质决定了政治统治首先是阶级的统治。在阶级社会中，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本质上都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国家作为履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职能的管理机构，它所代表和维护的，实际上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公共利益。

当然，政治统治或阶级统治实际上也离不开维护公共利益。说政治统治的本质是阶级统治，决不意味着阶级统治就是国家活动的全部内容，国家还要以公共权威的面目出现来维护全社会的利益，并最终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以福利国家建成为标志，现代西方国家的职能呈扩大化和膨胀的趋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严格地控制着社会生活领域。这样的国家呈现三种特征：

（1）政治舞台上的扩大，即国家倾向于通过政治决策积极干预和管理资本主义，使之稳步增长并且保持充分就业。

（2）传统的以阶级分野为基础的左右翼之争正在明显减弱，公民在政党之间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技术合理性和经济增长成为凝聚大众的新的世俗宗教。

（3）平均主义的福利规划。国家通过政治机制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再分配，从而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要宽广得多。以福利制度为例，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扩大就业，建立各种保障制度，还要负担住房、物价补贴，等等。这一切表明，现代国家出现了新的变

化，并促使人们的国家观念也发生某种变化。人们不但应关注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本质，更应该关注政治统治的过程和政治统治赖以存在的国家的社会职能。

第二节　政治统治的过程与方式

一、政治统治的合法化

每一种政治秩序建立后，统治阶级都要力图使这种秩序合法化或获得合法性，以较少的精力和行政费用使自己的统治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合法性不只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律性（legality），它还具有某种正统性色彩。正是这种具有正统价值观念的合法性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持久的、最终的来源。

合法性不仅仅是一个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权力和权威的基础。在现实政治中很少有仅仅依靠强制力量进行统治的政权，各种“非纯粹”的强制统治形式，都要以合法性为基础，或者迟早要获得合法性。

合法性是如何获得的？这是政治统治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法律基础

合法性的获得首先依赖于一定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统治秩序。在统治秩序中，暴力提供了威慑力量，使反对势力不敢轻易地反对现政权；法律与制度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并为人们提供了据以行动的程序。

2. 意识形态教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支配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国家。这就意味着人的意识虽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能不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对社会的统治和支配作用实现。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这种思想的支配，将“决定着某一历史时

代的整个面貌”。事实表明，国家权力通过统治阶级思想意识这一中介，实现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控制，从而获得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普遍性认可。

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重要性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者所重视，也是其他流派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不仅以强制力量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反抗，还特别地强化了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操纵，使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家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夺取文化上的领导权，通过在市民社会中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来达到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新的形势需要人们对新目标做出新的解释。因此，意识形态需要一定的含糊性和灵活性，只有如此，意识形态才能被发展。期望政治体系中的每个成员都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政治意识形态太抽象、太复杂、太遥远；而对于一些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拒绝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甚至可能持对立的和冲突的意识形态。有时候，一个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会成为另一个时期的统治意识形态，如人民主权说与马列主义。

强调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特殊作用，绝不意味着精神力量一直决定着物质力量。恰恰相反，在人民的物质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强求思想意识的超前发展，希望因此营造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气氛，这种希望多半会落空。

因此，意识形态虽是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统治阶级决不能完全诉求于意识形态。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君权神授说”等宗教信仰系统和传统，那么在现代政治中，文化意识形态虽然仍然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统治阶级与政府的实际作为。

也就是说，合法化已不只是韦伯所说的信仰和价值判断问题，它已经扩大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经济职能已成为国家为其政治统治赢得大众广泛支持的重要手段。

二、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

政治统治是由在经济上居优势地位的阶级的统治，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权力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必须以公共利益的面目出现，这就意味着要考虑到全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才能得到更好地实现，政治秩序才能更加稳定。

但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中，国家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提供那些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利益和服务，例如，军事司法保护和修路架桥。而对于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市场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分配机制，即由“看不见的手”予以满足。然而在现代政治中，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国家已经成为与市场并驾齐驱的人类分配有限资源的另一种基本方式。林德布洛姆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不同程度”。现代国家不仅要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共同品，还要通过各种规范性的经济政策直接调节和引导经济发展，通过各种规范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满足社会各阶层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要顺利地进行下去，必须满足工人阶级的基本生活要求。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因素；另一方面，政治统治的巩固更直接依赖于经济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了全面的改革。但是，苏联的改革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经济上的实惠，在改革中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结果导致国家的分裂解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够在80年代末的国际风潮中不动摇，原因之一就是十年的经济改革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要求。这种鲜明的对比再次证明了：现代统治的合法性不仅在于政府说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政府实际上做些什么。

同时，必须牢记的是，在现代社会，人民主权理论的实现即作为权力主人的人民直接参与权力的分配，将是政治统治最为坚固的基础。

三、政治统治的类型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对政治统治进行分类研究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根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把政治统治分为卡里斯马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

卡里斯马型统治。卡里斯马式人物具有把人们吸引在周围而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同时追随者具有拥护这类领袖人物的赤诚态度。二者的结合便构成了卡里斯马型统治的合法性根据。卡里斯马型统治往往出现于社会危机时刻，卡里斯马式人物改变人们的生活境况，从而使人们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发生动摇，转而接受一种新的信仰，这就为某些有特殊能力的人取得权力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在危机时刻，渴望摆脱困境的群众也需要这种人的出现。因此，从荡涤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上看，卡里斯马式人物的作用是革命性的。但卡里斯马型权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最不稳固、“非常态的”统治形式，这不仅因为它缺少理性的稳定组织机构和它固有的反经济性，而且还因为领袖个人的生命迟早会终结，要选择新的卡里斯马式领袖来接替。这些因素促使卡里斯马型统治向其他形式转化，或者把职位卡里斯马化，造成新的卡里斯马式领袖；或者把权力世袭化，转向传统型统治；或者由追随者荐贤选能，转变为法理型统治。

传统型统治。一个统治的合法性若来自自称的、同时也为他人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规则和权力，那么这就是传统型统治。统治者获得权力的方式是根据沿袭下来的惯例，比如家长制、世袭制。在这种统治的组织机构中，最基本的特征是对个人的臣服，委任人员无视实际工作能力，行政人员没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和制度化的晋升标准。

法理型统治。与卡里斯马型和传统型的人治统治不同，在现代社会的法理型统治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种以法律为依据进行治理的社会。无论是领袖、官员，抑或普通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和束缚。领袖和官员一方面自身要服从这一非人格的法律秩序；另一方面，他们的任何决策和命令，也要受到这一秩序的辖制。服从统治的人是以自愿加入协议的组织成员身份而服从命令，他服从的只是这一组织的法律，只是一种非人格的秩序，而不

是服从统治者本人。

显然,法理性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更为牢固,其合法性比前两类统治依赖的合法性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韦伯对统治类型的划分不管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但忽视了阶级统治的事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存在过的统治分为两大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与多数人统治少数人。

第三节　政治管理

一、政治管理的含义

对于政治管理,人们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政治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伍罗德·威尔逊就是在行政管理意义上探讨政治管理的。广义的政治管理泛指国家对社会全部政治生活的调控,其中当然包括对国家行政机关自身政治生活的调整(公共行政的内容)。

什么是政治管理呢?或者说,政治管理的对象与基本范围是什么?必须首先明确,政治管理必须限定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即公共政治生活。一旦超越"公域"范围,不仅会扰民,干预人民群众的私生活,还会极大地破坏政治管理。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社会曾被高度政治化,许多与政治生活没有联系的现象都被赋予政治意义。对一些毫无政治意义或政治意义极小的行为进行"无限上纲",从而对之进行强化管理,结果粗暴地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

"公域"具体指什么呢?首先,它所涉及的问题必须是政治性的,其次,这些问题又必须相互影响,影响他人,影响社会。由此判断,宏观的社会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直接影响人们成长的微观社会环境(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社区背景等)当然属于公域范畴。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有不同的具体政治行为,原因之一就在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学校教育和其他微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必须对一些微观环境进行适当的管理。但是,应该看到,微观社会环境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机制极为复杂,决不能因个别的或一时的特殊情况而不适当

地放松或过分严格地实施对某些微观环境的管理。

除了环境因素外，公域还包括公民的政治性的行为本身，即公民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性的言论和政治性的活动。政府不可能不让人思想，但总是要力图影响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形成。而当言论进入公域时，它显然已影响了公共政治生活；而与公共政治生活无关或不在公共政治场合发表的政治性言论，均不在政治管理之列。当然，对政治性言论的管理，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对政治性活动管理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某些政治活动可能会威胁现政权的基础，或妨碍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或导致社会的动乱，或妨碍国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

因此，政治管理就是国家权力按照某种特定的秩序和目标对政治生活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约束或制约的一定方式。就是说，通过这种特殊的约束方式使政治生活的各方面都能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来运行和发展。由此可见，政治管理的目标是为了维护政治统治和保障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其行为方式是自觉地、有计划地约束；其作用的客体是一般社会成员以及统治阶级自身。

在清楚了政治管理的含义后，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管理与政治统治的一般关系。政治统治在本质上是国家的阶级统治。阶级统治以及统治秩序的稳定，要以国家的社会职能为基础。也就是说，作为社会职能表现的政治管理直接制约着政治统治，并为政治统治服务。因此，二者是相互依存关系。政治统治是政治管理的前提，而政治管理是政治统治的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治统治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成熟。很多时候，政治统治的职能甚至表现为政治管理。成熟的政治管理也越来越掩盖着政治统治的阶级本质。过去，有人把少数人管理的规律上升为少数人统治的“铁律”，就是混淆了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今天，由于政治统治更多地以政治管理为基础，政治统治更加技术化，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了governance（“治道”）研究热潮。

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具体区别是：

第一，政治管理和政治统治的客体有所不同。如前所述，管理总是少数人的事，自从政治出现以来，总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在这些多数人中，既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也包括被统治阶级的成员。政治统

治则不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政治统治的对象不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

第二，与上述区别相对应，二者的行为主体也不相同。政治统治的行为主体是由统治阶级组成的以暴力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机关，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由于政治统治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统治的主体不是具体的政权机关，而是整个统治阶级。例如，我们常说资产阶级统治或无产阶级统治。而政治管理的主体通常是政府或准政府组织。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党政之间在实际上难以分离，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也实际上充当着政治管理主体的角色。此外，在党领导下的各种政治团体也在一定条件下履行着政治管理主体的职能。

第三，政治管理和政治统治的作用方式不同。由于政治管理主要是调控人民群众的政治性行为，协调一些社会公共事务，因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政治管理的作用方式的性质是行政的和民主的而非专政的。相反，由于政治统治是统治阶级针对敌对阶级的政治行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因而当被统治阶级的行为威胁和动摇统治阶级的地位时，统治阶级常常要诉诸暴力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阶级专政便是政治统治行为的根本方式。尽管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但凡是存在政治统治的地方，政治管理均不能从根本上取代政治统治的行为方式。

二、政治管理的作用

政治管理主要以领导、决策、组织、协调、沟通、监督等方式发挥作用，其根本目标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与此相适应，政治管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现存的基本政治规范，增强人民群众对这些政治规范的认同和支持。任何国家都要以一定的政治规范来支持其存在和发展，这些政治规范一般在基本法律中加以明文规定。例如，我国的宪法规定了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项基本原则。西方国家的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体现着权力制衡与分立、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侵犯等基本精神。宪法中体现的基本规范，决定和制约着所有其他的政治生活。统治阶级要通过政治管理机关来维护这些规范，从而获得公民的自觉认同和支持。

第二，维护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首先有赖于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也是政治统治合法化的主要手段。经济发展需要正确的领导、成功的决策，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领导与决策的失误曾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政治统治因而也付出很高的成本。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有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有地区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政治管理机关去协调，努力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平衡，化解矛盾。否则，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的产生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动荡，而经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此，政治管理机关要维护正常的生活秩序所依赖的各种法律、规章、制度和程序，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秩序的稳定不但需要执行正常的法规，还要有效地贯彻政策。

第三，促进民主政治生活。近代以来，不管统治者愿意与否，都要让人民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如参政权、一人一票权。没有人民的支持与认可，任何统治都难以长久地存在下去。为此，统治者必须通过其管理机关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公民的权利的获得更有赖于公民的自下而上的参与，但政治管理机关会疏通这种参与的渠道，以化解社会矛盾。自上而下的保障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参与机制无疑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更好地保护了公民权利。

三、政治决策

政治决策行为是政治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是把有效的政治要求转化成权威性政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事件、环境和信息促成为取得某种预期的结果而做出选择。所谓有效的需求，就是拥有各种政治资源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政治决策是一个动态过程。政府组织可以认为是一种输入与输出的决策模式。利益综合部门根据政治要求和支持的情况而制定政策，政策的实施又会引起反馈；反馈信息促使利益综合部门对原来的政策进行修订、更改或废止。所以，任何一个行政机构都无法

坚持永久不变的政策，因为行政行为是受到内外环境因素刺激的结果。

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模式、程序与原则只是科学化决策的技术要求，而政治决策的科学化，还受制于政治民主、决策机制等重要的因素。民主政治与决策的科学化。没有民主化，就不能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因而就没有决策的科学化，民主政治是科学化决策的基础。

沟通体制与科学决策。政治沟通体制是决策科学化的前提。任何政治体系都面对着环境的作用和影响，环境的变化，要求政治体系做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就是政治信息的内容。政治信息本身不会自动传递，只有通过沟通，政治体系才能收集或接收与政治体系的目标相关的信息，才能在对政治信息进行适当的处理后，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适应环境的要求。

政策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的变化。而政策是否得当，这就需要反馈信息，以便政府适时调整政策，对待解决的问题做出更恰当的反应，使环境朝有利于政治体系的目标和方向发展。因此，政治信息的沟通已成了“政府的神经”。

沟通的复杂化是事物的本质决定的，这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更为危险的是，决策机构可能会面对失真的信息，这同样是任何现代国家都可能要遇到的问题。信息为何失实失真？一般解释是：一个组织在一定时期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进入的信息量和复杂程度超过一定的限度时，该组织要么歪曲信息，要么要花很长的时间处理这一信息；另外，当信息流经多层等级结构时，往往因上级的意愿和下级的屈从而被歪曲。

为了避免或减少信息失真，就需要建立多渠道的信息沟通体制，例如传媒系统、学术研究系统、专门的信息咨询系统、情报系统等，这样，决策者就可以利用其他信息来源对下属造成的失实报告加以平衡。因此，要做到决策的科学化，决策者不仅要根据本系统的信息进行决策，还要有意识地参照其他信息系统提供的情况；当然，前提是非政府的沟通系统首先要有制度性的渠道能向上传送信息。如果决策者主要依靠本系统的“简报”，又成天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这样的决策

往往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各级决策者制度性地深入基层，这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

决策的科学化还离不开民主的政治监督。如前所述，决策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政策在实际中的效果如何？需要信息反馈，以使决策者修改、调整原来的政策，使之更加合理化。除了专门的信息机构，信息的反馈就依赖于政治监督。

决策机构的规范化。决策机构的规范化不仅包括建立必须的机构，还要明确其各自的职能，并在各机构之间建立起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这是确保决策科学化的基本条件。信息系统只对信息的适用性、准确性和时效性负责；咨询系统只对它拟订方案的科学性负责；决策系统则只对决策方案的选择负责。信息系统和咨询系统应独立于决策系统，缺乏独立性，它们的存在就失去了价值；但它们又是为决策系统直接服务的，因此又要与决策系统建立起联系。这样就可避免主观臆断，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科学化。

思考题

1. 精英统治理论和多元统治理论的含义是什么？
2. 政治统治的本质是什么？
3. 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的关系是什么？
4. 政治统治的主要类型有哪些？
5. 政治管理与政治统治的关系是什么？
6. 信息沟通体制与科学化决策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六章　政治参与

第一节　政治参与的含义

一、政治参与的定义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亦称参与政治，是普通公民通过

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根据各国的政治实践，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有投票、选举、主动接触、政治结社等。

这一定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一般公民，是公民自下而上影响政治的过程。这是政治参与主体的非职业性特征，即政治参与者是相对于政治统治集团而言的社会大众，包括了相对于政府官员、政党干部等在内的职业政治人士而言的普通公民，也包括非政府性的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政治参与者与职业政治人士是不同的。职业政治人士是专门从事政治或政府职业工作的人，如政府官员、政党干部以及国外的院外活动分子，他们终身——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政治为职业，他们的政治行为更多表现为决定而非影响政治，因此他们不属于政治参与的主体。

第二，政治参与是一种实际的活动而不包括态度。

第三，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政府决定的活动。这是政治参与的指向性特征。政治是分配权威性资源的过程，政府必然卷入，是当然的政治主体。如定义所说，政治参与还指向包括与政府决定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但主要宗旨是为了影响政府的决策。这里的政府，不但指中央政府，还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因此，政治参与的活动是多层次的。根据政治的含义，我们可以知道，工人要求私人企业主改善工厂环境的要求，如罢工，不能看做是政治参与；而要求地方政府改善社区环境的要求则属于政治参与。这样，政治参与的活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活动的范围。

第四，政治参与不仅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动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且包括行动者受他人动员而发生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

因此，在谈到政治参与时，就不能排除那些动员参与。政治参与活动是主动和被动、自动和动员、自愿和强制的混合体。

二、政治参与的限度

政治参与应当向全社会开放还是局限于那些知道怎样明智地使用参政权的人在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中一直有争论。有的学者将民主的各种理论划分为强调公民参与的民主理论和限制公民参与的民主理论两

大类。

主张限制政治参与的一方认为，广泛的参政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足取，不必担心政治冷漠对政治制度有什么危险；相反，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更有利于政治制度的运作。这是因为：

鼓励那些对政治不熟悉、没有兴趣的人去参与政治，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好处。一个非理性的集合足以破坏任何得之不易的成就。因而，鼓励这些人参与政治会在实际上对民主造成破坏。

坚持认为每个公民都要参与政治的观点，只是以对民主的忠诚情感代替了对民主的理性判断。只增加投票的数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一张选票可以用来选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也可以用来选林肯式的人物。所以，不关心政治要比盲目地参与政治好。

即使在最理想的政治条件中，一些选民也不会具有进行政治判断所需要的实际政治知识。这是精英民主主义者的一种代表性观点。熊彼特认为，公民之间不可能就应当实现的公共利益达成一致意见；从个人意志出发的政治决定，并不一定能代表所有公民的意志；由于公民对政治问题往往容易产生超理性的乃至非理性的偏见和冲动，因此在危急时刻这些因素对于他的国家也许是致命的。在熊彼特那里，“民主主义”意味着给予人民承认或否认自己统治者的机会。他把民主主义比拟为市场机制，职业政治家被喻为政策的生产者，公民是选择政策的消费者。公民不是自己制造政策，而是通过定期选举，用选票买取自己最中意的专家（候选人）。

广泛的政治活动，从某些方面判断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利的因素。太活跃的团体会妨碍统治者去做他们最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公共议事日程被扭曲了。

上述观点基本上代表了精英民主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的民主观，而多元民主主义者对政治冷漠深感不安。沃科尔和莱恩系统地批判了精英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冷漠需要论，呼吁人们不要忘记给人以启蒙的古典民主主义。

（1）那些没有参与政治的人没有被合适地代表，政府就不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如果一些人主动地不享用参政的权利，政

府就可能无视他们的兴趣和需要;这样,他们也就愈加没有勇气和信心去获取政治信息和表达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对政治就会更加无知,公民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警惕性就会进一步下降。

(2) 广泛的政治冷漠给那些为所欲为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政府的机会。政治参与的功能之一,就是提醒统治者必须专心他们的本职工作,为选举他们的大众服务。若政治冷漠占上风,组织和维持对政府的监督就更加困难,权力的滥用就得不到制止。

(3) 参与政治是最好地提高公民判断水平的工具和途径。

(4) 广泛的不关心政治,既是政治制度软弱的表现又是政治制度软弱的根源。这意味着统治者没有将统治下的社会公民组织到政治活动中去,没有能力激起公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对自己的忠诚。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什么时候公民的大部分游离于正常的政治渠道之外,不能共同参与决定他们生活的决策,这一国家的政治空气就变得具有潜在的爆发性。

上述两方面的争论告诫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理解政治参与与民主的关系。说什么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好的,等于无视在一定情况下参与膨胀对政治系统的危害,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文化大革命";同样,强调参政活动的增加会降低政治生活的质量,又等于否认公民的社会权利。其实,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是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的。

三、政治参与的方式与机制

根据各国的政治实践,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有投票、选举、主动接触、政治结社等。

1. 投票

政治投票是公民个人在竞争性的政策或候选人之间或在其他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面前表示其政治偏好或政治态度的一种政治行为方式。政治投票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选举、罢免、复决等领域表达自己政治倾向的行为方式。作为政治参与的方式,投票目的有二:一是选举政治官员,二是进行全民公决以决定重大国事。在西方国家,投票是一种最为频繁的公民活动。

2. 选举

政治选举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组织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由全部或部分成员抉择一个或几个人充任该组织某种权威性职务的一种政治过程。它是由一系列政治活动组成的，诸如组织协调、宣传动员及其他影响选举过程或结果的活动，投票只是选举活动的最后阶段。与投票活动相比，投入选举的前期活动需要更多的主动性，也是更为困难的活动。选举是诸多政治参与方式中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普通公民影响政府的重要的、制度化了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其作用一方面与投票相同，即评判政府和政治官员；另一方面，选举过程训练了政治积极分子的政治才能，提高了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

3. 主动接触

公民个人因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主动与政治官员接触，陈述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这种参与被称为公民的主动接触。在主动接触中，因为公民单独行动，决定参与的目标和内容，因而是一种具有主动精神的参与。在我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一种重要的主动接触参与活动，自改革以来，“来信来访”的数量呈不断增加趋势，这表明我国普通公民的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4. 结社活动

现代宪法一般都赋予公民结社活动的自由。在政治参与意义上，结社活动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参加政党和政治社团，二是以团体或组织的方式去解决社会或政治问题。只要公民加入了政党，不管他是否参加了团体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他都已参与了政治。参加政党和政治社团，也是我国公民的一种主要参与方式。不过，加入了政治社团并不意味着就进行了政治参与；如果把加入这些目的广泛的政治社团就看成是政治参与，那就无限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含义。只有加入政治社团并积极从事团体的政治性活动的行为才属于政治参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集团参与。

集团活动分为社团性利益集团的活动和非正规利益集团的活动。前者是从事利益表达的专门机构，它们是为了表达某些特定集团的利

益目标而专门建立起来的。非正规集团的活动是一种经常性的集团参与。这类活动常见的方式有抗议示威、罢工以及其他非暴力的但剧烈而直接的压力，其中某些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参与活动——其最后的性质如何，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环境和参与者的行动。

关于参与机制，人们一般认为，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社会，由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臣民，所以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随着参与的扩大，政党出来组织参与；随着政党的发展，它又促进参与的扩大。现代和传统政治体系之间的最基本的差别是政治参与的范围，因而政党是现代政治的独特机构。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高度发达的政党制度，不管其政党性质如何。另外，在一些国家，利益集团作为参与的机制，起着与政党同样重要的作用，如美国。

第二节　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一、社会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呈现正相关关系。就社会经济发展对政治参与的长期影响而言，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政治动员。

第一，在一个社会中，政治参与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教育程度、收入及职业地位越高的人，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就越高；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人在社会中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因而更多的人变成了政治上的参与者。

第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各种组织和协会等中间组织成倍地增加以及大量的人参加这些团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组织和协会大量涌现，诸如企业家协会、农民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以及各种学术团体。这是社会发达的一种象征。属于并积极参加这些组织活动的人，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比不属于这些组织的人要大得多。

第三，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化和相互紧张，使公民不得不诉诸政治行为来维护并进一步实现自身利益。在利

益关系的变化中，新的利益团体的出现使现存团体的利益受到某种威胁，不同团体之间就有可能产生某种利益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以及由此而来的可能冲突强化了本来就有的群体意识，从而导致群体采取集体行动来与其他群体竞争，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

第四，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促使政府扩大其职能。政府职能的范围一方面受制于基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受制于经济发展。政府职能扩大意味着政府扩大了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受到影响的个人和团体就越多；受到政府作用影响的公民为反过来影响政府作用，就不得不提高参与程度。

第五，社会经济的发展通常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发展来实现的。因此，经济发展使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日趋重要，个人逐渐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这种认同和忠诚使公民的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公民对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感的增强以及国家发展中形成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都促使公民积极卷入政治活动，以支持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但是，现代化进程也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参与水平并不必然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在一些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里，动员性政治参与的水平却很高；而在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里，政治参与的水平却很低，或者有些形式的政治参与水平高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原因何在？

首先，社会经济发展不是决定政治参与的唯一因素，社会结构也起着重要作用。群体利益冲突、群体意识、组织集团及政府活动的扩张，除了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外，也与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诸如迁移、剥削、战争、侵略、政治领导、意识形态和宗教冲突等，而这些因素可能独立于经济发展而出现。

其次，社会经济现代化使决策中心由传统社会的基层转移到全国一级，减少了传统社会中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同时，经济发展意味着增加了个人社会流动，流动中的个人不会或没有机会参与政治。

二、社会环境与社会地位

一个公民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由教育、职业、收入、年龄、种族、宗教

信仰、性别和居住地等因素所共同影响并形成的。这些因素与政治参与都有联系。一般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获得高职位和高收入阶层的成员、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和宗教团体、男性公民等，政治参与程度比较高。

然而，参政活动与社会环境中的可变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稳定，这主要视政治文化而定。

社会地位反映公民的某种社会身份。人们通常是根据教育、职业、收入、权力、威望等因素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于社会地位的高低直接与人们的政治影响力强弱有关，从而也与人们利益的实现程度有关。因此，一般在财富、教育、职业、权力和威望等方面均处于较高层面的公民，其政治参与程度就比处于较低层次的公民要高。

构成社会地位的各种因素在共同发挥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同时，各自在影响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又具有不同的作用。其中，教育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最为密切。这首先是因为教育有助于增强公民的义务观念，培养公民的政治竞争意识、兴趣和责任感；同时，教育也有助于培养公民的自信、自制和表达思想的能力。而且，学校本身就是一个获得参政技能的场所，一个人可以在学校里学习如何参加社团活动、完成任务、参加会议和讨论广泛的社会问题、组织和实现集体的目标。最后，受教育者能更好地把他们的政治兴趣和知识传授给下一代。所以，教育与参政活动的关系将是永恒的。

在社会地位的变量中，收入与政治参与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而言，收入越多，参与政治的兴趣就越高。我们知道，参与政治需要以一定的资源为基础，譬如时间、能力及财富，其中财富尤为重要。研究表明，收入与参与成正比关系。

然而，社会地位也不是影响政治参与的唯一因素，所以，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各国情况也不同。一般而论，从事政治活动需要一定的政治资源，诸如知识、财富和时间。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制度决定了政治资源将永远是不平等的，因此，这种基础之上的政治参与在本质上也是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人民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统一，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层次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对于政治的

兴趣要受到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的客观限制。调查研究表明，在中国，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政府影响意识、政府责任意识及法治意识就越强。但是，在选举心态方面，却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选举心态反倒呈消极的趋势。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人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其他因素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

三、政治制度对政治参与的制约

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要受到政治自身因素，主要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影响。下面的政治变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公民的参政热情与态度。

1. 政治平等与自由

法制条件下的平等与自由是政治民主的基础，当然也就是公民参政的基础。但是，在某些社会，自由是有的，却不一定存在政治平等和政治民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曾经在英国统治下的中国香港社会。

2. 选举制度

选举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由公民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选择一定公职人员的行为和制度。一般说来，选举制度经历了由限制选举制到普遍选举制、由不平等选举制到平等选举制、由间接选举制到直接选举制等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公民政治民主的逐渐扩大，政治参与的不断深化。

3. 政党制度

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的主要作用是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充分调动起选民参与的积极性，支持自己的候选人而赢得选举。所以，各党派都努力使选民加入党派之争。在选举运动中，党派的对峙也造成了选民的分化和对峙。

政党认同是政党影响行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当一个人认为某政党的主张符合他的利益和观念时，他就会加入该政党，并在选举中支持该党候选人。政党认同不是决定投票倾向的唯一因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有政党认同者去投票的比率比无政党认同者参加投票的比率要高；强烈政党认同者参加选举者比淡弱政党认同者参加选举者要多。所以，在西方国家中，各政党在大选时尽量把自己的宣言或政纲鼓吹得娓娓动听，以招徕更多的拥护者。

四、政治心理影响政治参与

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在某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展开的，政治参与行为也离不开它的心理动机的驱动力。一般说来，心理变量来自个体的性格特征（遗传与后天习得）和知识结构。一些遗传中的个性特征与政治参与并不存在多少联系，例如投票人与不参加投票的人在个性方面很难说存在什么区别。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政治积极分子和狂热分子的心理特征肯定不同于政治冷漠者。罗伯特·达尔对个性特征及知识结构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以及由此造成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1）对报酬的估量。如果一个公民认为介入政治得到的报酬低于从事其他活动之所得时，他就不可能介入政治。

（2）对选择的判断。如果一个公民认为自己所面临的各项选择对象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差异，他就认为自己的行为无足轻重，也就不愿介入政治了。因此，那些认为哪个政党执政都一样的选民，一般不会参加投票。即使在最低一级、最方便的议员选举中，如果候选人的观点没什么差别，这种选举也不会吸引选民。

（3）政治效能感。认为自己的作为不能有效地改变结果，即对自己的作为信心不足的人，一般不会介入政治。政治自信心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地位、收入、经验、受教育程度等。

（4）对结局的满意感。一个高度相信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稳定性和决策能力的人，认为自己的介入与否，都会有一个满意的结局，持这种观念的人不大会参与政治。

（5）对当前问题的知识或技能的拥有程度。

（6）只要克服较少的障碍就可行动。

第三节　政治参与的作用和发展方向

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作为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政治参与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均有重要作用。

一、政治参与与民主政治

考察现代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即政治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的正常运转也同样有赖于政治参与。

现代民主政治肇始于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一个相当长的成长过程，其中人民的政治参与对资产阶级民主建设的作用至关重要。以选举权为例，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初期，公民仅获得了一种参政权——选举，而且选举权的行使，要受到严格的资格限制。这就是所谓的限制选举。在限制选举下，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即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数额及一定的教育程度，而且还必须是男性公民，才能成为选举人。

以上限制的取消，乃至现在普通的或普遍的选举权——凡具有本国国籍的法定成年男女，未经刑事处罚剥夺公民权，且有行为能力者均可享有参政权——的获得，是人民不断政治参与的结果。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以革命手段建立的，革命过程就是动员与组织广大民众的运动，革命的成功就标志着权力主体的更新。与革命前的政权比较，新政权的统治基础极大地扩展了。

但是，无数的事实表明，建立了民主制度，不等于就实现了民主政治。民主政治要正常运转还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来促进和维持。但是，不适当的政治参与也会对政治民主造成伤害，如“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需要理解政治参与是如何维护着民主政治的。

民主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制度，一旦被建立起来，就有一个如何维护和正常运作的问题。“人民的权力”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程序或机制，民众通过选举政治官员来实行统治。在健全的政治参与形式下，希望连任的政治官员进行政治决策时，会受到他对选民对他的决定有何反应的预测的制约。也就是说，如果当选官员的政策符合选民的利益，选民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选择他，否则，选民就会抛弃他。另外，人民还会利用其他的政治参与方式制约政府的行为，如请愿、游行、示威、媒体曝光等。

可见，政治参与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工具。不仅

如此，参与对公民有着更直接的好处，参与的本身就是满意的首要源泉——对政府的满意、对自己的角色满意。另外，参与还是一种教育手段，人民通过参与学习“公民道德”，学到社会责任。从这种意义上讲，参与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中，如果你不参与影响你自己生活的决策，自尊就会受到伤害，因为缺乏参与的能力可能意味着缺乏在体系内成为一位完整成员的资格。因此，政治参与不只具有工具价值，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二、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从长远来看，政治参与最终推动了政治民主和政治发展的其他方面。但是，20 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事实表明，政治参与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发展。有时会引起“政治衰退”，造成政治动荡。

政治参与为何导致政治不稳定？关键在于社会动员产生的过高期求与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之间的矛盾。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政治动员和经济发展。卡尔·多伊奇把社会动员描述为“人们腐蚀和摧毁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开始接受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的过程。这意味着人们与传统社会有关的态度、价值观念和期望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态度、价值观念和期望。这种变化乃是都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传媒为大众所用的结果。因此，社会动员提高了人们的追求和期望，如果他们在经济上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些追求和期望就会刺激个人和群体去利用政治手段满足自己的要求。

在社会动员的同时，经济发展了。经济发展也许会提高一个社会满足这些期望的能力，因此经济发展应该有助于减少社会的挫折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不安定。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同时就增加了社会流动，让一些人在社会流动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若社会流动机会少，一些人还会诉诸政治手段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再者，经济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人们对利益期求增长的速度。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人们的过高期求得不到正确引导，再加上一些不平等的两极化、政治腐败，很容易引起不利于政治安定的突发事件。过去 200 年的大量事实表明，很多不满和动乱是在经济繁荣之际发生的。

更为严重的是，被动员起来的社会期求面对的是制度化水平低的制度。在新兴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它们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却陷入政治管理上的混乱，盲目移入的政治体制又不适合经济和文化水平落后、民族矛盾重重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优越的政治制度同样面临经济、文化落后的问题；同时，制度的优越感又使社会主义国家忽视了制度化建设，总以为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切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结果，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对话机制不畅通、人事制度不完善。当这样的制度化水平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过高的公民期盼时，政府就无力容纳这些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剧烈的政治参与不仅造成政治不稳定，一些社会主义政权还因此而垮台。所以，在发展经济努力满足人民的经济要求的同时，还要注重政治制度化建设，实现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虽然比较成熟，但剧烈的政治参与仍然会带来一些政治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由于越南战争、种族关系、水门事件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参与空前高涨，仿佛回到了杰弗逊民主时代，“大众对已建立的政治、社会、经济机构的权威进行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些机构中并且控制了这些机构；反对联邦政府职能部门权力集中，支持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精英重新信奉起平等的观念；为‘公共利益’而奔波的院外集团出现，大众对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参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力和在这方面的机会更为关注，并且对那些拥有或被认为拥有过多权力和财富的人进行了广泛批评。抗议的精神、平等的精神、揭露和制止不平等的激情，充满了整个大地”。这一参与高潮的后果是，一方面造成政府活动的膨胀，另一方面造成政府权威的下降。在70年代，政府权威的下降为利益集团使政府行为服从他们的特殊目的开辟了许多的机会。亨廷顿认为，在每一个民主社会，都有一个使民主有效发挥功用的不积极参与政治的边缘人群的存在，如果社会边缘群体也成为政治系统中彻底的参与者，政治系统社会因过多的要求而引起危险，这些要求一方面扩大了政治系统的职能，另一方面破坏了其权威。因此，当参与的价值观增大到最大值时，就需要对之进行合理的限制。

三、政治参与与经济发展

由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参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呈现复杂的色彩。

一方面，政治参与促进经济发展并维护其成果。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的政治史表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首先成长起来，政治参与扩大到下层阶级；然后，国家作为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推动者的作用扩大。获得了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有了发展经济的政治保护，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其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的社会财富超过了以前所有世纪财富的总和。不仅如此，选举权的扩大也使工人阶级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上的保护。因此，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参与与经济发展呈正比例的关系。

另一方面，政治参与又会制约经济发展。比如，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扩大政治参与会对平等政策造成压力，在经济腾飞之前，会耗掉为经济增长而进行的资本积累；政治参与的扩大可能会影响政治权力而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同时，因政治参与而引起的政治不稳定也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即使在发达国家，在他们普遍建立起福利制度后，却形成了“福利政治”的格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过多地损害公众的福利，否则，它就别指望执掌政府。这样，政府就背上了沉重的福利包袱，由此就制约了经济发展。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讲，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制约着经济发展。“福利政治”在西欧、尤其是北欧国家尤为明显。

因此，如何处理政治参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确是“不易的抉择”。在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些国家，如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首先是以较少的政治参与来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其间社会经济平等程度较低，政治稳定性差，但经济的现代化最终换来了更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而在苏联的改革中，首先追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以及由此而来的更多的政治形式上的平等，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政治不稳定，最终导致“参与爆炸”（即社会总崩溃）。历史经验表明，究竟如何抉择，政治家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四、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治参与从资本主义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参与，最后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的全社会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内容，本质上是与政治统治相联系的。政治统治的历史逻辑是从早期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到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再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最后实现全社会的政治统治即政治统治的消亡。政治参与的逻辑与此相符合，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参与，最后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的全社会的政治参与，那时也就无所谓政治参与，而是全社会的自我管理了。

第二，政治参与由少数人参与到多数人参与再到全体人参与。与政治统治相关，政治参与的发展也涉及政治参与行为的主体问题。政治统治主体发展的过程体现为少数人统治到多数人统治再到全体人的政治统治。政治参与最初也是少数人的权利和行为，到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普选制以后，虽然在形式上是以多数人作为政治参与主体，但实质上还不得不受到少数人统治的制约。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参与政治的范围和人数还在不断扩大，直至将来全体社会成员都来进行参与。所以，从政治参与主体的发展变化来看，其基本方向是，由少数人参与到多数人参与再到全体人参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其中"扩大"主要体现的是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而"有序"强调的则是公民参与的秩序和效果。坚持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决策制定是目前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追求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政治参与行为方式从单一化向多样化再向多层化发展。就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而言，最初的政治参与方式只是定期举行的投票选举。后来，不仅投票与选举各自获得了新的内容而成为两种行为方式，政治结社等其他新的方式也接连问世。尤其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协商、政策咨询、政策听证、信访等多种形式纷纷出现，政治参与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并且不断深入发展。因此，政治参与行为方式从单

一化到多样化再到多层化的发展，也是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之一。

由此可见，尽管政治参与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和地区范围内会出现突然波动，但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政治参与在人类政治历史上的不断扩大和加深是不可抗拒的。具体到一个国家，如果要随着本国民主化进程的加深而要扩展其政治参与，就必须综合考虑影响政治参与及其发展的各种变量。首先，必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具备政治参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次，必须培养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素质，否则，政治参与就会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和能力基础。再次，要提高政府的威信与政治的文明程度，使政府能够取信于民并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唯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才能带来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最后，必须加强政治的制度化建设，在鼓励人民了解政治，吸引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同时，建立健全政治参与的调节机制，以保证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

思考题

1. 政治参与的含义是什么？
2. 经济发展对政治参与有什么样的影响？
3. 政治制度对政治参与有什么样的影响？
4. 政治参与与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
5. 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是什么样的关系？
6. 政治参与对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7. 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第七章　政治发展

第一节　政治发展概述

一、政治发展的定义

政治发展本质上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社

会关系的发展和变迁，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会不断发展和变化，由此造成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在本质内容上形成社会政治发展。就此而言，政治发展实质是在利益和利益关系变化和发展的基础上，政治权力和权力关系、政治权利和权利关系、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相互关系的变化发展。

二、政治发展的表现形式

政治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发展采取两种基本形态和方式，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质变方式，其标志是政治权力的变更和移易。政治改革则是政治关系的量变方式，其特征是社会政治的演进和完善。作为政治权力确认和保障的政治权力得以平等实现的政治形态，政治民主是政治发展的目标，而高度的民主则是人类社会实现高度政治文明的标志。

在社会政治现实中，政治发展也表现为政治关系各种衍生形态的发展变化，其包括政治行为性质、方向和方式的改变和调整，政治体系基本性质、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和完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认知情感、态度动机、思想理论的变化和演进。就此而言，政治发展是社会政治诸方面的变革和调整。

三、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

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在特定经济社会关系基础上体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运动，政治发展的主导者是代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从低级政治走向高级政治、从政治的必然王国走向政治的自由王国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过程，是各种社会政治形态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任务。

第二节　政治现代化

一、政治现代化的概念与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一般公认的是，现代化开始于16世纪。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现代化反映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巨变。

这一过程开始于西欧，扩展于北美和欧洲其余地区，蔓延到亚非拉美。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进行了具有多重含义的阐述。

政治现代化研究在1960年之后形成高潮，原因有二：

第一，非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强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美国和西方产生了强烈冲击，同时亚非拉国家又掀起了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这些变化使得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不得不修正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策的基点，而新的全球政策的形成又仰仗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到1960年前后，冷战达到高潮，而美国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也达到了高潮。这种背景决定了现代化研究一开始就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把现代化进程看做是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实质上是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这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

这种理论框架把现代化研究带入了死胡同。再加上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西方化”的失败，迫使西方的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变方向。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成为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仿效的榜样，因而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遭到了批判。

第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革命性变化，使现代化研究成了跨学科的领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都展开了现代化研究。这也就决定了现代化具有多重含义。

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它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物质层面，政治现代化是制度层面，而思想和行为现代化则是社会的深度层面。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现代化是指世界自16世纪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的政治结构的根本转变，是工业化渗透到政治领域并引起其深刻变革的过程和发展目标。它包含着变迁（过程）和目标两方面的意义。

政治现代化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和特征。在政治现代化研究中，最受中国人重视的是亨廷顿的观点。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最关键的方面可以大致归结为三个基本方面。第一，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单一

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或种族的政治权威。理性化的权威对外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以抵制外国的影响；对内坚持中央政府的主权，以控制地方性和区域性权力。因此，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整合，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公共机构手中。第二，结构的离异化，即政治功能专门化。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立法、军事、行政和科学，都应由专门化的机关去执行。科层组织变得更精密、更复杂、更有纪律性。职位和权力的分配越来越以个人成就为标准。第三，参政的扩大化——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在现代国家中，不管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公民已经直接置身于各种政府事务中，并直接受其影响。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或团体在超于村镇层次上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政治社团），是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

亨廷顿认为，要达到政治现代化的三个标准，必须首先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国家适应能力增强，不断地推动社会的经济改革；二是国家有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制度之内。

总的来看，我们认为，政治现代化主要依赖于两个原则：政治的制度化与大众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制度化与大众参与的程度越高，权力就越具理性化，政府功能就越正常。

制度化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可用其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来衡量。政治组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衡量其制度化程度的标准，而制度化本身的含义是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在今天，这种行为模式就是指宪法、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无论是政府、政党、政治团体还是个人，都不能漠视宪法和法律。因此，制度化实际上就是法制化。政治现代化的制度化标准就是法制化。法制化是政治稳定的一个根本保证。

在现代化研究中，对于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或类型有很多不同的区分。巴林顿·摩尔在《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中，详尽地考察了英国、美国、法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历史发展，提出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三条道路。第一是通过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开辟的道路，这些国家

有英国、法国和美国。第二是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即法西斯主义，这些国家有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第三条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摩尔以这些国家的农民与资产阶级势力的对比来考察问题。

应该说，除了第一批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外，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后，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动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划分方法有利于说明现代化的起因，但要更详细地说明众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划分就显得笼统。

可以用很多标准来衡量各国丰富多彩的政治现代化之路，关键是要找出规律性的因素加以综合。循着历史的踪迹，纵观今日世界政治格局，政治现代化有三种明显不同的道路类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中国家的道路。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这些国家刚刚独立，便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需要解决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认同。传统社会政治共同体的连接纽带是家族、部落、种族、种姓或语言集团，在社会急剧转变中，旧有的连接纽带受到冲击，但又缺乏新的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国家领导人往往借助民族主义的旗号进行政治动员，而当民族主义失效后，又借助于西方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口号。因此，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先天不足。没有起凝聚作用的意识形态，稳定的新型政治关系就难以形成。

第二，合法性，即宪法以及宪政体制能否得到建立。传统政治统治是人治，如何克服人治传统，建立法治国家，是一个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命令贯彻，即中央政府能否有效地把命令贯彻下去。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地指挥、控制社会的命令执行机制，新的政治体就难以形成。

第四，政治参与。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引发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成员会被越来越广泛地卷入政治生活。然而，参与的膨胀与政治制度能否有效地容纳新生力量的要求，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

因素。

第五，一体化，即新的政治体能否把整个社会的各个功能机构都结合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有效地实行命令和满足大众的参与要求。

第六，分配。政治说到底是分配权威资源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怎样影响社会的财富、权力、工作机会，都关系到现代化的成败。

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众多国家采取了诸多不同的发展战略。西方学者对此的总结有：超凡领袖推动论、政党推动论、行政组织论、军队参政论、心理文化更新论、专家治国论、民主政治论，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强调以某个领域作为突破口，以此形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因素并进而带动全局。从实践上看，威权主义模式使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因而引起世界关注。

二、政治革命与政治改革

1. 革命的含义与政治革命的条件

从概念上说，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政策及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发生了迅速的、根本的、暴力的全国性变革。显然，革命包含以下几点：

（1）革命是一种暴力行为。暴力是残酷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暴力的价值。暴力可以用来建立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是实现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法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使用过暴力。

（2）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占据统治地位的可能就是一个阶级，而被统治的往往是几个阶级。因此，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要进行革命的联合。

（3）政治革命仅仅是社会革命的开端。社会革命就是要彻底变革

旧的生产关系而建立适应生产力需要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政权的根本改变,将使旧的生产关系丧失政治上的保护,同时为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证。同时,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信念或价值观及其他社会结构,因此,一场政治革命的完成也有赖于社会革命的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完成标志着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起义、暴动和政变,就它们本身来讲,由于只能改变领导权或者改变政策或政治制度,但并不能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或价值观,所以它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革命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就已开始初步形成,所以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破坏了旧的社会关系后,已初步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立即破壳而出。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就能在完善和发展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列宁指出,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创立了一套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不仅表明现代化在政治上正式形成,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仍然是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为了进行社会革命。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但是,这两个阶级从进行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的过程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在进行政治革命后,就能在已经初步形成并获得解放的生产关系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而无

产阶级在进行政治革命后，要利用掌握的政权，在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的同时，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从而进行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所处国家的经济越落后，社会革命的进行也就越困难。而其社会革命的成功，则更加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对现代化的价值。

政治革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产生大量的新生社会阶层，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而当僵硬的政治制度不能为新生的社会阶层进入权力层提供渠道时，就产生了政治危机，从而导致革命。这是革命的一般制度背景。如果比较一下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还会发现若干不同的与相似的革命条件。

第一，经济条件。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条件是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强，使他们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均是如此。但是，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资产阶级追求的是政治权力并以此来扩大财富。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时，经济条件都在改善，而不是恶化。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都是如此。

第二，社会阶级之间发生严重冲突。革命前，在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存在着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到一定阶段，革命就成为必然。

第三，在严重冲突时期，国家统治机器软弱无力，统治阶级衰败。列宁认为，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了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第四，大批知识分子疏远了革命前的政权。在美国殖民地居民中，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杰弗逊、麦迪逊和富兰克林等人脱离了支持英国统治的行列，转而为建立一种全新的统治体系提供了一系列论证，并创立了一套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组织机构。革命化了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作用更是无与伦比。在俄国，脱离了旧政权体系的列宁等人为革命提供了专门的理论，并创立了政党。列宁指出，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不仅如此，以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更是革命的灵魂。政党能最大限度地团结革命力量，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使革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并能根据形势的特点，提出革命的策略和任务。中国革命的进程与俄国革命不一样，但从共产党的诞生到革命的胜利，都是革命化了的知识分子进行组织和指导的结果。

2．政治改革的含义

如前所述，一场真正的革命意味着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而那些范围和程度上受到限制的变化，称之为改革。同时，改革还意味着方向性的变化，是朝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更平等，社会和政治参与日益扩大的方向发展的变化。一场真正的革命和一场全面的改革都会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但改革是对革命后社会有条件的扬弃，体现着社会变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

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民众的要求以及外部环境的压力。当某种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这种生产关系就应该被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而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体制，对生产关系的变化自然也就最为敏感。因此，政治改革说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当生产方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时，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同样会受到压制，民众会自然地要求变革。为了有利于自己的阶级统治，统治阶级会疏导民众的要求，容纳民众的要求，对民众的要求进行一定程度的让步。因此，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

同时，改革又是外部压力的结果。后发达国家要真正走向现代化，不能不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发展程度及各种现代化标准势必会刺激后发达国家，形成“示范效应”的冲击。后发达国家进行政治改革的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使得政治改革的进程更为艰难。

在某种意义上，改革是一场比革命更加复杂和艰难的系统进程。亨廷顿认为，改革者所面临的问题要比革命者更为困难，一个成功的革

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但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

首先，改革者既要反对保守者，又要反对激进者。保守者会阻挠改革的进程，而激进者则有可能过于急躁而把改革引向失败。改革者应当采取弹性政策，尽量使其政策具有最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革命者的目标很明确，竭力使政治两极化，政治问题简单化，以分清敌我阵线。革命者是在分裂社会力量，而改革者则是要驾驭各种社会力量。因此，改革者应该具有比革命者更高超的政治才干。

其次，改革是一场渐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是朝着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发展的。这就要求改革者要精心设计和控制社会变革的速度、方式和时机。而革命是一场暴烈的社会运动，任何破坏现存统治秩序的行为对革命者都是有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者的任务就是破坏秩序，而改革者则要控制秩序。所以，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

最后，改革无论是以变革社会经济结构为开端，还是以变革政治体系为开端，最终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体系均衡发展，而不是相互牵制。所以，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保持社会经济改革和政治体系变革两者之间的平衡，并使双方的结合不至于阻碍其中的任何一方，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与此相对，革命者则首先进行政治动员，而后利用动员起来的社会势力促成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正是由于改革的复杂和艰难，所以，在现实中，有的改革成功了，使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辉煌；有的改革却失败了，使国家出现了“现代化中断”。一般来说，一场成功的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并精心选择适当的改革战略。

第三节　政治民主

一、民主的含义

“民主”（democracy）概念来源于希腊文 demokratiao，它是由 demos

(人民)和 kratia(统治权或权力)两个词组成。因此,民主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显然,民主的概念来源于某种实践。根据古希腊城邦政治,亚里士多德写道,民主政体“以自由为宗旨”,“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

古希腊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共和国灭亡之后,人类进入了由皇权或教权凌驾于一切法律和一切机构的时代,“人民的统治”化为乌有。在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中断了 2 000 多年后,启蒙思想家们重新光大了古希腊的民主含义,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洛克试图利用社会契约论证明,政府是根据多数人的意志组成的,政府根据人民的同意来实现人民的统治。到了 18 世纪,卢梭把洛克的思想推向极端,认为人民的同意是在共同意志基础上形成的,从而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他说:“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决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

洛克、卢梭的“古典民主理论”被密尔、柏尔、麦迪逊等人继承和发扬。密尔系统地论证了实现人民统治的最好形式是“代议制政府”。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代议制政府的弊端在实践中暴露无遗,例如为富人所操纵,由此人们对代议制予以批判,并重新审视“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力”这一民主概念。首先,“人民”是谁?是指每一个人?不确定的大部分人?较低的阶层?一个团结一致的有机整体?绝对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是什么人?有限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又是什么人?其次,什么是统治和权力?如果说统治和权力就是控制他人的力量和能力,那么,人民如何成为实际的权力行使者呢?名义上掌握的权力显然不能解决人民主权的问题。因此,建立在语源基础上的古典民主观,很难回答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因而也招致批判。

意大利式的精英理论家认为,无论如何定义“人民”这个美丽的辞藻,人民在历史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历史的舞台不过是走马灯般的精

英在演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出现一个统治阶级，广泛的人民控制是不可能的，寡头统治是铁的规律。在现代民主制条件下，由少数统治精英组成的统治阶级结党营私，无止境地攫取个人利益。如果说现代的民主制与其他国家制度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与资本家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财阀政治”（plutocracy）。

意大利式的精英主义理论被马克斯·韦伯和熊彼特发展成“精英民主理论”。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说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复杂性及明显的社会差异使直接民主变得不可能。他认为，管理国家是一项宏伟的事业，是那些对政治和其他公共事务感兴趣并具有一定才能的精英的职业。一般人缺乏选择政策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有能力选择领导人。因此，民主就像市场一样，是一种淘汰最弱者的制度机制，同时使那些最具有竞争力的人去争取选票和权力。

和韦伯一样，熊彼特把民主看成是一种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政治方法，是“某些人通过获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在熊彼特看来，古典民主理论的问题在于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选民，并把它作为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而人民选择代表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事情。这种颠倒是不符合任何政治现实的。他坚持从经验上认为：“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是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意义说的人民是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民主不同于独裁的地方在于“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自称的领导们之间为争取选民投票而进行的自由竞争”。

韦伯和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概括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重要特征，例如代议制、选举制和政党制之下公民对代表的选择，政府过程的复杂化，以及一个庞大的无政治阶层的存在。

但是，精英民主理论忽略了现代西方政治过程中的另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利益集团的作用。这也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民主理论和民主现实留下了空间。政治多元主义的创始人拉斯基曾认为，一元论国家观或国家主权观是一种想象，因为国家并不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只代表少数经济统治者的利益；政府的行为并不总是正确的，个人或团体的反政府行为有时可能是正当的。拉斯基的国家观后来虽然

有很大的变化，但其多元主义的传统却为现代多元主义奠定了基础。

达尔直接继承的是托克维尔的思想。在达尔看来，社会中权力的安排是竞争性的，权力是众多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过程”，政治决策则是政府部门试图调和这些集团冲突的结果。达尔指出，人民在民主中不可能直接参与决策，而是通过成为这些集团的一员来参与。在这些集团中，往往是少数活跃分子成为领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精英。

达尔客观地认识到，西方的多元主义民主也存在着重大缺陷：使政治不平等稳定化，扭曲公民意识，使公共议事日程不正常，使人民失去对议事日程的最终控制。但是，达尔并不因此而否定它的价值，他仍然把它当做最好的国家制度；而克服这些缺陷的根本途径还在于更加完善多元主义民主，尤其是增进经济民主。

古典民主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依据。但是，当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后，就不愿再提及“谁统治”的问题，他们需要的是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制度，于是，民主是制度和程序的民主理论应运而生并流行起来。

综上所述，无论是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还是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批判理论，都企图否定民主的本来意义和人民主权说，企图掩盖已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制度的阶级实质。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观点不但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民主的指南。

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经典定义，其中包括三重含义：

第一，民主是一种阶级统治。“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的权力”。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人民”自然就是统治阶级，所以，民主实际上就是一种阶级统治形式。

第二，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这里的“民主”，实际上是指作为政体的“民主制”。

第三，民主意味着公民的平等和参政的权利。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民主”概念的基本含义依然是“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统治”。

但是，在无产阶级民主建立之后，我们决不能只满足于“人民的权力”，因建立了人民的政权而裹足不前；更重要的是应注重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如何限制与制约绝对的权力？这就需要健全民主制度和政治程序，诸如选举制度、代表制度。这意味着，人民的统治和权力是通过代表他们意志的代表来实现的。

概括说来，民主首先意味着“人民的权力”。其次，“人民的权力”在实践中体现为有限的多数原则，即多数人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无限的。第三，有限的多数原则是靠制度和程序来保障的。因此，在无产阶级统治确立以后，重要的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建设，否则，“人民的权力”就是一句空话；即便实现了，也可能是变形了的民主。

二、政治民主的价值

政治学对民主价值的研究和论述大体存在两种途径，即理想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途径是民主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根据这一途径，民主的价值体现在：第一，“自治”。民主的实质就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即“自治”。第二，“平等”。民主反对任何特权，反对权力垄断，强调公民平等，提倡所有的职位和权力向所有公民平等开放，公民平等地享有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权力。平等也是人类生活的价值目标，而民主正是平等信念和精神的最好体现。第三，“权威”。民主反对霸权，反对个人专制，反对强暴统治。民主为政治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在民主基础上产生的权威不是以暴力和恐惧为基础的专制王权，而是一种法的权威、合理性的权威和对人人平等的公共权威。

经验主义途径体现了民主研究的现实主义思路。根据这一途径，与其他政治制度相比，民主方法或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

第一，民主宪政保证国家政权的和平交接，从而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民主宪政的建立使社会摆脱自然状态（战争状态）而走向文明。在民主宪政体制下，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以暴力而是以民意为基础；选

举决定谁应该掌握国家政权；定期的选举又给那些落选者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从而避免了落选者铤而走险的可能。

第二，民主宪政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它将每个人的独立自主性与社会成员彼此的相互宽容紧密结合起来；它以多数人的意志为意志，但又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他将政治的竞争纳入到既定的程序和规则之中，给每个社会成员以同样的权利和机会来组成社会多数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的对抗性。因此，与任何个人独裁和专制政制和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制”相比较，民主宪政是一种最能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制度。

第三，民主制度能使政府更加关心人民的幸福。民主制度以人民的福利为宗旨，制定一系列的防范措施，这些防范措施归结起来，一是保障民主地产生作为人民代表的政府和政府官员；二是通过民主“修错机制”来保障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加关心人民的利益。

三、政治民主的基础

1. 经济基础

首先，所有制决定民主的性质。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治统治都是以特定的所有制为基础并为其服务的，因此，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实际的民主还是形式上的民主。

其次，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决定民主的程度。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程度的不断提高，民主推广到全社会，这是因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实现的。在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民主程度的提高。商品经济中的主体的利益原则，表现为民主政治中参与者的政治权利原则；商品经济中的自由平等原则，表现为参与者权利平等和自由原则；契约原则表现为法治原则。因此，高度的民主政治有赖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最后，经济利益决定民主的选择。民主制容易使政权获得合法性，是统治阶级稳定统治的一种好的政体。不仅如此，资产阶级选择民主制，还有利于实现和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当民主制难以保证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时，民主制就会被抛弃。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就是最好的

证明。

总之，社会经济条件在根本上决定着民主的程度与民主制的形式。发达国家的民主理论家常常由于享有经济繁荣，错误地忽视了物质条件对民主的必要性。对于经济因素对民主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的认识最为深刻。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的失败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威权主义模式的成功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在那些尚不具备这种基础的国家，形式上完美的民主却使国家的现代化举步维艰。因此，政治与经济应均衡发展。

政治发展研究表明，民主不一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但经济发展和繁荣可能促进民主发展。经济发展从以下方面促进了政治民主化：

（1）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民主的基础之一。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民主派。他们崇尚自由，反对干涉；主张合作双赢，反对你死我活；倾向中道温和，反对极端和突变等。他们希望改革威权主义政治，而不是通过革命推翻这种政治。

（2）经济发展促进教育的发展。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自主意识的增强，不容易受极端分子的煽动，不盲从政治野心家的蛊惑，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

（3）经济发展能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自身利益并希望表达出来。

（4）市场经济本身教会公民自立、多元化、宽容以及不要期望过高。这都有助于维持一个民主制度。

2. 法制基础

近代民主是商品经济的结果，但民主政治制度要有法律的保障，统治阶级以法律的形式把有利于自己的民主制度固定下来，以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这个制度。这也就意味着，在与近代民主对立的专制社会，虽然有法律和法律制度，却不是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而完全是根据个人的意志进行统治，专制君主可以随时废止法律和颁布新的法律。因此，法律与法律制度只为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障民主政治。

3. 社会自治

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其实现程度均有赖于社会自治。多重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提供了一种相互控制的机制，从而能有效地抑制权力的扩张和支配性。社会自治是一种直接民主，但作为社会民主，它又为政治民主提供了基础和制约机制，实际上是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

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类型

1.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民主不断自我修复，制度化达到较高程度，其形式也日趋完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主要包括议会制、普选制、政党制和三权分立原则。

2.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其基本内容：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参与国家的管理。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就使社会整体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政治制度。第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即城乡居民群众以法律为依据，行使民主选举，实行自我管理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有效整合了人民群众各阶层和群众的不同利益；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和保持国家长期协调稳定发展，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思考题

1. 什么是政治发展？
2. 政治现代化的含义是什么？
3. 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4. 政治革命的条件有哪些？
5. 为什么说政治改革比政治革命更为艰难？

6. 主要的民主理论流派及其主要观点是什么?
7. 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政治民主分别具有什么价值?
8. 经济制度与民主政治有什么样的关系?
9. 经济发展从哪些方面促进了政治民主化?
10. 资本主义民主的制度特征是什么?
11.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和作用是什么?

第二编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初步实践

第一节　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的反应，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继承者。就其本质而言，它属于后资本主义的范畴，是试图用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的办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病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达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一种思想、运动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病的暴露而出现的。19世纪中叶之前，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相应地，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只能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空想的”社会主义阶段。

1516年托马斯·莫尔所著《乌托邦》一书的出版是空想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空想社会主义从莫尔开始到19世纪中叶欧文时期达到顶峰，其间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大致又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家庭手工业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机器工业这样三个时期相对应。

16—17世纪，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是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的时期。与此相对应，出现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者反抗早期资产者的斗争，其理论表现形态便是以英国的莫尔、德国的闵采尔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英法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欧洲国家还相继开始了影响

深远的产业革命。伴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无产阶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巴贝夫、摩莱里和马布利等。到19世纪前半叶，英法两国已基本完成了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业的社会变革过程。西欧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也纷纷继之而起。随着资产阶级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正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越来越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在这一背景下，欧洲社会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评价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与批判，提供了后人研究资本主义早期发迹史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思想材料。同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分析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在猜测和论证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进步的、合理的思想或思想萌芽，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思想，关于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思想，关于劳动改造与劳动光荣的思想，关于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的思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建立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的思想，关于缩短工时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思想，关于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的思想，关于实现理想制度的方法与途径的思想，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关于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关于人口发展规划与人口平衡的思想，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和思想的萌芽，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和直接的思想材料，同时也是人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包括：

（1）空想社会主义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崇拜幸运的偶然性，宣扬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2）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

力量，因而始终没能找到改造现代社会的物质力量。

（3）空想社会主义者离开阶级斗争去设计、谈论和实践社会主义，他们的设想便不能不是空话，他们的实践活动也不能不充满幼稚的幻想。

（4）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理性原则，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从道德情感出发的社会主义。

（5）空想社会主义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空想社会主义对当代的意义在于，其一，我们要不断发掘其积极成分，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把社会主义先驱者的优秀思想不断发扬光大，把社会主义先驱者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其二，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重犯这些先驱者的错误。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一、近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呼唤新的社会主义理论

现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这种斗争最初是以自发的形式出现的。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西欧的工人运动已从产业革命初期破坏机器的自发斗争，发展成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6年至1848年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欧洲的现代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独立的政治运动时期。与早期的工人运动相比，以这三大工人运动为标志的近代欧洲产业工人运动开始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无产阶级明确地、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把斗争的主要矛头直接对准了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逐渐抛弃破坏机器等原始斗争手段，转而采取罢工、游行示威直至武装起义等形式反抗资产阶级，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战斗精神的明显提高，开始建立起许多政治性组织。

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开始占据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地位。为了更有成效地进行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空想社会主义曾经是早期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但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却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无力回答无产阶级所面临的迫切的理论问题，因而也便不再能够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有效的理论武器。不仅如此，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走向了反面，日趋保守和反动。这样，因应时代的呼唤，抛弃陈旧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适时地进行理论创新，为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指导，便成了摆在社会主义理论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批判地吸收前人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促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的转变，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二、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1.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同的创始人。在青年时代，他们都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信奉者。后来，他们通过各自的艰苦探索，几乎同时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844 年 8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再次会面并结成了终生不渝的战友。从此，他们共同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全面清理旧的世界观残余，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共同完成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任务。

2.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把唯心主

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繁芜丛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再被看成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发现，而是被看成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现在，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不再是去苦思冥想出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并从由此造成的经济状态中找出解决冲突的办法。

3.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提出了著名的剩余价值学说。在这里，马克思完全摈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纯粹道义的谴责，而是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找到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革命阶级即现代产业无产阶级，同时也提出了“剥夺剥夺者”这一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途径。

4. 马克思恩格斯以欧洲19世纪先进文化为依托，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地吸收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成分，把社会主义从空想阶段推进到了科学阶段

任何一种新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材料。在自然科学领域，以能量转化学说、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和成果，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基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所高扬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等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思想文化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近代欧洲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剔除了其中的陈旧与玄想的部分，保留并进一步发展了其中

积极合理的成分，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严密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最终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5.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就是沿着理论创新、批判谬见、建立政党这几条线索进行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见面后，便开始系统清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重大理论观点，同时初步但却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新理论过程中，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潮进行了斗争，一方面更彻底地、直接地和公开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借机把自己的理论进一步推向前进，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传播了自己的思想。这些主要斗争包括：批判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当而且必须首先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真正的社会主义”，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宗旨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通过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的思想；批判蒲鲁东和海因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工人运动的实践，积极进行了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理论经受了考验，而工人运动和建党活动的实践则反过来又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便加强各国社会主义团体之间的联系，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各国社会主义团体的了解，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改造正义者同盟上。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

敦举行了改组大会。大会将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取代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1847 年 11 月底至 12 月中间，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终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新理论和新原则，并委托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纲领。会后，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充分酝酿，最后由马克思执笔完成了纲领的起草工作。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式诞生。

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历史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它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从道德和理性原则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和从头脑中构思未来理想社会的根本性缺陷，对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科学的论证，从而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把社会主义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过去，所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主要是思想运动的历史，实践运动始终没有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主义基本上局限于少数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即便是从事革命活动的实践家，也往往局限于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就其对未来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认识而言，归根结底，它与前者仍是一脉相通的。科学社会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着意避免使自己陷入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泥潭，而是要把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也确实从此越出了狭小的范围，变成了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把工人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的工人运动，只是一种零星的、自发的、更多表现为改善生存和经济生活条件的斗争。这时的无产阶级也只是在它被当作客观存在着的受苦受难的群体的时候，才被认为是一个阶级，也就是说，它还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它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武器交给工人，它加速了无产阶级由

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由自发的斗争转变成了自觉的斗争。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这两大运动合流，整个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虽然有某种交叉关系，但二者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独立运动，各自在自己的狭小圈子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促进了这两大力量的合流：社会主义运动因为以工人运动为依托而找到了自己的载体，而工人运动也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导而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正是这两大运动的结合，使得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从此，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被深深打上了它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的印记，它不得不一次次地向工人阶级做出让步。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诸多合力中，加进了一股足以改变其前进方向的、势头强劲的推动力量，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因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此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几乎处处都有了抹不掉的社会主义痕迹。

四、《共产党宣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1.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思想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贯穿《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基本思想，是统领其他基本理论的纲。《宣言》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思想展开的。按照恩格斯的表述，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2. 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

《宣言》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了整个人类社会从古代社会直到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它把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考察社会变迁与进步的基本范畴。按照《宣言》的分析，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是以乡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保守、封闭和愚昧，其主要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是手工。这种社会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但是，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样，宗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最终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这便是从奴隶社会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变迁的秘密之所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开始尖锐化了。于是，人们眼前又开始了类似的运动：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3. 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宣言》分析了从奴隶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并没有消灭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它只是用新的阶级、阶级对立形式和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色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

4. 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

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首先都要求对社会本身的结构进行客观的、准确的分析和把握，否则现实的阶级斗争就会失掉基础。《宣言》在简要分析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之后，把分析和解剖的重点放在了资产阶级社会。依照《宣言》的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较之以前的等级社会已被大大简化了，它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阵营。在这个阵营之外，还有现实存在并不断分化着的中间等级以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阶级。在这些现存的

阶级阶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身上。《宣言》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同义语。它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特征，即丧失生产资料和自由地出卖劳动力。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与阶级特性使它不仅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愿望，而且能够担负起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历史使命。《宣言》所说的中间等级，是指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宣言》认为，中间等级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反对革命的一面。《宣言》对流氓无产阶级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认为它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是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

5. 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理论

《宣言》总结了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论证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根本道路。《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必然要运用掌握在它手中的社会资产、国家政权、舆论工具等来防范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这样，无产阶级也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建立自己的统治。就其性质而言，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与过去一切旧的革命是有着根本不同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对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实施革命性的改造，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6.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从理论上规定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宣言》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

党，它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宣言》明确规定了共产党的近期目标和最终目的。共产党的近期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逐步改造社会；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扬弃私有制，消除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建立起一个人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党人同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组成的工人政党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并不因为与其他工人政党的联合而放弃对它们的主张持批判态度的权利。其二，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还是在掌握政权之后，都要善于团结各民主政党协力前进。《宣言》在阐述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时，处处流露出了共产党人应该同各民主政党通力合作的思想。这一思想所包含的基本原则不仅适用于革命时期，而且也适用于建设时期。《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条件采取灵活的办法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结合起来。

7. 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

《宣言》对国家的性质、国家的发展趋势及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阐述。《宣言》指出，国家是一种政治性的公共权力，是阶级实施有效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政权是各阶级争夺的对象，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的也是取得国家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利用国家政权对旧的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并且利用国家政权，尽可能快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也就失去了政治性质，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消亡。无产阶级对国家问题的基本原则是：首先，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工具，在这个意义

上说，工人没有祖国，只有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最终求得自身的解放。其次，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舞台往往是民族的、国家的。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再次，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的国家，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又次，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应该首先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最后，无产阶级国家的历史使命就是促使国家的消亡。

8. 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民族问题是与国家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宣言》在阐述国家问题基本理论的同时，也阐述了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宣言》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产生民族压迫的根源。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扬弃私有制。《宣言》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待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概括为两点：其一，在资本统治下，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应该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待民族问题，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其二，无产阶级必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它本身还是民族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最终战胜资产阶级，解放自身。

9. 关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思想

《宣言》进一步发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历史”观点，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资产阶级统治的全球性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全球化。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就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宣言》阐述了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重要性。《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获得解放。因此，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要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为此，《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0. 关于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理论

《宣言》以极其凝练的语言概括了阶级消灭之后未来社会的存在态势，阐明了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宣言》指出，当

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权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是共产党人最终的奋斗目标，才是共产主义的真谛。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新总结

《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欧洲经历了两场影响重大的革命，即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这两场革命之后，欧洲以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重大发展，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也在深广方面获得了重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实践经验的新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些新总结主要包括如下一些主要内容：

1.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的社会发展形态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在认真分析了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后，马克思明确表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和合作工厂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

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这里所阐述的两个“绝不会”和两种资本扬弃方式的思想，是对他以前所阐述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思想的重要补充和重大发展。

2.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848 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批判地考察了 1789 年以来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演变的历史，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态度：过去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的主要战利品。无产阶级革命则完全不同，它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到 1871 年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更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明确地概括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指摧毁和铲除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中一切具有纯粹压迫性质的机构，尤其是它的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达到这些条件的具体形式只有暴力革命一途。工人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应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斗争形势来决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一切，绝对地抛弃各种传统的民主运作机制，而是要扬弃资产阶级民主，把其中的合理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积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在他们的一系列论述中，详细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所应采取的态度：首先，民主共和制是最进步的一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它是人类政治文明进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在民主进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吸收来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注意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其次，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应当为争取民主共和制而斗争。因为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民主共和制是最有利于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的。第三，民主共和制只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它的性质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因此，再进步、再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不可能从它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要获得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最终还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变成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第四，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国家还不能马上消亡，它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

3. 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要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工人阶级不能期望历史会出现奇迹。他们不能仅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最终实现理想社会，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在政治方面，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在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直到政权完全失去其公共性质，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还肩负着改造旧的社会经济关系、为新社会创造更高级的经济基础的使命。在文化方面，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还面临着一个让整个社会摆脱传统的落后的文化和思想意识，进行新的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这也需要几代人艰苦努力。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即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4. 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

马克思晚年就东方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确实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其一，对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做了严格限定，反对别人把自己关于

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其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多线条的,是多样性的统一。人类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未必只有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一途,东方社会或许会走上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三,东方社会存在着两种进化的可能性: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但历史的发展确实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但是,后一种可能性的实现是有严格的条件的。其四,承认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并不是赞成民粹派的观点。

5.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得到农民的"合唱"

1848 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都证明,工人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首先是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建设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重要条件。对劳动农民来说,只有把工人阶级作为自己利益的天然的代表者,他们才能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使自己的前途得到保障。只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才能保证农民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这是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客观基础。

6. 民族独立是各民族和谐合作的必备条件

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将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基础。因此,对各国无产阶级来说,当着民族独立的任务尚未完成时,他们应当积极参加本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并尽可能使之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方向发展。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要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要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与自觉的合作。但是,无产阶级在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也要坚决反对一切反动的民族运动,防止反动势力借助于民族主义情绪把革命向后拉。

7. 工人阶级只有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19 世纪后半叶，在指导各国建党的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对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各国的无产阶级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政党。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种力量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而不再做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其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注意加强自身建设。随着欧美一大批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出现，怎样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便日益凸显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各国工人党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他们自己的实践活动，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有一个健康的队伍。加强党的民主建设，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总是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自己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完善或修正自己的理论。社会主义是科学，就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以保证在运用这一理论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现成的结论，用教条式的理论原则去剪裁现实。要防止教条主义，就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思考题

1. 如何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
2. 《共产党宣言》主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哪些基本理论？
3. 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的？
4.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5. 马克思恩格斯对 19 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了哪些新的总结？

第二章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一、列宁主义关于俄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进入20世纪，首先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社会制度实践的代表人物是列宁。弗·伊·列宁（1870—1924），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一生不断总结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理论上有许多创新和建树。在他逝世后，他的思想被称为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俄国工人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列宁依据时代的变化和俄国的具体国情，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1916年，列宁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垄断，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帝国主义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资本输出和以往的商品输出大为不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这种腐朽性是帝国主义特有的，是与帝国主义的垄断分不开的。为什么垄断会导致腐朽？原因有二：一是垄断导致技术进步和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消失，在经济

上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二是从自由竞争当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垄断、寡头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通过对帝国主义腐朽性的分析，列宁进而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之上的。他认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消失，而且由它派生出来的三大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其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因为存在垄断，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特别突出。由于世界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如德、奥、意等国，只好结成同盟，与英、法、俄等国结成的协约国相对抗，从而导致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种战争造成的破坏，必将使帝国主义时代的其他两大阶级矛盾激化，并且上升为主要矛盾，并进而引发世界革命危机的日益发展，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

列宁在深入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列宁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可以在经济落后国家首先胜利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

（1）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各国在竞争中往往以军事冲突和战争的方式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加深，从而造成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

（2）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破坏，使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化，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除了起来革命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3）不发达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势力的存在，造成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甚至叛卖性，他们不可能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把这些国家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4）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革命性强，有农民作同盟军，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如果这些条件汇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种直接的革命形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时，相对落后的俄国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革命一触即发。列宁的理论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夺取政权的强大理论武器。1917 年 11 月（俄历 10 月），列宁成功领导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列宁对俄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

1.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试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从 1918 年 3 月开始，英、法、日等十四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外国干涉者与国内反革命势力勾结起来，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形成了对新生政权的包围圈。为了自身的生存，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些紧急应对措施，如实行余粮征集制和广泛的工业国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商业国有化，经济关系实物化，劳动军事化，等等。

在客观上，战时共产主义是为了应急而被迫采取的举措。但在主观上，布尔什维克党却把它当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捷径，认为由此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战时共产主义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是，它对后来苏联模式的形成及改革的历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转向新经济政策，探索新的建设道路

随着国内战争的基本结束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局限性的日益暴露，自 1921 年春天开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出现了战略性的转变，即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它标志着苏俄进入了探索如何建设社

会主义的新时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雏形，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承认和利用市场的积极作用，积极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力图建立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做法，通过租赁、租让等办法，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改革过度集权的政权体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认定落后国家要经历更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其间要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经济，逐步消除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成分有一定发展，逐步扩大社会主义阵地，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电气化和政治民主化。

新经济政策本来是长期的社会发展战略，然而，自 1924 年 1 月列宁去世后的五年里，这一政策实际上已逐步停止实行。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起，苏联领导层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次战略转变所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对苏联乃至以后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转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对如何在一个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从这一基本现实条件出发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步骤、形式和速度等问题，没有达到正确的认识。这次转变的结果，是建立起了斯大林模式，即后来持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

第二节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在国际上的推广

一、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成就

列宁去世后，发生了频繁而激烈的党内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斯大林战胜党内反对派后，随即发动了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这三大运动是相互配合、互相促进的，彼此有着紧密的内在

联系。斯大林坚持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求苏联在10年内跑完资本主义国家50年至100年所走的路。这对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而且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三年内战破坏，经济勉强恢复到1913年水平的国家）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解决高速工业化所需的资金问题，斯大林发动了农业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把个体农民组织成为集体农庄，实行义务交售制，将农村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运行轨道。而为了镇压强制推行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造成的不满情绪，斯大林又发动了大清洗运动，旨在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扫清政治障碍。三大运动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最终催生了一个以过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体制。

20世纪20—40年代，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大动荡之中，革命与战争连绵不断。苏联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它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以求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体制在某些方面适应了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满足了苏联社会发展的要求，并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首先，它巩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苏联，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顺利的时候，还是政策发生失误的时候，也无论是战争逼近的时候，还是进行战争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多民族成分组成的党和国家也始终保持着统一。总体上看，苏联在这一时期消灭了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阶级，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增强了工农联盟和各民族人民联盟，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得到了巩固，它同当时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巩固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保障。斯大林体制的社会主义，以建立美好幸福生活的远景为号召，激励着全体人民的建设热情，从而在极短时间内，使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其次，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41—1945年间，苏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力量之一。作为这场战争的主力军，苏联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得社会主义苏联的威望空前增长，使得苏联以世界两大强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随着红军在欧洲的推进，在东欧出现了一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后来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世界进步事业的发展。而在所有这些成就中，都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弊病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过度集权。这一特征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主要表现为过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等等。在经济方面，它的主要表现是：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方法，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它主要表现为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领袖言论成为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舆论一律，等等。在对外关系方面，它的主要表现，一是对外实行封闭政策，二是在“世界革命”的目标掩护下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弊病是：政治上民主太少，容易滋生个人专权；经济上管理过死，经济总体效益差；思想文化上严格控制，导致个人崇拜盛行，思想僵化；对外关系中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导致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

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大成果，是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朝鲜、蒙古、中国等十多个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国情不同，解放方式各异，它们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过程也各有特点。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从苏联一国发展为多国，并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世界 1/3 人口和 1/4 土地的强大社会主义世界性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根本改变了战后国际力量的对比。20 世纪 60 年代，拉丁美洲的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70 年代，印度支那半岛人民抗美战争取得胜利后，柬埔寨、老挝也走了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多时达到16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都是以共产主义政党为领导的人民政权，在军事上通过双边条约和《华沙条约》组成共同防御同盟（1954年华约缔结时有苏、波、捷、东德、罗、匈、保、阿八国参加，1962年以前中国曾派观察员出席会议），在经济上通过双边条约和经互会组织互助合作，建立起社会主义世界市场（1949年苏、保、匈、波、罗、捷六国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来阿、东德、蒙、古、越五国也加入，中国和南、老、朝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一些例会）。

欧亚拉美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次历史性胜利。它大大发展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各人民民主国家诞生之初，大都具有不同于苏联的新特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曾表示要建立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模式，通过人民民主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社会主义的好经验自然会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重视。可是，苏联却自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具有普遍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具有国际意义，非要别国照搬不可，表现出了严重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之下，绝大多数东欧国家都被迫接受苏联模式，不顾具体国情，照搬苏联那一套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结果，东欧各国在政治上也是过度集权、以党代政、领导职务终身制，在经济上急于消灭私营经济，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牧业集体化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搞一大二公三纯，在经济管理方面，排斥市场机制，依靠行政命令。在思想文化上搞个人崇拜、一言堂、教条主义、限制人民自由，等等。总之，这些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政治动员，忽视物质利益。因而体制存在严重弊病，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此外，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也都普遍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国际上推广，其效果和影响存在差异性。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性，另一方

面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个国家，对苏联模式的借鉴和仿效程度有差异性。由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有些执政党对苏联模式的普遍性提出异议，甚至抵制过苏联模式的推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最先起来冲破苏联模式束缚，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条件制约，南斯拉夫虽然抵制过苏联模式，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可是也未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实践证明并不成功。

第三节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及其历史教训

一、20 世纪 50—80 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斯大林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从它建立一开始就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端。随着这些矛盾和弊病的积累，第二次大战后，苏联社会的许多领域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成了战后苏联社会改革思潮涌动的原因和动力。斯大林模式形成之后遭遇了第一次较大的冲击波，但是这股涌动的改革潜流因没能得到斯大林的认同而最终胎死腹中。苏联失去了一次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它毕竟预示了更大规模的改革浪潮的到来。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苏南冲突的大背景下，南斯拉夫开风气之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冲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 1950 年起开始自治社会主义的建设。自治社会主义先后经历了“工人自治”、“社会自治”和“联合劳动”三个阶段。南斯拉夫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树一帜，第一个突破了传统模式，率先进行改革的探索。尽管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南斯拉夫受到苏联模式的排挤而被视为异端，尽管南斯拉夫的自治式的经济体制存在着过分分散的缺陷，但它毕竟给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打破了苏联模式的唯一正确性。在南斯拉夫的影响下，当时其他东欧国家也相继出现了要求改革传统体制的呼声。

苏联自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也开始了改革的探索。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矛

盾，触犯了过多人的利益，超过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改革措施难以为继。随着赫鲁晓夫被罢黜，他的大多数改革措施也相继被中止，半途而废。但赫鲁晓夫毕竟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公开揭开了苏联旧体制矛盾和弊病的盖子，并改变了旧体制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社会的发展，也对苏联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苏联赫鲁晓夫改革的同时，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国也相继开始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改革。改革基本上也是在不触动中央集权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各自国内的危机，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经验。

以1965年苏联实行新经济体制为标志，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1968年，匈牙利推行新经济管理体制，民主德国1964年开始实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也于同年达到高潮，捷克斯洛伐克则出现了著名的“布拉格之春”。这一时期，南斯拉夫把“工人自治”推进到了“社会自治”阶段，罗马尼亚也于1965年开始加入到了改革的行列，保加利亚从1971年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随后波兰也开始实行新体制战略。但是，苏联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持续推行下去，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又逐步后退了，许多措施不是虎头蛇尾，就是名存实亡，改革的目标没能实现。这一时期改革取得比较明显成效的是匈牙利。它在改革中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苏联又有别于南斯拉夫的经济模式，它试图把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既保持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又发挥微观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68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全面改革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正式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它不仅要求彻底改革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且要求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与国内政治民主化。苏联领导人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离开了社会主义，于1968年8月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形势开始逆转，各国相继放慢甚至中止了改革的步子。进入70年代以后，虽然一些国家仍没有停止探索，但总体而言，改革的势头再次受到扼制。

1982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重新开启了苏联改革的闸门。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改革（执政时间总共 14 个月）再次激活了处于政治休眠状态的苏联社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改革势头进一步强化。但是，戈尔巴乔夫最初几年的经济改革未能使苏联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多大变化，也未能阻止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的势头。1988 年苏共第 19 次全国代表会议把改革转入政治领域。苏联社会迅速进入动荡时期。进入 80 年代，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复兴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这一时期，除极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加入了改革的行列，一度使社会主义改革的潮流出现了空前波澜壮阔的景象。不过，总体上看，东欧国家 80 年代开始的改革收效不大，没能扭转各国经济发展的颓势。1988 年以后，东欧国家的政局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作用和巨大冲击下，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与剧变相伴随的改革也开始失去其原本的含义，体制改革演变成了制度转轨。

20 世纪 50—80 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主要成就是：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缓和了所在国的矛盾；改革打破了传统经济体制的神话，使人们认识到了改革旧体制的必要性；改革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改革促进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改革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论的探索，而理论探索反过来又推动着改革实践的深化。

但是，这一时期改革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改革在启动之初普遍准备不足。二是尽管各个国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大多数国家的改革普遍存在着不深入、不彻底的毛病。三是改革不全面、不配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其他改革的相互配合以及经济体制内部各项改革的不配套，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改革也是如此。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明显不足，没能与改革的实践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二、苏联东欧剧变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

1989—1990 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作用和巨大冲击之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东欧剧变，综合来

看，各国大体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可一时又找不到解决困难的出路，党内出现了反对派并与党外的反对派相呼应。二是执政党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影响下，不断对反对派妥协退让，甚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承认反对派合法地位，与反对派对话或召开圆桌会议等，而反对派则乘机扩大势力。三是反对派向执政的共产党夺权，或通过大选，或通过不断制造动乱，不断施加压力，个别国家甚至通过武装冲突，最后实现政权更迭。东欧国家由于毗邻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压力与冲击力很大，先于苏联发生剧变。东欧剧变有三波浪潮：波兰、匈牙利的剧变是第一波浪潮，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剧变是第二波浪潮，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剧变是第三次浪潮。

东欧八国的剧变各有各的特点，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从时间上说，波、匈、东德、保、捷、罗六国是在1989年发生剧变的，时间较早，阿、南两国是在1990年以后发生剧变的，时间稍晚一些。从方式上看，有的国家是执政的共产党本身改变了性质，变成了社会党，从而导致社会发展方向的改变；有的国家则是执政的共产党被迫向反对派让权，从而使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多数国家的剧变是和平演变；个别国家如罗马尼亚的原有政权则被暴力所推翻。但是，东欧各国剧变的性质是相同的，即第一，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三，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苏联的解体，主要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从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8年6月到1990年7月，即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苏联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提出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改革的方向发生重大改变。第二阶段从1990年8月到1991年8月，即从苏共二十八大到“8·19”事件，“传统派”与“激进派”进行激烈斗争。这一阶段的前期“传统派”占优势，后期“激进派”占上风。打着“中派”旗号的戈尔巴乔夫，前期倾向“传统派”，后期又转向怂恿“激进派”。第三阶段从1991年8月到12月，即

从“8·19”事件到苏联解体。“8·19”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苏联共产党彻底垮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倾覆，苏联出现了亡党亡国亡制的局面。

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1.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的原因错综复杂，必须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同时还要抓住关键，分清主次。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第二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第三是西方从外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学术界无论何种观点，一般都承认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是苏联解体的基本原因，分歧在于各自对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的侧重点不同。有的观点侧重于外部原因，认为西方从外部搞和平演变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结论自然是要把反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放在首要位置；有的观点侧重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因素，因而主张把选好接班人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防止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有的观点侧重于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认为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主张把着力点放在改革苏联模式上。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苏联原有的模式积弊太深。这并不是说苏联模式已经无药可救，必死无疑，而是说必须对苏联模式进行根本改革，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去代替旧模式。

苏联模式的弊端总括起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表现为社会长期存在三个矛盾。第一，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水平，过早建立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尽快发展。超前、僵化的生产关系同后进生产力的矛盾，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难以更快地提高。第二，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的体制同社会主义要求尽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矛盾。这个矛盾极大地限制了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自由，损害了人民的权益，越来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第三，党政军官僚特权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雪上加霜，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不满。这三大矛盾是执政的共产党本身的错误制造出来的，再加上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等，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多样。可以说，凡是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

同程度上都存在上述这三大矛盾。它最早在3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时就已出现，经过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代领导人搞三代终身制，这三大矛盾更加演化、更加严重了，而且随着苏联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这三大矛盾也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化、国际化了。如何解决这三大矛盾呢？苏共后期党内形成的“左”、中、右三派都拿不出正确的路线来妥善加以解决。而叶利钦的自由资本主义则利用这三大矛盾以及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把苏共、苏联彻底搞垮了。

2.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是20世纪末震撼世界最重大的事件，是十月革命胜利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最严重挫折。根据以上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原因的分析，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和改革中必须汲取以下三点主要历史教训。

（1）要警惕右的，但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是“左”的教条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相结合所形成的理论观念、具体体制和方针政策。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长期不能克服“左”的错误（如指令性计划经济，过度集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很容易滋生右的东西，造成先“左”后右合葬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前三年还是“左”，后三年走中间路线，他反“左”不得法又不得力，愈益向右倾斜，倒向右的一边，终遭失败。事实证明，借助于“左”的东西来反右，顶多一时管用，从长远来看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当然，反“左”还要防右，不能调和折中。

（2）改革必须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它们的改革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取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认为，改革要把握正确的方向，最基本之点就是要在理论上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首要的关键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清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进而按照这个基本规律来制定切实可行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以科学

社会主义为指导来进行改革，还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相互关系。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是硬道理，提高经济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切都离不开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稳定则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条件，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否则就无从谈起。二战后历届苏共领导人，都没有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相互关系。斯大林压制改革，赫鲁晓夫盲目改革，勃列日涅夫只讲稳定而不谈改革和发展，戈尔巴乔夫却是只讲改革而不谈稳定和发展。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来进行改革，还要正确对待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在改革的年代，回顾和总结过去的历史是完全必要的，改革就是要克服以往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消除原有体制的弊病。问题在于共产党本身采取什么态度。正确对待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苏联、东欧剧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共产党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丑化自己，结果为共产党垮台和社会主义崩溃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3）要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剧变，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起了重要作用。这虽然不是导致剧变的决定性原因，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自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就把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根本战略目标。当使用武力不起作用时，它们就转而采用和平演变的办法。但和平演变能否得逞，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态度，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为了防止和平演变而倒退到对外封闭、与西方国家的冷战对峙的旧格局中去。在对外开放以及与西方和平共处、协作、竞争的过程中一定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利益，不能迁就与退让，对西方腐朽、反动的思想与文化要进行抵制与批判。更加重要的是要加快内部体制的改革，避免给西方的和平演变找到可加利用的突破口。

思考题

1. 什么是新经济政策？
2.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弊病是什么？
3. 简评20世纪5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4.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5.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主要历史教训是什么？

第三章　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及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探索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早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构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陆续建立了民选的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开始初步独立探索中国未来通往社会主义之路。这些探索的最高成就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借鉴中又有创新。同苏联模式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如下三个突出特点和优点。第一，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方式创建政治体制。第二，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第三，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制度。但是，1949年我们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过早地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于1956年提前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在初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大量存在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繁荣，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重要思想。然而，由于并没有真正认清苏联模式的根本弊端，加上对1956年秋后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1957年春夏国内整风运动中发表的各种意见作出错误的分析与判断，又缺少党内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自1957年起逐渐转向“左”的方面。从此，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连续20年之久，在我国推行了一套比苏联模式更“左”的模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遭到了重大挫折。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1976年10月我们党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而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的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重新步入正轨。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命题和基本理论。大会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1987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三大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大会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为12个要点，指出这一理论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大会还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十四大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新党章的总纲。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明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并把它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大会强调，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都出现了新形势，面临着新任务。新科技革命更加迅猛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前进，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涌动，一批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执政地位。中国要追赶世界潮流，要求加快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民主政治与先进文化，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改善其处境，维护其切身利益的迫切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且扩大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作出的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江泽民系统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定位为党的指导思想。从十六大起，我们党的文件还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更加精练，而且包含有精深的要义，即既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超越科学社会主义。总之，党的十六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21世纪初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十六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党必须全面认识新形势新任务，科学分析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奋斗。大会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大会进而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从纵向来看，迄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内容，今后还会增加新内容；从横向来看，包括解放思想论、改革开放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民主法治论、先进文化论、文明建设论、核心价值论、一国两制论、和平发展论、和谐社会论与和谐世界论，等等。

第二节　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一、越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越南的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认真分析和反省了过去的错误和面临的严峻局势，得出了只有革新才能促使形势转好、只有革新才有出路的重要结论。大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推进革新事业，以市场机制彻底取代计划机制。自此，越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6月召开的越共七大又明确提出了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由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的革新战略，强调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要逐步进行，确定了独立自主、广泛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越共七大以后，越南采取了一系列深化革新开放的步骤和措施，革新开放进入较为巩固的发展阶段。1996年6月底7月初召开的越共八大，总结了10年革新开放的经验教训，宣布越南已经摆脱了持续15年的严重社会经济危机，开始进入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时期。2001年4月，越共召开九大，确定了21世纪初期越南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大政方针。这次大会系统阐述了胡志明思想，确定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为越南经济体制发展模式，明确把民主作为越南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大会还提出，到2010年要使越南摆脱不发

达的状况，显著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为2020年基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奠定基础。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确定了2006—2010年总体发展目标，并开始党的最高领导人差额选举的尝试。

越南经济革新的政策与措施主要包括：大力推广和不断完善农村承包制，鼓励和支持农村庄园经济的发展，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力促进经贸合作，加快融入世界经济，提升越南经济的国际化水平，等等。政治革新的主要探索包括：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明确限定党的领导人的任职年龄，推行差额选举，强化中央委员会决策权和质询权，加强国家权力配置的相互制约，强化国会权力，推行信息公开化，提高全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开展持续不断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等。越共革新开放的主要理论成果包括：确定越南仍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统一、固定的模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越南实践相结合的胡志明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把独立、民主、富裕、强大、公平、文明确立为越共的奋斗目标，确定越共既是越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越南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忠实代表，等等。

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与严峻挑战，如工业基础设施薄弱，人口增长的压力巨大，贫富悬殊现象严重，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等等。

二、老挝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老挝人民革命党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执政党和唯一政党。老挝党在夺得全国政权后，曾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结果使老挝经济陷入困境。老挝进入重新认识国情、推行革新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于1986年11月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四大。这次大会纠正了过去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认为老挝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以后还要经过若干阶段和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老挝从此逐渐开始了革新经济政治体制的进程。2001年和2006年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和八大勾画了老挝进入新世纪的经济与社会

发展总体战略。

老挝经济革新的政策与措施包括：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改革国营企业体制，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等等。老挝政治革新的措施包括：加强党建工作，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强化权力监督机制，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大力调整民族和宗教政策，等等。在外交方面，推行以谋求经济援助和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全方位务实外交。老挝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重要认识包括：老挝仍处在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以后还要经过若干阶段和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进入社会主义；老挝最迫切的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逐步把老挝的自然、半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坚持老挝人民革命党是人民民主政治体系的领导核心；加强政治建设，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等。

1986 年全面革新开放以来，老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基础薄弱，国民总体教育水平低，贫富差距大，等等。

三、朝鲜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朝鲜劳动党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其指导思想是朝鲜劳动党前总书记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金日成曾把“主体思想”概括为“在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后来“主体思想”被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朝鲜的社会主义也因而被称为“主体社会主义”。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朝鲜经济出现停滞局面。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朝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金正日主政朝鲜后，表示将坚定地走“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朝鲜的内政与外交也发生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在农业领域，逐渐实现了由“分组管理制”到“分组承包制”再到“家庭营农制”的转变，并开始推行以调整粮价为中心的购销体制变革。第二，在工业领域，开始谨慎地进行突破计划体制的尝试。第三，在社会生活领域，取消实行数十年的生活必需品国家定量配给

制，调整物价，增长工资。第四，在科技领域，重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相关人才的培养与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第五，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实行“先军政治”和“强大国家”战略，更加突出和强化军事力量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第六，逐步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提升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地位，设置特别行政区，不断拓宽对外贸易的对象和领域。第七，在对外政策方面，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积极谋求打破外交孤立，拓展外交空间。

朝鲜国内发生的一些变革是积极的。不过，朝鲜的发展与变革也有许多制约因素。既有国内的体制问题，也有来自国外的干扰。朝鲜式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任重而道远。

四、古巴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古巴内外交困，面临巨大的生存威胁。为摆脱危机，克服困难，古巴实行了“稳步的改革开放”政策。1993 年 7 月，卡斯特罗发表讲话，宣布实施重大经济改革措施，标志着古巴进入了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主的新时期。

古巴的改革和开放措施主要包括：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合理发展；加强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相继对计划管理体制、税收制度、价格体系、市场管理体制以及金融体制等进行了调整和改革；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下放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正；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善全国人民代表政权制度建设；积极推行全方位外交政策，等等。古共在理论认识方面的新变化主要包括：强调走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强调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相联系，为此，古共把民族独立英雄何塞·马蒂的思想写入党章；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资源配置方面坚持不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多党制；在国际问题上主张世界多极化，倡导建立稳定、公正和民主的国际关系体系。

古巴强调从本国国情出发，走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已逐步摆脱了苏东剧变造成的困

境，但古巴在改革和建设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面临诸多挑战。

第三节　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探索

一、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显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世界无论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1）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在内涵上已由过去的蒸汽化、电气化发展到当今的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在地域上已由一国范围发展到国际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生产要素的配置与组合出现前所未有的社会化与国际化。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越来越起主导作用，已成为资本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和组织形式。

（2）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剥削与政治统治方式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剥削更加隐蔽化、智能化、国际化，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方式也带有越来越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和“持中”色彩。

（3）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资本剥削形式的变化，雇佣劳动阶级的构成以及雇佣劳动的形式日趋复杂化。以往资本主义社会的“葫芦型”阶级结构也由“橄榄型”结构取代，中间阶级人数越来越多。

但是，必须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不时地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其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工作环境、生活水平、福利待遇等方面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第三，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民主权

利比以前有所扩大，但是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结合得更加紧密。政治的阶级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第四，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规律依然在起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频频爆发，并由此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

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很大冲击，严重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自动解散或迫于压力以及其他原因改变了党的名称和性质，共产党的数量减少，党员总数急剧下降，党内思想混乱。从目前的现状看，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与政策调整，基本上渡过了苏东剧变初期最为严峻的困难，发展稳定，在一些地区、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力量还有所发展。面对冷战后出现的新形势与新问题，许多共产党都结合各自面临的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和积极的探索，其中主要包括：

（1）大多数共产党都认为，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它只是证明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

（2）绝大多数共产党都非常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变化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分析与深入的探讨。

（3）尽管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差异，但各国党都比较强调要依据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状况，搞有本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4）许多共产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党的性质、组织原则、指导思想、斗争策略、党际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冷战后，一批共产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动荡与滑坡之后逐渐稳定下来，并积极谋求发展，一些党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还有所加强。当前世界上除五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大约还有 100 多个共产党，9 000 多万党员，分布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目前在各自国内有一定影响力共产党，在传统西欧有法国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在原苏联地

区有俄罗斯共产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等，在亚洲地区有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度共产党等，在非洲有南非共产党、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留尼汪共产党等，在拉丁美洲有巴西共产党等。其中有些党是各自国内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或第二大党，有些党是国内重要的参政党，有些党长期在地方执政，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共产党通过艰苦努力成了国内的执政党。例如，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在2001年大选中胜出，该党领导人沃罗宁当选为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在2005年的摩尔多瓦大选中，沃罗宁成功连任。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亚斯在2008年2月进行的塞浦路斯总统选举中获胜，组建了以劳动人民进步党为核心联合政府。1994年11月至1995年9月，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曾单独组阁，此后又多次参加联合政府。2006年11月，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长期武装革命并有望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下，毅然放弃武装斗争道路，回归民主选举，并在2008年4月的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8月，尼共（毛主义）主席普拉昌达被选举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理，并建立了以尼共（毛主义）为首、包括尼共（联合马列）、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等党的联合政府。

冷战后世界共产党的新变化，既有独立自主、多元发展的一面，也有加强彼此交往、增进国际联系的一面。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党际交往更加频繁，地区性的共产党会议经常召开，如西欧共产党的“西欧左翼论坛”，南亚的“毛主义政党协调委员会”，以及以国际学术会议等形式定期召开的“马克思园地协会”、“世界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者国际大会”等。更值得关注的是1998年以来持续召开的世界性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该会议不是重建国际组织，也不是以哪个党为领导或中心，而是以交流经验、加强联系为宗旨，对国际形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自状况，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等问题进行探讨。该会议大致每年召开一次。

三、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几个有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

在冷战后时代，有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除各共产党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政党的民族社

会主义、红色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等。

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曾同出一源，但它们后来分道扬镳了。从20世纪90年开始，在社会党国际、各国社会党文件以及有关社会党理论与政策的文章中，“社会民主主义”逐渐取代“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大多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实践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选民眼前利益的改良主义，比起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一个进步。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取代民主社会主义后，社会党的政治目标已不再是建立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社会民主”、“民主主义”或“民主制”，而社会主义则变成了一种关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

民族社会主义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三大洲有100多个新独立的国家，除极少数像中国、越南、古巴等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外，绝大多数国家是在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取得独立的。受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有很多民族主义政党在赢得国家独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纲领，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在冷战后时代，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社会主义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国家明确宣布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与理念，另一些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则逐渐演化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并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其他一些民族主义政党虽然基本上坚持了原来的立场，但也大都根据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政策调整。

生态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绿党运动与生态运动中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逐渐成为一个异军崛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生态社会主义从自然环境面临严重危机这一事实出发，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与全球性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同时，重新思考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独到见解的理论主张与政治思想。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与生态危机的产生存在必然联系。只有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拯救人类

的生存环境。生态社会主义作为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关心人类前途与命运的一种派别与理论，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严重表现、后果、根源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思考，揭示了全球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与探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关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类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些都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主张较之其他绿色政治派别更符合实际、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

思考题

1. 试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2. 试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3. 试述越南革新开放的主要政策与措施。
4. 试述冷战后世界共产党的基本态势。

第四章　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命运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教训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贡献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理想和信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第二，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展现了美好的前景。第三，共产党和多种社会主义政党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社会主义力量的组织者、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政治舞台和许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第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初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第五，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第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许多宝贵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和借鉴。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最根本的是要坚持解放、实事求是。审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的历史，其基本经验包括：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不懈地搞好党的建设。第二，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第三，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四、必须努力探索反映时代特点、适合本国国情和具体历史条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第五，必须善于把握时机，勇于在历史转折关头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阶段。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要教训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应该吸收的主要教训包括：第一，必须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第二，必须善于把理想和现实、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近期切身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第三，必须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革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第四，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第五、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防止和反对大党大国主义。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当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是指人类活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遵循唯物史观来确定划分时代的标准。这样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另一个是生产关系的性质和阶级力量的对比。

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标准来看，人类社会正面临一个科学技术

革命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时代。所谓科学技术全方位大发展，是指以往的科技革命主要限于某一学科领域，而当前时代的新科技革命则遍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所谓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大发展，是指科技的发展后浪赶前浪，速度倍增，突飞猛进。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必然会使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人际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各方面都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正是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使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如社会生产进一步自动化、社会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在增强，世界一体、全球一村的进程在加快。

从生产关系性质和阶级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已进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共处、竞争和斗争的新时代。两种制度、两类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反复较量，逐渐形成了一种彼此和平共处并且在许多领域进行协作的局面。有的问题要协商对话，协调关系，达成协议；有的问题还可以进而互相合作，共同发展。当然彼此还会在很多领域开展竞赛和竞争，竞赛和竞争就是要比优劣，优胜劣汰。同时，两种制度、两类国家仍然会充满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斗争。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国际间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有时可能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二、当代科学社会主义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新科技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科技革命不仅使当代资本主义由工业经济时代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为其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它同时也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为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注入新鲜活力。其次，经济全球化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社会主义国家吸引外资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推动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第三，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在不断增长，世界多

极化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呈现全方位发展态势，这些都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条件。第四，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也给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断地创造着条件。新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的维持，极大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则为最终扬弃私有制、消除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创造着物质基础，为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准备着条件。

三、当代科学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在当今这样一个新科技革命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共处、竞争和斗争的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民主化的挑战、当代资本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自身的挑战等。其中最突出的两大挑战是：发达资本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就前者而言，科学社会主义迫切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为什么被科学社会主义断定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还能带头掀起以信息化为先导的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更加发达？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为什么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等十几个国家会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落败而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才能保证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取得最后的胜利？等等。就后者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在资本主义世界，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越来越超过科学社会主义？应当怎样看待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都社会民主党化并从科学社会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科学社会主义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在理论上就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并在实践上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应对这些挑战。而执政的共产党只有加快改革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病，既坚持又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探索建设成功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才能从根本上应对来自发达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挑战。

四、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战略

为了积极迎接挑战，在新的形势下，科学社会主义需要采取新的战略。概括起来，新战略主要包括：第一，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勇于放弃战争引起革命的旧战略，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去争取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第二，要树立长期斗争的观念，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放弃短期突进的“左”的观念；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彻底放弃以某一国家为中心领导世界革命的观念，要立足于搞好本国建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向心力；第四，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要调整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由对峙、对抗转向长期和平共处、对话、交流、合作、竞争，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在对外开放中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五，各国共产党要立足于求同存异，联合各类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要区别对待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各种政党，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就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新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新的挑战，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仍然威胁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牢固树立科技兴国的战略意识，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创造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全面加强制度竞争力。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严峻的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思考题

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历史贡献是什么？
2.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3.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历史教训是什么？
4. 当代科学社会主义面临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5. 当代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什么？

第三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毛泽东思想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历史背景

1.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特点及革命的缘起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大体经历了由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入侵三个阶段。1840 年 6 月，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 1842 年 8 月 29 日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又增加了补充文件。这些条款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外贸主权、行政主权和司法主权。中国从此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

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或追随英国，对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侵略和掠夺。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不但规定中国割地、赔款、增开商埠，还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厂，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从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进入到资本输出打开大门。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1900 年夏，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英、法、俄、日、美、德、意、奥八国联军攻掠京津地区。次年 9 月，清政府与八国签订《辛丑条约》。它标志帝国主义已全面控制了清政府，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格局基本形成。

中国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六个特点：

（1）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成为统治中国、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

决定性力量。

（2）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

（3）封建剥削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4）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和本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抑，它不仅力量软弱，而且发展缓慢，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5）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又由于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造成中国实际上长期不统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6）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群众，尤其是工人和农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近代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相勾结，造成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中国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主要的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

2.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新旧两个阶段：1840 年到 1919 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19 年到 1949 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广义说，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都可以归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从狭义说，只有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播下了民主

主义的种子。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攫得。袁世凯热衷于专制集权统治，破坏政党政治，从外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派，取消国会，废除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意在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最后竟然准备恢复帝制，终于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和反抗。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分裂成皖、直、奉三大派系，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军阀。他们分别依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彼此割据称雄，相互争权夺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国家和地方议会、政府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压迫人民，成为分裂和战乱之源。中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

3. 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前后，由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陈独秀等人发起，在全国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反对封建文化，传播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新观念的思想解放运动。

1915 年 9 月，为了冲破袁世凯专制统治的黑暗，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宣传民主、科学，反对以儒家旧伦理道德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白话文与文学革命，反对偶像崇拜和鬼神迷信。1917 年初，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先后受聘到北大任教。《新青年》迁到北京，影响扩大。北京大学经过重大改革，成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之一。《新潮》、《国民》、《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等陆续加入新文化的宣传。五四运动后数年间，涌现出几百种新文化刊物。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启蒙运动。它比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更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文化，震动了辛亥革命失败后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有力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也存在形式主义的弊病，并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震动。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李大钊率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

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这成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

4. 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为抗议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妥协退让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的协约国家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上不顾战胜国中国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竟然将德国战前在山东霸占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北京十多所学校3 000余名学生于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并火烧了曾参与同日本进行有关“二十一条”谈判的前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北洋政府镇压，但却迅速得到全国各界支持。6月5日开始，上海、天津等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波及全国22省100多个城市，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最终赢得了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官僚职务和中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签字的胜利结局。

五四运动和以往的革命运动相比，有三个显著特点：

（1）它发生在十月革命后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成为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2）它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出现了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阵营。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繁荣而有了显著发展，到1919年已达200余万人。它除了具有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共同优点外，还具有三个特点：其一，受压迫重，有着更为坚决彻底的革命性；其二，生活、工作地区和行业高度集中，有利于团结战斗；其三，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强大的工农联盟。在五四运动中，工人们规模空前的政治大罢工，对运动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立力量，开始走上领导中国革命的新阶

段，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3）五四时期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他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分析社会政治与革命问题，自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并成为不久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批骨干成员。

以上三个特点决定了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它具有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它划分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界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5. 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兴起。许多刊物刊载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

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严密的科学性和已为俄国革命证实的革命实效性吸引着进步的人们。1919 年 5 月起，《晨报》副刊、《新青年》、广东《新中华报》等纷纷登载评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1920 年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出版。同年 3 月和 5 月，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论争。第一次是有关问题与主义，即是应当采用实用主义的渐进改良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还是应当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之争；第二次是有关社会主义，即在中国能否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和怎样实行社会主义之争；第三次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即如何看待个人与团体、自由与秩序、革命与专政、平等与平均等问题的论争。通过论争，先进分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和革命的方向，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从而跨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初期斗争

1.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1年7月23日到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最终消灭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会议选出三人组成党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组织、宣传。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重大意义：第一，它标志着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第二，它标志着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障。第三，它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中国革命从此有了经过非资本主义途径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

2. 中共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同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阐明的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讨论和制定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通过了大会宣言及《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等决议；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服从上级机关，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

会议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肯定当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同民主主义势力结成联合战线，以促使革命迅速成功。在此基础上，会议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即

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二，它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这是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第三，它为自己指出了当前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为不久后国共合作，发动国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到发展工人运动方面。1921 年 8 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自 1922 年初到 1923 年 2 月，全国举行上百次罢工，形成近代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些罢工主要有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香港海员罢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邓中夏、罗章龙、邓培领导的开滦煤矿罢工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员英勇坚决、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在全国政治上的威望。同时，斗争的实践也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而没有强大的同盟者，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这种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

第二节　国民革命与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一、国共合作的建立

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大体经历了三个步骤：

（1）1922 年 6 月，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同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愿

望;党的二大正式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进一步肯定了这一主张。

(2) 由于孙中山不同意党外合作方式, 1922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有关建立国共合作的建议,决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推动统一战线的建立。

(3) 1923 年 6 月,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以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政策的最终确定,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党在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中,找到了合作伙伴和使合作能够实现的方式;它的实施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也有利于共产党人从工人运动的低潮中走出来,开拓新局面,从而加强革命力量,推动革命进程,迎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高潮。

2. 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形成

自 1922 年 9 月起,孙中山组织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成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1923 年 11 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 160 多名代表中有 20 多名共产党员。这次大会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1) 确定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三民主义做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了国家的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并“适合于中国现在革命之需要”;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也被称为“新三民主义”,

它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纲领的若干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2）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议通过允许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章程条文；决定大力吸收工农分子加入国民党，积极开展农工运动，扶助工农革命团体。

（3）按照国共合作精神选举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在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人分别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占全体委员人数的1/4。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随后兴起的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二、国民革命的爆发与失败

1. 五卅运动

1925年1月11日到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如何领导即将到来的工农运动高潮问题。它使党加强了领导革命斗争的力度。

192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针对5月15日上海发生的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事件，发动学生和工人举行大规模的反帝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英国巡捕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逮捕数十人，是为“五卅惨案”。6月1日开始，上海工人、学生、店员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随后成立的三罢斗争指挥机关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于11日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提出惩凶、赔款、取消领事裁判权等17项交涉条件。三罢斗争持续到6月下旬，因总商会通告商人开市方告结束。为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已经取得的斗争成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罢工工人亦于8、9月间陆续复工。在五卅运动期间，全国各地有1 700万人直接参加反帝示威和“三罢”斗争。其中发生在香港和广州的省港大罢工有25万人参加，得到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从1925年6月一直持续到1926年10月，是五卅反帝怒潮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斗争。

五卅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第一，它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怒

潮，有力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威信。第二，它是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一次实际表演，充分证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死敌；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反帝斗争，但易于动摇妥协；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反帝斗争热情；无产阶级则具有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性，不愧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2.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广东是孙中山两次护法运动的大本营。1923 年滇、桂两军驱逐陈炯明后，孙中山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于 1924 年 10 月镇压了有港英当局和广东大地主支持，蓄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商团叛乱。1925 年 2 月到年底，广东革命政府先后进行两次东征和一次南征，消灭陈炯明和邓本殷部，其间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并于同年 7 月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将所辖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从而建成统一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早在改组之前就出现的反共右翼势力由于孙中山逝世，党内矛盾加剧而日益猖獗。1925 年 6、7 月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鼓吹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又提出所谓团体“排拒性”、“独占性”的观点，宣称建立“纯粹的国民党”，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同年 11 月，国民党内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不久后又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从而形成西山会议派。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予以坚决回击。瞿秋白、陈独秀、毛泽东等发表文章，揭露戴季陶背离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违背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于 1926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重申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但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也采取妥协政策，致使不少右派分子仍被选进新

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特别是善于伪装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大为提高。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以共产党人擅调中山舰图谋不轨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制造了所谓中山舰事件。5 月 15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 1/3 ,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共产党应交出加入国民党的人员名单等。这些措施限制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及活动,使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逐步夺取在国民党内的领导权。

3. 北伐战争与工农运动的高涨

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分为西、中、东三路。西路军先头部队于 5 月起进军湖南,8 月下旬在汀泗桥、贺胜桥大战中歼灭吴佩孚主力,10 月 10 日攻克武昌。其间,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的一部分和首登武昌城头的部队,建立了重大功勋,该团所属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中路军于 9 月进军江西,攻占南昌不久复失守;11 月上旬在南浔路一带歼灭孙传芳主力,占九江、南昌。东路军于 10 月上旬出击,一举攻占福建各地。与此同时,受到奉直军阀压迫的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帮助下,于 1926 年 9 月在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11 月下旬占领西安。1927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下令定都武汉。此后,北伐军继续推进,西路进入豫南对奉军作战;中路和东路于 3 月下旬进占上海、南京。至此,北伐战争取得前一阶段的重大胜利。

北伐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范围反帝斗争和工农运动的高涨。1927 年 1 月,汉口和九江发生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从 1926 年 10 月到 1927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其中第三次起义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经过周密准备和浴血奋战,在北伐军进占前夕,于 3 月 22 日解放上海。从 1926 年秋到 1927 年春,两湖和江西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从 1924 年 7 月到 1926 年 9 月举办过 6 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各地农会领导农民向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开展减租减

息、清算罚款斗争，有力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显示了农民的伟大革命力量。

4. 国民党右派集团相继叛变和革命的失败

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国民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帝国主义者为维护在华利益，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在上海集结两万人的军队，有90余艘军舰游弋于上海附近和长江之上，并且相继发生英国军舰炮击北伐军和民众，造成1 000余人伤亡的“万县惨案”和英美军舰炮击南京，造成2 000余人伤亡的“南京惨案”。蒋介石一面争取帝国主义势力的理解和支持，一面违背国民党中央决议，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改迁南昌，挑起“迁都之争”，同时，加强反共和破坏工农运动，进而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袭击工人纠察队，镇压游行工人，并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的“国民政府”，公开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继续对反共势力妥协。1926年12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提出，使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日益向“左”和国民党军事领袖日益向右，主张大力扶助汪精卫，同时推动蒋介石左转和纠正共产党及民众运动的“左”倾。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仍选举他担任中央总书记，而且未能针对挽救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1927年5月13日、21日，武汉政府区域内相继发生夏斗寅、许克祥叛变。6月，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冯玉祥先后在郑州和徐州分别和汪精卫、蒋介石讨论蒋汪合作，共同反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虽然后来继续北伐，但是，它投靠帝国主义，成为新军阀，建立专制政府。因此，国民革命终归失败。

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第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第二，国民党背信弃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第三，中国共产党犯了右倾错误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犯有若干脱离实际的错误。

国民革命虽然失败，仍具有重大意义：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远比辛亥革命深刻得多、坚决得多的勇猛冲击；它大大唤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觉悟，把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站在斗争最前列，不怕牺牲，英勇拼搏，成为开拓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主要力量。

三、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与国民党合作领导国民革命期间，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关于资产阶级和统一战线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第一步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实现和平统一，建立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渐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才能成功。无产阶级要在国民革命中争取领导权；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两面性，无产阶级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这些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第三节　土地革命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一、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土地革命的兴起

1. 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

“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各派势力经过一系列钩心斗角和军事混战，到1928年2月初，由一度下野重新登台的蒋介石控制了局面。同年4月，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发动“二次北伐”。6月，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12月，张学良宣布“易帜”，归服国民政府。南

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全国。

国民党政权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在它的统治下，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仍然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2.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方针的制定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着重批评了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会议没有注意防止已经开始滋长的“左”倾情绪，反而允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会指出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革命的任务，亦即党的工作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分别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但起义军退出南昌后，转战两个月，终于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广州起义仅坚持三天，亦被镇压。秋收起义在毛泽东领导下，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井冈山，与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联合，又于 1928 年 4 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毛泽东担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先后开辟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此外的其他起义大多失败，但也有一些坚持下来，转移到农村，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左右江、广东东江和琼

崖、湘赣等地的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余人。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7月，蒋介石前后调动10万~30万人的兵力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展开三次大规模“围剿”。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这些“围剿”。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基本思想的提出

1. 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思想

毛泽东在国民革命时期就注意对国情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提出认清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等问题。在八七会议上，他又明确提出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和“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认识。在领导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进一步思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和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初步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这一理论大体包括三个内容：

（1）红色政权暨工农武装割据得以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中国是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广泛存在，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政治发展不平衡，军阀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混战，使红色政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缝隙；地域广大的地理环境使革命力量有广泛的回旋余地——这些是根本原因。国民革命在一些地区产生过很大影响；全国革命形势将会继续向前发展——这是两个客观条件。相当数量的红军存在；共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和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这是两项主观条件。

（2）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的密切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武装斗争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

展革命根据地的最有力的工具；建立革命根据地则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党的领导则是根本保障。

（3）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前景：全国范围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建立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将正规红军和人民自卫武装结合起来，使政权波浪式地扩大等，才是适合国情的正确政策。

以上内容，实际上形成了共产党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2. 土地革命路线

毛泽东等人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领导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由湘赣边区工农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又经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的实施，推动了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调动了根据地农民生产和支援红军战争的积极性，并为党后来制定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经验。

3. 人民军队建军原则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转移井冈山途中，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实施军队改编，主要内容是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制度，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这次改编开始确立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929 年 12 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毛泽东为会议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同时，批评将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观点，还重申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

务，从而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基本任务。

三、“左”倾路线的危害和革命道路的历史性转折

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先后发生三次较大的“左”倾错误。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批判调和主义，强调反右倾，决定改组各级领导机关。受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王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优势和国际代表的支持，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控制中央领导权，开始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观点集中表现在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夕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中，其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认识不足，因而没有能够更迫切地由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在阶级关系上，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早已投入反动营垒，一切资产阶级改良派更都属于反动营垒。第三，在中国革命性质和对象问题上，提出现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因而强调宣传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土地国有等。第四，在革命形势问题上，认为中国革命正在形成新高潮。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冒险主义。它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第一，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陷入一片混乱，刚刚恢复不久的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惨重损失，以至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于 1933 年被迫迁往中央根据地瑞金。第二，使农村根据地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中央根据地红军虽然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但毛泽东被解除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临时中央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斗争，邓小平等遭到无情打击。第三，在反击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中，听命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反对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全线出击”，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终于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2. 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召开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由于“左”倾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损失惨重，人员锐减。

1935 年 1 月 15 日到 17 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错误，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 1931 年 9 月以来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在极其紧要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第二，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表明中国共产党已能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通过了川西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越过雪山、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于 1935 年 10 月 19 日抵达陕北吴起镇，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下历经曲折，后经朱德、任弼时等人的斗争，亦于 1936 年 10 月到达甘肃，与先期北上的红军会师。红军长征的胜利宣告国民党“围剿”的彻底失败，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并且广泛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为抗日战争和后来革命的胜利打下基础。

四、反抗日本侵略和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

1.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的确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四个月后侵吞了中国东北全境。1932年初，日军突然袭击上海闸北中国驻军，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同年3月，日本政府扶持清朝废帝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日军占领山海关、承德，分兵进犯长城喜峰口等要塞，直指北平、天津。1935年，日军迫使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与之签订掠夺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又策划旨在将华北与中国领土分离的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制造了华北事变。

针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形势和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这一策略总路线作了精辟阐述。决议和报告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迫使一切不愿当汉奸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民族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可能保持中立态度。地主买办阶级由于其依靠不同的帝国主义“主子”，也有一部分会参加抗日。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会议还对党的政策作了若干调整，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战中加强组织建设，争取实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路线，保证了党在新形势下运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团结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2. 西安事变和团结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大规模抗日救国示威运动，全国三十多个大城市学生群起响应，是为“一·二九”运动。以此为契机，全国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与驻扎西北地区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协议。1936 年 12 月，蒋介石亲临西安，敦促张、杨“剿共”。张、杨因蒋屡次拒绝关于停止内战的劝说，遂于当月 12 日扣留蒋介石及其随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提出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邀请，派周恩来赴西安参与张、杨与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由于各方面因素的推动，谈判终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定。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宋庆龄等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标志着国民党最高当局终于放弃内战“剿共”、对日妥协方针，开始向和平、抗日方面转变。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团结抗日局面初步形成。

第四节　抗日战争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初期抗战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特点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军队制造了卢沟桥事变；8 月 13 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亦即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此爆发。7 月 15 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议以此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宣言》提出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项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所作的四

项保证。8 月 22 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就中共宣言发表谈话，提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有四个特点：

（1）它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成分更为广泛复杂。

（2）它的内部存在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矛盾和斗争更为复杂尖锐。

（3）它是国共两党以党外合作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只是采取遇事协商、临时约见的合作办法，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4）它处于有利而又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

2. 两条抗战路线和抗战初期的两个战场

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两条不同路线：国民党实行的是坚持一党专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拒绝一切根本改革，反对使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战争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实行的是坚持人民战争，要求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

抗战开始后，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八路军配合，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大的战役。中国军队除取得台儿庄歼敌 2 万余人等局部胜利外，在全局上连遭失败，先后失去太原、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等要地，丢掉大片国土。但是，这些战役前后持续一年多，亦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为敌后战场的开辟起到掩护作用。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将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东渡黄河对日作战，先后取得平型关大捷等胜利，并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

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斗争消灭了大量敌人，形成辽阔的敌后解放区战场。

二、相持阶段的抗战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

1. 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和国民党妥协投降的逆流

1938 年 10 月日军侵占武汉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策略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日本近卫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诱降原则。1940 年 3 月，汪精卫在南京与北平、南京、内蒙等地汉奸政权头目一起成立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史称“汪伪政府”），随后与日本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基本关系条约》等，成为公开的卖国伪政府。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在这一时期虽仍坚持抗战，取得一些战果，但在全局上实行收缩方针，转而把政策重心转向对内，先后三次发动反共“摩擦”。

第一次是在 1939 年冬到 1940 年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侵占八路军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五座县城，并准备进攻延安；阎锡山部在晋西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朱怀冰等部进攻晋东南太行山根据地和晋南根据地。八路军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坚决回击了这些进攻。不久，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等文件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当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这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更加完善。

第二次反共“摩擦”以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为高峰。1941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 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八万余人的围击。新四军血战七昼夜，除 2 000 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被俘、失散或牺牲。中共中央一方面在政治上揭露事变真相，对国民党当

局提出严重抗议；另一方面，立即重建以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的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

第三次反共“摩擦”发生在1943年春夏。以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和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契机，胡宗南调集重兵，再次准备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当即发动政治反击，使这次“摩擦”尚未发展成大规模军事进攻即被制止。

2. 反“扫荡”、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把军事进攻的重点逐渐移向敌后战场，对敌后解放区军民实行“囚笼政策”。解放区军民采取广泛的游击战略，灵活机动地展开反扫荡斗争。其间著名的战役是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起三个半月时间里，八路军总部先后投入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歼敌2.5万人，造成华北敌人交通一度瘫痪。这次战役是抗战期间八路军参战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的一次。它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1942年春，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整风运动胜利结束。这次整风运动是中共全党范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在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问题的认识，使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在整风运动同时，中共中央还号召边区军民开展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军民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1.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及其成熟标志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

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多方面。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

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全面成熟时期。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集中全党智慧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的发表。

2.《实践论》和《矛盾论》

1937 年 7、8 月间，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并就这两个题目分别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实践论》阐明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等命题进行了精辟论证，肯定“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矛盾论》阐述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区分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指出矛盾的普遍性，重点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概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

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党领导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根源，用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它们标志着以科学认识论和辩证法为核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成熟。

3.《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从土地革命后期到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发表一系列军事著作，其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既是指导抗日战争的重要文献，亦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这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1）阐明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指出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由此形成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等相互矛盾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是持久战；中国一方在战争中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并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2）阐明人民战争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3）阐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大规模的，有根据地依托的，单独在外线独立作战的，与正面战场和正规战进行战略配合的，可以逐步发展到高级阶段、担负战略反攻任务的战争，因此，它不只是个战术问题，而是具有战略地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是游击战略原则的中心问题。

上述两篇著作和毛泽东等在同一时期写出的其他军事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详细阐述了党在领导革命战争中所应遵循的战略战术思想原则，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

1939年10月到1941年1月，毛泽东在集中全党智慧，总结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主张，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这些主张包括：

（1）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必须分成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

（2）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领导权是否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要与农民结成联盟，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特殊条件下还要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纲领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才可能去进行后一阶段的革命。两个革命阶段必须是衔接的，不容在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时期。

（5）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从社会制度来说，必须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但是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不能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

（6）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形成的意义：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到重大指导作用。

四、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 中共七大的召开及其意义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

告。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三个方面：

（1）总结党领导民主革命，特别是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党的领导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纲领和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通过新党章。新党章有三个特点：第一，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指针。第二，明确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第三，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3）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随后进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书记。

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代表大会，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20多年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全党的空前团结。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组织基础。

2.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1945年8月，随着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放两颗原子弹及苏联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立即向日伪军发动猛烈反攻，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8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代表签署投降书。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1）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反对日

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它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结束了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屡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奋起的历史转折点。

（3）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和转折点。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人民革命力量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得到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有120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120万人的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建立了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拥有1亿人口的19个解放区。这一切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全国解放战争

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 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提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出现美苏两大强国既斗争又妥协的新格局。美国坚持扶蒋反共政策。苏联不愿意中国被纳入美国势力范围，但因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故一方面谋求在中国东北和外蒙的利益，以便保证其在远东的利益和安全，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与此同时，国内各民主党派纷纷提出反对内战，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20、23日，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其基本精神是：在不放松自卫战争准备的前提下，借助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挫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力图通过和平途径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

2. 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

1945 年 8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和谈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自 29 日起，国共双方就和平建国等问题展开谈判。其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多次会晤，具体谈判则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等人之间进行。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解放区，交出军队，实现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军令政令统一”。中国共产党代表要求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同时也做出让步，提出按一定比例缩编军队；同意将自己的军队从江南广东等八个省的解放区撤至陇海路以北和苏北、皖北。这些建议遭到国民党方面拒绝。双方未就这两个问题达成协议。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共同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按照国共会谈协定，有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无党派人士共 38 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在重庆开幕。会上，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分别代表的三种政治力量就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前者涉及坚持还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问题。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努力，通过《和平建国纲领》，规定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并且通过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其成员由选民直接选举等内容。这是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种限制。关于后者，国民党提出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实行政治民主化。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军队国家化根本前提是首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即先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为了推动谈判的进行，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一齐进行，及军党分离、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办法。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张群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商定整编军队办法。会议最后通过五项协议案，于 1 月 31 日闭幕。但是，国民党并未完全遵守政协会议的协议。3 月初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一个推翻政协宪草原则的《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不久，国民党更撕去和平伪装，公开发动了

内战。

二、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自卫战争方针

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就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夕，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1946 年 6 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分别于 7 月和 9 月，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提出自卫战争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针，即在政治上，放手发动群众，和人民群众密切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和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提倡节约，反对浪费，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这些方针成为人民军队夺取自卫战争胜利的保障。

2. 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内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队 200 余万人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东北、陕甘宁、广东等各解放区、游击区展开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先后经历中原突围、苏中地区七战七捷、陇海路和鲁西南地区连续作战、莱芜战役等胜利作战，到 1947 年 2 月底，共歼敌 71 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从 1947 年 3 月起，国民党转而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中共中央撤离延安，随后指挥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华东野战军先后取得蒙泰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3.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 12 万人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于 8 月底进入大别山区，开辟根据地，揭开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的序幕。8 月，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豫西、豫陕边根据地。9 月，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由鲁西南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平原。

至此，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纵横于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国民党军，从战略上改变了双方的态势。为配合三路大军作战，人民解放军又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迫使进攻陕北之敌北上；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地区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引向海边。内线作战的各解放区战场亦相继转入反攻。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攻势作战形成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总形势。

4.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6 年 5 月 4 日，人民军队自卫战争开始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随后，各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47 年 7 月到 9 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将地主土地、公地及其他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平均分配，由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担任土改的合法执政机关。会后，各解放区抽掉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掀起空前规模的土改运动。到 1948 年秋，约有 1 亿人口的解放区完成土改工作。解放区的土改摧毁了当地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促进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热情，为战争的胜利准备了人力和物力条件。

5. 中共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确定

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这就是：

在军事方面，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对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指导思想、目的、方法、形式以及战斗作风等作了规定，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在经济方面，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

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且规定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必须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导方针向前发展。

在政治方面，提出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纲领和政策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政策上作了充分准备。

6. 第三条道路的破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

抗战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曾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合法的改良主义途径，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此，他们一方面和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方面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幻想。国民党在进行消灭共产党人的战争同时，也不断加剧对民主党派和非党派民主人士的迫害。1947 年 5 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诬蔑民盟等“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 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这说明第三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1948 年 4 月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 年 1 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陆续进入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

7. 三大战役

1948 年秋，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9 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从 9 月 12 日到 1949 年 1 月 31 日共 4 个月零 19 天里，人民解放军相继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

154 万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之局。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194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相应的决议。毛泽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指出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最后夺取这个胜利的方针。第二，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第三，阐述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党在各方面的政策。第四，估计了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是：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制定了党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政策，确立了革命胜利后建设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蓝图，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部各个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要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还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以及在对外关系上“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政策。这些建国原则和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它们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内容，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的思想基础。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国都、国歌、国旗等问题做了决定。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 56 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同时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由 108 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当日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人齐集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 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意义：

（1）它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和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实现了中国独立、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它是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3）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找到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第六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的确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新中国建立伊始，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

第一，在国际上，新中国一方面得到苏联、东欧与亚洲人民民主国

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与支持;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却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和武力袭扰等破坏活动,成为新中国来自外部的主要威胁。

第二,在国内,人民解放战争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还未全部解放国土;中央政权虽已建立,但各级地方人民政权还有待建立和巩固;国民党溃退时潜伏下来的大批政治土匪、各种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各类反动分子,仍在各地进行疯狂的破坏与捣乱,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安全;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未开展,那里的广大农民还没有完全动员和组织起来,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

第三,新中国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废墟之上的,生产力十分低下,经济文化极其落后。1949 年,整个国民经济中,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只占 10% 左右,90% 左右是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与手工业经济。而国民党统治时期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供应紧缺,投机活动猖獗等情况,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依然存在。

根据上述形势,党提出在当时的任务主要是:除需继续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并完成民主革命的其他遗留任务外,所面临的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是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最大的努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以便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

面临上述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首先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北、西南进军,完成大陆的解放。到 1951 年 10 月,全国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几个海岛外,全部国土获得解放,祖国大陆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多少年来所未有的统一。

在政治上,建立和健全地方各级人民政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各地立即摧毁国民党旧政权,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其他临时人民政权。随后相继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基本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

了旧中国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和香港、澳门以外）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外交上，党和政府本着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各国政府与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到1950年10月，新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还同许多国家恢复和发展了通商贸易关系。这样，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形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利国际环境。

在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稳定物价。新中国刚一成立，人民政府即采取了革命的手段，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残存于中国大陆的一千多家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陆续转归国有，这奠定了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基础。1950年3月，政务院又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

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开展

1. 力争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党的战略与策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提出争取在大约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奋斗目标，阐述了为获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他提出全党和全国的任务是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必要的精兵简政、有步骤地开展旧有文教事业的改革、灾民和失业人员的救济工作、团结各界民主人士、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等八项工作。这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斗争纲领。

会议还讨论和制订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和策略方针。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2. 土地改革运动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随后在新解放区分批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顺利的土地改革运动，到 1952 年底，约 3 亿农民分得约 4 700 万公顷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 90% 以上。这就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

3. 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这次运动重点打击了土匪（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运动中正确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和专政机关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取得了巨大成绩。1952 年，运动基本结束，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4. “三反”、“五反”运动

1951 年底至 1952 年 5 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清除了一批被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腐蚀的国家干部。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对加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

起了重大作用。

“三反”运动同时，在城市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违法的工商业户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揭露和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行为。“五反”运动的开展，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为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5. 抗美援朝运动

1950 年 6 月，朝鲜南北之间爆发战争。不久，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9 月 15 日，美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不久就越过三八线，侵占平壤，并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进犯，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为了维护祖国安全和邻邦朝鲜的独立，全国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于 1950 年 10 月赴朝参战，和朝鲜人民军同甘共苦，团结战斗，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共歼敌 109 万人（其中美军 39 万人）。1953 年 7 月，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胜利，既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保卫了中朝两国的独立和安全，保卫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又直接地保障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四、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3 年 6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总路线规定，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改造非社会主义工业，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使我国的工业不但能够制造人民必需的工业品，而且能够制造为社会主义工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设备，同时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条件。这样，使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据优势，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还把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视为两翼。总路线规定要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将他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把资产阶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发展生产力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

五、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党和政府从1953年起逐步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2年冬，在一些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广泛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

第二阶段：从1953年初到1955年上半年，全国以兴办初级农业合作社为中心，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第三阶段：从1955年秋到1956年底，合作化运动进入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评价：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它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五亿农民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农业合作化运动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根据我国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形式，逐步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既使农民愿意接受，又避免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在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贯彻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从而团结广大农民共同走上集体化道路。

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偏差。这主要是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的原则以及经营管理混乱等缺点。

2.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来实现的。这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自1953年至1955年夏，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的阶段。这主要是在工业中采用委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委托经销、代销等。这些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各种合同在原料供应、产品的生产计划、销售及价格上被国家控制。当时企业的利润分配，实行所谓“四马分肥”，即所得税占30%，工人福利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方股息红利占25%。这样资本家的利润受到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所减轻。但这种企业仍然属于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仍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其内部的劳资矛盾依然存在，还不能全部限制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是实行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有两种，即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由国家投资并派干部同资本家共同经营，企业的生产资料由私有变成公私共有，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由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部联系变成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社会主义成分居领导地位。利润仍按“四马分肥”的原则，但资本家只能按私股所占比例取得红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红利则转为国家所有。因此，这种公私合营的企业可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按地区每个行业所有私营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组成一个大的企业单位，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一管理生产，统一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统一计算企业的盈亏，并按清产核资所确定的股份实行“定息”制度，资本家不再参加利润的分配。1956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过程中，成功地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相应的赎买形式，从而实现了以和平方式完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向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转变；另一方面，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实现了团结资本家，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并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奇迹。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存在着一些偏差和缺点，这主要是公私合营的面过宽，改组过多；后期工作过粗、形式简单；合营后，产品单调，商业网点过少；对许多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有不当之处。

与此同时，国家采取了类似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大致经历了相同的进程，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思考题

1.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怎样形成的？它有哪些特点？
2.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意义是什么？
3.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4. 遵义会议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5. 试述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背景、政策的内容和制定这一政策的意义。
6.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哪些内容，有何意义？
7. 中共七大的召开有何意义？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有哪些？
9. 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10.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如何？
11.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2. 什么是“三反”、“五反”运动？
13. 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14. 如何评价农业合作化运动？
15. 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有何必要？

16.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邓小平理论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中共八大的召开

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初步成果。此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1.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十大关系”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分析，开辟了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论述，讲的是在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而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论述中，提出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论十大关系》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并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2. 中共八大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社会主义改造行将基本完成之时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做出了我国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的结论。明确指出，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立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方针。提出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

第二，会议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重申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明确指出要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要使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协调发展；要正确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提出了生产和经营中的计划性与非计划性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国家市场与自由市场相结合等一系列指导方针。

第三，会议还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党必须始终一贯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同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总之，中共八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正确而适时地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符合人民的意愿，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经修改后，6 月 19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毛泽东这个报告，系统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报告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科学

地阐述了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思想。

毛泽东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一般不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正是通过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而向前发展的。毛泽东还第一次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一般说来，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必须用专政的、强制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应该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

第二，报告分析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关系，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同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具体方针。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三大改造完成后，剥削制度已基本消灭，“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大量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具体方针。这主要是：在人民内部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必须实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是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共八大的思想，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进展。中共中央从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今后中

心任务的正确估计，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方针的科学阐述，实际上为我国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勾画出一幅最初的蓝图。但是，由于缺乏对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深刻了解，也缺乏进行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此后的一个不短的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偏离了这个蓝图的最初构想，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三、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散布言论，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 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 月 8 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

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由于反右扩大化而使许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这是党和国家的损失。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所谓“大跃进”，实际上就是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从主观上制定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追求工农业生产的

“高速度”。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在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和体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方面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左”倾冒进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规定的“多快好省”，其核心是一个“快”字，是高速度。因此，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空气笼罩全国，“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运而生。

“大跃进”的序幕是“钢铁元帅升帐”。在急躁冒进的气氛下，钢铁年产量指标一提再提，因此开展所谓“全民大炼钢铁”，大搞“小、土、群”即小高炉、土法炼钢、群众运动。结果，炼出的钢铁合格的不到 1/10 ，这种运动对其他行业造成的损失，对资源、人力的浪费更是无法计算的。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为适应以人海战术大办农田水利的要求，农村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社的现象。与此同时，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许多物质、福利都免费供应和服务。1958 年 8 月初，毛泽东视察河南、山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说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遍及全国。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 1958 年底，全国 74 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 2.6 万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 99% 以上参加了公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农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五、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暴露了“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对国民经济的现状逐渐有所认识，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由“大跃进”到调整方针的转轨。1960 年 7 - 8 月间，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李富春首先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这一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公布。所谓调整，就是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包括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等；巩固即是巩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所谓充实即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而提高则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 7 000 多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 1956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提出了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大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作用。会议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大会没有彻底改正并且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1965年冬和1966年春，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开展的对《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批判，实际上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甚至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但篡夺了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和新闻界的领导权，而且渗透到党、政、军各要害部门。《通知》还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此后，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于1966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在舆论的号召下，北京及各地的学生起来“造反”，冲击学校党委，揪斗干部、教师，使许多基层组织陷于混乱。毛泽东当时在武汉，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北京各大、中学派工作组，试图消除混乱现象。但毛泽东回京后马上指责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犯了方向性错误。于是，在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等人；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号召群众要“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运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上海“一月风暴”则是全国全面夺权的起点。到1968

年9月，全国除台湾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先各省市中共党委、省市政府、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与此同时，全国卷起无政府主义狂潮，使社会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全国各地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大批干部、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归国华侨及其他各界人士被诬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横遭迫害。1967年4月开始的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全面肯定和发展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方法。大会通过的党章将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总纲”。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进一步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野心家在中共中央的权力和地位。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二、林彪、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一伙急于抢班夺权。林彪集团瞄准四届人大，以设国家主席和宣传“毛泽东是天才”为策略，阴谋夺取最高权力。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1970年8月23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林彪集团在会上发难，以夺取权力。毛泽东很快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林彪集团妄图夺取国家主席职位的阴谋被粉碎，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和组织措施，使林彪集团控制军队的梦想成了泡影。因此，林彪集团转而密谋策动武装政变和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林彪等人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北逃，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机毁人亡。

林彪集团策动武装政变，是“文化大革命”推翻、破坏党和国家一系列基本原则所造成的。林彪集团武装政变阴谋的败露，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中共十大以后，江青集团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阴谋进一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他们图谋以四届人大组织“内阁”的阴谋并未得逞。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经过短短一年多时间，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发展的景象，国内形势有了好转。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但当邓小平要系统地、有步骤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毛泽东又不能容忍。毛泽东尽管在某些领域、某些具体问题上也曾纠正过“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于1975年煽动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方面整顿诬为“全面复辟”、“唯生产力论”，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4月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仅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有200万人次的群众参加了这一活动。当晚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事态的发展。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会议认定天安门前的群众运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并认定它的后台是邓小平。4月5日，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发现花圈、标语被清理后，在场的群众与民兵、警察、士兵发生冲突，不少群众被逮捕、殴打。这就是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同时，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江青集团阴谋策划，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遗嘱”，迫不及待地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

力。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一举粉碎。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一大批正直的干部、群众遭打击，而一批阴谋分子、野心分子、投机分子钻进了党和政府的机构里；这场内乱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它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这场内乱还严重地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给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大破坏。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署名发表经华国锋审定的《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即“两个凡是”的方针。由于华国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在党内外群众思想中引起新的混乱，也遭到党内外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对于“四人帮”在理论上或实践上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重申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指出，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照抄照搬才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号召打破精

神枷锁，进行思想解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猛扩展为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整风以来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多年来盛行的束缚人们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它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开展；它亦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78 年 12 月 18 — 22 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就如何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第一，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深入讨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深刻阐明了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强调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党才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变，才能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对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也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第二，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决定从 1979 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强调，应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在

一定范围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行动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第三，全会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强调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为此，全会提出要逐步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决定全党要用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决定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精简经济行政机构，纠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现象，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全会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审查并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全会强调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全会鉴于过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够健全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强调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国家各级机构的建设，坚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会还在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强调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方面做出了若干重大决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反对突出个人，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决定建立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执行维护党规党法的任务。上述重大决定标志着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系列领导工作中作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

而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步履维艰的局面，使党的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三、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拨乱反正，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 32 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科学的总结，正确地分析了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第二，在政治方面，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平反冤假错案。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和有关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从而使新中国成立以来这起最大的冤案得到平反。此外，还为其他遭受冤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彭真、邓子恢、黄克诚、乌兰夫、谭政等和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共平反冤假错案 90 多万件，改正了错划的右派分子 50 多万人，改正了被错划为资本家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 70 多万人，摘掉了 270 万人的地主、富农帽子。民族、宗教、侨务、统一战线、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陆续得到恢复、调整，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

第三，在组织方面，进一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并着手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十一届五中全会主要解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坚持党的路线、坚持集体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等12个方面的问题做出原则规定。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进一步强调要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随后开始了干部制度的改革，强调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

第四，在经济方面，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稳步地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197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原料、燃料与生产建设等各种比例关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农村逐步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尤其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中国农村基本上仍以手工工具进行生产劳动的现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

1. 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二大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由1980年的7 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 000亿元左右，使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要解决好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学问题，并必须力争把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要分两步走，即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

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在经济建设中还须着重解决关于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重大问题，做到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2. 各项改革事业进一步发展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其特点是：农村改革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出了重大的步伐。

农村改革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任务。到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村中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决定》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起全面展开，在1987年（即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第一年）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

3. 中共十三大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三大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的突出贡献，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总

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并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基础，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具体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总体目标和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报告》指出：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逐步摆脱贫困、摆脱落后；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全面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

4. 中共十四大

1992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开幕大会上，江泽民向大会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十四大报告有以下重要内容：

第一，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十四大报告中最重要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基本理论。十三大归纳了12个理论观点。1990年12月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12条原则。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在这些基础上,十四大报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问题。

这个新的概括,既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又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杰出贡献;既已初步形成体系,又需要继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是指引全党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二,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十四大指出:“14年伟大的实践,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把坚持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有了正确路线必须贯彻始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国际国内风浪,除非大规模敌人入侵,否则就不要改变;重申了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

第三,关于改革是党领导的又一次革命。十四大报告阐述了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这不仅肯定了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同时也表明党对改革性质、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改革和革命都有解放生产力、破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任务,改革引起社会深刻广泛的变革,因此,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十四大报告认为,这场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报告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角度认识改革的革命意义,这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继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

论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新的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十四大是中国共产党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

5. 中共十五大

1997 年 9 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主题下，对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其基本要求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十五大的理论贡献主要有：

第一，关于邓小平理论。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第二，关于党的基本路线和纲领。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第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指出：从现在起到21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为此，必须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即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等。在这几个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告中有关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党的十五大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江泽民在会上作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6. 中共十六大

2002年11月，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十六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十六大的理论贡献主要有：

第一，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次代表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十六大的历史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1）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2）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3）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

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4）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实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坚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相统一，使党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十六大指出，我们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主要目标是：

（1）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2）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3）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

（4）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为实现上述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第三，关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十六大指出，21 世纪头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1）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2）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

（3）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要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

（4）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5）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

（6）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7）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8）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职责，广开就业门路，积极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提供新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第四，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次大会强调要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要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要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党的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江泽民的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7. 中共十七大

2007 年 10 月 15—21 日，中共十七大在北京举行。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奋斗。

胡锦涛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与会代表审议和通过了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纪律检察委员会的报告和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胡锦涛的报告有六个要点：

第一，总结十六大以来党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成就包括：经济实力全面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

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困难和问题主要有：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等等。

第二，总结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经验。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使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民族；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新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30 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三，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命题。指出，改革开放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四，系统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提出背景、重要意义、基本内涵和贯彻要求。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

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外国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第五，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指出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我国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态环境良好、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对外更加开放更具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第六，对全党提出新的工作目标和具体要求。包括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

十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科学回答了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中国共产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是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更为广阔发展前景的行动纲领。

第四节　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精髓

1. 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也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个主题的具体内容包括：

（1）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必须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2）从总体上看，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它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又存在着一些弊端。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怎样搞社会主义，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正因为如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3）“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所以，1988 年，在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可见，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也是促使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2.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包括：

（1）“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邓小平一生的活动都是与实事求是理论分不开的，邓小平的全部活动又发展了实事求是。

第一，把实事求是看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看做是对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突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特征，极大地拓展了创造和发展的空间。

第二，把实事求是看做认识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统一，寻找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确立了新时期一切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认识基础。同时，又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为一个可以评价的有机整体，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三，揭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即要随着新的实践研究、解决新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破除头脑中的条条框框，解除思想枷锁；反过来，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要把“解放思想”与“头脑发热”区别开来。

（2）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达到实事求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第二，解放思想是为了破除思想僵化的主体精神状态。思想僵化与实事求是是对立的，因为思想僵化从“本本”、指示、旧的传统出发，也就不从实际出发，归根结底是一种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三，解放思想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达到新的实事求是。

（3）在摸索中“求是”，在试验中创新，按照辩证法办事。

要勇于创新，同时，又要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重大决策可以先从局部做起，“走一步，看一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试验中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

（4）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这次争论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问题在于实践标准本身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而要使实践标准具体化，必须走出认识论一般原则的层次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提供出较为具体的

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这样才能更好更大地发挥其作用。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困惑和疑虑，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在社会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更加适合具体的操作。第一，这里，生产力已不再是一般的生产力，而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凡是符合这一点的，都可以大胆采用。第二，综合国力既可以是直接的现实的，也包括间接的潜在的，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艺术等方面。对于那些远离经济建设的部门，就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其决策和工作。第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对发展生产力目的的规定，也是搞社会主义的总目的所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永无止境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1.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国内背景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深重灾难。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政治上处在动荡的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恰恰在这一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展开，资本主义开始了又一次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入到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因此，当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走出来时，就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2.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国际背景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具体说来：

第一，20世纪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战争的灾难，在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核武器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当代世界的一种趋势。从总的国际局势看，制约战争的力量、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断发展，因此，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认识到，要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必须获得经济的发展，改变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发展问题因此成为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突出的问题，成为当代世界的又一趋势。

第三，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速度和再发展问题。问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发达国家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就难以解决；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继续贫困下去，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可能没有出路。所以，经济上的开放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发展问题因此在当代世界非常突出，具有全人类的意义。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三、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和现代化建设的重新启动，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是新的社会实践的反映、总结和升华，反过来又指导这一新的社会实践。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适应，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这是邓小平理论主要观点的形成时期。具体地说，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关于实行改革开放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观点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的。以

此为基础，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

第二阶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这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的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围绕着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阐发了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提出的十二个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轮廓。其主要内容包括：(1)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2)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3) 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4)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5)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6) 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7)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8)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9) 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10) 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11) 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12) 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

第三阶段，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这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鲜明标志，就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台阶式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本质，计划、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等，都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深刻透彻的概括和阐发，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以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灵魂的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成为较为完善的科学体系。从党的十四大开始，邓小平理论进入新的检验和发展时期。

第五节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1. 我国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

（1）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由近代国际国内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国的人民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取得胜利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它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2）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就生产力水平来说，就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程度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工业化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建立在生产高度现代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基础上，才能充分体现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去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应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基础。这个历史阶段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国已经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

和个人收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消灭。在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一阶段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建立起来的过渡时期有本质的区别。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生产力还非常落后，商品经济和市场不发达，社会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完善，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旧的思想意识形态还广泛存在。这一阶段与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也不相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决不能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不能搞“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必须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历史阶段，不能急躁冒进。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具体表现在：

第一，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而且还不平衡，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要求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之相适应。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积极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生产决定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在生产领域里存在着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那么在分配领域必然存在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这些分配方式包括：资产收入、个人劳动所得、股份分红、债券利息、资本收入、剥削收入、风险收入、机会收入、劳动力价值收入等。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

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第四，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但是，共同富裕并不就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因为生产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波浪式的，因而人民生活的提高也是不平衡的，波浪式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自己的勤奋和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会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鼓励作用，从而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应，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

为了正确解决上述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基本路线就要坚持一百年不

动摇。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1. 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第二个方面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的概括,既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也讲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既讲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讲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既讲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也讲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既讲了社会主义在客观运动规律上的本质要求,也讲了社会主义在主体价值目标上的本质要求。这是在深层次上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出的新概括,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观的重大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它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2.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第一,发展是硬道理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发展是一种带有世界历史性的客观需要,中国人民如果不认识这种需要的客观性、迫切性,就要在时代的发展中落伍,就无法实现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夙愿,也谈不上坚持社会主义。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已经耽误的时间弥补回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复兴。第二,发展是硬道理是一个政治性的命题。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少发展中国家发生这样那样的严重困难,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我们如果不解决发展问题,没有经济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些难关就闯不过去,政治上也会出现问题。第三,发展是硬道理是一个战略性的命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的问题很多,矛盾十分复杂。但是解决中国所有的困难和问题,都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把发展放到首位,用发展来统领一切,在发展中变被动为主动,变不

利为有利，变困难为成就。只有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才能使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逐步相信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

其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地位。第一，从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来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力系统中最重要的也就是第一位的构成要素，因此必须要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第二，从现代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因素所占的比重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因素所占的比重迅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其他因素，因此必须要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第三，从知识创新和创造知识的劳动在现代社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必须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 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基本保证

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原则问题。同时，必须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建设。面向21世纪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

1. 坚持改革开放

（1）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

改革、发展与稳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的相互关系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首先，发展是目的。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这是在处理三者相互关系问题时首先要树立的观念。中国解决自身内部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和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也要看我们自己的发展情况。

其次，改革是动力。要发展就必须改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也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在改革与发展之间，发展是目的，改革

是动力。只有改革，只有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各种问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广阔的空间。改革是发展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反过来，也只有发展，只有持续不断的发展，只有通过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人们在改革中怕失去的利益，改革才能持续下去，深入下去，才不会半途而废。所以，一方面离开改革不可能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离开发展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发展是改革的目的。

再次，稳定是前提。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改革和发展健康进行的前提和保证，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保证。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国家整天处在动荡之中，不能从时间和空间上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不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再好的愿望也要落空，再好的计划、方案也无法实施。所谓稳定的社会环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政局要稳定；二是现行政策不变。政局稳定和现行政策不变相结合，就是稳定和良好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是政局稳定。

（2）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短期行为，而是我国将长期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第一，从对外开放的长期性来看，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决定的。实践已经证明，封闭必然导致贫穷和愚昧，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实现上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使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再达到更高水平，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继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而不能时放时收。

第二，从对外开放的全面性来看，我国的对外开放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开放，即无论对采取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积极地对外发展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从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来看，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了对外开放。除了吸收外国资金、技术、设备和不断增长的经贸往来外，我国

还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艺术、政治等许多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如派遣留学生，实行智力引进等。这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使得我们能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学习到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先进经验、当代国际惯例等，使得我们总体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发展态势有了很大的提高。

加入世贸组织（WTO）是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做出的必然选择，这既是我国20多年对外开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又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起点，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和具体化，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各环节具体包括的内容如下：

第一，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推动市场竞争和市场发育、积累资金、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将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也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它们与公有制经济的相互竞争则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注意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坚决制止向企业乱集资乱摊派及乱收费；逐步减轻企业负担。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鼓励发展一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第三，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分配、销售和价格的形成都已纳入了市场调节的轨道，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目前还比较薄弱，当前的重点是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等。

3. “三步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1）“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内容。

在总结以往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台阶式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经过切实的努力，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创造了良好条件。据此，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使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更加明确，更加具体。

（2）“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既坚持了实事求是，又体现了雄心壮志，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进行的科学总结，它必然成为我国今后制定现代化建设战略蓝图的指导方针。

第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过去我

们也一直在谈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主要从生产关系上把握，甚至把“一大二公”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其实，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更先进的根本表现是，能够用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速度来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才能充分体现其优越性。

第二，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基础与保证。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现代化始终处于中心与基础的地位。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基础，“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正是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第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现代化不能急于求成。在通向现代化的征途上存在着众多的困难，因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如果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会慢，在这方面我们付出过高昂的代价，从“大跃进”到“洋冒进”，都说明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因此，制定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重积累、轻消费，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根本目标很清楚，那就是消灭贫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五，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为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因为只有改革传统的计划体制，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邓小平全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核心，执法必严是关键，违法必究是保障。这四个方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包括立法，也包括执法；它既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指针，更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系列论述，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发展。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平理论，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的高度，作为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跨入新千年，江泽民又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实行依法治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并得以严格遵守和执行。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发挥其优势，得到健康发展。

其次，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民主同法治是密不可分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基本权利、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和运作程序、经济生活的民主化、社会生活的民主自治等，都需要有法制加以确认、规范并通过严格执法加以保障。任何违反法律的所谓民主，都会对社会秩序和他人的民主权利造成损害，必然危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再次，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标志。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来看，从封建专制主义到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再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

最后，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安定团结，是我们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要保持社会稳定，

就必须保证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各种破坏、犯罪活动能受到有力打击和有效控制，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能得到正确处理。要做到这一切，最关键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实行依法治国。

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法治是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是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感召力和劝导力，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来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5.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第一，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首先要站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高度，确立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优越性重要表现的观念。

第二，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对此既可以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去把握，也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去把握。不论是两个文明还是三个领域，都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第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物质的丰富，还表现在能够消除剥削制度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有助于社会形成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的。

第四，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两个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第五，精神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是促进和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其中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根本任务，指的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一个总的要求，是根本目的。从根本上说，精神文明建设是培养人的，它的成果体现在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上。精神文明建设是面向全民族的，它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这是我们民族振兴的根本大计。

第二个层次是根本目标，指的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它是根本任务的具体化和明晰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模式。“四有”公民的目标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具体性，它是根本任务在目标上的具体体现；二是全面性，“四有”体现了对公民素质的全面要求，涵盖了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三是统一性，公民的四种素质要求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四是层次性，“四有”是普遍要求，但每一“有”本身又有层次的不同，对于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目标，指的是根本目标或目标模式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或时期的具体体现。它是在内容上比“四有”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规定。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针和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针主要包括：第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第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全面改革的精神文明建设；第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第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深入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二，科学文化建设。主要包括发展科学和教育，具体说来，是指教育、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以及卫生、体育、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6.“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

（1）“一国两制”的内涵。

“一国两制”构想具有科学的含义和丰富的内容。概括地说，就是在坚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其基本内容包括：

第一，坚持“一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

力，由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坚持一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二，坚持“两种制度”，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作为统一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则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相互支援，共同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

第三，保证台湾、香港、澳门的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的局面。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依法在台湾、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行使地方政府的权力，除在外交、国防、宣战、媾和方面服从中央政府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台湾特别行政区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

（2）“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首先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一国两制”也为澳门的回归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针。香港、澳门回归后，并不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结束。伟大构想的全面实现有待于港澳以后的发展，更有待于台湾与祖国大陆最终完全统一。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释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为和平推进祖国统一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设性的主张，是我们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

“一国两制”构想及其实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一国两制”的构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新形式。按照“一国两制”构想，我国仍然是单一制国家，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单一制的地方行政区域，但它又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财政独立，为单独关税地区，自行发行货币。所有这些都说明特别行政区享有比联邦制国家的州更大的权力，这有利于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有利于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一国两制”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新形式，突破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只能允许存在一种社会制度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第二，“一国两制”的构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的原则用来处理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为一个国家处理内政问题提供了一个好办法。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作为一个善于按照辩证法办事的政治家，邓小平进一步使这一原则由“外”转向“内”，用来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统一问题，解决一个国家内部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之间关系的问题。

第三“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范例。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面临着需要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第六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

一、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品质

2000 年 2 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发表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80 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品质。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随着实践发展的、开放性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有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墨守成规、不求发展的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既要坚持，更要发展。在坚持基础上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自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实际生活变动之剧烈和深刻，是空前的，也是人们难以预料的。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因此，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新的理论丰碑。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为了理解和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第一，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

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在“三个代表”中，先进生产力是基础和前提，先进文化是灵魂和旗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出发点和归宿。

三、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最大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又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坚持、继承、发展与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从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国内国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依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强调要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科学准确地把握了当今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社会主

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原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指出要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加深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规律性认识，并充实了执政党的先进性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提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就为我们党在新世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和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指明了方向，同时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原理，第一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文化建设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思考和指导党的建设，突出了党的先进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一致性，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基础、灵魂和本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第二，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党的立党之本，进一步回答了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总结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当好“三个代表”。党的一切活动、一切事业，甚至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都在于这“三个代表”。只有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目标和方向去建党，才能真正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党，才能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险的考验，真正发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

导核心的作用。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未来，无论从经验还是教训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党的立党之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进一步回答了党应该怎样执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容和任务，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推进社会发展；就是要不断建设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四有”公民，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说明了党执政的基础、执政的内容、执政的任务和执政的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进一步回答了党怎样保持先进性和生命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历史使命、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始终是与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的思想作了新的提炼和概括，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实质和内涵。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02 年 11 月中共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六大通过的江泽民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党的领导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报告指出：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 2010 年、建党 100 年和新中国成立 100 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 21 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想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增添新动力；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第七节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思想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基于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观察，概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导致阶级斗争和革命，推动社会变革进步，主张无产阶级顺应历史发展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以合理的方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生活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提出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巩固新制度，建设新国家。邓小平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纠正了“大跃进”到“文革”期间的“左”倾错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苏东剧变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和经

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发展的地位、阶段、动力、机遇、道路、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科学论断，丰富和深化了党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提出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教兴国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胡锦涛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国内外形势新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进入21世纪，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极大发展，国内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从这个基点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间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社会格局剧烈调整，利益矛盾更加突出的阶段。事实正是如此，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和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等。在新形势下为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需要更为科学的发展观。从国际来看，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上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各国也都在致力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工业化以来的生存环境、生态环境、资源紧张等问题。与此同时，人类近50余年来对于发展问题的探索也积累了若干经验，先后提出发展=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发展=合理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等几种发展模式。这为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科学发展观从提出到完整阐述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3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针对SARS传染病肆虐全国部分省区，暴露国家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行政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提出“全面的发展”和“协调发展”观念，到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其间陆续提出了“发展绝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的指导思想深化改革等一系列观点。

第二阶段，从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阐述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到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其间陆续阐明“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五个统筹”；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等一系列观点。

第三阶段，从2007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四个要求”到同年10月十七大报告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依据、理论意义、基本内涵、实践要求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将科学发展观写入新修改的党章。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在现阶段重大战略思想得到了完整阐述。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来源和理论意义：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依据：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其现实依据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科学发展观要求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面临发展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就是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使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为造福人民；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是说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

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四项要求：一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其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和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二是要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三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四是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站在完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中提出的新概念。作为一套理论体系，它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上是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重要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主题是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品质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基点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基础；理论目标是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出发，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围绕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在社会主义本质、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一国两制、和平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等诸多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集中体现了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党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探索真理、把握规律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思考题

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何在？

3.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基本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4. 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化运动？

5.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6. “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全面发动起来的？

7. 为什么说中共九大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8. “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是什么？

9.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意义何在？

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什么？

11. 为什么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2. 中共十二大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3. 中共十三大有哪些突出贡献？

14. 中共十四大的突出贡献是什么？

15. 中共十五大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什么？

16. 中共十六大理论贡献是什么？

17.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所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8.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是什么？

19. 如何理解我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0. 如何理解我国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

21. 如何理解十五大报告中有关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论述？

22. 简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3. 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24. 如何理解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25.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

26. 为什么说三个“有利于”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是对实践标准的发展？

27.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28.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29. 为什么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全部问题的关键？

30.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31. 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33. 试述“三步走”的台阶式发展战略。
34.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何在？
35.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何在？
36. 如何正确理解“一国两制”构想的战略意义？
37.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38.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及辩证关系。
3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40. 简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坚持“四个必须”。
41.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和理论特色是什么？

第四编　国际政治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

国际政治，通常也可称为国际关系，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

按照这一定义，国际政治由两个层次构成：一是微观层次，主要是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及其动因，它们相互关系的基本状态及其调控；二是宏观层次，即国际政治体系，它是所有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构成的一个整体。国际政治体系具有总体的结构和内在的联系及其运行的规则。

国际政治的这两个层次，具体构成了国际政治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

1.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是指在国际社会中能够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影响和作用的一系列实体。它们既有国家行为主体，又有非国家行为主体。它们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一般应具备下述基本条件：

第一，具有独立的对外行为能力，能够独立参与国际事务，发生对外行为，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和决策，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利享有者与义务承担者。

第二，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各自的特殊利益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相互区别的关键。各自利益的差异决定了追求目标的不同，从而构成

了冲突、竞争与合作等基本关系。

第三，拥有自主权和决策权，享有独立地位，不受其他行为主体的操纵或控制。能够独立参与国际间的相互交往，自主确定自己的对外决策和对外行为。

第四，具有较稳定的组织结构和形式，拥有一定的实力。任何国际行为主体只有具备了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才能显示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有形存在。

上述四个条件是彼此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行为能力是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基本前提；特殊利益是相互区别的基本依据；自主地位是独立行为的重要保证；组织形式则是保障生存的物质基础。它们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确立自身国际地位，发挥国际作用的必备条件。

2.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由三个层次的关系构成：

第一，利益关系。国际政治行为主体都具有特定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本质上是特定的利益主体。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包含着利益共同和利益矛盾两个方面。在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关系中，利益关系的这两个方面占据的地位不同，决定了这种关系呈现不同的状态。

第二，力量对比关系。在利益要求的基础上，国际政治行为主体聚积力量，作为自己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活动凭借。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力量，是这些主体拥有、掌握和控制的多方面资源和因素的总和。国际政治诸行为主体的力量，在相互利益关系基础上，构成了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三，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关系，具体体现为这些行为主体的活动和相互作用。这些活动是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多方式的，一般说来，它们主要体现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对外交往活动、对外政策。这些活动构成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

3. 国际政治体系

国际政治体系是指由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国际政治诸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和活动，构成了它们之间的整体联系，这些总体性的联系，构成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体系。

国际政治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相继出现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国际分工日益扩大，整个世界的相互依赖关系开始出现。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列强瓜分世界的争斗，最终促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

国际政治体系包含了所有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国际政治诸行为主体之间具有广泛的利益联系，同时，国际政治体系也是各行为主体之间合力作用的结果。国际政治诸行为主体之间按照利益要求、利益关系、力量状况等形成了排列组合状态，这种排列组合状态构成国际政治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际政治的总格局。

4. 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国际社会是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系统，不存在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权威。但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又表现出一定的有序性，这一方面是由于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现代国际法体系所确立的基本准则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1）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

主权原则的核心是国家拥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同时，主权原则与领土完整原则是相辅相成的。领土与主权一样，也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任何对国家领土的侵犯都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2）互不侵犯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互不侵犯原则就是指各个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和任何方式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同时，互不侵犯原则又是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社会反对侵犯国家主权的任何

行为，尤其反对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行为，反对把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各国均有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3）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指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因此，武装干涉及对国家主权或其政治、经济及文化要素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预或威胁企图，均系违反国际法。

（4）平等互利原则。

平等原则即所有同家，不论大小强弱，均享有平等的权利并承担义务，在相互关系中应平等相待、互相尊重，这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平等，而且表现为经济上的平等。

（5）和平共处原则。

和平共处原则包括两层含义。首先，它是指各个国家，无论其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如何，都应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其次，它是指国家之间的一切问题，都应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二、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是为认识、掌握与推进国际政治而进行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方式。

1.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世界是统一的和相互联系的，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飞跃，应当从“终极的经济原因”去考察国际政治的运动，但又不漠视上层建筑以至于个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的最根本的方法。

2.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性，与其他众多学科都有广泛的交叉点和接触点，或从这些学科中脱胎而来，或从这些学科中得到借鉴，或同这些学科有共同的增长点，因此，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抽象法、分析与综合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的方法以及定性与定

量分析法、概率、数理统计、决策分析、案例分析等，都能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但要注意其适用范围，避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能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作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和分析。

3. 自然科学方法

国际政治学还从当代自然科学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代表的最新科学成果，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系统研究、结构功能分析、层次分析、模式分析和信息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充分利用这些新的科学方法时，要研究这些方法与国际政治学的有机结合，使之在国际政治领域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当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还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先进的信息储存、检索系统和数据处理技术，大大加强了及时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大大加速了纷繁复杂的统计分析过程，为国际政治研究跟上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

国际政治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国家间联系和交往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国家间联系日趋密切，国际政治的内容也因此而愈益丰富和复杂。

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货币关系落后，国家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国际政治的发展缺乏基本的动因，再加上交通和通讯手段十分落后，使得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处于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国际政治处于不发达、不成熟状态，呈现出偶然性、地区性、有限性和幼稚性。

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使人类社会生活领域日益国际化，催生了现代国际政治。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强大的生产力，开始冲破旧世界的藩篱，推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一个紧密的整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历史地位。

18 世纪到 19 世纪中期，西方先进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生产力需要原料与市场，需要国际分工与交换，因而竭力向国际领

域扩展，促使或迫使世界各国卷入世界市场，一个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同时，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出现，世界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加剧，国际政治矛盾已难分难解。大工业造就的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则为全球沟通和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国际化进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世界各大洲、各地区以及各国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密切和复杂，突破了早期国际政治松弛、狭隘的框架。

19 世纪中期，一个囊括全球的国际体系初步形成。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后国际政治发展的最主要特点。国际政治发展到世界规模，是资本主义产生后出现的社会现象，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充分展开后的外在表现。

由于国际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国家间联系的激增，越来越多的行政活动在客观上冲破了国界，须由各种国际行政联盟加以协调，来解决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协作。接着，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也开始出现。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尚不具备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资格，但毕竟给未来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多样化，从而给整个国际政治带来富有意义的深刻变化。

国际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法规范，以公认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实现对国际政治的调整，以利其发展。从 17 世纪起，国际法应运而生，并伴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而发展，逐步形成了国际法体系，与国际政治互为补充和促进。这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

长期以来，少数资本主义强国长期垄断国际事务，推行强权政治，使弱肉强食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普遍现象。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形成后，国际政治中弱肉强食这一强权政治基本特征更加突出并典型化。在这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争霸，力图通过战争来摧毁对方霸权，重新分割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急剧地减少了世界强国的数量，造成了国际战略力量的重新配置，美国和苏联先后成为超级大国。由雅尔塔体制演化而来的美苏两极体制，构筑了新的世界结构，取代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体制。冷战的开始使两极格局逐步走向对抗，并一度扩

大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其基本特征是长期冷战，且带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浓郁色彩，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了紧张而恐惧的气氛。美苏整体实力对比呈不均衡性，但在其争斗的中心地区——欧洲，又呈现局部的均衡，直接表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峙，以及各自势力范围的制度化。美苏两极格局冲突强度大，具有总体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但有较强的控制力。超级大国的出现是战后新的国际现象，它们在政治上对国际事务有巨大影响力，在经济上曾一度各自为中心，在军事上对其他国家占有压倒性优势。无论是一个超级大国称霸，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都会导致国际局势的紧张与动荡，给国际社会带来尖锐、复杂的全局性危机。两极格局的形成和超级大国的出现，使当代国际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作用，从根本上体现了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本质要求。独立自主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发展中国家崛起，两大阵营分化瓦解，大国兴衰存亡，令人眼花缭乱。随着美苏实力的相对下降，对国际事务影响力减退，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日益壮大，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干预国际事务的全球性角色，从而形成决定世界战略形势的几大战略力量并存、相互作用的基本结构和形态，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彻底冲垮了两极格局的框架，加之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最终解体，世界进入了多极化加速发展时期。此次格局转换中并未立即形成一个定型的多极格局，其原因在于这次格局的巨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像历史上那样靠大规模战争或世界大战来实现，而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必然是渐进的，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当今，在国际关系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演进发展的这一新时期中，和平与发展是主题，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是历史大趋势，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

第二节　国际政治理论

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

1. 理想主义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充分暴露了传统欧洲外交在保障世界和平方面的脆弱性和不充分性。国际联盟的建立，促进了对世界政府的设想，对国家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国际准则的探索，政治家和国际政治学者企图从中找出通向普遍和平、避免世界大战重演的道路。这种探索努力的集中代表是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

理想主义学派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形成最早的一个学派，崇尚人性善的哲学思想。理想主义的特征是法制主义和规范主义。它强调以法律和司法程序解决一切国际冲突，制裁违法的国家，其准则是道德规范，声称“凡是涉及个人的道德规范，均可类比运用于国家之间”，“要以文明国家的价值观念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应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它追求的最终理想、目标实际上是世界政府，它强调“要以世界政府和世界公民的意识来代替主权国家民族统一的意识”，宣扬威尔逊所谓“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的理想。

理想主义理论缺乏客观基础。随着法西斯的到处侵略扩张和国联的软弱无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理想主义蓝图最终葬于战火之中。理想主义学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遭到了惨败。

2. 现实主义学派

1939年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出版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一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抨击理想主义是空想，强调人类应当面对政治斗争的现实，提出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这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兴起，它通过与理想主义学派的争论，开始在国际关系领域取得优势地位。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于1948年出版现实主义的权威著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国际关

系作了重要的理论总结，比卡尔又前进了一步，把现实主义理论引向鼎盛时期。

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1）权力是政治的本质，是永恒的人类本性所决定的。

（2）以权力规定的国家利益原则，是一切政治活动的普遍规律，是现实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点。

（3）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就是为权力而斗争，不能以道义为准则，只能以国家利益为准则。为政之道，在于权衡利弊。基本权力模式是显示权力、维持权力和增强权力。

（4）外交的艺术在于协调不同的国家利益，大国均势原则是维持和平的手段。

摩根索等学者以国家权力—利益论为核心，确立了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围绕着军事冲突和战略演化，就冷战、遏制政策、核战略、核威慑政策、军事战略、有限战争、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国际危机的处理等方面发表了大量著述，为美国这一超级大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国际关系领域里的权力政治观。

3．行为主义学派

20 世纪 50 年代末，科学行为主义理论崛起，进入了所谓“行为主义方法论革命时期”，引发了一场与传统学派的方法论之争，60 年代这场争论达到高潮。因为这场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方法论的范畴，因此也被称为是一场“方法论之争”。

所谓传统学派的研究方法，是指现实主义学派和理想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即以政治学、哲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等传统学科的概念和范畴，以历史经验为资料来建立理论体系。战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学者认为，传统的研究方法不科学。他们把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概念和范畴，自然科学中新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用来研究国际关系，试图设计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重要代表人物有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戴维·辛格等。

行为主义学派批评传统的概念如权力、利益、主权等不能验证，主张用行为主义的角色、结构、功能、相互作用等概念取而代之，排除概念

内含的价值观念，采用中性的或自然科学的概念来建立理论体系。

行为主义学派的基本特征是：

（1）要求国际关系理论从经验和事实出发探讨其因果性，并以数量、公式、模型加以验证和预测，特别是运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方法和计算机手段来研究国际关系，力求精确与科学化。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强调“是如何”，而不是“应如何”；

（2）从总体上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即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强调采用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理论和方法，以便形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论体系，使国际关系理论抽象化、系统化、一般化，由政策定向走向理论定向。

行为主义学派扩大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推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开拓了研究新领域，把研究重点放在经济、生态、资源、人口等方面，强调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作用。但是，行为主义学派企图完全排除价值观念和传统概念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过于强调方法论，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特点，会使国际关系研究变成经院式的研究，而且，建立行为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努力实际上也以落空告终。

4. 新现实主义学派

20 世纪 70 年代初，行为主义学派承认，“有必要使用两种技术与方法，如果忽视经验与历史所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则是不明智的”。越来越多的学者采取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政策定向与理论定向、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力从方法论向实质性问题转移。其主要动向是现实主义卷土重来，出现了一批新现实主义者。斯坦利·霍夫曼强调，现在需要的是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战略，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了，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

新现实主义通过对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以及对各派精髓的借鉴，力求反映变化了的国际关系，并就美国等西方国家调整

对外战略提出应对之策。到80年代，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内，新现实主义成为主导理论，其基本特征是坚持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角色，仍以权力和利益为出发点，对国家来说，权力、安全和生存是第一位的，同时吸收国际体系结构理论，承认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强调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等。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肯尼思·华尔兹、斯坦利·霍夫曼、罗伯特·吉尔平等。肯尼思·华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巅峰之作，因其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新现实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5.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新现实主义学派对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了“科学的修正和补救”的同时，一些学者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进入主流。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观点有：第一，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武力不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从根本上摒弃了现实主义有关权力和利益的观点，指出全球相互依存、经济技术合作正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第二，国家已不再是占中心地位的国际社会角色，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将导致众多的角色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第三，国际体系分析主要包含结构和过程两个层次的分析，应当更注重系统和体系的“过程层次”的动态分析。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7年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把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与相互依存结合起来，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开始萌芽。理查德·罗斯克兰斯1986年出版的《贸易国的兴起》一书则认为二战后的世界有利于贸易国的兴起，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国际和平。罗伯特·基欧汉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从理性的利己主义模型出发，借助集体行动理论、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市场失灵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深刻论证了国际机制基于其功

能而产生的独立作用和重大价值，从而发展出了一套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以此确立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

6. 建构主义学派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论战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际关系学论争的重心。但两者在物质主义世界观、理性主义认识论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等方面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面对这种主流理论日趋合成的现实，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非主流学派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流地位继续发起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迅速崛起。

建构主义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的学派，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它们都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没有足够地重视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事实，因而缺乏对现实国际关系的解释力。1992年，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质疑的目标直指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共同前提——国际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开始得到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更加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使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包括：

（1）国际体系的结构包括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物质结构是行为体的实力分配及其相对位置；社会结构则是指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文化因素。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只有在社会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

（2）认同是利益的基础，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决定和改变国家认同、利益和行为的不是体系的物质结构，而是在国际政治互动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社会结构。它们影响着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导致相互关系的合作或冲突。

（3）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关系。社会结构不仅确定单个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而且确定这些单个行为体所从事

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同时社会结构又是行为体实践的结果。①

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一个主流理论深入发展，不同学派各显特色的大发展时期。新马克思主义、后实证主义、英国学派、北欧学派等开始形成并取得进展。“软权力论”、“地缘经济学”、“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世界秩序新论”等国际关系理论也对冷战后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思路和模式。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发展所显示的重要特点是在理论上与早期资产阶级世界观一脉相承，能及时吸取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理论和方法变化迅速，强调科学性和超前性，能适应不同形势下国家利益的需求。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

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和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国际政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马克思主义指明了研究国际政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最高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对国际政治有普遍指导意义，是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包括：

（1）关于“合力论”。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产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意愿，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合力”，促进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也是

① 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224～225 页。

“合力”。

（2）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经济有反作用，有相对独立性。这对国家是如此，对国际政治来说，同样如此。在冷战后时期，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得格外鲜明。

（3）关于阶级分析的观点。要充分注意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政治的社会政治与阶级内容。

（4）正确对待民族问题、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支持进步的民族运动、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运动、民族主义，包括民族利己主义、民族沙文主义与民族分裂运动。主张实行民族自决权。

（5）重视人民群众与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前者在推动历史前进中起决定作用，后者在历史舞台上有重大作用。这个观点在国际政治发展中表现得最典型、最突出，尤其是人民群众在决定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

再次，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基本思想，以及对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问题的精辟论述，对于研究和处理当代国际政治关系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例如：

（1）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现代国际政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2）国际分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切国际关系都是某种国际分工的表现，随分工的改变而改变。

（3）关于资本主义列强外交政策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大量篇幅揭露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揭露它们为了达到夺取势力范围和霸权的目的，采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时而相互勾结，时而相互背弃。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更是论述外交政策的专著。这是我们揭露、批判当代霸权主义并与之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4）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要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要分析战争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明确对

不同战争的态度;要求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挑起战争,使工人阶级互相残杀,还要警惕大国的插手和利用。马克思相信,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

(5) 关于不能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么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也不能为了剥夺对手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他们的防御手段,不能以索取对手的战略要地,作为防止侵略的保证,否则结果将是悲惨的。

(6) 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想。如关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产生、作用与灭亡;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关于殖民地争取解放的道路和方法;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关于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关于对资产阶级各种殖民理论的批判。

(7) 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必须确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但同时强调决不应该在损害别国或别的民族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实行国际联合,反对民族压迫,坚持各民族的独立自主原则。

(8) 关于工人阶级应该“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马克思认为,“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9) 关于“新社会”的对外原则。马克思强调指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10) 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

的灵活性。

思考题

1. 试述现代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
2. 试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对国际政治的变革作用。
3. 试述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学派。
4. 试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第二章　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

第一节　国际体系及其特征

一、国际体系及其形成

国际体系，也称世界体系，包括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是国际范围内由各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相互政治经济联系与作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具体表现为行为主体在追求财富与权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等经济政治活动中进行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对抗与合作，主要反映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

国际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手段，使亚非拉地区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丧失了独立与主权，变成了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更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所推行的这种集军事、政治和经济于一体的殖民扩张政策，最终促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际体系的形成。

当然，国际体系的形成绝非偶然，是一定客观历史条件的产物。

首先，两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引起生产力突飞猛

进地向前发展，在不到一个世纪内，创造出比过去一切年代的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使大工业得以脱离本国基地，开始面向世界，使社会分工具备了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国际分工的条件。19 世纪后期，以电力、钢铁工业、铁路交通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更新了工业结构，使重工业比重急剧增加，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加速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垄断统治的确立。它加快了领土瓜分，彻底消除了民族壁垒，加深和扩大了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使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从此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整个体系中的环节。

其次，垄断的产生和发展。垄断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使帝国主义走上瓜分世界以获取超额利润的道路。随着垄断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了全世界，强化了资本输出国对输入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使二者的政治经济联系更加扩大和深刻。

第三，殖民政策的出现。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瓦解了世界各地的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移植了新的生产方式，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广大亚非拉地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旋涡，为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物质基础，加快了世界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促进了国际体系的最终形成。殖民政策是国际体系形成的决定性条件。

由此可知，国际体系主要由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以垄断资本为基础的世界金融体系和以统治剥削为基础的世界殖民体系所组成，它打破了民族壁垒，完全把世界联成一体。国际体系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以及殖民体系的建立。国际分工始于地理大发现，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完成。它是世界经济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它与殖民扩张相配合，在经济和政治上把世界各国联结成一个无法分割的国际体系。世界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并以世界货币为前提，是世界范围内的交换场所。世界市场使货币发展为世界性的，并形成了世界货币体系。世界货币的出现，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联系的扩大与发展，而且广泛服务于资本输出和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是帝国主义统治、控制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体，既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也是国际体系形成时期的生

命线。

二、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及原因

1. 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

国际体系自形成之后，迄今为止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单一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时期，从19世纪末到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时期，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占据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治经济规律成为世界现象。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以私有制为核心，以帝国主义国家为核心行为主体，使整个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突出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强权政治日益盛行、集团政治不断加强、国际冲突日益尖锐和扩大，反映了统治与从属以及互相争夺霸权的实质性关系。

第二，两种政治经济体系并存、斗争的时期，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1945年二战结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纯粹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开始动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了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因素，成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热情支持者和鼓舞者，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持续不断，帝国主义大国左右国际局势的能力遭到削弱。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相互争夺依然存在；但又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并且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当然，从宏观来看，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此时仍然占有绝对优势，整个世界也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但战争与革命、强权与民主的对抗贯穿始终。

第三，两大社会体系、多种类型的经济制度在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中并存、竞争、共处的时期，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90年代初。二战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为多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亚非地区逐渐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诞生了一系列主权国家。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使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种体系的并

存开始演变为三类国家体系的统一体。三类国家体系、多种经济制度之间都在相互渗透、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的趋势不断加强，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和一体化倾向。两大社会体系、三类国家体系内外都在寻求并存、共处，竞争的方式逐渐从军事方面转到了经济与科技领域。

第四，冷战结束后。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出现严重问题。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使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巩固，维护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意志和能力加强。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受到显著削弱。然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单一化”或“垄断资本主义化”，而是使世界变得更加多元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全球化和区域化两大趋势齐头并进、相互作用。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国际化、跨国化、市场化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是区域合作，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均参与其中的区域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一球多制、多元共存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最显著特征。

2. 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原因

（1）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战后出现的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深了生产的国际化，扩大了各国经济联系的规模与范围。它更新了国际分工的内容，加强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它加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导致了地区性共同体的建立与壮大，加速了一体化趋势；同时它也加剧了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扩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使世界产生新的动荡与不安。

（2）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影响。苏联以其自身的发展和在二战中的重大贡献，向世界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地显示它们的强大生命力。如今，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国民经济中的工农业比重已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发展，必将更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在国际体系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冷战结束后，虽然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出现了逆转的状况，但是中国在 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

的成功，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力。

（3）第三世界的崛起。第三世界是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由亚非拉地区新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力量。他们主张不结盟，公开宣布反对强权政治，维护了国家尊严和主权平等。在当前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国际形势下，亚非拉地区的各阶层人民都能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第三世界的崛起还带动了亚非拉地区所有民族民主国家及其同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崛起。这主要表现为它们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以及在世界事务中的相互磋商、相互支持、协调对策、联合行动，其目标是加速世界民主化进程，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

（4）垄断资本的两重性。垄断资本既有腐朽性，又有进步性。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并不是单纯的垄断，而是垄断与竞争的结合，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各国的不平衡发展，显示了向更高的社会经济结构过渡的特点。另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特征，在于它既有反动倾向，但又不完全排斥民主制。二战后，垄断资本主义改变了赤裸裸的强权统治和掠夺政策，日益注重经济渗透，用对话与合作取代了战争手段，强化了其自身的调整能力，使之能够继续充实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三、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1. 整体性

国际体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不是各国政治经济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各国政治经济运动规律的简单延伸，它有自己的特殊运动规律。国际体系的整体性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各行为主体单个力量相互作用而融合成的整体力量，这不是各行为主体意志和愿望的直接表现，而是这些意志与愿望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的集中表现，不以某个行为主体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国际体系的整体性表明，各行为主体不仅离不开世界，而且都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前提和条件，这就完全否定了绝对的主要和绝对的次要的形而上学观点。帝国主义列强和争夺霸权的超级大国妄图主宰世界的梦想是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强于一切，唯我独尊的观念也是行不通的；那种认为两种制度绝对对立的看法也

是不符合国际体系整体性现实的。

2. 相互联系性

从国际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来看，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1）世界经济是世界政治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对其起决定作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所有现象都可从世界经济中找到动因，世界经济领域内的重大变化，势必会影响世界政治的发展。

（2）世界政治对世界经济也有反作用。世界政治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独特的内在规律性，在特定条件下，世界政治也能反过来作用于世界经济。它能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也能阻碍或破坏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当战争与军事实力成为世界政治的首要因素时，这种反作用就特别明显。

（3）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之间是相互渗透的。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加上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交通设施和通讯手段的不断改善，使每一国家的繁荣都离不开世界，世界政治日益经济化，世界经济也日益政治化。此外，国际体系各行为主体也是相互联系的，表现为彼此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彼此间必须相互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当然，相互依存并非均衡和平等，它总是偏重一方，对一方更有利。其方式既有合作性的，也有冲突性的，或者二者兼有。

3. 不平等性

国际体系是建立在垄断资本对全世界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之上的，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争霸战争紧密相连，因此它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合理性。国际体系的不平等性最充分地体现在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亚非拉地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统治与从属、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使被压迫民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处于附庸地位。二战后，随着亚非拉地区一系列国家的独立和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以发达国家居于垄断地位、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国际体系的不平等性，构成了其内部各种矛盾和

冲突的根源，也揭示了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二节　国际政治格局类型及其特征

一、国际政治格局及其类型

1. 国际政治格局及其构成

国际政治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简言之，国际政治格局就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状态。

国际政治格局作为国际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形成和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关，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产物，严格地说，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后才真正形成的。因为只有到此时，世界才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形成了对国际政治具有全局性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集团或国家联合体，形成了以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主要内容的结构状态，即国际政治格局。

国际政治格局的构成要素是“国际政治力量”。所谓国际政治力量，是指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并对国际政治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位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国家集团或国家联合体。例如一战前的英、法、德、俄等国家和同盟国、协约国；二战后的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美国、苏联、中国等主要国家。政治力量与一般国际行为主体的主要不同在于行为能力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一个政治经济实体，只要它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就可以构成为国际行为主体，就可以成为一般国际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而一个国际行为主体，只有当它的行为能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即能对国际政治的发展，对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大影响时，才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力量，成为国际政治格局的构成要素。

某一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或综

合国力紧密相关，因此，构成国际政治力量的往往是大国。但是，并不是所有实力强大的国家都能够成为国际政治力量，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国际政治力量。譬如，美国在一战前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由于它对外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因而并未成为全球性大国，其行为能力和影响力反而不如英、法、德、俄等国。二战后，西欧的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在经济、军事实力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英法两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它们谁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只有联合成为统一的欧洲联盟，才形成为当今世界的力量中心之一。中国尽管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远不如某些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形成为单独的政治力量，但通过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类型

最早从理论上研究国际政治格局类型的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学者莫顿·卡普兰和加拿大学者K. J. 霍尔斯蒂的国际系统模式。

莫顿·卡普兰在1957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它的国际系统六模式。这些模式是按照一体化的程度进行排列的，是设想出来的，是启发性的模式。

（1）“均势”系统，主权国家是唯一的行为主体，各自以一种互相补充的方式单独行动，不存在政治子系统。

（2）“松散的两极”系统，既有国家，又有超国家的行为主体——集团行为主体和全球行为主体；并存着两个主要集团行为主体。国家、国家集团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相互制约。

（3）“牢固的两极”系统，整个世界分为两大集团或阵营，不存在其他的行为主体，基本特征是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

（4）“全球性国际政治”系统，这是一种一体化的、统一的系统，国

家和国家间联盟的行为都将受到全球性政治规则的约束。

（5）“等级制”系统，由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凭实力将其意志强加于他国而形成，以专制独裁为基本特征。

（6）“单位否决”系统，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的政治系统模式，所有行为主体均拥有毁灭他国的能力，但同时又无法防止自身的毁灭。各个国家各自为政，依靠自身的力量保护自己，相互威慑。以后，卡普兰又根据战后世界格局的发展，设计了另外几种可能的格局模型，如：非常松散的两极系统、缓和系统、不稳定的集团系统、不完全的核扩散系统，等等。

加拿大学者 K. J. 霍尔斯蒂主要是通过对国际关系史的考察，归纳出国际政治格局的不同类型。他的分类主要依据五个方面，即系统的界限、系统成员的特征、系统的结构、系统成员相互作用的形式、调整系统的相互作用和运转过程的规则和惯例。霍尔斯蒂把格局分为四种类型：

（1）等级制模式，权力集中于一个单位，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呈自上而下的等级状态。如中国古代的周王朝。

（2）分散型模式，权力归于系统内各构成单位，各单位实力均衡、彼此独立。如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意大利城邦国家时期、18 世纪和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欧洲。

（3）分散的集团模式，既有对立的集团，又有非集团和不结盟的角色存在，相互交流、相互制约。如古希腊时期、19 世纪末期、二战以前和 50 年代中期以后。

（4）两极模式，两大集团对立，权力集中于集团领导国手中，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成员国之间相互作用。如拿破仑战争时期、一战以前、二战后初期。

实际上，区分格局的不同类型，主要应当依据格局的内部结构和外在形态。所谓内部结构，是指构成一定格局的政治力量的特征以及各种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容与结构。所谓外在形态，是指政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组合形式与规模特征。据此，我们把国际政治格局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1）一元格局，或称单极格局。即某一个主要的大国或政治力量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该国周围存在着一系列其他主权国家，但并不能够成为与之抗衡的政治力量，一国独霸世界。如自由资本主义初期的大英帝国和所谓的“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ica）。从历史上看，这实质上是一种不完全的、过渡性的格局状态，是资本主义刚刚形成时期的特定产物。这个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刚刚在局部地区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尚未形成，国际政治格局从无到有，才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的独占地位。而且这种独霸，也只是在局部地域的独霸，并非世界霸权的建立。

二战后，美国曾经获得了与历史上的英国相同，甚至超过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即所谓“美利坚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但是，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形成美国独霸的一元格局。美国充其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冷战结束后，有关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的言论甚嚣尘上，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的出现和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他国而存在和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凌驾于国际社会所有其他国家之上。

（2）两极格局。即两个大国或两大集团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制约，对整个国际事务起着决定性的影响。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法国与反法同盟、一战期间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二战期间的法西斯轴心国和反法西斯同盟国、战后初期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美苏两极对抗是两极格局的典型史例。

历史上的两极，主要是两大对立的国家集团，而不完全是两个国家之间或某个国家单独与另一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19 世纪初期，面对欧洲的反法同盟，法国一方也有自己的盟国或附庸国，如由拿破仑帝国所控制的荷兰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意大利王国、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以及西班牙等国。所谓美苏两极，也不单单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美国一方有其西方盟国和北约集团，在苏联一方有其东欧盟国和华约、经互会。此外，两极格局，从未形成为卡普兰所说的“牢固的两极”，即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在两极之外总有不从属于两大集团的其他国家存在。一战期间的两大集团之外有强大的美国和日

本;二战期间也存在一些没有卷入战争的国家;战后初期则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地带”。不过,这些集团以外的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并未构成国际政治力量,从而使两极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一定时期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

(3) 多极格局。即多种政治力量相互制约,各种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各自独立、基本平等,相互之间不存在联盟或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格局类型与西方学者所说的“均势”模式、“分散的集团”模式、多极模式基本相同。如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均势格局,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格局出现了向多极方向发展的趋势,即中、美、苏、日、西欧和第三世界这六大力量的竞相发展。当然,19世纪欧洲的多极均势,只是一种局部地区的格局状态,是一种不完全的多极格局。虽然五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但它对欧洲以外的美国和日本的影响是有限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国分立,是在世界大战后的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具有极不稳定的特点,很快被集团对立所取代,显示出明显的过渡性。战后,国际社会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扩展以及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逐步为建立全球性的多极格局创造了条件。正在形成中的多极格局将具有全局性和稳定性的特征。

(4) 两极多元格局。这是一种由两极向多极,或由多极向两极的过渡性格局形态。在这种格局状态下,一方面存在着两大集团或阵营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对整个国际体系的相互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存在着独立于两极之外的其他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不受两极之间关系的直接影响,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格局特点,就表现为两极——美苏和多元——中国、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当然,真正的完全独立于两极之外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西欧和日本与美国还是盟国,在政治上受制于美国;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但是过于松散。

二、国际政治格局的一般特征

1. 国际政治格局总是同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

时代是指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定阶段，它以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的变更为其主要标志，因而是一个相当长的社会形态演进过程。国际政治格局是指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状态，以其构成要素间力量对比关系的组合为基础。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力量对比可以在几十年甚至几年内就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导致格局样式的改变。时代与国际政治格局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关系。国际政治格局总是一定时代条件下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格局外在形态的样式如何，是两极还是多极，反映的都是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二战后初期的两大阵营对峙与一战前的两极格局就其内在结构本质来说也是一样的。就外在形态而言，格局与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也是有关联的，作为格局初始形态的一元格局，就是由资本主义时代初级阶段的特点所决定的。19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多极均势也是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各国资本主义的竞相发展相一致的。

2. 国际政治格局总是同世界经济格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世界经济格局是指世界范围内各种国民经济类型和经济力量中心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或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状态。经济格局与政治格局之间，既自成系统，又相互联系。

（1）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是国际政治格局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一定的政治格局状态。

（2）国际政治力量的形成，与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以及其在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紧密相关。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能力如何，经济实力地位是最基本的、并长期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英国之所以在 17—18 世纪能够称雄世界，就在于它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经济实力最强大。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和帝国主义阵营的领袖，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

（3）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演变直接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两者的演进呈同向性发展的趋势。19 世纪的欧洲均势，是以资本主义多元经济中心的形成为先导的。二战后两大经济体系、三种经济类型

和多元经济力量中心的出现，为国际政治多极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然，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对世界经济关系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国际政治格局一经形成，对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经济关系就具有相当的制约性。例如：两大阵营形成后，相互间政治上是敌人，经济交流就受到极大限制。东西欧之间的传统贸易往来，因两大阵营政治上的尖锐对立而不得不各自转向苏联和美国。60 年代以后，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化、西欧和日本政治独立性的增强，也使其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加灵活，并由此而出现了最初的南北对话。其次，国际政治格局与世界经济格局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当代的国际政治多元化是在世界经济多元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反过来它又进一步推进了各种经济力量的发展和经济多元化的深入。

3. 国际政治格局总是同一定形式的国际秩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国际秩序主要指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构状态，而不是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同国际格局一样，国际秩序也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形成的，但是它早于国际格局。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就有国际秩序，如被人们称为“世界帝国”秩序的“区域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一种国际秩序形式。在这种秩序下，各个古代帝国间彼此隔绝，只有一些偶然的、局部的往来。真正的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建立，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之后。同样，国际秩序也有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之分，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格局的特点。国际政治格局是在一定的国际关系基础上建立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中各种力量的构成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形式。二战以前，国际政治秩序的本质特征是强权政治和集团对立，这就决定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垄断地位，决定了战前的格局主要是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战后，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和第三世界的兴起有力地冲击了国际政治旧秩序，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仍企图用强权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加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的错误，国际政治旧秩序得以保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然而，民族独立和主权国家的增加，

使国际政治多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促使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的发展。因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坚持独立自主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强权政治和集团对立，与积极推进世界的多极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一致的。

4. 国际政治格局在其演进过程中，总是新旧交迭，呈现出过渡性特征

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就其内在的矛盾运动而言，主要是格局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和地位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国际政治格局就是一种力量均衡（或均势）状态。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之间的对比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形成一定的相互制约关系，构成一定的格局形态。当然，各种政治力量自身也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有的衰落，有的兴起。一旦原有的均势状态被打破，就会形成新的均势，构成新的格局形态。但是，新旧格局的交替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总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种过渡时期或过渡形态中，旧的力量对比尚未完全打破，新的格局形态还未确立，从而必然存在着新旧两种格局形态的相互交错和并存。因此，一种新的格局形态的确立，是无法用准确的时间予以界定的。19 世纪欧洲均势格局在 1870 年普法战争时期已经开始走向崩溃，1882 年就建立了德奥意三国同盟，而两大集团的对立到 20 世纪初才确立。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形成也不是大战一结束就出现的。美苏从战时盟友到战后敌手，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美国自 1947 年开始组织反苏反共的帝国主义阵营，而社会主义阵营到 50 年代初才真正形成。

第三节　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演进

一、二战以前的国际政治格局

1. 战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

第一，以欧洲为中心。战前，国际政治力量主要是由欧洲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的，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与争斗主要是以欧洲为中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欧洲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并在以后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确立相适应，欧洲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军事力量，所占有的殖民地是其他地区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其次，现代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最早也是在欧洲形成的，这种相互关系形态也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欧洲资产阶级为追逐利润向全球的扩张，而延伸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因此，只有欧洲国家和国家集团具备国际政治力量的资格。北美的美国和东亚的日本，虽然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强大国家，但美国因其“孤立主义”的传统而与欧洲和世界事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日本则因其实力所限而主要在亚洲扩展自己的势力。尽管在一战以后，欧洲的中心地位就面临着严重挑战，但直到二战后欧洲的这种地位才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以大国和强权为中心。与以欧洲为中心的格局特点相联系，战前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状况，实际上只是少数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演进，主要是建立在这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实力消长和地位起落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除了以分割者的经济、金融和军事等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整个世界形成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国际体系，强权政治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

2. 战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时期

战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

（1）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围绕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① 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阶段（17 世纪），即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较早的国家之间争夺或确立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先是西班牙、荷兰，以后是英国。英国因其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在 17 世纪中期，先后打败了商业资本发展较早的西班牙、荷兰，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最主要力量。这个时期的格局只是处于初始阶段，力

量对比态势尚未明显确立，可称之为主权国家体制下的一元格局或主权国家并立下的无极状态。

② 两大集团的争斗与对抗阶段（1789 年至 1815 年），即法国大革命后，英国为维持其霸权地位而与受到拿破仑威胁的欧洲封建国家共同建立反法联盟，形成欧洲两大力量之间的长年征战。

③ 多极均势阶段（1815 年至 19 世纪末）。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建立了“维也纳体制”，也称“欧洲协调”体制。英、法、俄、普鲁士、奥地利五大欧洲强国相互制约，共同主宰国际事务。为了达到维护各自利益的目的，五大国之间在欧洲上演了一幕幕合纵连横、相互争斗的闹剧，神圣同盟、四国同盟、英法奥联盟、普奥联盟相继出现。

（2）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的国际政治格局。

这个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和强权为中心的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① 欧洲列强间的两极对峙和帝国主义战争阶段（19 世纪末至 1918 年）。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等国开始建立了以德国为中心，以法国和俄国为主要打击目标的联盟体系。英国则一直企图玩弄均势，从中渔利。美国和日本的实力也有了很大发展，并分别在美西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大出风头。20 世纪初，欧洲出现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并最终走向全面战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两次大战期间的力量重新组合阶段（1918 年至 1939 年）。一战导致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受到极大削弱；美国、日本的力量迅速增强。一战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根据各自实力地位，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经历了从不稳定的均势—动荡—重新走向集团政治的过渡，并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③ 二战期间由两极多元到两极阶段（1939 年至 1945 年）。二战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39 年至 1941 年，主要是德、意同英、法在欧洲交战和日本在亚洲的侵华战争。第二阶段是 1941 年至 1945

年，苏美参战后，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两大阵营——法西斯轴心国和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二、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

二战使欧洲中心地位不复存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受到极大削弱，丧失了全球性大国的地位。美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位，在战争中得到巨大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军事超级大国。苏联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有了很大进展，成为欧亚大陆的头号强国。在大战末期，美国和苏联就已经取代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导力量，并规划和确定了对战后具有深远影响的“雅尔塔体制”。战后不久，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改变了战时与苏联结盟的政策，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了冷战。在整个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 两大阵营尖锐对峙时期（战后初期至50年代）

二战期间，苏联为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而同帝国主义国家结盟。战后，苏联希望同其他国家保持和平共处的正常关系，而美国出于建立战后其独霸地位的考虑，把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视为主要对手。1945年4月，杜鲁门上台后，逐步采取了一系列恶化美苏关系的措施，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尖锐对抗。

帝国主义阵营是美国为了推行其反苏、反共、独霸世界的对外战略而一手筹划建立起来的。1947年3月出笼的“杜鲁门主义”，是以美画线，全面反共的政治动员令；1947年6月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为控制西欧，拉拢东欧而抛出的经济钓饵；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是美国协同其西欧盟国对苏联东欧实行军事遏制的集团体系。50年代初，美国又同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建立了军事政治联盟，拼凑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球性战略包围圈。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阵营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加上法共和意共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实行了“莫洛托夫计划”，并发展成为“经互会”。与此同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缔结了20个双边友好互助同盟（合作）条约。1955年，

苏联东欧国家针对帝国主义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和斗争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上，社会主义国家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侵略扩张。经济上，帝国主义国家以“巴黎统筹委员会”等方式实施经济封锁和制裁，社会主义国家则依靠自力更生和相互合作而迅速壮大起来。军事上，两大阵营在欧洲尖锐对峙，在亚洲进行了直接较量。

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战后初期的国际事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尽管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地带”，但均受到两极对峙的制约，并未形成国际政治中的“第三种力量”。

2. 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时期（60 年代）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社会的两大政治力量出现了重大的分化，新的力量开始兴起，国际政治格局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整个 60 年代，国际政治格局处在一种剧烈的变动状态中。帝国主义阵营已出现分化，但西方联盟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解体，但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还有联盟关系；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力量正在形成，但尚未真正发挥其有效的影响。这个时期，国际政治格局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首先，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化。50 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到 60 年代，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西欧和日本的实力地位上升，美国相对衰落，60 年代末形成了美、日、欧三大经济中心并存的局面。与之相适应，西欧和日本开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平等伙伴的地位。欧洲共同体的建立，“戴高乐主义”和“新东方政策”的出现以及日美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了严重挑战。

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激化，逐步走向解体。苏联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原有的矛盾，并增加了新的矛盾；特别是进入 60 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激化，武装冲突屡屡发生。中苏关系的破裂，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第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大批涌现。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鼓舞下，60年代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1960年至1970年，先后有46个同家获得独立。1961年出现的不结盟运动，1964年建立的七十七国集团，标志着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开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联合起来，预示着第三世界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

3. 两极多元下的相互制约时期（70—80年代）

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状况表现为：两极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政治力量竞相发展，构成了两极多元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复杂局面。国际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基本确定。

首先，两极依旧存在。经过60年代的分化、改组，两大阵营对峙的两极格局演变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对抗。美国的实力地位虽然大大下降，但它仍是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和“科技强国”，不仅在西方联盟内部，而且对整个国际事务都有很大发言权。苏联为同美国争霸，在7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军事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是在80年代则陷入困境。虽然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但苏联仍长期控制着其东欧盟国，成为美国最有力的国际竞争对手。70年代至80年代，美苏关系一直是国际事务中的中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与繁荣。

其次，多种力量竞相发展，超级大国已不能再任意主宰国际事务。7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的联合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而且开始同西方国家进行了直接的集体交锋（突出地表现在70年代的石油斗争、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中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第三世界的最坚定支持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大国结盟的方针，为有效地制约美苏争霸、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西欧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它们的政治地位在70年代至80年代间进一步提高。西欧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其政治一体化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继

70年代初提出“多边自主外交”后，又在70年代末开始实施其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战略。作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角色，西欧和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同美国的分歧开始明朗化。

三、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及其特征

1. 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重新组合和结构调整

7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两极多元格局本身就是一种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过渡形态，这一过渡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停止，反而有所加速。

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两极格局的终结。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形成美国独家称霸的“单极”格局，也没有形成西方主导的美、日、欧“三极体制”。各种力量间重新组合和结构调整的趋势继续加速发展。

首先，西方大国间的力量对比状况出现变化：美国的力量相对上升，特别是由于1992年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使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在逐步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继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欧洲共同体发展为欧洲联盟后，又于1994年通过《申根协定》，1997年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1999年开始启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欧盟经济的发展，使其总体经济实力已经在诸如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等关键领域超过了美国。与美欧的发展形成对照，日本在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局势和经济状况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均呈下降趋势，美日欧三边关系正朝着有利于美欧，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其次，中国在90年代进一步加快了改革与开放的步伐，政治经济实力迅速增强。1992年至199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达到12.1%，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居第一位。1989年以后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1994年后，逐步改善了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第三，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苏联东欧集团不复存在，大多数东欧国家倒向西方。俄罗斯虽然取代了苏联在国际社会的位置，但是由于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困境以及俄罗斯政府在对外战略中的急躁，使其不再具有世界超级大国的实力，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明显

下降。

2. 各种力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多样

冷战后，国家间单向的政治、经济依附大大减弱，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愈加明显。各种政治力量，各个国际行为主体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各个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彼此间的合作，缓和相互间的对抗。这就使得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合作中有斗争，矛盾中有协调。阵线分明的集团对抗已不复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合作将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内容。

3. 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依旧存在

战后初期的两大阵营对峙是两种制度间的公开对抗，帝国主义未能阻止社会主义的发展。60 年代以后形成的美苏两极争斗，既有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的一面，同样也具有两种制度间斗争的特征。冷战后，虽然东西方之间的集团对抗结束了，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依然是国际政治格局内各种力量间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得更为隐蔽和不具公开的制度对立色彩。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其基本战略，只不过更多的是采取和平演变的战略，是要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战争”，达到其“不战而胜”的目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何既坚持对外开放，又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两大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存、彼此竞争，是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特征。

四、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未来多极世界的基本格局的具体样式问题。有人提出，未来的多极世界将主要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极体制”。或者是美国、以西欧为中心并包括东欧在内的大欧洲、与中国保持适度关系并加强与欧美联系的日本之间的三足鼎立。也有人提出，未来的多极世

界将是中、美、俄、日、欧洲五大力量中心的“均势”。两德统一后，有人则进一步提出了中、美、俄、日、德五大力量中心的构想。此外，还有人提出了以区域集团化为中心的多极格局模式，即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第三世界的区域共同体联盟。

在国际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中，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首先，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因而无论是区域化还是集团化，都将是有限度的。其次，主权国家仍将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政治力量的构成仍将以主权国家为中心，但是大国与强权的作用将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第三，国际社会的整体化和相互依存将继续深化，但国家利益将仍旧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进程看，未来格局的发展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国际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在减弱“极化”世界的趋势

冷战时期“极”的内涵更多地表现为“斥”，而当今多极化中的“极”将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异”，即在相异性的同时，带有吸引力、影响力、作用力。出现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际政治经济中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

2. 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将异常激烈

这种竞争不仅包括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竞争，而且包括三类国家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竞争。竞争的内容将主要围绕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展开。这种竞争将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但并不排除战争、甚至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从而有可能导致格局出现出人意料的急剧变化。

3. 区域化的趋势将有所加强，区域化的区域界限将进一步扩展

这主要将表现为欧洲一体化、亚太经合组织、跨大西洋联盟以及第三世界区域内和跨区域间的合作的加强。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组织的作用在增强；亚太经合组织、跨大西洋联盟、欧亚合作等洲际合作业已开始。除了现有的第三世界区域性合作组织之外，第三世界本身可能将进一步分化为若干不同的政治经济

力量中心。当然，它们也会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区域性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从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多极或多元状态，这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思考题

1. 国际体系发展演变各阶段的基本特点。
2. 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形式。
3. 国际政治格局与世界经济格局之间的关系。
4. 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特点。

第三章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主体

第一节　民族国家

一、民族国家的含义及其基本类型

1. 民族国家的含义

民族国家是在统一的民族基础上形成的独立国家。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是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是一国整个对外活动的责任承担者。

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国家必须具备下列四个要素：

（1）定居的人民。这是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是国家组成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家在国际上有形存在的重要标志，以及发挥国际作用的客观前提。

（2）一定界限的领土。这也是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国家在其规定的领土上拥有全部的管辖权。领土为人民生息繁衍、国家生存发展提供土地和资源，也是国家在国际上有形存在的主要标志和发挥国际作用的客观基础。

（3）政府。这是国家的组织形式，是行使国家对内、对外职能的机

构，拥有实力和强制手段。无政府的社会不成其为国家。

（4）主权。这是国家最根本的属性，也是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最重要的特征。享有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拥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并以整个国家的名义来行使，具有鲜明的权威性。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国家的四要素只是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存在的客观前提，并不能否定国家的阶级实质。

在构成国家的四要素中，主权最为重要。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主权，才能独立自主地制订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才能真正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实施对外行为，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真正确立自身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地位。

2．民族国家的基本类型

当代民族国家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早期形成的民族国家，一直享有充分的主权，历经数百年获得了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业已形成较完善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生活水平亦较高。在这些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其中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国际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民族国家的最高形态。它们正处在发展中阶段，经历着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正在完善其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以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它们坚持独立自主，充分享有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持正义，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崭新作用。

（3）其他大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它们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范畴，大都政治结构不够稳定，经济发展水平低，主权地位不巩固，一般都面临着巩固政治主权、争取经济主权的严重任务。其中发展最快的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少数最落后的仍保有前资本主义的明显特征，差距日益拉开。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年轻的民族国家不断增强其力量，日益成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

二、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基本行为主体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是在享有主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民族国家的产生是现代国际政治产生的历史起点或历史前提。国家不仅是最早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曾经是唯一的角色。国际关系首先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国家体制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从而推动了国际政治体系的诞生。第二次民族国家的大兴起，又充实和完善了这一体制，使之成为世界性体制，这是当代国际政治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体系最基本、最重要的构成单位。国际政治体系具有多层次的结构，无论在全球层次上，还是在地区、亚地区、多边或双边层次上，国家都表现为核心要素，占据中心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已有数以千万计的非国家角色进入国际政治的广阔领域，但是，能反映国际政治本质规律，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多样性统一基础的，只能是民族国家。这是因为：

第一，国家是国际政治体系中唯一享有充分主权的行为主体，因而也是最有实力的角色。国家主权是各国行为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对内具有最高统治权，且能以国家的名义全权实施一系列重大的对外行为，并能运用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和利益。主权是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根本特征，这是非国家行为主体所不具有的。

第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直接规定了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状态。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矛盾、竞争、冲突与合作都深植于国家的本质属性之中，虽然它们的内容、形式、地位和作用各异，却都根源于各国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国家利益。随着国际关系日趋发达，越来越多的领域纳入了国家间关系，甚至连一些发生在国内社会的事情，也跃入了国家间关系领域。尽管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共性不断增强，但不断升华的民族意志和情感、国家主权和利益，仍然十分敏感，大量的国际问题尤其是核心问题，都要直接依靠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来解决，舍此无其他出路。

第三，非国家行为主体大都为国家的派生物，都是在国家间关系日益发达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它们的性质、地位、行为、作用即使不是由国家决定，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的制约与影响，而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行为能力的大小。即使有些国际组织享有部分主权权力，也是国家自愿让予的结果，由单独行使变为共同行使，归根结底仍受国家意志的支配。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

一、国家主权的含义

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固有的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包括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两个方面。对内主权是指在整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对一切事务具有排他性的最高统治权，即在主权国家内不得有他国或任何其他权威行使主权权力；对外主权则是指民族国家在对外事务上有独立自主的决定权，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不接受其他国家或权威的干涉或强制，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其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权利和义务的承受者。主权的两重性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没有对内最高的权力，就谈不上对外独立。主权对内最高的属性派生出主权对外独立的属性。同样，没有对外独立性，国家就会丧失其国内的最高权力，对外主权是任何独立国家的基础。对外主权只有在国际关系中才有意义。

二、国家主权观念的发展

国家主权原则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扫除地方封建割据的障碍，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必须在政治上以全权统一国家，并以最高权力的名义进行统治。

近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让·博丹最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国家的“主权权力”是一种永恒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每一个民族国家中，都存在着独立的国家主权，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最高权力存在的基础。在博丹的君主主权学说提出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又出现了托马斯·霍布斯的契约君主主权论、约

翰·洛克的议会主权论、让-雅克·卢梭的人民主权论、黑格尔的国家人格君主主权论以及约翰·奥斯汀的功利主义主权论等，主权理论不断丰富、发展。最终，主权成为民族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

对外主权的明确概念是西欧思想家在16世纪提出的，反映了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国家力图摆脱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和统治，有权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政治要求，当时主要是指国家内政不受干涉。民族国家的产生促进了对外主权的全面发展。在博丹的主权理论形成后，对外主权理论脱颖而出，后经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著名思想家的论证和阐发，对外主权理论获得了充分发展。主权理论为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但是，以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体制，仅仅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展开提供了一般前提。实际上，自近代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只有那些具有相当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是享有充分主权的民族国家，而在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殖民地和附属国任人宰割，近代国际关系基本上是以欧洲大国为中心的。

正是由于大量新的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的最新发展，主权问题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炙手可热的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民族国家的初创阶段，它们的主权地位还是较为脆弱的。其内部政治结构不稳定，经济基础大都比较落后，正在艰难地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一痛苦的历程中，它们难以有力地抵御内外政治、经济势力的冲击和束缚，它们对内和对外的重大决策时时受到外来的干扰和干涉。因此，新独立国家必然首先着重强调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尽力争取民族与国家利益。主权对它们来说是生命攸关的。

民族国家的成长与发展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国家作为新的民族国家要获得充分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他们必须依靠国家主权这一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来保证发展。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不仅不能削弱，还必须强化。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面对强权与霸权，主权也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国际关系实践充分说明，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正在而且必将继续在国际

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权民族国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要这些历史条件未发生根本变化，它们的主权地位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三、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和制约。

一方面，西方国家为了资本扩张的利益，千方百计从理论到现实削弱、剥夺和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这突出地表现为对中小国家内部事务或相互冲突的强烈的干涉主义倾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是其典型表现。科索沃问题是南联盟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南联盟并非北约成员国，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既无联合国的授权，又无当事国的同意，擅自对其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这清楚地表明，霸权主义仍然是国家主权面临的主要危险。

另一方面，当代特别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深刻变革的历史条件已经形成，一个密切联动的社会呈现在世人面前，封闭型的民族国家形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相互依存、国际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也不能适应在许多方面必须进行全球治理的世界形势。虽然，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至今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主权的本质和地位，但是，主权国家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一切要素都在跨国界流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普遍建立起全面的互动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依靠封闭式的自我努力，而是在开放式的互动性国际关系中得到实现。国家利益的内涵开始深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家间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国家利益向经济发展利益倾斜。以全球性问题为标志，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它们唯有在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利益，这种实现是以利益和权力的相互让予为条件和代价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会充分利用它在现有国际机制以及创建未来国际机制中的主导权和掌控权，使国际体制、国际准则、国

际规则、决策程序及运作机制成为限制其他国家主权的强有力工具。

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主权的本质，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寻求最佳选择。

第三节　国家利益

一、国家利益的含义

国家利益是指满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某种客观性质，不是任意界定的。国家利益可以从不同视角加以区别：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战略利益与战术利益、国内利益与国外利益，等等。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对外行为和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区分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意义最大。

国家根本利益，亦即摩根索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内核”，是对于国家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利益，它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其基本要素是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制度和经济繁荣。

国家安全是国家和民族生存的安全。在今天，安全利益的内涵日益深化，既包括军事安全，又包括经济安全与环境安全，它是任何国家生存的首要条件。只有在生存的基础上，国家才能去谋求其他利益。它意味着国家维护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巩固政治制度和发展经济的良好前提。

领土完整是国家存在载体的完整，包括领土、领空、领海的完整，是国家有形本体保存的主要标志。

社会制度是国家体制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任何国家都竭力巩固、发展、完善和光大其政治与经济制度。

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和核心要素，经济繁荣能大大加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制度。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总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繁荣社会，稳定政局，提升本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国家利益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利益在最高层次上的表现，是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其内容是相当稳定的。它们既相互联系、融成一体，又

独自存在、相互区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成为国家追求的重点目标，如战时的军事安全，平时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各国都制订了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确定其基本目标，从而使国家利益具体化，便于贯彻实施。

一般利益是从属于根本利益的局部利益，是为根本利益服务的，它具有易变性，随着国家利益目标的转移而转移，随着国际形势及相关行为主体目标、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国家的根本利益对于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涉及国家根本利益时，国家会尽全力予以实现和维护。而在一般利益上，国家有可能在某种情势下作出妥协或让步。

二、国家利益的复合两重性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只强调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忽视了它的民族性。因此，提出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与民族性的两重性，是一种进步。但是，国家利益的内涵及其在当代尤其是冷战后的深化，国家对外行为及其效应的多样性，揭示了国家利益不只是具有上述单一的两重性，还具有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两重性。

1. 国家利益的阶级性与民族性

国家利益的阶级性是由国家的阶级性决定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本质上来说，国家利益不能不表现为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表现为统治阶级维护和发展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追求其经济利益的要求。就此而言，鲜明的阶级性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质和特征。

在强调国家利益阶级性的同时，必须看到国家利益又表现出民族性。任何国家均由特定的民族所构成，在国际社会里作为一个整体的单元与其他民族相对应而存在。国家利益的民族性表现为民族生存、繁荣昌盛所必需的条件：维护国家与民族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防止外来侵略与干涉，争取民族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维护本民族的语言、传统、习俗、文化、宗教、尊严和生活方式。

自近代以来，任何阶级的统治都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施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一般都是该民

族利益的代表，至少总是以民族利益的形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因此，如果统治阶级的政策和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全民族的愿望和利益，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受到动摇和削弱，其本身的利益就难以实现。在对外关系领域，民族性更多地表现为国家的凝聚力，国家利益也更多地以保护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利益的面目出现。

就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看，在反对外来欺侮、干涉、控制、入侵，维护民族尊严，发展民族经济，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极易吻合，外交政策会成为举国一致的政策，全民族会为之而奋斗。但是，如果两者发生尖锐对抗，会造成外交政策的失败。

在当代世界中，国家利益中民族性因素的增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无论是在制订及实施本国外交政策时，还是在分析、评价别国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时，都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必须既重视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又重视其日渐增长的民族性，防止片面强调前者，忽视以至抹杀后者。

2. 国家利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或个性与共性

世界各国都是特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以及民族的诸种国内因素和外部发展环境的不同，产生了各国特定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表现出其个性或特殊性。这种个性或特殊性决定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家利益的本质、结构与特点。

一般说来，国家利益的差异、矛盾与对立，往往导致国际关系中的矛盾、竞争、对抗与冲突。在国际关系发生根本变革之前，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基本的。

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又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普遍的利益。这就说明国家利益的个性之中包含着共性，特殊性中蕴涵着普遍性。正如托马斯·鲁滨逊在《国家利益》一文中所指出的，就国家而论，国家利益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即单个国家的利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共同利益；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即人类的共同利益。第一层次反映了国家利益的个性或特殊性，是核心，后两个层次都是第一层次的重叠或交叉点，表现为国家利益的共性或普遍性。

科技革命的发展，通讯、交通技术的更新，国际分工的扩大，国际贸易的拓展，资本、技术、劳务的输出，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涌现，使得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人类的共同问题逐步形成和突出，从而确立了国家间日益广泛的共同利益，强化了相互依存的趋势。虽然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归根结底依然是获得国家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可以不是排他性的，在一国取得自己利益的同时，其他国家以至全世界都得益。

综上所述，在确定和分析国家利益时，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既重视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和特殊性，又不忘民族性与普遍性；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在继续肯定国家利益的阶级性与特殊性占统治地位的同时，清醒地看到国家利益的民族性与普遍性在不断增长中，国家利益的内涵在日益深化中，国家利益的兼容性因此而增强。

三、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第一，国家利益是各国处理国家间关系，进行对外活动的动因。就其本质来讲，任何国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活动，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

第二，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国家利益取代了国家最高统治者个人或最高统治层少数人的利益，成为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基础。外交政策的效果也是以国家利益是否得以实现来判断的。

第三，国家利益的变化会引起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础，国际领域的变化会导致国家对外活动和对外政策的变化，同时，也会引起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四、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是指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全面或局部的协调、联合等协力行为。它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基于各自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利益或目标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而采取的一种相互配合行为。利益一致的范围和程度决定了可能合作的范围和水平。这种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并

不总是与国家的类型或意识形态是否一致相联系的。一般来说，国际合作建立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之上。

在当今世界上，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发展，多渠道、多层次的联系与交流日益扩大，国家利益的兼容性、互补性增强，共同利益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国际合作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第一，国际合作具有全球性。国际合作的规模是随着国际联系的扩展而扩展的。二战前，国际联系有限，占主导地位的是区域性多边合作，全球性多边合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有限。国际联盟开创了全球性多边政治合作的先例，二战期间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则是全球合作的成功典范。战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领域的不断扩展，全球性问题日益紧迫，相应地要求在国际社会各领域不断扩大全球性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就是适应全球性国际合作的需要。

第二，国际合作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体现在国际合作在所有领域都得到大大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国际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大为加强和扩展。当代国际政治合作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联合国把国际政治合作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当代国际军事合作也得到发展，军事合作领域日益广泛，程度加深，从战时扩展到平时，从战略层次扩展到战术、技术层次。而在国际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更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三，国际合作呈现新的趋势。

（1）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对于国际合作具有主动积极性。由于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各国争取生存与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所以各国观念更新，有了合作的主观愿望，有了主动行动的强大动力。

（2）国际合作呈现稳定性。由于世界各国认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而且国际合作已达到相当程度和规模，涉及所有领域，基于合作各方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已表现出相对稳定发展的特点，这种状况已难以逆转。

（3）国际合作呈现机制性，即通过建立国际机制来促进国际合作的发展。

（4）国际合作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冷战时期的主要历史教训之一是意识形态的僵硬对峙，这并不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与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也背道而驰。实际上，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不一定友好相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也未必注定交恶。国际合作日益冲破意识形态的界限，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这需要各国更新外交观念。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异同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依据。国家利益的共性成为国际合作的客观基础和主要动力。

不可否认，当代世界各国的地位、处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继续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远未销声匿迹，这一切都大大阻碍着国际合作的深化与进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霸权国家往往利用新的合作机制来谋求全球战略利益，损害对方的利益。它只要利用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增加对方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用相互依存之网套住对方，就可以迫使或促使对方执行某种政策，做出某种调整，甚至发生体制性蜕变，以继续维持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至少会常常谋求单方面不合理的最大利益。

五、国际冲突

国际冲突是指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由于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和价值的不同或相悖，或者由于国际社会结构性差异所引发的矛盾，而处于自觉的抵触、摩擦、对立或对抗的状态。

1. 国际冲突的特点

（1）国际冲突及其发展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要的社会功能。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国际冲突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国际冲突不仅具有破坏性后果，也具有增强国际社会关系及其调节与控制能力的作用。一定程度的国际冲突是国际社会不断进化的基本要素，是国际社会的必然现象和本质特征之一，它由国际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所决定。国际冲突的性质应视其产生的背景、内容、代价，以及它给冲突各方、地区或全球国际关系带来的后果来加以判断。

（2）国际冲突具有利益对抗性。国际冲突本质上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的对抗，其行为一般表现为确认各自目标的不相容，一方预计或感觉到对方正在损害其利益、目标和价值，并为此采取行动。冲突各方价值体系的矛盾、物质及社会稀缺资源的竞争，是目标不相容的主要原因。互不相容的目标，造成冲突形势；冲突者的主观感受、心理状态或者态度，会强化紧张情绪或挫折感，加剧冲突形势。在冲突加剧的情势下，冲突各方可能为了达到有争议的目标，或迫使对方修改或放弃其目标而采取行动。冲突形势、冲突态度与冲突行为构成国际冲突的三维结构。这三者在冲突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推动。

（3）在国际冲突过程中，冲突通常呈螺旋式发展势头。冲突方的相互作用具有自激和互激性质，因此，冲突的发展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因谋求某项国家利益的冲突方除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而无其他选择，冲突风险又不大，或因双方逐步升级的敌意行为的相互作用，进入上升的螺旋式发展，往往要一决雌雄才能告终。第二，因冲突风险很大，又有比选择冲突更好的机会，或因双方都无法取胜、冲突资源难以为继，甚至出现更为紧迫的新威胁，冲突各方都愿探求妥协之路，这种相互作用可使冲突转而步入逐步下降的螺旋式发展，使冲突暂时平息，甚至解决。

（4）在国际冲突过程中，冲突可能扩大，原先与冲突无直接关系者卷入冲突。新卷入冲突者，往往是与冲突一方有某种利害关系的国家，或难以置身事外的强国、大国和国际势力。冲突扩大易产生极化现象，冲突各方更为固执，冲突扩散，甚至形成对立集团。

（5）在国际冲突呈现螺旋式上升和扩大趋势时，冲突可能发生升级。冲突升级是指调动更多的冲突资源、冲突行为显示更高的强制性或武力反应程度的过程。有三种基本的升级模式：① 重复模式，即针锋相对地采取与对方对等的行动；② 强化模式，即行动性质类似，但行动频率与强度随时间而增加；③ 发展模式，即随着冲突的发展，冲突行动有量变又有质变。

除了上述这些一般性特点之外，国际冲突在国际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的具体特点，就当前国际冲突来看，它又有如下具体

特点：

（1）冲突呈现全球性、广泛性与联动性。在当代，国际冲突继续保持区域特性的同时，向全球性转移，由于全球问题的形成，全球性冲突普遍存在且具有全面的扩散性，不仅遍及国际关系一切领域，而且在每一领域都充分展开，并涉及各个层次。同时，由于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以及非国家角色大量涌入，参加国际冲突的角色从以前局部地区的少数角色发展到全球的所有角色。

当代国际冲突还具有联动性。这种联动性由于国际联系的日益频繁、相互依存日益深化而得到强化。各行为主体、各个领域的国际冲突形成了相互感应与影响的关系，于是出现了经济冲突政治化、政治冲突经济化、国内矛盾国际化、国际矛盾国内化、双边矛盾多边化、历史矛盾现实化等现象。

（2）冲突的主要方式呈现转移与兼容性。在冲突方式的变化上，“硬权力”对抗与“软权力”对抗并存。传统对抗的轴心是“硬权力”，即军事实力、核威慑力等，因此，国际军事冲突是最主要、最常见、最活跃的冲突形式，特别是大国往往把军事力量用于国际体系的平衡。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来源于经济、文化的“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软权力”一般被认为包括价值标准、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法制与文明。美国把它具体化为自由、民主与人权，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法制，西方文化与宗教。“软权力”通过国际社会的全面沟通、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国际文化交流发挥其潜移默化的重大作用。“软权力”是“硬权力”的延伸和补充，两者是互补的。

在冲突方式的包容上，国际冲突历来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即排斥合作与之并存。然而，在当代，纯粹的国际冲突越来越少，国际冲突越来越具有兼容性，并不排斥合作，不仅与竞争而且与合作并存。

（3）冲突的频率与时间发生变化。当代，投入国际冲突的角色大为增加，国际冲突具有全球性、广泛性、联动性，国际冲突重点的转移使得各行为主体都能参与冲突，从两极到多极，旧的超级大国的控制力逐步弱化，新的控制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各国都有了一定的实力，而长期

被压抑的矛盾不断爆发，加之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越来越凸显，因此，国际冲突频率明显增加。

但国际冲突的时间性即延续性，却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军事冲突的时间逐渐缩短，这是由于武器性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破坏力空前提高，战争消耗量迅速增加，战争承受力下降所致。非军事冲突则呈相反趋势，用非军事手段来调节和解决非军事冲突，加上冲突的联动性增强，多边介入，都延长了冲突时间，使国际冲突长期延续。

（4）冲突呈现潜在危险性与可控性的两重性。当代是核时代，大规模国际冲突有可能毁灭全球，相互依存的深化使国际冲突产生了连锁反应，在全球的社会与生态问题上的冲突倾向预示了可能的毁灭前景，这些都说明当代国际冲突具有巨大的潜在危险性。但是，这种可怕的前景正在使绝大多数国家保持清醒头脑，此外，冷战后全局的对抗强度和危险性有所下降，单靠国际冲突升级来获取利益已不大现实，国家间相互沟通，不断深化的相互依存的正面效应持续强化，国际社会正在寻求建立控制冲突的机制，使大规模、高烈度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下降，保险系数相应增大，具有某种可控性。

2. 国际冲突的类型

人们一般根据国际冲突的烈度来对国际冲突加以分类：

（1）语言象征性冲突。只停留在语言、文字等象征性方式上，应用的手段包括外交文书、传播媒介、谈判用词等。没有其他冲突行动，属最低层次的国际冲突，通常不含有明确的对抗性或不可调整的利益，危害性不大，一般均可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妥善解决。

（2）一般性冲突。已有了实际行动，但可控性较大，双方一般都会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3）对抗性冲突。往往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对立，具有升级为危机的潜在可能性。

（4）国际危机。通常指国际冲突不断激化，恶性发展，陷于严重对抗，特别是军事对抗的状态。这是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或恶性状态。此时，冲突各方大致已作好摊牌甚至战争的心理与物质准备。因此，人们习惯于把国际危机视为摊牌甚至通向战争的最后一个

阶梯或临界状态。

国际危机一般具有三个要素：威胁到冲突方的基本利益与价值，即严重性；作出反应的时间十分有限，从而产生紧迫感，决策者必须在短时间内作出重大抉择，即时限性；卷入敌对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突然骤增，即突然性。

国际危机的动态过程可以划分为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三个阶段：危机前期、危机高潮和危机后期。在危机前期，冲突各方间的关系开始扭曲，但紧张程度较低。如果冲突各方轮番采用强制性策略，紧张程度迅速提高，就会将危机推入高潮。一旦危机步入转折点，即进入后期的解决阶段。

（5）国际战争。这是烈度最高的国际冲突。当冲突的一方或各方认为除了给予对方军事打击外，无法维护自身的价值和重要国家利益，于是各方调动一切战争资源进行战争。自古以来，战争就是国家为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斗争的最高形式。由于战争是国家实力的直接交锋，其结果必然造成国际力量的变化，从而改变局部或整体格局。上述五种国际冲突，其烈度逐步递增，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升级或降级。

3. 国际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影响国际冲突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有：

（1）国际冲突的参加者身份和参加方式。就参加者的身份来讲，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角色，它们的实力以及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均有各自的特点，不同的参加者对国际冲突有不同影响。就参加冲突的方式来讲，有直接参加者与间接参加者。直接参加者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在冲突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处于直接对立状态，但是，哪怕只是与一个直接参加者结束对立状态，也意味着从一种冲突状态转入另一种冲突状态。间接参加者一般站在冲突的一方，参与的程度可高可低，参与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根据需要而改变，可以在冲突的任何阶段加入或退出，也可以随着形势的变化改变同盟者身份。当间接参加者扩大参与直至直接参与时，间接参加者就转化为直接参加者，这往往会使冲突面目全非。

（2）国际冲突参加者的实力、手段与谋略。在参加者的实力方面，

国际冲突是当事各方综合力量的抗衡，其发展和结局基本上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对比。作为国际冲突结构性因素的实力，其运用是否具有广泛性、稳定性、足够性和可靠性，对冲突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在参加者的手段方面，国际冲突是多种形式、多种表现的社会过程，有高、中、低三种烈度之分，在这些具有不同特点的发展阶段或表现形态上，冲突各方可以采取不同的手段。

第一种手段是报酬性手段。以许诺或施惠交换对方放弃某些争执目标。许诺是一方许以好处，使对方改变对结果的评价。它可由条约、协定明文规定，也可仅仅是君子协定。但许诺必须具有可信性，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欺骗则难以奏效。许诺是一种承诺，而施惠却当场兑现。它往往产生对等效应，即一方给予好处，就可从对方获得相应的回报。报酬性策略与手段的成功运用，取决于冲突的性质和重要性、冲突的发展阶段、双方的力量对比与新近关系的状况。

第二种手段是强制性手段。即以威胁或实际使用强制性手段，预示或实际给对方造成损失和痛苦，来影响对方的决策过程，迫使其修改或放弃原定的冲突目标。威胁与许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威胁预示一种坏的结果，一种惩罚，即要将事态的发展导向对方不愿意接受的方向和程度。威胁的方式有声明、信息的秘密传递、显示武力等。由于它往往可以预示结果而不用将结果变为现实来达到目的，所以常被使用。它同许诺一样，只有在威胁者具有相当实力，威胁具有可信性时，才能奏效。制裁或使用武力，既可用来讨价还价，也可用以造成既成事实。

第三种手段是谈判与协调的手段。冲突各方同意“得大于失”的谈判与协调手段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好途径。它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基本手段，能使冲突各方就其利益冲突进行沟通和协调，发挥创造性的构思，提出既能满足己方利益又使对方不难作出抉择的方案，以达成协议的方式得到各自最为需要的东西或维护各自根本的利益。通过此途径，双方最终都能有所得，建立起某种共同利益基础，避免因一方得利另一方失利而导致冲突久拖不决甚至恶化。

冲突各方采取何种手段，对国际冲突的进程有重大影响，会导致不同的结局。

在参加者的谋略方面，国际冲突不仅是力量与手段的抗衡，也是智慧的较量。力量相对弱小、手段选择有限的角色，如果选择了正确的谋略，可以最大限度增进自己的利益；相对强大的、有多种选择手段的角色，如果谋略失当，也难免遭受挫折和失败。力量接近的冲突各方，谋略就更重要。谋略即参加者对付冲突的方法和策略的选择。高明的谋略要求充分估计冲突各方可能的选择和后果，在此基础上寻求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

博弈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决策分析方法，也被当作指导国际冲突和对冲突结局进行估价的一种特殊手段。“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是博弈论描述博弈结局的两个重要概念。

“零和博弈”，或称“零和游戏”、“零和对策”，是指参与博弈的结果，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的博弈情形。在“零和博弈”中。双方选择的随机性强，偶然性大，得与失的可能性相当。它只是在冲突极端尖锐、双方处于绝对对立的情况下和你死我活的敌对位置上才会发生，属于限制性的纯冲突，不存在合作的可能。这种情况在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中已经较为少见。

“非零和博弈”也称“非零和游戏”、“非零和对策”，与零和博弈相对，是指参与博弈的结果，一方所得并不意味着另一方所失，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的博弈情形。在典型的博弈模型“小鸡游戏”与“囚犯困境”中就描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第三方或更多的角色加入，会造成更为复杂的局面，主要涉及如何合理分配所得之利或分摊损失。若能遵从公认的行为准则，则合力以求最大利益，否则联合解体，合作一方叛离，另一方会遭受重大损失。“非零和对策”是在国际冲突中常用的对策方式。它说明在大多数国际冲突中，冲突各方是有限敌对，既有冲突因素，又有相互依存因素；既包括利益分歧，又包含利益一致；既隐真示假，又维护可信性。因此，保持彼此间的沟通极其重要。及时地沟通，准确而清晰地传递信息，使冲突各方认识到他们行为的相互关联性，能理智地抓住各方利益和期望的某种一致性，以让步换取让步，以妥协求得妥协，取得对各方都有利的结果，避免冲突升级、失

控与两败俱伤，于是往往选择谈判的道路。实际上，大部分国际冲突都可能具有或可以转变为“正和对策”的性质，即冲突各方均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获益，出现其和大于零的积极结果。

（3）参加者的利益、目标和价值观。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决定了冲突各方的行为原则、精神、心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国际冲突直接参加者在价值、利益和目标方面的直接对立酿成了冲突，这种冲突可以由于一方得到满足，另一方完全失去而告终，或者通过妥协使冲突暂时消失，这都会留下冲突重复出现的很大的概率。间接参加者的价值观、利益和目标，也对冲突过程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可以改变冲突本身，可以使冲突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同时，间接参加者在价值、利益和目标方面往往与直接参加者不完全一致，它们主要关心自己的目的能否达到，并不十分在意冲突是否得到彻底解决或如何解决。

（4）冲突的紧张度。它表明冲突各方间的对立程度，即国际冲突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这种紧张度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如在政治领域，可由发言、声明的频率，措辞的强硬程度，大众传播媒介方面的激烈程度来表示，还包括采取何种政治行动。在军事领域表现得更明显：军备程度、战备级数、经济转入战时体制的程度、军事调动与部署、民防等。对冲突的紧张度可作定性和定量分析，而人们常凭直觉作出自己的判断。

（5）地理因素。包括有关各方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气候类型、地域的军事战略意义与经济贸易意义。

4. 国际冲突管理

国际冲突管理是指在冲突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处理冲突的方式和办法。

在国际冲突酝酿阶段，冲突管理的目标是防止酿成目标不相容的形势，以避免冲突升级。避免冲突的基本策略是，增加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等稀缺资源的供给，采取较为公平合理的分配与竞争原则，并设法抑制对稀缺资源的过度需求和竞争。

在国际冲突的初始阶段，冲突管理的目标一是防止恶性的冲突行

为，二是将冲突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前者是所谓冲突压制，即通过减少或控制冲突资源，依靠合法的强制性武力制裁或威慑，有权威或有实力的第三方的介入，来达到阻止恶性冲突行为发生的目的。如限制保留武器的种类与数量、裁军、武器禁运、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等。后者是冲突调整，即调整冲突行为，使之在由国际法、国际行为规范等组成的国际冲突规则的约束下发生。还可以动员国际舆论压力，运用国际协商机制来化解矛盾。如规定冲突性质，给各方公平机会，监视整个过程以防犯规或使用不正当的武器或战术，限制时间和地点等。

在国际冲突的全面展开阶段，冲突管理的目标是解决冲突或彻底消除冲突。冲突的解决的目的在于改变冲突行为，如用强制力制止暴力冲突，或迫使双方暂时停火，进而通过直接、间接谈判或国际调解，使冲突妥善解决，但冲突根源并不一定消除，在一定条件下，冲突还可能反复发生。冲突消除则不仅要制止冲突行为，还要彻底消除冲突根源。要寻求使双方均感满意的方案，从而消除冲突，是十分困难的。大多数国际冲突往往是得到解决而不是彻底消除。

在国际冲突管理中，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国际危机管理。由于国际危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了防止因其失控而导致战争或其他灾难性后果，人们常常对国际危机进行控制和调节，这种控制和调节，就是国际危机管理。

国际危机管理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冲突各方优先考虑的政治目标是避免摊牌与战争，都愿为此接受政治解决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是为战争寻找理由的国际危机，其结果一般来说是战争。如果是涉及冲突各方根本利益的国际危机，也难以管理，容易走向灾难性结局。

国际危机管理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第三方积极介入与调停，甚至进行强制性干预，使危机缓解或解决。二是冲突各方对危机的处理与控制。这种处理和控制的基本原则是：保持沟通以传递具体而明确的信息；确定切实可行的有限目标；以利益冲突代替原则冲突；灵活反应，逐步升级，适当克制；分解冲突和分散危机事态；为双方保全面子，通过谈判探求妥协方案。

就国际危机管理的工作内容来说，主要包括危机预测与预警，制订

应急计划，成立高层危机决策小组与相应的工作机构，以及配置专门资源，实施正确的危机决策。

第四节　综合国力

一、综合国力的含义和构成

综合国力是指一国所拥有的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全部实力的有机综合，它包括已有实力，也包含潜力及其转化为实力的机制。它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自由度和影响力，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重要尺度，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与此相近似的概念有国家的力量、实力、权力、能力、潜力、影响力等。

综合国力是由多种基本要素构成的，这些基本要素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一定的功能、一定的关联性。不同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美国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综合国力主要取决于九项要素：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资源状况、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法国国际政治学者雷蒙·阿隆把它归纳为国家所拥有的空间、资源和行动能力三大要素。日本学者强调综合国力的三个侧面：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也有人认为是构成一个国家的能力和潜力的综合力量，包括政治、经济、技术、社会、科学和地理力量。苏联学者则强调它“由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构成，是军事潜力、经济潜力、精神—政治潜力及科学潜力的总和”。

由此可见，综合国力可以被分解成许多具体和抽象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可以归为两大类：可计量的物质要素与难以计量的精神要素。综合国力是质与量的统一，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统一。它的构成及其发展变化，是这些要素的有机组合以达到整体效应的最优化。

1. 物质力量

物质力量往往是有形存在、可量化和可测定的力量，它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1）人口和地理条件是两大基本要素，是综合国力的源泉。一个

国家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包括占合理比例的劳动力，才能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产生一定的文化影响。当然，人口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只有在它具有合理的数量、结构与增长率，具有较高的质量，并与领土面积、经济力与资源等成合理比例、呈合理分布时，才能成为综合国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反之，则会削弱综合国力。地理因素包括领土领海、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特征、土地肥力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发挥综合作用，它们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综合国力有着重大影响，但是，它们能否发挥最大的效能，取决于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2）经济和高科技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核心。经济实力一般包括工、农业生产能力，第三产业发展状况，资源的拥有、开发和利用状况，科技水平，参与国际经济的能力等，它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等指标来表示。

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石，决定着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外贸水平、军事力量的规模与水准、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生活水平与政局稳定、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分量。其中，特别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中最为活跃、作用日益突出的因素。它包括科技人才、科技水平以及科技的开发和应用能力。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军事实力的升级，都愈来愈取决于科技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科技的竞争。

（3）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中最古老却仍居于核心地位的要素，是综合国力的主要象征和集中体现，它包括军队及其武器数量与质量、军队迅速部署的机动能力、军事科研与生产的能力与水平。在综合国力中，军事实力不像有的要素那样，必须通过某种转换过程才能投入使用，它可以直接投入应用，而且带有暴力与强制的独特性，用以适应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军事实力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和国际冲突的最终解决手段，是国家自保和推进国家利益的后盾。

2. 精神力量

精神力量往往是无形存在、难以量化与测定的力量，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国民素质、意志和士气，人心向背，民族的精神，社会的凝聚力，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要素。

（2）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是否富有生命力，是否能凝聚民心和国力，也是综合国力一大要素。

（3）政府素质及其运行的质量对于综合国力具有深刻影响。它取决于政府体制与效率，国家领导人的素质和权威，以及领导、组织、管理、决策和动员的能力等，这涉及一国能否充分、合理、有组织地调动本国的一切资源，能否迅速、准确地对国际事件作出反应，能否在争取国家利益方面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效。

（4）国家战略目标的明确性、合理性和可能性，以及国家贯彻战略目标的意志的坚定性，是综合国力能否有目的地、充分地发挥作用，以及获得国民支持的关键。

（5）文化因素愈来愈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具有民族特性，表现为特定的语言、传统、意识、伦理、性格、宗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这是决定民族国家凝聚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并赋予国家对外行为以民族特色，它作为一种精神因素，也会对综合国力产生极大的正负效应。

综合国力具有多元性、关联性、综合性和整体性。因此，要发展综合国力，必须从它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强调各要素的高度协调，建立合理的结构，以便取得整体功能的最优化效果。

综合国力还具有动态性和层次性。所谓动态性，是指综合国力的结构、要素及其联动、特点均处在不断的变动中，这是由国家及国际环境加速发展变化的动态特性所决定的。

构成综合国力的各要素是分层次的。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属于最高层次。它们的组成要素处于第二层次，以此类推，有更多的层次。分析综合国力要素的层次性，是为了明确各要素在综合国力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层次要素的作用，并按轻重缓急、适当比例和先后主次，合理发展综合国力。在一般情况下，物质力量起决

定作用，但这并不排斥精神力量的重要作用，有时甚至表现为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从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

二、综合国力的评估与比较分析

综合国力的评估与比较分析，可以从数量、质量、结构、特点等方面来进行，一般都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物质力量采用量化指标，对精神力量则采取专家评分法，从综合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和比较分析。

不少学者试图把综合国力诸要素化为数量指标，用数学方程来表达综合国力，以便于评估以及进行比较研究。

综合国力的测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莱伊·克莱因在《世界权力的评价：战略动力的估算》一书中提出了国力方程，即著名的克莱因公式：$P_p = (C + E + M) \times (S + W)$，其中 P_p 为确认的权力（国力），由物质要素（C + E + M）和精神要素（S +W）组成。物质要素包括近 50 个指标，其中 C 代表基本实体，人口和领土各占一半；E 代表经济能力，GNP 占一半，另一半由能源、关键性非燃料矿物、工业生产能力、粮食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所组成；M 代表军事能力，核力量和常规军力各占一半。在精神要素中，S 代表战略意图，W 代表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S + W 为系数，标准值为 1 。克莱因使用 1978 年数据，采用综合评分方式，对 77 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评估。

（2）威廉·富克斯根据常用的自然科学方法，把基本变量简化为人口、钢产量和能源产量三个指标，以外推法的派生公式为基础，建立起他的强国公式，预测某年国力指数变化的方程为：国力指数 = 1/2（钢指数+能源指数）。富克斯据此对主要国家的国力进行了计算，提出中国将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 1978 年出版的《明天的帝国》一书中，他修改了原先的部分预测，论证了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言。

（3）考克斯和杰考伯逊选取 GNP、人均 GNP、人口、核能力和国际

威望等5项指标，J. P. 考尔选取领土（面积）、人口、钢消费量、标准能源消费量、GNP和总军事力量等6项指标，分别使用特定年份的资料对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测算。

（4）日本综合研究所根据国际贡献力、生存力和强制力三大能力及15个构成要素，覆盖约100个指标，使用“专家调查法”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计算和预测。

（5）中国军事科学院黄硕风运用系统论、动力学和协同学的原理，提出综合国力是生存力、发展力与协调力的有机结合，并设计了综合国力动态方程，它由一个非线形的微分方程为主方程和30多个子方程所组成，约涵盖150个指标，其中硬件（物质要素）指数化，软件（精神和智能要素）专家评分法，协调系数（国家领导协调统一等要素）是加权系数，用专家评分法，使用了1986年的数据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测算。

上述测算综合国力的方法与模式不尽相同，但其结果以各国位次排序来看，基本上接近实际，在20世纪90年代前，美、苏、日、中、西德等国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尾随其后的是英、法、澳、巴西、印度等国。进入90年代后，取代苏联的俄罗斯实力大大下降，中国在加速发展，德国因统一而大大增强发展潜力。美国和日本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测试模式及其计算，大都考虑到物质和精神的力量，对两者都作了量化的努力，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1）在综合国力中起作用的因素难以全部、准确估计到，这涉及量化指标的有限性、准确性。

（2）每个国家的特殊因素，尤其是社会政治内容难以体现。

（3）综合国力的结构、各构成要素的关联性往往被忽视。

（4）评价体系、取量标准因人而异，有主观随意性，极易失之偏颇，特别是精神因素很难找到客观而统一的标准，往往取决于评价者的主观偏好或臆断。

对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静态的量的判别上，还必须注意到：

（1）不仅要看综合国力的大小，还要看这种力量的结构、特点及其

优化组合、统一协调，在何种情势和环境下显露其优劣。

（2）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体系的作用。由于综合国力是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体现其意义，所以，世界形势、国际环境、多边或双边关系状况、其他力量的干预，都制约着一国的综合国力。一国获得国际支持或遭到反对，会使该国综合国力在实际发挥作用时发生增减，从而直接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和最终结果。国际关系体系的这种影响力可以是政治、外交、道义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两者兼而有之的。

（3）综合国力具有动态性，从而引起国际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动中，所以应该以动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各国综合国力及其变化，以及促成这种变化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及时地把握各国综合国力及其对比。

三、综合国力对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意义

综合国力作为国际政治基本行为主体的主权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对国家的行为、地位和作用以及国际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

1. 综合国力的正确评估与比较分析，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

在当代，各国更加重视综合国力及其国际对比在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任何国家要正确制定对外战略，必须做到两个适应：（1）必须与综合国力相适应，（2）必须与国际力量对比相适应。

2. 综合国力提供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要求的基础和手段

一国的强弱兴衰和国际地位的升降，取决于它的实际综合国力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对其他行为主体决策的影响力，所拥有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手段与途径的强弱多寡及其影响范围、领域与程度。一个国家要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依靠不断发展、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而正确分析把握形势，采取正确的策略方法，只能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进行。

3. 综合国力决定国际政治格局

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基本上决定了国际关系的结构，尤其是国际战略格局，也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和状

态及其发展趋势。

思考题

1. 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国家必须具备哪些要素？
2. 为什么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基本行为主体？
3. 试分析国家主权的内涵及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遇到的挑战。
4. 试述国家利益的内涵及其两重性。
5. 试论当代国际合作的新特点与新问题。
6. 试论当代国际冲突的新特点与新问题。
7. 试述综合国力的内涵及其分析评估。

第四章　国际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主体

非国家行为主体是指除国家以外的能独立参加国际事务并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实体。自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民族国家始终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甚至在早期是唯一的行为主体。但是，随着国际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主体逐渐在国际关系中显露头角，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国家行为主体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国家行为主体仍然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但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正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其发展和影响不可忽视。

第一节　国际组织

一、国际组织的含义及其特征

国际组织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国际组织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其政府、民间团体或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以一定的协议形式所形成的常设性机构。它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 Governmen-

tal Organization，简称 IGO）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 INGO）。狭义上的国际组织则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即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府为达到某种目的，以一定的协议形式所形成的常设性机构。本节使用狭义上的国际组织概念。国际组织是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

这一特征至少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国际组织的主要参加者是国家，而不是某些非独立国家的政治实体或地区、各国的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其次，国际组织是国家之间的组织，不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不能违反国家主权原则去干涉那些本质上属于成员国国内管辖的事务。从根本上说，国际组织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其成员国的授权。

2. 依据成员国之间的正式协议而创立

此种协议一般规定了该组织的目的、宗旨、结构及运行机制，构成该组织活动的法律基础，实际上等同于该组织的宪法。因此，国际组织的活动不得超越其协议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否则就是非法和无效的。

3. 设有常设机构

常设机构的设置确保了国际组织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与国际会议的区别所在。

4. 具有国家间高度合作的职能

国际组织存在的本身即说明了国家间寻求合作的意愿，同时也是国家间合作的表现。国际组织的基本宗旨就是通过与各成员国政府打交道，鼓励与促进成员国之间在政策方面的协调。国际组织的发展并不是要破坏现存的民族国家体系，而是要使现存体系运转更加灵活、高效。

二、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评价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历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对国际组织持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国际组织是正在形成的世界政府的先锋，正在建构新的世界政治体系；也有人则极力贬低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徒具虚名，毫无作

用。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应该是，在民族国家体系内，主权国家是最基本的政治单位，拥有最大的权力和权威。而国际组织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主权国家不能取代的。但是，国际组织毕竟不是国家实体，不具备国家的属性，不是主权拥有者，不拥有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的物质前提，如领土、军队等。因此，与主权国家相比，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是有限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组织无法取代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

从国际组织涉及的领域来看，国际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防止和制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历来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同样也是普遍性国际组织的首要目标。以联合国为例，联合国为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举世公认的作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世界总体和平得以保持，其中原因很多，但联合国的出现及其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战后曾一度出现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被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操纵，犯了不少错误。但是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壮大，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逐步得到贯彻和落实。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于联合国的努力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古巴导弹危机得以化解，避免了一场核大战。进入 80 年代以来，联合国在两伊战争、阿富汗、柬埔寨、纳米比亚等冲突地区成功地进行了干预。尤其在海湾战争中，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 12 项对伊拉克的决议，展现了联合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次最大决心，有效地遏制了侵略，维护了中东地区的和平。进入 21 世纪以后，由于美国对外政策中单边主义倾向的发展，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在国际安全维护领域的活动受到干扰。2003 年美英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对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构成严重挑战。

第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客观上必然形成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

国际经济组织便应运而生。二战刚刚结束，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便脱颖而出，至1951年国际经济组织已达123个。进入六七十年代，国际经济组织发展极其迅速，据统计，目前全世界3 000个经济组织中，80%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在当今的国际经济舞台上，活跃着一批强有力的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它们在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推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改善南北关系、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有关国家提供了数目庞大的贷款，其作用十分关键。

第三，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上，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可替代。自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出现。二战以后，人口问题、全球性环境危机、能源危机、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世界粮食问题、难民问题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们的跨国性，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国家间的合作。这就为国际组织发挥其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环境问题为例，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错误，将自然作为征服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衡，遭到自然的疯狂报复。二战以后，环境问题日趋全球化，气候变暖、酸雨问题、滥伐森林、水资源短缺、臭氧层耗竭、海洋污染、沙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环境问题空前严重，人类面临着生存还是灭亡的重大抉择。在此关键时刻，联合国毅然承担起拯救地球的使命。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主持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将环境问题提上国际政治的议程。随后，联合国成立了环境规划署，作为协调各国环境行动的中心。在联合国组织下，国际社会签署了大量重要的国际环境协定，如《保护臭氧层蒙特利尔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塞尔公约》等，为保护世界环境作出重要贡献。1992年，联合国又主持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世界环境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召开了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强调当务之急是认真贯彻落实《21世纪议程》的内

容，可持续发展重在行动。总之，联合国在世界环境与发展事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在促进社会进步、保障人权方面功不可没。促进社会发展、保障人权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联合国及众多有关社会、文化和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组织所追求的目标。战后至今，联合国所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宣言和公约近70个，其中以《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最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联合国人权原则的基本框架，已成为当今世界保障人权的锐利武器。

综上所述，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际组织的作用都是积极的，在历史上，一些军事、政治组织的出现，加剧了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紧张，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三、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间组织，古已有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或合纵或联横，形成不同形式的同盟关系。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军事性质的正式组织。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的产生却是近代的事情。它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以国际关系的演进为依托，同时也构成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特征。国际组织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19世纪是国际组织的形成时期。国际组织的产生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因为一个国家是不能形成国际组织的；二是存在国家间多边交往的需求和愿望，因为虽然有众多的民族国家存在，但若它们之间并无交往与合作的需求，仍然不能产生国际组织。这两个条件到19世纪逐渐成熟。1648年，为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而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揭开了国际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会议确认了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为数众多的邦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标志着民族国家体系开始出现，也开创了国家间通过大规模国际会议的形式来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先例。但在18世纪下半叶以前，欧洲国家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主要由几个大王朝统

治者的利益所决定。它们之间的交往主要涉及军事联盟或王朝联盟的组成。这一时期欧洲大国间也举行过不少国际会议，但多是以结束战争为目的。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欧洲国家间交往与合作的范围与程度都相当有限。18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关系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工业革命造成生产力的极大飞跃。当时，由于蒸汽机和钢铁工业的发明和发展，交通运输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水路与陆路交通变得空前便利。由于电报机的出现，邮政与电信事业也日趋发达。技术革命使地球的空间距离大为缩小，直接导致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超越国界的经济、航运以及通讯领域的活动越来越多，从而产生了国际协调的需要。二是由于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各国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殖民地的斗争十分激烈，欧洲国家间的战争愈加频繁，战争的规模和破坏程度越来越大，需要各国通过共同商讨来解决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19世纪以后，国际合作出现了两股新的潮流，其一是政府间国际会议的不断发展，使国际会议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基本程序，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欧洲协调”和海牙体系；其二是国际行政联盟的产生。在这两大潮流中，国际组织得以孕育。

所谓欧洲协调，是指以会议外交方式处理欧洲或与欧洲有关事务的一种定期、多边及高层的协商制度。“协调”一词，来自英、俄、普、奥四国先后于1814年3月签订的肖蒙条约和1815年11月签订的四国同盟条约的条文之中。欧洲协调始于维也纳会议。在1814年10月至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与会国签署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以条约形式恢复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封建旧秩序和确立英、俄、普、奥四强主宰欧洲事务的格局。1815年末英、俄、普、奥签署四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将定期举行会议，协调一致，维持欧洲和平。欧洲协调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这种定期协商制度对国际组织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特点是：第一，欧洲协调涉及的领域和范围非常广泛。与过去一般的停战善后会议不同，欧洲协调的目的在于调整欧洲国际关系的各个方

面，包括政治、经济、宗教、航运、少数民族等问题。第二，大国处于特殊的霸主地位，欧洲协调实际上是大国协调。第三，创立了比较稳定的多边外交体制，积累和提供了多边条约的技术，并在多边外交会议的技巧方面有所创新。历史上的外交方式主要是双边接触，而到欧洲协调时期，则规定“定期举行会议”，使多边外交成为一种较稳定的制度。事实上，维也纳会议的《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是第一个以多边形式表达的条约。多边条约形式被迅速运用到集体和平解决争端和其他领域，并为后来国际组织的创立提供了法律手段。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大型国际会议中，形成了许多新议事规则，逐步完善了多边外交会议的活动程序，有助于以后国际组织的运作。

海牙体系是指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和会在发展国际法、寻求减少战争伤害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随之形成的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海牙体系是欧洲协调的延伸和扩展，是迈向现代国际组织的重要一步。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两次海牙和会的发起人。由于俄国在19世纪末的第一次军备竞赛中力不从心，为寻找喘息的机会，尼古拉二世首先倡议召开国际会议，口号是裁减军备，维护和平。两次海牙和会在裁军问题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但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取得了相当成绩，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海牙体系对国际组织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其特点是：第一，与会国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与会国突破了欧洲的界限，扩展到全世界，首次具有世界性的特征。第一次会议有26个国家参加，包括亚洲4国、美洲2国、欧洲20国。第二次会议有44国，其中欧洲21国、美洲19国、亚洲4国，欧洲以外的国家数目首次超过欧洲国家，体现了会议的普遍性和广泛性。第二，海牙会议开始确立起国家平等的原则，与会国一国一票，拥有平等的投票权。虽然中小国家实际上仍受到大国的控制，但至少名义上是平等的。第三，最早关心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海牙会议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召开的，并非为处理某一特定战争问题所引起的问题而召开。会议概括而抽象地订立了一些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中所规定的和解、调查、仲裁通则及国际调查委员会与常设仲裁法院等，对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和机关均有重要意义。

第四，改进了会议技巧。如首创唱名表决的方式，并在全体一致的表决原则基础上，产生了“准一致”的表决原则，即不计算弃权票的一致原则。这实际上是向多数原则转变的开始。第五，尝试建立常设制度。海牙和会曾决定每隔七八年即举行类似海牙和会的大会，并拟设立筹备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落空，但海牙体系的实践与理想仍然对国际组织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际行政联盟是指以专门从事行政性和技术性的国际协作为职能的国际组织。国际行政联盟是为了适应近代欧洲经济、社会、文化密切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1815 年成立的莱茵河委员会是此类组织最早的代表，其次有 1856 年的多瑙河委员会、1865 年的国际电报联盟和 1874 年的万国邮政联盟等。此后，一大批关于农业、版权、度量衡制度、公共卫生、商标等方面的行政性国际组织宣告成立。在国际组织的发展史上，国际行政联盟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第一，促进了政府间的合作。国际行政联盟涉及非政治领域的几乎所有内容，因此成为各国情报收集、交换的场所，政府间讨论问题的论坛和协调国家政策及行动的中心。各国通过在国际行政联盟的交往与合作，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相互信任，进一步推动了政府间的合作。第二，在组织结构方面有重大创新。国际行政联盟首创常设机关——国际事务局，使国际会议制度化，保证了国际组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国际事务局的出现，是国际组织演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成为现代国际组织中秘书处的前身。与此同等重要的另一创举，是国际行政联盟首次将决策的大会和作为执行机构的理事会分设为两个机关。前者由全体会员国代表组成，集会时间较长；后者由当选的少数会员国的代表组成，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大会执行政策。这样，事务局、理事会和大会几经演变，构成了国际组织的基本蓝图和框架。第三，专家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事务过去一直为职业外交官所垄断，但到了国际行政联盟时期，各种专门人才、技术人员等开始涉足国际事务，国际舞台上出现了新的气象。第四，会议技巧进一步改进。国际行政联盟改进了各种程序规则，创立了多边条约的形式，并对国际会议的语言、文字、内部组织等许多繁杂事项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国际组织兴起的势头相呼应，世界上第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于19世纪末在美洲大陆诞生。1889年10月至1890年4月，美国同拉美17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创立了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国家商务局。1948年改名为美洲国家组织。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为以后的国际组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综上所述，在民族国家体系日臻成熟的19世纪，伴随着国家间交往的需求和愿望日趋强烈，国际组织呼之欲出。在经历了欧洲协调的百年洗礼、海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国际行政联盟的一系列创举之后，国际组织终于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同时也为20世纪国际组织的兴盛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20世纪是国际组织大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一是国际联盟的成立，二是联合国的创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大战历时4年，席卷欧亚非三洲，死伤人数在5 0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近1 800多亿美元。战争的空前惨烈使人类通过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组织以避免世界大战重演的要求十分迫切。1919年由战胜的协约国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1920年国际联盟宣告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是国际组织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国际联盟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主要宗旨，同时兼顾促进国际合作。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包括大会、行政院、秘书处和常设国际法院。国联最多时拥有59个成员国。国际联盟在其第一个十年中，在解决国际争端，化解危机方面曾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后来当一些违反盟约的事件发生时，国联由于其严重的缺陷未能采取有效行动予以制止，最终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国际联盟的寿终正寝。1946年国际联盟宣告解散，所有资产由联合国接收。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1945年6月，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1945年10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联合国现有192个会员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自成立以来，联合国虽历经坎坷，但一

直发挥着其他国际组织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联合国是历史上所有国际组织的经验与成就的集大成者，是迄今为止国际组织发展的最高峰。

与19世纪国际组织发展缓慢的历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组织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国际关系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特点是：

第一，国际组织的数量呈现爆炸性的增长。这一切是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所致。东西方对峙的两极格局是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战后初期就很快出现了一批建立在东西方对抗与意识形态冲突基础上的区域性军事、政治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等。新兴独立国家的急剧增加和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战后国际关系的头等大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宣告独立，新独立的国家数目之多，已大大超过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一半。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组成了数目庞大、种类繁多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战后国际关系的另一重大变化是新的科技革命使地球的空间距离日益缩小，出现了“地球村”的概念，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加深，全球化进程加快，加强国际协调与管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迫切，从而导致了国际性的科学、技术及行政机构大量产生。目前世界上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已逾4 000个，重要的有500个左右。其中90%以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因此，有人将19世纪称为“国际会议的世纪”，而20世纪则被冠之以“国际组织的世纪”。

第二，国际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极其广泛，包罗万象。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当代国际组织体系，涵盖了全球的各个角落，其活动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全球政治军事，下至百姓的衣食住行，国际组织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第三，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体系。国际组织的不断涌现使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十分重要。为适应这一形势，联合国宪章特别规定，联合国应成为一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因此，现代国际组织体系又被称为“联合国体系”。实践表明，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联合国体系的运行状况是基本正常和良好的。

四、国际组织的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各组织之间范围不同、宗旨各异，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也不尽相同。为研究方便，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

1. 依据国际组织的宗旨和职能来划分，可分为一般性（或综合性）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组织。一般性国际组织的宗旨和权限范围较为广泛，涉及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关系到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经济、福利的发展等基本方面。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此类组织的代表。专门性国际组织的宗旨和权限则有特定的专门限制，是以某种专业技术活动为主的组织，如国际电讯联盟、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

2. 依据国际组织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可分为世界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

世界性国际组织的成员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向一切国家开放。当然，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并不一定包括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国联和联合国均属于这类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和活动范围仅限于某一特定区域，有明确的地理条件限制，如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有些区域性组织并非严格按照地区组成。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包括了处于地中海的希腊。

3. 依据国际组织的构成来划分，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国家或政府为组成单位，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是民间团体和个人。两者在国际法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主体，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则不是。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通常探讨的主要是政府间国际组织。但近年来，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呈现上升势头，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五、联合国

1. 联合国建立的经过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酝酿并着手建立的，是战时盟国互助合作和战后各国人民和平要求的产物。建立联合国的思想最

早见于1941年8月14日英、美两国首脑共同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之中，宪章希望世界终将能建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声明拥护《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约定以全力对轴心国作战，决不单独停战和单独媾和。《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显示盟国赞同要以建立“广泛而永久的国际安全制度”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宣言中第一次出现了“联合国家”一词，但当时并不是一个国际组织，而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各国的总称。联合国的名字即渊源于此。

1943年10月30日，中、苏、美、英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即莫斯科四国宣言），确定了战后建立普遍安全组织的共同方针和基本原则。四国宣言声明，“它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不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同年12月，苏、美、英三国签署的《德黑兰宣言》重申应成立这样的国际组织。四国宣言是建立联合国的关键性步骤，它所提出的建立新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的任务，按规定交由1944年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召开的会议去完成。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苏、美、英三国和中、美、英三国分别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这是为落实莫斯科四国宣言而筹建联合国所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根据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的精神，草拟了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并且提出了给即将成立的国际组织取名为“联合国”的建议。在这个建议案中，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等机构的组成和职权。在这次中、美、英举行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三项建议：明确表示在和平解决争议上，国际组织应该适当考虑正义和国际法，不应该只顾及政治的便利；大会应承担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的任务；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活动，应扩大到教育和其他文化合作。这三点建议先后为英、美、苏三国所赞同，并被1945年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所采纳，成为联合国宪章

的组成内容。

1944 年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促进联合国的成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联合国的成立做了很重要的工作，规划出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有关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问题和创始会员国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1945 年 2 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就上述两个问题达成了一致的协议，使之成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草案的组成部分，同时会议还决定由中、苏、美、英四国发起邀请有关国家在旧金山举行制宪会议。1945 年 3 月 5 日，由美国政府代表中、英、苏三国（法国因未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不愿做发起国，但同意参加会议）作为会议发起国，对有关国家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书。

1945 年 4 月 25 日，在旧金山召开了制宪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50 个国家（因波兰临时政府当时没有得到西方盟国承认，未被邀请出席会议，但同意它作创始会员国在宪章上签字）。与会代表讨论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制订的方案、雅尔塔协定以及各国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经过两个月的激烈的讨论和斗争，终于在 1945 年 6 月 25 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6 月 26 日，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在宪章上签了字。1945 年 10 月 24 日，经中、苏、美、法、英和其他多数签字国交存批准书，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宣布正式成立。后来联合国决定将 10 月 24 日这一天定名为“联合国日”，以资纪念。

2. 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由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和第一条及第二条加以规定。这三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宪章的总纲。宪章第一条详细载明了联合国的宗旨，它们是：

（1）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宪章第一条规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是联合国组织最主要的任务。为此目的，宪章规定了两个步骤：“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宪章序言中也规定，联合国“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并“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这就是说，对于国际间威胁和平的争端和情势，一定要采取和平的方法，通过协商加以解决。有关预防和制止破坏和平行为的集体措施以及解决争端的和平方法，在宪章的第七章和第六章中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和平与安全”是指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换言之，只有当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或破坏时，联合国才有责任予以干预。如果仅仅是一国内部的和平局势受到破坏，而且这种局势也并没有对国际和平构成影响或形成潜在的威胁，就应该视为一国的内政，联合国则不应介入。

（2）促进各国以人民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为基础的友好关系。

宪章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为了“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宪章序言中也规定，联合国人民决心重申“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依照上述的规定，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所愿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所有未获得独立的各个民族，都应当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实现它们的民族独立，谁都不得用强迫手段加以干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友好关系，才能够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3）促进国际间有关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合作。

宪章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联合国“应当促成国际合作，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国际合作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条件。为了国际间的和平与安全，不仅要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制止侵略行为以及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也需要进行有关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公共福利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

（4）为达成上述共同目的提供协调各国行动的场所。

宪章第一条第四款规定，联合国“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这里强调联合国应当成为协调一切国家的行动并使之进行协商和合作的重要场所。

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组织及其会员国必须遵守

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

（1）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

宪章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宪章序言中也承认了“大小各国平等权利”。宪章将这一原则列于各项原则之首，旨在强调其特殊重要性。国家不论大小，主权都是平等的。只有尊重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国际间的和平与安全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既有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意义，也起约束联合国行动的作用。

（2）善意履行宪章义务。

宪章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会员国为了保证全体会员国享有由于加入本组织而产生的权利和利益，应善意履行依照本宪章所承担的义务。条约义务必须遵守，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它与国家主权原则并不冲突，因为任何国际义务都只有在依国家主权原则自愿承担的情况下才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宪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会员国在依本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同依其他国际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发生冲突时，应依本宪章所承担的义务为优先义务。这就是所谓的“宪章优先原则”。

（3）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宪章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宪章不但规定会员国要通过和平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而且还规定安全理事会负有促进国际争端和平解决的责任。当这种争端已构成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行为时，安全理事会还有采取行动加以制止的权力。这里所指的和平方法，包括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利用区域机构或区域协定等。

（4）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所有会员国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一规定表明，宪章不仅在原则上采取禁止侵略战争的立场，而且进一步明确了一切武装干涉、进攻或占领以及相威胁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这一规定大大扩大了禁止的范围，使会员国的国际责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宪章无条件要求任何争端当事国以

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也从另一方面杜绝了任何使用武力的权利。但是，宪章并不否定会员国在一定条件下单独或集体使用武力的权利。按照宪章的规定，所谓“一定的条件”是指：只能在遭受武力攻击时进行自卫；自卫只能在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之前进行，而不能在其后。而且会员国必须将自卫措施立即报告安理会，自卫措施不能影响安理会的职权。

（5）集体协助。

宪章第二条第五款规定，所有会员国对联合国依照本宪章而采取的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国对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强制行动时，所有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这项规定中所说的防止或强制行动，只限于宪章第七章范围内所采取的行动。

（6）保证非会员国遵守宪章原则。

为了保证联合国组织的普遍性和广泛性，确保在世界范围内避免再次重演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宪章第二条第六款规定联合国应当保证非会员国也遵循本组织的原则。根据条约法的规定，条约不对第三方产生权利和义务，除非第三方明确表示接受。要求非会员国遵守宪章的原则，显然不是基于它们的同意。现在联合国已拥有 192 个会员国，除个别中立国外，几乎所有主权国家都已加入了联合国。因此，此款的作用已变得十分有限，但对最大限度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仍具有积极意义。

（7）不干涉内政。

宪章第二条第七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并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执行办法之适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引申，是联合国活动的一项重要原则。

3. 联合国会员国

根据宪章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分为创始会员国和接纳会员国两大类：第一类为创始会员国。凡参加旧金山会议，或在此之前签署过《联合国家宣言》，并签署和批准《联合国宪章》的国家，都

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创始会员国有51个。第二类为接纳的会员国。凡爱好和平的国家,接受宪章所载的义务,经联合国认为能够并愿意履行宪章义务的,均得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接纳新的会员国必须经安全理事会推荐,并经大会以2/3多数通过。提出申请的国家,大会接受申请之日起正式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截至2009年6月,联合国共有会员国192个。

对于联合国会员国权利的中止、恢复或开除会籍,联合国宪章都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五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业经安全理事会对其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得停止其会员权利及特权之行使。此项权利及特权之行使,得由安理会恢复之"。第六条规定,"联合国之会员国中,有屡次违反本宪章所载之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得将其由本组织除名"。不过,宪章中没有关于被开除的会员国重新加入本组织的规定。

对于会员国退出的问题,宪章中没有做出任何规定,在旧金山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得出共同的明确表示,即某一会员国如"由于特殊情况"而觉得非退出不可的话,联合国无意强迫它"继续在本组织内进行合作"。

4. 联合国的主要机构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条的规定,联合国设立六个主要机构,即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在这些主要机构下面,根据工作需要,还分别设有常设的、辅助的或临时的机构。

(1) 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

联合国大会由全体会员国派代表团组成,是联合国的主要审议机构。

联大会议每年在九月第三个星期二开幕。闭会日期无明文规定,但一般都在12月25日圣诞节以前结束。如议程还没有讨论完毕,可暂时休会,到第二年春天继续开会。联大除每年举行一届常会外,还可根据安全理事会或过半数会员国的请求,召集特别会议或紧急特别会议。

会员国向联合国总部派遣常驻代表团。常驻代表团设常驻代表、副代表、参赞、秘书等，负责处理有关联合国的经常性事务。常驻代表一般为会员国出席大会常会的首席代表和出席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代表。出席大会常会的代表团由正、副代表各五名组成，其中一人为团长。如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他们就是当然团长。代表团的顾问、专家和秘书人数不限。

联大每届会议在开幕的当天举行第一次全会。先由上届联大主席担任临时主席主持开幕式，选举新的主席、副主席和七个委员会主席，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九名委员。选出新的主席后，就由他来主持会议；若主席不能主持会议时，可委任一名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大会常会一般首先在全体会议上讨论决定会议的议程，各委员会分别讨论分配给该委员会的议题。一般辩论结束后，全会即讨论直接由全会处理的问题及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和决议草案。议程上的项目讨论完毕并作出决议和决定后，会议即告闭幕。

联大设主席 1 人，副主席 21 人。在每届会议上，大会选举主席、副主席及 7 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按照现行惯例，主席和副主席人选，是按亚洲小组、非洲小组、拉丁美洲小组、东欧小组、西欧和其他国家小组 5 个地区小组分配，由会员国轮流担任。安全理事会的 5 个常任理事国不担任主席，但可以当选为副主席。

每届常会，设 7 个主要委员会协助全体会议进行工作。其责任是一方面考虑大会所交付的事项，并给大会的全体会议准备建议及决议草案；另一方面，考虑专门机构和秘书长交予归它所管的有关报告。每个委员会由全体会员国派代表组成。这 7 个委员会是：

第一委员会，讨论政治和安全问题，包括调整军备问题。又称为政治及安全委员会。

第二委员会，讨论经济和财政问题。又称为经济及财政委员会。

第三委员会，讨论社会、人道和文化问题。又称为社会、人道及文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讨论托管问题和非自治领土问题。又称为托管委员会。

第五委员会，讨论联合国的行政和预算问题。又称为行政及预算委员会。

第六委员会，讨论法律问题。又称为法律委员会。

第七委员会，与第一委员会分工，讨论一些属于政治性而被认为比较次要的问题。又称特别政治委员会。

每届常会还设有两个重要的程序性质的委员会，即总务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总务委员会由大会主席、21 个副主席及 7 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组成。主要负责审议临时议程中的项目是否应列入议程和讨论的先后次序，并向全体会议提出建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由大会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任命 9 个成员国组成。负责审查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是否符合规定，并向全体会议提出报告。大会还设有两个常设委员会，即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会费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负有专门调查联合国预算的责任，并协助第五委员会工作，由按地域匀分原则选举的 9 名委员组成，其中两名是公认的财政专家。会费委员会由 7 名委员组成，按地域匀分原则产生，它的职责是根据会员交纳力量分配摊款数额，并向大会报告会费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此外，大会还设有几十个辅助的、临时的和有关的组织机构：如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联合国韩国统一和复兴委员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国家管辖之外和平利用海底和洋底委员会、裁军委员会、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等等。

大会常会每年会期只有三个月。平时设有特别委员会和各种机构进行经常工作。

联大是联合国的主要审议机构，按宪章的规定拥有广泛的权力。对于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问题，除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者外，均可由大会讨论，并向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审议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普遍原则，包括裁军和军备控制等，并提出有关这些原则的建议；研究促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接受并审议联合国各机构的报告，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理事国和托管理事会理事国；与安全理事会

共同选举国际法院法官;经安全理事会的推荐,批准接纳新会员国和任命秘书长;经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停止会员国会籍或开除会员国或恢复会员国会籍,讨论联合国的预算、决算和会员国的会费,等等。

从宪章对联大上述职权的规定可以看出,联大行使这些职权都属于政治性的,不具有立法权。它通过的决议只是建议性质,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不过对会员国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联大每个议题,会员国可单独或与其他会员国联合提出提案,要求给予讨论和表决。会员国也可以参加某些会员国已经提出的提案,作为联合提案国。按照大会议事规则,同一问题如有两个以上的提案需交付表决,一般都是先提出的提案有权先付表决。

大会表决时,每个会员国有一个投票权。大会对于"重要问题"的决议,须由出席并参加投票的会员国以2/3的多数通过。一般性问题的决议草案,只要过半数的有效票(出席会议所投的赞成票和反对票为有效票,弃权票和不参加投票为无效票)就算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是指有关和平与安全的建议,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经社理事会理事国和托管理事会理事国的选举,会员国的接纳、会员国权利的中止及会员国的开除,托管问题及预算事务等。7个委员会和两个程序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必须提交大会通过后才算联大的决议。此外,除已有规定者外,大会如要确定一些问题是否需要2/3的赞成票通过,只要得到过半数的同意就可决定。

(2) 安全理事会(The Security Council)。

安全理事会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在联合国六大机关中,安全理事会占有首要的政治地位。根据宪章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都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但两者在下列几个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和法律上的区别:

第一,大会可以讨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但是对于其中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大会应在讨论前后或讨论后提交安全理事会,大会不得做出采取行动的决议。

第二,对于已经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问题,非经安全理事会的请求,大会不得提出任何建议。

第三，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只有安全理事会才有权采取行动；而大会则不同，它只能做出一般的建议。这些建议虽能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但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由此可见，大会是联合国的主要审议机构，而安全理事会则是联合国唯一有权采取行动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

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常任理事国为中、俄（曾为苏联）、美、英、法5国。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任期两年，交替改选，即每年改选5个，任期届满，不得连选连任。

在联合国创建时，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来，大批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先后加入了联合国。到60年代初，联合国成员国的数目增加到110多个，其中亚非国家占了半数以上。它们强烈要求扩大安全理事会，增加亚非国家的席位。1963年联合国大会第十八届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宪章第二十三条的一项修正案，把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从6个增加到10个，使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从11个增加到15个。决议还规定了关于增选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地区分配原则，这项决议取代了1946年的伦敦君子协定，其分配原则是：非洲和亚洲5个，拉丁美洲2个，东欧1个，西欧及其他国家2个。

根据宪章规定，为了保证联合国的行动迅速有效，会员国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在履行这一责任时作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代表，处理影响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国际事件，制止侵略活动。

安全理事会可以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导致国际摩擦的任何局势，建议调停这种争端的方法或解决办法。任何会员国，任何预先接受载于宪章的和平解决义务的非会员国，大会或者秘书长，都可以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和局势。

安全理事会可以断定是否存在任何对和平的威胁、破坏或侵略行为，可以提出建议或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强制行动可以包括吁请各会员国实施经济制裁以及除使用武力外的其他措施，必要时可对侵略者采取军事行动。会员国应按照安全理

事会的倡议商定的特别协定，提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军队、协助和便利。

安全理事会还负责制订管制军备的计划，对战略托管地区行使联合国的托管职能；向大会提出年度报告和特别报告；与大会分别投票选举国际法院法官，并向大会推荐联合国秘书长。

安全理事会的每一理事国有一个投票权。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由15个理事国中至少9个理事国的可决票通过。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定，也需9票通过，其中应包括所有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或称为“否决权”（Veto）。关于程序问题和实质性问题区别的标准，宪章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是由1945年6月7日苏、美、英、法四国发表的关于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的声明加以补充说明。所谓“程序问题”，是指宪章第五章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事项，包括通过或改变议事规则，推选理事会主席的方法，组织理事会使之能继续行使职务的组织措施，决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设立必要的附属机构，邀请在安全理事会设有代表的会员国或非会员国参加讨论等。除此之外的问题，通常称之为“实质性问题”，例如，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第七章范围内就国际争端所作的调查、调停、制裁以及防止冲突继续和扩大的种种决定。对于某一事项应否认为是程序问题必须由安全理事会7个理事国的投票，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在内，才能做出决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国的双重否决权”。

安全理事会通常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为了使安全理事会能继续不断地行使其职能，每一理事国必须有一名代表常驻联合国总部。安全理事会主席，由各理事国代表按国名的英语字首顺序轮流担任，每人任期为一个月。安全理事会可自行决定议事规则，并可建立附属机构。

安全理事会有两个常设委员会，即专家委员会和接纳新会员委员会，均由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的代表组成。专家委员会就议事规则和其他技术事项进行研究，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近年来，安全理事会还设立了许多特设机构。

（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简称经社理事会),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根据宪章的规定,经社理事会在联合国大会之下,负责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活动,研究有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有关问题,并向大会提出报告和建议;可以为了促进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和遵守提出建议;可以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召集国际会议并起草提交大会的公约草案;可以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订立协定,确定专门机构与联合国的关系,并协助各专门机构的活动;可以就它负责处理的事项,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

经社理事会由54个理事国组成,任期3年,每年由大会改选其中18个理事国。任满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最初,经社理事会由18个理事国组成,1965年和1973年开始生效的宪章修正案,将其理事国数目分别增加到27个和54个。按照惯例,它的席位分配办法是:亚洲和非洲24个,拉丁美洲10个,东欧6个,西欧及其他国家14个。

经社理事会每年举行常会两次,每次为期1个月,分春季夏季举行。春季会议在纽约,夏季会议在日内瓦。会议的决议以出席会议并参加投票的理事国的过半数通过。理事会主席和3名副主席,由理事会每年一次按照理事国改选的情况和地域分配原则选出。常会期间,设立经济、社会、协调等会期委员会进行工作。

经社理事会设有9个职司委员会,它们进行经社理事会所指定的工作,并向理事会提交报告和提出建议。它们是:统计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委员会、科技发展委员会、麻醉品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经社理事会设有5个区域经济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本地区国家之间以及本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协助经社理事会研究解决与本地区有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区域经济委员会受经社理事会领导,它们的决议,均需经社理事会批准。这些区域经济委员会是: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济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

经社理事会设有若干常设委员会,作为联系和处理某一方面问题的特设辅助机构,其中包括:规划和协调委员会、非政府间组织委员会、

科学技术用于发展工作咨询委员会、跨国公司委员会、发展计划委员会等，并根据需要设有各种专门委员会和各种特别机构。

（4）托管理事会（The Trusteeship Council）。

托管理事会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它主要是在大会的权力之下，对国际托管制度的实施负监督的责任。按照宪章规定，联合国设立托管制度，“以管理并监督凭此后个别协定而置于该制度下之领土”。

托管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托管领土居民的生活进展以及托管领土向自治或独立方向的逐渐发展。

国际托管制度基本上是国际联盟制定的国际委任统治制度的延续，而国际委任统治制度则是变相的殖民统治，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殖民地的一种分赃政策。国际托管制度不同于国际委任统治制度的地方，就是它明确宣布要增进托管领土趋向自治或独立的逐渐发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地独立运动高涨的直接结果。

根据宪章的规定，托管理事会的组成应使管理领土的理事国与不管理托管领土的理事国保持平衡。因此，托管理事会的理事名额不是固定的。随着托管领土和管理国数目的减少，托管理事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小，其职能也已消失。

托管理事会在大会权力之下行使联合国关于除指定为战略地区之外的托管领土的职能，而安全理事会则在托管理事会的协助下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事务等方面，行使联合国关于“战略地区”的职能。

托管理事会负责审查托管领土管理国的报告，会同管理国接受和审查托管领土居民请愿书，按期视察各托管领土等。托管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每一理事国享有一个投票权。托管理事会的决议，由半数以上赞成票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通过才能生效。

（5）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1940 年 2 月在荷兰海牙成立。根据宪章的规定，“国际法院为联合国之主要司法机关，应依所附规约执行其职务。该项规约系以国际常设法院之规约为根据，并为宪章之构成部分”。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但不一定是唯一的司法机构。除国际法院外，联合国还可以设立辅助的司法机构，同

时宪章也不排斥会员国依据现有的或以后缔结的协定，将它们的争端交付其他法庭解决。

按照宪章的规定，只有国家才能充当国际法院的规约当事国。国际法院受理的是国家间的诉讼，不受理个人之间的诉讼。规约当事国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联合国会员国即规约的当然当事国；第二类是非联合国会员国而按照宪章第九十三条规定的条件，成为规约当事国；第三类是非联合国会员国并且没有成为规约当事国的国家，其成为诉讼当事国的条件由安全理事会决定，但不得使当事国在法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首先就是受理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所提交的一切诉讼案件，但是这种审理必须基于当事国的完全自愿。当事国在争端发生后，双方签订一项特别协定，自愿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审判，如果争端一方声明不接受法院的管辖，法院就无权审理。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任何国家可以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对于那些曾经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的国家，如果它们之间发生争端，只要有一方把这个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他方就必须承认国际法院有权受理该案。国际法院对它受理的案件作出判决后，争端双方都应遵守法院的判决，如果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一方不履行依法院判决应负的义务，他方有权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安全理事会如认为必要，可提出建议或决定应该采取的办法，以执行判决。对于强制管辖，法院规约并不要求所有国家都要发表声明予以接受，而且这类声明，可以是无条件的接受，也可以附加保留意见。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除了上述的诉讼管辖外，还有咨询管辖。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可以随时就任何法律问题，要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但联合国其他机关和专门机构则需由大会授权后，方可请求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而且只限于其工作范围内的法律问题。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反映了法官对该项法律问题的看法，具有建议性质。

（6）秘书处（The Secretariat）。

秘书处是执行联合国各机构的行政秘书事务的机构。秘书处由秘

书长一人，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若干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秘书长是联合国的行政首长。

秘书长经安全理事会推荐，由联合国大会任命，任期5年。期满后经宪章规定的程序重新任命，可以连任。现任秘书长为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相当广泛。除了领导秘书处并向大会提出联合国活动的年度报告外，还可以把他认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并执行大会、安全理事会等联合国主要机构委托的其他任务。秘书长及工作人员应对联合国负责，在执行任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联合国成员国也有义务不影响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执行他们的国际性责任。

5.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无理阻挠，致使为蒋介石集团窃据的中国的合法席位长期得不到恢复。为此，中国政府一直为恢复自己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的斗争。

美国在联合国阻挠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主要采取了三种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50年代，美国以“时机不宜”、“暂缓讨论”为借口，阻止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日益提高，美国这一伎俩越来越行不通；于是从1961年起，美国硬把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说成是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继续进行阻挠；到了1971年，美国在形势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抛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和一个“双重代表权”提案，把它长期蓄谋已久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公开端了出来，企图强迫联合国大会接受。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经过一个月的辩论，有80个会员国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发言的情况清楚地表明，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图谋，越来越不得人心，已经使它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10月25日，大会否决了美国的“重要问题”的提案，并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及利亚

等23国的提案。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所属的机构中驱逐出去。至此，联合国中的这种长期不合理的局面才得以改正过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得到恢复。中国走向世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第二节　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发展

跨国公司，又称多国公司、超国家公司、国际公司或环球公司，日本称之为多国籍企业。跨国公司是以一国或数国资本组成的总公司为基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设立分公司、子公司或合资企业，从事跨国界的生产、销售和其他业务活动的国际性公司。从目前情况看，跨国公司的主要形式是：公司间的联合、渗透或建立合资企业，跨国性兼并，与零部件公司签订协定。跨国公司大都为私有，少数为国有，或私人与国家共有。

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是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大规模资本输出，跨国公司应运而生。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它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很小，相对集中在制造工业、采矿工业和石油工业中，活动地域也主要集中在欧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技革命的催化下，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全球化，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寻求新的投资场所，以及加速寻找新的市场，成为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巨大内在动力，同时，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巩固政治独立后，为加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对外开放，引进外国的资本、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则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性拓展的巨大外在动力。它的数量迅速增至3.7万家，海外分公司约20余万家，分布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规模愈来愈大，活动范围遍布全球，投资额至80年代初已跃至5 000亿美元以上，利润率高，经济实力急剧膨胀。如埃克森石油公司等著名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均高达数百亿美元，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

总值。据统计,1980 年世界上最大的 350 家跨国公司拥有 2.5 万家子公司,2 500 万雇员,以及 2.6 万亿美元的总销售额。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跨国公司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至 2001 年,全球跨国公司达到 6.3 万家,年销售额超过 14 万亿美元。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总值的近 50%,国际贸易的 60% 和技术转让的 70%,对外投资的 90%。美国的微软公司年销售额达数千亿美元,富可敌国。跨国公司不仅使生产、贸易活动国际化,而且使科研、管理活动也国际化,并打破国界,拆除壁垒,针对全球范围制定其研究、开发、制造、销售的全球经营战略。正是由于跨国公司规模大,拥有大量财富,又具有跨国性质,几乎渗透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产业领域和部门,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

二、国际关系中的跨国公司

迅速发展中的跨国公司不单纯是个经济实体,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强有力角色。

从跨国公司本身来看,首先,它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庞大的权势,控制一定的土地、人口和经济,在某些国家的特定区域内,由于享受特殊政策的优惠,而不受该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不少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许多国家。到 80 年代初,包括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前 100 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跨国公司约占 40 个。

其次,跨国公司对母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常常通过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来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已占美国全部出口的 25% 和全部进口的 15%。同时,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发展,母国的政治军事影响也随之扩散出去。

再次,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活动具有较强的行为能力,它有时与子公司所在国的统治者结成特殊的联盟,有时却与之处于敌对的地位。它能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与外交,有时不仅导致对它们某一经济部门的影响与控制,而且导致对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政局的干预与控制,成为霸权主义的根据。

最后,跨国公司大都代表私人垄断财团或国际垄断财团的利益,具有自主权和决策权,对本国政府亦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成员往往将所属

国家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更何况它在不同的国家中进行活动，具有某种超国家和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常利用其跨国经营特性，削弱或摆脱某一国家的直接管辖。单个国家的政府很难对它进行直接或全面的控制，而它却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或国际间的相互行为，影响各国关系，或使国家的行为归于无效。它可以通过其内部系统，在各国之间调动资金，转移生产或商品，干扰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等。

从整个国际关系来看，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其整合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影响世界资源配置和各国政策对全球生产、贸易和货币金融等方面进行控制，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进程和方向。由于世界经济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跨国公司通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跨国公司是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在当代跨国公司迅猛发展的大潮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及两者混合的跨国公司，促进了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大发展，加强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头，从而也必然加深整个国际关系相互依存的发展趋势，国际政治与经济呈现出新的面貌。

第二，在全球跨国公司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无论是在数量、实力还是在影响力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据统计，美日等15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数量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7 000家增加到90年代末的4万家。它们掌握着资金和高技术，维持着不尽合理的国际分工，并且通过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控制，实行不等价交换，攫取丰厚的利润，维护了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正是由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旧貌未能改观，国际政治新的秩序也难以建立起来，与之相适应的是不尽合理的国际政治旧秩序。

第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兴起，是当代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虽然它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其意义业已显露，不仅推动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现代化进程，有助于促进南南团结与合作，而且加速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使国际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四，在当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方向在发达地区。在发达国家内部，跨国公司的不平衡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丧失了垄断地位。世界经济也由美国独步寰宇演变成美欧日三分天下。这种发展状况，一方面造就了当代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明显特征，既全面相互依存，又不乏经济上的抗争，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全球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分散，多极化趋势的形成，给国际关系民主化注入了新的因素。

总之，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跨国经济活动，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观构成重大挑战，对国际关系的全局和局部发挥自己的深刻影响。它有牟取暴利、损害所在国主权、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操纵世界经济的一面，也有进行正常经营活动、取得合法利益的一面，其资金、设备、技术、销售渠道和管理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加以利用，也可以使世界范围内资源的利用更趋合理，有利于强化相互依存、地区一体化、和平相处与和平竞争。然而，要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约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通过各国政府合作和国际协调机制来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是主要的思路。1974 年联合国成立跨国公司委员会，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属常设委员会之一，负责综合情报系统工作，编写各大跨国公司概况，研究它们的活动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及社会的影响，讨论制定跨国公司的行动准则等。

思考题

1. 试述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2. 如何认识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3. 简述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及其职权。
4. 论述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五章　外交政策

第一节　外交与外交政策

一、外交的含义

1. 外交的含义和特点

外交是适应国家对外交往的需要而产生，几乎和国家一样历史悠久，它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在早期，外交具有临时性、封闭隔绝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其内容与形式均较为单一，且为各国的政治统治、风俗习惯等所左右。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民族国家确立起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主体的地位，也明确了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职能作用，外交成为民族国家重要的对外行为之一，外交突破了原来的狭隘性，向现代外交迈出一大步，调整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外交法也随之逐步形成。

尽管外交历史悠久，但何谓外交，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或者说外交就是大使和使节们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有学者认为，外交就是把才智和技巧应用到各独立国家政府间的正式关系的活动中去。也有学者主张外交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实质上，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是国家用和平方式进行的对外行使主权活动的总称。具体地说，外交是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

根据外交的这一定义，可知外交具有如下特点：

（1）外交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行为及其过程。外交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当代，一些政府间组织也已成为外交的重要参与者，它们的活

动，特别是联合国的活动，同各国外交密切相关，影响、协调着各国外交。以全球性、区域性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制的不断强化，大大拓展了多边外交的驰骋天地，有利于国际社会的沟通和消弭冲突，增进了世界各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尽管如此，外交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展开和进行的。

（2）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利益。外交的基本内容是作为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官方行为，相互沟通，说明情况和明示态度，用各种和平方式捍卫国家利益，通过对外活动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提高国际地位。

（3）外交受到有关规则的调控和规范。外交在实施过程中，首先受到外交法的规范。外交法起源于国际惯例，在近代通过一系列条约逐渐形成外交的法律制度。

除必须受外交法的制约外，还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且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平等和正义的外交。

随着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数百年来，外交历经沧桑巨变。今天，外交在一般性特点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带有时代烙印的新特点：

（1）外交成为高度组织化和高度专业性的业务。早期外交被视为君主及其宠臣独占的领地，注重战争、财富、领土、权力和统治者的个人野心。因此，在夸夸其谈、钩心斗角的外交战场，魅力、狡诈、奉承、威胁和说服的才能和技巧特别受到青睐。当代，外交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一门高度组织化和高度专业性的业务，同时，外交又是一门艺术，需要讲究方法、技巧和风格，即在坚定的原则性的条件下，根据形势变化、事态发展，以及求同存异的原则，采取灵活的策略，及时把握时间、心理，有分寸地通过相互妥协和让步，达到利益的协调。

（2）重要政要成为外交的主要角色。当代外交区别于传统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交部长、政府首脑以至国家元首的高层外交愈来愈占有中心位置，使一般外交官逐渐丧失了他先前可能拥有的许多权力

和活动领域，这是由于当代国际问题的全球化，国家间关系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紧迫性与复杂性，以及技术手段发展所致。尽管如此，职业外交官仍然占有重要地位。高层次外交和低层次外交具有不同的职能，方法和技能亦相异，是一个同一过程的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

（3）当代外交的另一个特征是全方位、多元化参与外交活动，具有开放、联系、高层化、世界性的特点。

（4）国家在外交中具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权。主权平等是外交的主导原则。同时，外交授权仍然有限，外交决策权在国家最高层，外交机关仅是执行机关，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灵活掌握外交权。

2. 外交的类型和方式

外交类型可以作多角度划分。从外交的规格和代表性来看，有首脑外交、官方外交、民间外交、集团外交、政党外交等；就外交手段而言，有炮舰外交、原子外交、金元外交、文化体育外交（如乒乓外交）、经济外交、科技外交等；从辐射面来看，有多边外交、全方位外交、等距离外交、区域外交、全球外交等；从形式来看，有会议外交、穿梭外交等；最重要的是从外交的性质来看，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平中立外交、不结盟外交、强权外交或霸权外交、依附型外交等。

西方的外交分类以大国为核心，以权力—利益为标准，包括：强国外交与弱国外交，即以一国国际利益范围以及同其他国家关系的特征而定；维持现状外交与修正现状外交，即根据一国对国际现状是否满意从而决定其采用何种外交方针来划分。威廉·考普林在《国际政治入门——理论通观》一书中，根据当代历史特点，对外交作了如下分类：从基本活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地区性国家外交与超地区性国家外交；从对他国发生影响的方式不同，主要以是否把改变别国政权为首要目标，可分为干涉主义外交与不干涉主义外交；从国家关系的状态不同，可分为敌对国家外交与友好国家外交。

就外交活动的方式来看，主要包括直接的外交，如各种级别、各种外交渠道的访问、谈判、交涉、会议等；间接的外交，如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如书信、电报、电话进行的外交等；公开的外交或秘密的外交；双边的外交乃至多边的外交。外交一般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但也可以通

过民间组织和个人来进行。

3. 外交关系的形式

外交关系的形式有以下四种：

（1）正式或正常外交关系。以双方互派常驻使节为特征。这是最普遍的外交关系。

（2）半外交关系，或称不完全外交关系。其特征是双方长期保持互派代办的关系，虽属正式外交关系，但实质上是国家间建交尚未完成阶段的一种不够正常的外交关系。

（3）非正式外交关系。其特征是双方通过正式外交代表机构以外的渠道保持外交接触。

（4）民间外交，即个人或群众团体进行友好互访，并可就两国关系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或公报，或就具体事项达成民间协议，以发展两国间交往关系，其目的在于最终推动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二、外交政策及其结构

外交政策是指一国制定的指导其外交活动的目标、原则和行动方针。一般是根据国家的战略、利益、综合国力和国际环境加以确定的。外交政策通常由政府制订、外交部门贯彻执行。外交即是执行外交政策的过程和手段。

外交政策具有如下特点：

（1）外交政策具有多层次结构。其中主要包括：由国家利益所规定的目标，由国家性质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各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

（2）外交政策具有特定的目标性。任何外交政策都具有特定的目标，决定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利益，其他主要因素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环境。因此，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是以国家利益为依托，以综合国力为后盾，以国际环境为背景的，它是国家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作的选择，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一国的外交政策有很多目标，包括根本目标、长远目标、发展目标和各种具体目标。根本目标又称核心目标，反映国家的根本利益，如国家的生存、安全、统一、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社会制度和经济繁荣等。长远目标又称战略目标，是基于价值观和战略考虑的对未来的愿望或

理想，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实现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或发展相互依存求得一体化，把本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企求领导世界的地位等，上述目标都对国家对外关系有指导意义。发展目标是指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本国经济，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及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具体目标往往是短期目标，涉及特定的国际问题，外交谈判大都在这个层面上展开。

外交政策围绕国家利益的实现而制定，不仅要考虑到本国的综合国力，特定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而且要考虑成功的机遇和预计的代价，使外交政策建立在至少对所采取行动步骤的得与失所作初步估计的基础上，以确保本国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要有防止其他国家危及本国利益行动的计划，该计划是针对构成其他国家战略基础的得失判断而精心设计的。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正确估计对方的综合国力、战略意图和可能的反应，并将有关的信息传达给对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具体来说，外交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正确估计的基础上，即要了解对方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步骤，怎样看待这些步骤的相对风险和可能的收益；必须明白无误地把本国的意图传达给对方，使之确信采取何种行动会得益或付出潜在的高昂代价。上述两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和密切结合，是确保外交政策目标顺利达到的保证。沟通渠道的阻塞、信息传递失真或错误的认知和估算，都会造成外交政策的失败。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摩根索把外交政策的目标归结为四项任务：根据国家现有实力确定的对外目标，判断别国根据其实力确定的对外目标，比较双方的实力和目标，运用适当的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他强调：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权势。

（3）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并在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原则、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和合作的原则、反对强权和霸权原则等。不结盟原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权力政治观是西方国家指导制订外交政策目标的最根本原则。西方学术界有一种分类法认为，东方以国际主义、独立自主、和

平共处原则为特征，西方以权力政治、国家利益、相互依存原则为特征。

（4）外交的各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有全球性、区域性、多边和双边之分，都是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外交政策目标和原则的具体体现，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和多边性，而外交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是基础，具有相对稳定性。

（5）外交政策的基本倾向会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霍尔斯蒂称之为“外交政策取向”。他把“外交政策取向”归结为孤立主义、不结盟政策以及外交集团和军事结盟等。

第二节　外交决策

一、外交决策的形成

1. 外交决策的含义及特点

外交决策是指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其过程。通常指从多种可能中做出外交选择和决定。主要的决策方式包括个人权威决策方式，组织决策方式（较为平等，少数服从多数），以及群体决策方式。从总体上来看，外交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有关国家对外事务的重大决定和一般决定的形成、实施，根据事态发展不断予以调整的过程。

外交决策的主体是政府、外交部、其他有关国家机关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个人决策者或决策参与人。公众一般不能直接影响外交政策，但可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有关政府机构、大众传播媒介产生间接影响，有时也会发生直接的、强有力的作用，如就某项外交决策举行全民公决或进行大规模群众斗争。

外交决策的特点是：

（1）政治性。外交决策是国家法律、政策和利益的具体化，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体现了国家的意志。

（2）法制性。外交决策机构制定的决策，必须符合法律、法规、法令规定的程序和内容，使决策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

（3）权威性。外交决策机构和人员有决策权与实施权，有时能力排众议，做出决断。

（4）组织性。外交决策机构是一个有原则的组织系统，最高决策人必须尊重高层的集体决策权。

（5）有序性。只有经过信息、情报的收集，综合分析与咨询两个工作步骤才能进入决策。

（6）广泛性。由于外交决策广泛涉及国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外交决策机构要对决策涉及的对象有广泛的接触和充分的了解。

外交决策也遵循一般决策过程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1）系统原则。即把决策对象视为一个系统，以整体目标的最优化为标准，子系统和单项目标必须置于整个系统中来分析。

（2）可行性原则。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到综合国力的实际状况，又要符合外部环境与实际需要。

（3）重点原则。抓住中心，突出重点，分清主次，一次决策着重解决一个或一部分问题，以提高决策效能。

（4）适时原则。抓住时机，利用机遇，当机立断，适时决策，避免议而不决，贻误时机。

2. 外交决策的制约环境

外交决策涉及范围广，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比一般决策更为复杂和困难。

就外交决策的内部环境来说，它取决于国家可以用于外交决策的资源量和外交决策的动机与运作。具体讲，主要的国内影响因素有：

（1）历史继承性与文化传统。

（2）国内政治形势。

（3）政府结构因素：在传统上外交与军事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影响与作用最大，现在经济机构也跻身于这一行列，此外，各国决策机构所遵循的规范决策活动程序也不同，有集权型、分权型、等级型、民主型、民主—集中型等。

（4）经济发展及其结构作为外交政策关键因素，发挥一种标准的作用，它给外交决策创造良好的基础或产生某种制约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外交选择余地的大小，它的急剧变动会冲击外交决策。

（5）在外交决策时，综合国力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作为

综合国力主要构成的国家规模、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资源基础，一般总是处于突出的位置，同时，与某项外交决策有直接关系的综合国力要素，也会具有突出的影响力。

（6）党派、利益集团等的影响，包括政党数量与权力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利益集团的发育与影响力等。

（7）公众舆论与大众传播媒介。

（8）行为分析因素，即决策者个人的因素。

就外交决策的外部环境而言，主要的国际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世界及地区力量对比、国际潮流与发展趋势、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状况、世界及地区经济与发展状况、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政治与军事结盟、相互依存与国际一体化、国际舆论、有关国家的意图与反应，等等。

外交决策不仅本身比其他决策复杂、困难，而且在当代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决策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生态等国际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决策的意义和作用空前突出，甚至涉及全人类的命运；决策的难度空前增加，全球化的国际关系涉及的行为者和影响因素纷繁复杂，有的还涉及一系列高科技问题；决策的紧迫性空前提高，一场国际劫机事件引发的危机要求即时决策。

3. 外交决策的类型

从外交政策的决定程序方面看，外交决策可以分为常规决策与危机决策。

在常规决策方面，古典决策模式，即理性模式，又称合理解决模式，把决策者视为具有最大限度理性的人，整个决策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理智过程。它在决策的一般程序中的理想表现是：

（1）认定形势。决策者能及时获得充分而正确的情报与信息，并对环境条件与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有关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

（2）选取目标。决策者根据形势与自身利益的关联程度，选择最大价值的行动目标，使决策有明确的方向。

（3）探求方案。设计出所有各种可行的备选方案，并理智地加以

评估、比较和筛选，将它们按优先顺序排列，提出取舍意见。

（4）最后抉择。选择一个在同样的约束条件下获利最大、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最佳方案，以便抉择一个优先的行动，达到所选取的目标。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式，假设决策者在理想条件下完全理性地决策，而不是在实际决策中的状态，但它对重大外交问题的中长期决策研究是有意义的。

有限理性模式是对古典决策模式的修正与补充，将其实用化。它以有限合理性代替完全合理，以满意原则代替最佳原则。在经过基本的决策程序后，决策者按顺序对可供选择的方案逐一审视，直至找到一个符合最低要求的方案，即满意的方案为止。有限理性模式仍是一种理智的过程，但比较接近现实，适用于日常的一般外交决策。它可以简化为形势判断、确定满意的目标、选择一个符合最低要求的方案三个阶段。

在西方还有组织过程模式和政府（官僚）政治模式。前者指决策是通过政府的各个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最后做出选择，后者是指政府各部门领导人所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最后决策是竞争、妥协和选择的结果。

理性过程模式（即有限理性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政府（官僚）政治模式即为艾利森决策三模式。

在发生突发性国际危机的情况下，按部就班的常规决策难以适应复杂而紧迫的形势，完全从理智、合理的角度来决策，也往往忽视国际形势中的多变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在国际危机的严重性、时限性和突然性三要素的同时作用下，危机决策的压力感受与常规决策完全不同。危机决策常采用控制论的决策模式，简化决策过程：接受一定的变量与信号—作出反应—信号反馈—修正目标—再作出反应的不断循环过程，即一种逐步调整和修正的决策过程，使外交决策逐步接近实际，并达到对国际关系进程的某种控制。危机决策采取高度集权的方式。

实际上，控制论的决策模式还可以和常规决策模式结合起来，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原有决策作补充或修正，即作为原有决策的追踪决策，从比原有决策更为优越的对策中做出抉择，产生更佳的决策效果，使外交决策更趋于合理，更符合实际。这种模式能较为充分地考虑到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扩大了选择和控制的范围，为外交决策提供

了较大的摆动幅度。

无论是常规性决策还是危机性决策，都涉及决策程序问题。外交决策程序的核心问题，是为外交决策提供合理有效的工作过程，使决策者掌握决策程序中各个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实现外交决策的目标。外交决策程序是一种严格的逻辑表现，即先从摸清形势与外交问题的性质入手，探求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通过对比分析找出最优选择，最后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即通过对决策耗费与收益的比较分析，做出外交决策的最终评价。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常用的一些技术性方法，主要有逻辑推理法、模拟法、数学法、几率法和作业法。

二、外交决策的优化

外交决策的优化，即最大可能的制定最佳或者最满意的外交政策的过程。

外交决策的优化要有一个完整的外交决策系统。这一系统由信息、智囊、决策三个子系统组成。

信息子系统——对外交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情报进行收集、加工、传递、贮存、处理的系统，是外交决策的基础和首要前提。信息、情报收集得越全面、翔实、细致，外交决策就越可靠，越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1）信息、情报的获取。或直接从信息源获取原始形态的信息、情报，或接受外界传递过来的信息、情报。一种是基本信息情报，涉及全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基本情况，这是外交决策的基本依据。另一种是特别信息、情报，即某项外交决策所需要的特定信息、情报，这是外交决策的必备依据。

信息、情报必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它通过多渠道获取，通常由外交、情报、新闻、研究等机构及其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经由各种途径与关系，建立畅通的信息、情报网络。形式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在当代，尤其是冷战后时代，信息、情报的收集，越来越成为一个广泛、合法的活动领域，许多国家都乐于向其他国家提供自己的情况，并为正确了解自己提供各种机会和方便。

（2）有效地分析处理。即对信息、情报进行验证、筛选、分析、加工、分类，并编制索引。

（3）贮存以建立信息库，以备随时选用。

（4）迅速、及时、准确地把信息、情报传输给接收者，保持畅通，使之发挥作用。

信息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独立收集、处理、贮存信息，以防止信息的失真和错误信息的传播。在技术上要求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建立信息情报网，各部门的信息情报网在高层交织起来。

智囊子系统——以其专业性、技术性提供决策保证。智囊对大量的信息、情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提出各种咨询意见、可供选择的方案和预测，供决策系统参考。其主要作用是谋，是决策者大脑的延长，由于其地位、特点与弱点，故不能替代决策。

智囊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常设的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经常性服务，许多专家、学者直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独立的或附设在高等院校里的研究机构、思想库，接受专题决策研究项目，或提供临时服务；由平时分散的专家任顾问或临时咨询。

智囊子系统在外交决策中地位的确定，反映了现代外交决策过程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现代外交决策的科学性。

决策子系统——外交决策的核心系统。

外交决策机构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领导下的政府会议，以及外交部长或有关部长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其主要职能是：确立决策目标，使外交执行者有明确的方向；根据外交目标的要求，制定决策方案，方案要有择优性和可行性；在各种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实施决策反馈，及时修正原有决策，并通过相互沟通，取得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有了一个完整的外交决策系统，就有了优化的基础，只要保证其有效运转、发挥作用，就能达到优化的目的。它要求做到以下两者的结合，不可偏废：决策系统必须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使信息、智囊、决策三个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与权利，正常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使信息渠道畅通，使智囊能发挥全部创造力，使决策建立起一整套民主而有效率的组织原则与工作程序，避免因信息与智囊子系统视决策者好恶处理信息、提供意见，而招致决策无科学化、合理化可言；使上述三个子系统既相对分工又密切配合与协调，以发挥出整体功能。

每个环节都能发挥最佳工作效能，环环相扣，才能转化为整体功能，特别是要形成一个合理的决策程序，这个总体步骤和过程是外交决策在程序上的保障，完善的决策技术则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

三、外交决策的效能

外交决策的优化是外交决策效能的前提。外交决策效能是指外交决策达到了预定的目标，解决了相关的外交问题。要实现外交决策的最佳效能，就要在决策优化的基础上注意下列四点：

1. 外交决策的执行过程

合理的外交决策只是成功的一半，决策效能归根结底决定于执行过程。外交政策执行或实施会产生三种情况：确实得到执行，达到预期效果；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原来规定的道路和方向，外交政策只得到部分执行；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上述三种情况导致三种结果，主要是由于执行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涉及众多的因素，既有主观认识的偏差，又有客观因素的变化不定。

2. 决策追踪

决策及其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系统的过程，决策者根据反馈，不断地对外交决策及其实施进行客观评估，若客观对象和外部条件未变，外交决策正在顺利实施，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则应继续努力贯彻原外交决策；若原有外交决策暴露出缺陷，或客观对象以及有关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某种变化，就必须及时对原有决策进行修正、补充或调整，甚至以新的决策代替原有的决策。这既可以看做原有决策过程的继续，也可以视为一个完整决策过程的开始。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完全达到预定目标。一般地说，国际形势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部分调整外交决策的事是常有的，惟其如此，才能使外交决策日益完善，达到最佳效能。因此，决策追踪是十分必要的。

3. 外交决策的效应程序

决策效应有近期效应和远期效应。外交决策也不例外。良好的决策效应应当是两者兼顾，有机结合。要注意防止近视的倾向。有的外交决策在近期能产生令人兴奋的效应，但远期效应却是负面的，最终会使该项外交政策失去决策效能，或造成新的严重问题。

4. 外交政策实施手段的合理运用

这是外交政策能否取得实际效能的保证。外交政策的基本实施手段有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民间交流及特殊手段等。

政治与外交手段是和平时期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段。其特点是运用国际法、外交法，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其方式和方法包括联系交往、传递信息、协商谈判、签订条约协定、参加国际组织、运用国际法和他国国内法进行国际活动等。

在当代，运用政治与外交手段有它的新特点：

（1）当代是信息时代，准确、及时、广泛地传递信息，是相互沟通，加强信任与合作，避免误解、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发生冲突、危机时更显其重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和磋商制度，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等相对定期的互访，外交机构定期磋商，外交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定期接触，还有吹风会、通报情况、“热线”联络等。

（2）协商与谈判是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改善关系和解决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手段。这种外交谈判与国际协商形式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首脑外交的兴起和普遍化，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3）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趋突出，所以各国普遍重视其作用，积极参加其活动，以国际机制为重要手段，来贯彻其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

（4）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各国日益重视在国际活动中对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经济法，甚至他国国内法的了解和运用，以便在对外经济、民事活动中减少损失、增进利益。

随着冷战后时代的到来，以及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进一步深化，经济与高科技手段越来越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实施手段，它既可以成为无正常外交关系国家之间最终走向邦交正常化的桥梁，又可以成为有正常外交关系国家间发展关系的手段；它既可以用来增进国家关系，也可以用来阻碍国家关系，用作干涉或惩罚的手段。

经济、科技手段主要有：正向的经济技术援助，经济技术合作，促进

投资、高技术及其产品的输出等；反向的经济封锁、制裁，贸易禁运，限制高技术及其产品出口，金融战、贸易战、关税战等，其中经济制裁成为当代普遍使用的手段，包括抵制、禁运、恶化贸易条件等。

军事手段等是推行外交政策传统的重要手段，几乎和外交手段一样古老，且常和外交手段交替使用。当一国无法以政治、外交及其他和平手段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时，军事手段便成为迫使别国接受自己意志的强制方式。它包括批准军售、提供军事援助、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签订军事协定或军事条约、建立军事集团、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等。

威胁使用武力，是通过炫耀武力产生高压，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这是强国常用的手段。它的常见方式包括派遣舰队在对方领海附近游弋，派遣军用飞机在对方领空附近飞行，在靠近对方领土或领海的区域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或军事演习，军事动员，最后通牒等。使用武力的形式有武装冲突与战争，包括其变种——雇佣军和代理人战争。

军事手段作为外交政策的实施手段，在当代也出现了某些变化：一是核力量成为军事力量的后盾，但难以作为一种纯军事手段来使用；二是大国的对外军事援助、军事销售，不但注重于本国的政治、军事利益和目标，而且注重于经济利益和目标的实现，成为特殊的“商品”倾销和获取外汇的重要源泉；三是冷战后时代，军事力量作为外交政策实施手段的地位，在不同层次的国家关系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文化手段，特别是其中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是指国家为了特定的目的，通过推进教育、科技、体育、艺术等国际交流，以达到近期特别是长远的战略目标而进行宣传、广播、新闻报道、文化传播等活动。其内容一是宣传本国文化传统、价值观、社会制度，以及对国内外一系列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二是通过对对象国内政、外交的客观或非客观报道，来影响对象国和本国民众的思想和情绪。其正向实施，可以传播彼此的友谊，增进相互了解，进行善意引导，加强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其反向实施，就是宣传战、心理战，这必然导致对立以至仇视情绪的滋长。文化手段，包括大众传播媒介手段，有时直接用作外交政策的工具。

民间交流手段是外交政策实施的补充手段，间接地为外交政策目

标服务。国家鼓励对它有利的民间交流，给予支持和帮助，甚至直接、间接地组织与参与民间交流。国家限制甚至禁止对它不利的民间交流。

特殊手段为某些国家所采用，如派遣间谍或在当地招募间谍，秘密搜集各种情报，进行绑架、谋杀、破坏、颠覆活动，有的国家甚至把国际恐怖活动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施手段。这些手段违背普遍的道德观念与国际法，侵犯主权和人权，被称为非法手段。

所以，外交政策实施手段不仅有合法与非法之分，还有主次之分，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是主要手段，文化与民间交流等属次要手段。但是，即使在主要手段中，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例如军事手段总的说来呈下降趋势，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而文化虽然还不能作为一种主要的外交政策手段，其地位与作用却在迅速提高中。

由此可见，外交决策的最佳效能，有赖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决策的适应程度，这些条件是因国家而异的，外交决策的最佳效能是在决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也是合理使用各种实施手段的结果。

思考题

1. 简述外交关系的形式。
2. 简要分析外交政策的结构。
3. 简述常规外交决策的一般程序。
4. 外交决策优化的条件是什么？
5. 如何提高外交决策的效能？

第六章　国际政治环境及其发展趋势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国际政治

自然环境通常是指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其中包括作为生产资

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条件。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社会物质生活经常必要的条件。它包括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幅员大小、地形地貌、土地与资源状况、气候条件、人口数量和质量与人口结构等自然地理内容。

自然环境不仅与国家的力量、地位、外交政策以及国家间关系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有重大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自然环境因素既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又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自然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及其发展趋势，一方面必然制约国力和国际力量对比，对国家对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会给国家间相互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自然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对国家对外行为和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影响等。

一、自然环境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们在进行政治行为分析时最早加以研究的环境因素。事实上，这种研究早在古代就已初步展开，如中国春秋时期孙武在他的兵法十三篇中，曾将地理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也注重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近代法国的思想家博丹与孟德斯鸠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分析。然而，直到20世纪初，一些西方的学者才对自然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自然环境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将自然环境看做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环境是构成有形物质要素最基本的成分。

国际政治中的自然环境包含以下几项基本内容：

（1）地理因素。其中包括：① 地理位置，即某个国家或某种政治力量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特征。以海陆为标志，表现为内陆国、沿海国和海岛国等不同形式。② 国土面积，包括国土面积的大小以及国土面积表现为方圆、狭长、紧凑、分割等不同形状。③ 地形地貌，即某个国家地表形态的总体状况，像高山、丘陵、平原等。④ 自然气候，由温度

和湿度两大因素构成，有热带、温带、寒带和雨林气候、沙漠气候等。以上地理因素的各种要素之间也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如地理位置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自然气候等等。

（2）人口状况。包括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内容。

（3）自然资源。一般是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如土地资源、矿藏资源、海洋资源、生物资源、水力资源，等等。它们既是生产资料的基本来源，同时也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对象。

自然环境本身所包括的上述各种要素，作为一种有形的物质存在，对国家综合国力的构成产生着直接的，甚至是巨大的影响。

首先，从地理因素方面来看。一般地，地理位置优越、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较容易发展成大国和强国；相反，较差的自然环境条件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成为力量强大的国家造成障碍。一些控制世界战略要地的国家，也会因此得以提高其国际地位。如土耳其因控制黑海出海口而受到重视，埃及、巴拿马因其运河而身价倍增等。此外，国土面积的大小与一个国家的国防能力成正比。土地幅员辽阔的国家在战争时期的回旋余地大，敌人很难将其全部占领和征服。1812 年拿破仑进攻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入侵中国和德国侵略苏联，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国土面积呈狭长或分割状态的国家则比相对方圆而紧凑的国家更易遭受敌人的攻击而不易防守。国土地形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高大山脉可以阻碍交通运输，起到天然屏障的作用。

其次，从人口状况看。人口是从事经济生产和战争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虽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口因素的作用，但机器毕竟不能完全取代人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寡和人口素质的高低往往成为国家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口众多的国家，便于发展更大的经济规模，为军队提供数量较大的优质兵员，国家力量会更加强大，当然，人口的数量超过一国的生产能力或人口结构比例严重失调时，往往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削弱国家力量。

最后，从自然资源方面看。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就奠定

了它成为政治经济强国的基础。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强国往往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为自然资源是大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来源，而只有拥有强大工业基础的国家才能够成为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进而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与之相适应的地位。同时一些控制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如中东产油国等也在国际舞台上备受重视。

二、自然环境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和政策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具有制约作用。这是因为一国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改变。自然环境不仅直接影响了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地位，而且对一国所面临的外部世界的客观环境产生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限制了其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手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对外目标的选择和对外行为的特点，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对外决策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因而，自然环境对一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自然环境除了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以外，对国家对外行为的特点也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从地理因素的各方面来看。拥有良好港口和漫长海岸线的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在对外行为中把发展海上力量放在首位，如15世纪以来逐次称霸海上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彼此相邻的大国之间，或敌或友，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总是更直接一些，在彼此为敌时，漫长的共同边界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建立强大的军事机器，并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在彼此为友时，共同的边界可以加强相互地缘经济亲和度。小国与大国为邻，易受大国的控制与影响。而处于两强或多强之间的小国，要投靠一方势必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要左右逢源又不可能，只有选择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如瑞士这样的中欧小国，历史上长期与列强为邻，战后又处于东西两大阵营之间，严酷的地理政治现实迫使它奉行永久中立的基本国策。

其次，从人口状况来看。一个国家拥有相当数量与质量的人口，不仅提高了其综合国力，增强了国际政治的行为能力和影响作用，并进而促使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发挥影响，往往奉行具有独立色彩的外

交政策。

最后，从自然资源来看。一个拥有丰富而全面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就不怕国际上的孤立与制裁，其独立性更为明显，外交上的选择范围也因此扩大。而像日本这样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在战前主要依靠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来掠夺资源以弥补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战后，由于殖民地国家大批独立和日本的战败国地位，只能依靠在国际贸易基础上实行经济外交，在政治上则容易受制于外界的压力和影响，只能依靠与美国结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独立的立场，发挥其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作用。

正是由于自然环境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因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认识的理论往往成为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指导思想，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则突出地扮演了这种角色。

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末德国的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使用了“人类地理学”的概念，把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综合到一起，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政治地理学（Politics Geography）。20世纪初，拉采尔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谢伦首次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概念（Geopolitics），并以此描述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此后，地缘政治学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解释政治现象与地理因素关系的理论，并进而成为在国际政治中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国家决策的一门学科。地缘政治学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理论学说，对当时各大国的对外决策都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三、自然环境对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其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制约作用上，而且还表现在国家之间的相互行为与相互作用方面。这是因为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对外行为势必引起其他国家的各种反应，并在它们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由此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自然环境对国家间相互行为和相互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自然环境对一国综合国力的影响，自然环境在全球范围

内分布的基本状况也就影响了一定时期内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从而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与演变产生制约作用。地球上陆地、海洋、岛屿以及人口与资源等因素在各主权国家的分布情况，对一定时期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发挥着相对稳定和持续的影响，是我们从宏观角度把握和分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前提。

其次，由于自然环境对国家行为能力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制约作用，大凡地处海峡、海道以及陆上战略通道等战略要地的国家与地区，因其扼守着大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咽喉，往往成为国际政治争夺的热点地区。战后的东欧因其地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前沿以及所谓心脏地区的边缘而成为美苏激烈争夺的对象。此外，像中东地区、中美洲地区、东南亚地区等也因地处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而与大国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成为战后国际政治中长期动荡和多事的地区。对自然资源展开全面争夺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间发生的战争，包括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都包含着争夺资源的重要原因。战后中东地区频繁爆发战争、冲突持续不断，除了由于极为复杂的种族、宗教、历史以及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地区蕴藏着世界石油总储量的60%以上。因为战后科技革命和工业的发展，各国对能源的依赖日益加深，石油已成为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战略资源。

最后，由于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与应用，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成为全球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科技革命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给自然环境增添了新的内容，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新的问题与挑战。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曾列举了人口激增、土壤流失和退化、沙漠扩大、森林锐减、能源消耗与日俱增、化学品滥用、大气污染严重、水和海洋污染严重、大气“温室效应”加剧等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为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必须加强各国的协同行动，因此，自然环境问题也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与联系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对一国的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国家间相互关系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当然，自然环境的这些影响与作用并不是孤立的和绝对的，总是在与其他因素相互结合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同时，自然环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因素，它往往因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一些原先不突出的要素现在会变得至关重要；一些过去重要的因素现在则可能显得无关紧要了。

四、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

生态环境是地球生物群落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统。它是人类获取能量的源泉和生存空间，是人类借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战后以来，随着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向自然的索取与日俱增，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大大恶化。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得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生态环境的恶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气污染。空气污染导致因吸入有害气体而患病和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同时有害气体的排放还导致了地球上空臭氧层的破坏，增加了皮肤癌、黑色素瘤、白内障的发病率。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排放的二氧化碳、氯氟烃、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又引起了地球表面气温的上升，造成了温室效应，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和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

（2）水源的短缺和水质的污染。人类所需的淡水资源短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变得更加严重。世界工业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迅速增加。由于工业废水的排放和化肥、农药的流失和有毒化学废弃物的随地堆放，自然水质已受到严重的污染，导致了人类疾病的

发生。

（3）森林的减少和土壤的沙漠化。世界森林资源因盲目扩大耕地和牧场以及过度采伐而急剧减少，从原有的76亿公顷到20世纪70年代仅剩36亿公顷，而目前只剩下26亿公顷。森林的减少，植被的破坏，加速了水土的流失，导致了地表温度的升高和大量动植物的灭绝以及土壤的沙化、可耕地面积锐减。土壤的沙化和土质的退化降低了粮食生产能力，增加了粮食危机、饥饿和疾病。

（4）海洋生态的危机。大量垃圾排入海洋，致使大量的海洋生物减少和死亡，渔业损失巨大，沿海居民发病率升高。

（5）物种濒危。由于森林减少造成了生物生存环境的丧失和改变，再加上过量的捕捞和捕猎，大气和水质的污染等原因，目前地球上每天有100种生物绝种，在今后20 ~ 30年内地球上全部生物的1/4有灭绝的危险，5% ~ 15%将绝迹。

所有这些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因此，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环境问题也因此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内容。

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除自然规律的作用外，更多的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造成的。它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

（1）超级大国持续不断、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二战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集中在军事领域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两国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制和开发尖端武器系统。特别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研制达到了超饱和的状态。频繁进行的核试验，生产、运输和储存生化武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放射性物质的泄漏，核废料和化学废料的掩埋、处理和倾注，等等，必然造成大气、海洋等环境的污染，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

（2）无政府状态的经济竞争。发达国家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贫穷落后，缺乏资金和技术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为了满足扩大出口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导致了过度耕作，滥采滥伐等破坏性的资源利用方式，以及不计后果地向自然界直接排

放废水废物。特别是国家内部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只图眼前利益，饮鸩止渴，置环境保护于不顾。

（3）发达国家出于私利而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污染转移。发达国家是污染物的最大制造者，同时他们也较早地认识到环境污染对自身的危害性。然而，他们对自己工业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料和废渣往往采取以邻为壑、嫁祸于人的轻率处理办法，将其运出国门在第三世界存放和掩埋，更有甚者干脆直接向海洋倾注。由此加重了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

（4）持续不断的国际战争和动乱。战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发展中国家的内乱也此起彼伏。战火所及之处，不仅破坏了大量的国家财富，而且也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森林被焚，大气污染，农田荒芜，村庄被毁。而且环境保护很少得到政府的重视，生态环境进一步的恶化。

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全人类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人民都不能幸免。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通过全球性的合作和共同努力。1992 年 6 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环境外交也因此日趋活跃。然而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世界各国还存在着分歧。但是，全球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此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利益互补或冲突关系。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力分配结构上，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发达国家一方面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事实上，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也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在国际经济关

系中，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将过时的、污染严重的技术以及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因此，全球性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是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南北关系的协调，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正因为如此，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力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生态环境的变化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 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它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

第二节　经济因素与国际政治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行为、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经济影响的。所谓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是将通过国际经济关系而联结的世界经济体系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并将其作为国际政治的外部环境来分析它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与作用。美国学者丹尼斯·皮雷奇斯认为，“在工业时代，国际政治主要是有关狭隘的军事问

题”，而现今时代“新的国际政治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国际化”。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作用日益突出的现实。

一、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冷战结束后，东西问题不复存在，南北问题的重要性日趋上升，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把增加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作为基本国策，国际竞争的重点也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来。因此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

第一，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南北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长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一种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关系。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决定了南方与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也决定了双方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平等地位。南北双方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来自于国际经济旧秩序。

冷战后，北方国家为了维护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主张建立由美国独霸或以美、日、欧三极共同主宰世界的新秩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进扩张战略，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符合北方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价值观念。与此同时，南方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合作等领域，斗争的焦点也由要不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转到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上。南方国家主张建立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经济领域应主权平等，公平合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第二，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因素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军事因素的作用逐渐下降，经济实力开始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保障它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在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中，经济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各国之间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世界经济领域里争夺优势地位。世界各国

纷纷转向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

第三，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深入发展给当代国际政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对国家主权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由于相互依存日趋深入，一个国家在制定政治、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遵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系列规则，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某些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潮流，凭借自己在经济、政治、科技领域的优势，在国际规则制定、知识产权维护、因特网信息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信息霸权主义”。

二、经济实力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基础和保障

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中最核心的内容。综合国力是国家对外政治行为的基础和保障。在国家综合国力的构成中，经济实力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国力构成的学说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毫无例外地将经济力量作为国家实力的基本要素。经济实力对国家实力的影响不仅在于它是国力构成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且还在于它对国力构成的其他要素也能产生重要影响。

（1）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就会得到增强，一国受自然环境的约束和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就会减轻。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也能够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此外，生产力的发展将带来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革新，洲际导弹和航天飞机的出现，使世界变得日益狭小，高山大川的地理屏障作用现在已变得微不足道了。

（2）在科学技术方面，科技的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济实力的提高将为科技的发展奠定基础。很难设想，一个经济贫困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科技潮流中处于领先地位。

（3）在军事实力方面，国家军事力量依赖国家经济力量的支撑，经济基础的雄厚是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物质保障。

（4）在国力构成的精神要素方面，国家经济实力的发展，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拥护程度，提高政府的效能，提高国民受教育的水平，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同时也增强了国家政治

体制的稳定程度，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由此可见，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和关键要素，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实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世界各国的竞争都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美国学者克莱因在其《世界权力的估价》一书中，将经济能力作为国家实力中物质要素的最基本成分，他甚至认为，其具体比重应当占到2/5 。

国家经济实力还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格局。国际政治各种力量对比的消长和彼此间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也是由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彼此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决定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改变，不仅直接决定国际经济力量相互联系的结构状态，即世界经济格局，而且还必然促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更。从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国际政治格局的演进总是以经济格局的变化为先导的。尽管二者的演进过程并不是同步的，但方向是一致的。此外，世界经济格局的特点对国际政治格局的特点具有重要影响。战后以来，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各种类型和多种力量之间通过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经济纽带程度不同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现象使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空前加强，构成了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中多种力量并存、共处、协调和竞争，在曲折中发展的局面。

三、经济手段是实现国际政治目的的主要方式

经济方式是国际关系中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常用的手段。在战后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之间在其对外行为中常常使用经济手段来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它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贷款、投资或无偿提供货币和商品等方面的经济援助，将受援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大国政治中常见的手法。二是削弱和限制对手的发展。在利用经援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同时，大国也往往采用各种经济手段限制对方势力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在国际政治中，经济制裁在一定时期内会给被制裁国带来一定的经济困难，甚至能够迫使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不合

理、依赖性较强的国家就范，从而达到制裁国有限的政治目的。然而从长期看，这种制裁的后果是消极的。它对一个具有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在被制裁国经济受到损害的同时，对制裁国的经济同样产生不利的影响。尽管如此，经济制裁毕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并对国家间相互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对经济也具有反作用。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无疑也体现了这一原理。

国际经济是国际政治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并影响着当代国际政治的特征和发展，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际政治是在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的历史时期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世界上多数国家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体系尚未出现。18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取得统治地位，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中来。而正是世界市场的建立加强了国家间的交往与联系，促使了最初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出现。

19 世纪 70 年代后，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发展，并开始在经济上瓜分世界。所有这些，极大地加强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统一的世界市场和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终于形成。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国间的政治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促使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广大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大幅度增加，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促使世界经济体系的规模不断扩大，已把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纳入世界经济洪流之中。正是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

之上，才形成了今天以一百九十多个主权国家和数以万计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的全球意义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

其次，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力量构成。从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体系的成分性质来看，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封锁、包围和孤立的政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系并存的局面。这两大体系的相对独立的运行，促使了当时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同时也加深了两大阵营间尖锐对峙的国际政治态势，构成了冷战的经济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两大体系的对抗被三种类型的国民经济所替代。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三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关系不仅决定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决定了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三种基本力量，并由此产生了国际政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再次，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由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性质和水平以及生产方式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某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的形式、结构和共同性的基本问题，都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性质以及主要生产方式的特点而转移变化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完成了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由此出现了商品过剩。于是资本家开始奔走世界各地寻找新的市场，从而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和基本问题，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对外掠夺与扩张以及殖民国家之间的相互争夺。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电力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了商品和资本的相对过剩。帝国主义国家为垄断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以及资本输出的场所，开始了瓜分世界的斗争。因此，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同盟的形成导致了集团政治的加强；另一方面，整个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

族。由此而来的是国际冲突的尖锐化与扩大化。战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资本主义的垄断也由一国走向世界，从而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介入国际经济生活，其作用和影响不断增强。由此产生了国际政治中和平、发展、核武器和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的共同性问题，同时也使战后国际政治突破了原有的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传统局面，出现了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新局面。

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在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中，尽管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而是能动地反映经济并反作用于经济的。

首先，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对国际经济的重要影响。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是在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它们一经形成就会给当时国际社会的经济关系以重大的影响，甚至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类型和世界经济格局的特点产生反作用。国际政治体系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和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任何一种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总是借助于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斗争和较量来实现的，而这种斗争和较量总是呈现出国际政治的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体系表现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实行的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这种殖民体系的最终完成是与当时国际政治体系中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当时处于国际政治中心的欧洲列强，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推行强权政治，通过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用军事手段瓜分世界。并把自己所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作为后备力量同别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较量。这种政治斗争的后果造成了世界划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残酷虐待、掠夺和剥削。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正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基础上的。

其次，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类型有着重要

的影响作用。国际政治格局是反应各国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结构，不仅对政治关系结构，而且对经济关系结构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正如美国学者琼·斯佩罗所言，“国际经济的结构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政治体制的结构与运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打破了国际政治形成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基本格局，而代之以美苏之间的两极对峙，美苏两个大国和东西两大集团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制约，不仅对国际政治，而且对国际经济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使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中曾经出现的两种彼此隔绝的不同经济体系类型，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体系，就是东西方政治对立的产物。

再次，国际政治格局一经形成，对各主要力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强大的制约力。国际政治格局的确立是通过无数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而完成的。这种格局一经形成，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的总的战略关系结构必定会对各个力量之间经济关系发展的方向、规模和水平起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建立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时，政治关系的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外经济联系的发展不仅反应本国的经济要求，而且通常取决于对国家更为重要的、更本质的国际范围内的政治关系，即涉及安全、政治或经济独立以及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关系。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和对外经济政策受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结构、力量对比和矛盾斗争等因素的制约而发生变异和修正。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国家间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对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影响无疑占有首要的地位。政治因素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对经济关系都具有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明显影响。

第三节　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

所谓科技革命，是指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必然会引起生产力的变革，改变社会生产的形式和内容，加深全球范围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联系，推动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向前发展。

一、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其内容

科学技术因素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性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欧洲，它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推动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它们纷纷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转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商品过剩和市场狭小的矛盾。因此，单一民族经济的发展开始冲破了国界的束缚，形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最终使资本主义在欧洲政治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现代意义的国际政治也由此而产生。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和北美地区，以电力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为标志，出现了电灯、电报、电话和电动机，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大陆铁路、公路交通得到了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切加速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出现，促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世界市场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而不断扩大。那些科技革命成果应用较早的少数国家实力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对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优势地位，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整个世界形成了以少数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殖民压迫的完整的全球体系。并导致了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殖民地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现象的出现。

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并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它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它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融为一体，比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更为强烈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也更为持久和深刻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子能和核能的利用带来的不仅是武器性质的变革和战争形式与规模的改变，而且也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能源与动力。人造卫星的发射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也引起了交通和通讯的革命性发展。所有这些，促使了社会生产力以空前的速度极大地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国际分工的规模，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它为冷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也促使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当前被人们称之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以材料工程、能源工程、生物工程、信息工程和宇宙工程为标志，实质上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继续与发展，只不过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地扩展了。因此也被人称之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第二阶段，或新技术革命时期。它改变了第一阶段科技革命成果主要和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状况，成为对世界经济的更为直接的推动力，并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虽然首先在发达国家兴起，但迅速扩展到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以致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这场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之中；它给世界政治和经济提出了一系列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时交通工具和联系手段的发展，使得世界在空间上变得更小、更透明。整个人类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和扩大，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整体化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纵观历次科技革命，犹如汹涌澎湃的海潮一般，一波接一波，一次比一次更为深刻和广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而且也给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内容，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科技革命看成是第一生产力，“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二、科技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科技因素影响国际政治，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政治本身的不可分割性。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经常是相互交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战以后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科技因素直接作用于国际经济，也就自然间接作用于国际政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科技革命本身已经越来越

深入地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领域，对国际政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要素都产生了直接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高涨和深化，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直接和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作为国家实力构成的一种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到国家间实力对比结构的变化。科技因素作为国家实力的要素之一，其主要原因是它能对国力构成的各大要素几乎都产生直接的影响。

首先，科技因素对国家经济实力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科技已经成为核心因素。由于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构成的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技因素也加强了它在国力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科学技术因素对自然资源因素在国力构成中地位的影响。科技革命往往导致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发现和应用，降低了传统资源在国力构成中的地位与作用。19 世纪后期，石油资源的开采与应用，降低了煤炭资源的地位，石油资源国也取代了煤炭资源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新技术革命促使工程塑料和核能等新材料和新能源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减轻了人们对传统自然资源的依赖。科技使纯粹的自然资源在国力构成中的地位更加复杂化了。

再次，科技因素对国家军事实力产生直接的影响。军事历来是科技成果应用最多和最快的领域之一。科技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一个国家军队的武器质量和性能，直至军队的战斗力。

最后，科技因素对国力构成的精神要素产生影响。国家科技水平的发展，可以极大地提高全体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国民士气和政府的组织能力以及国家的凝聚力，从而使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第二，科技革命的发展使现代战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更加复杂化。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武器系统的革命性变革。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由冷兵器向热兵器、常规武器向核武器、地面地表武器向太空武器发展的三次武器革命，都是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发生

的。武器的性质和水平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规模和结局，同时也导致了军事理论的发展和部队作战方式以及编制的改变等军事革命。另一方面，科技革命的发展也改变了战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家之间的战争历来被看成是国际政治关系的高级形式，因为战争通过军事实力的直接较量而迅速实现国家利益，是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然而，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大国间核军备竞赛的结果，使得全面核战争的破坏性和残酷性空前增大。核大战已经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之分，作为一种实际战争手段已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因此，大国间的核裁军才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此外，由于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不断加深，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也制约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所以，在世界大战意义上的战争的地位被大大地削弱了。然而，有限的、常规的局部战争则由于科技的发展和武器性能的系统改进，在国际政治中的现实意义却得到了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60 多年未爆发世界规模的核大战，而局部战争却连绵不断的原因恰恰就在于此。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科技因素的发展已使得战争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更加复杂化了。

第三，科技革命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国际政治的全球化，并大大丰富了国际政治的新内容。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世界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深入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导致了各国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而科技发展带来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变革，这种快速交通和高效通讯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地理距离相对日益缩小。这种时空关系的相对变化，又使得在任何遥远的角落里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能迅速地影响到整个世界。地球变成与所有居民都息息相关的地球村，过去那种被自然地理疆界限制的地区文明变成了世界文明，地区性国际社会纳入了全球性国际社会。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透明和更加连为一体，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也进一步加深了。这是导致国际政治全球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开拓了人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如海

洋资源和太空资源的开发，核能的利用等。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及社会问题，如核武器的威胁、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资源衰竭、人口爆炸，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已经直接威胁了全人类的生存利益，而且只有依靠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解决。因此，这些全球性的共同问题被列入了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

三、科技竞争是当今国际政治的新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已使得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国家的强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学技术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经济竞争已经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要下决心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社会正迈进知识经济时代，各国都在加紧调整科技战略，以便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国际政治的新特征之一。

一方面，各个国家纷纷调整战略，加快科技领域创新和进步。另一方面，由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各个国家在知识产权、人才争夺、技术准入出口管制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科技发达、掌握高技术的国家，已经在信息革命中领先一步，为了维护本国在综合国力方面的领先地位和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防止对手赶超并威胁自己，经常采用高技术禁运、技术出口管制等手段来限制对手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技术大国在技术转让和技术援助的时候常常附带种种政治经济条件，以图控制和影响接受国政府的内外政策。

第四节　文化因素与国际政治

一、文化因素日益参与国际政治

所谓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则专指社会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

度和组织机构，即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国际政治中所研究和分析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上的文化。

数千年来，各民族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民族文化，这些复杂多样的文化不仅是各国对外行为滋生的土壤与重要根源，也是国家间关系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文化因素的影响逐渐扩大，并日益重要。

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因素也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国家综合实力的构成包括民族特征、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和民族凝聚力等精神要素，而它们都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构成的国际社会中，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不同，文化也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具有明显的民族特性。这种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凝聚力强弱的重要因素。文化上的悠久历史会产生民族自豪感，而文化上的统一性又能增强民族整体的行为能力和社会结合程度。与此同时，文化因素还能够对各项物质要素本身产生制约作用。所有这些都对一国的综合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次，文化交流和沟通是国家间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随着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增强，各国之间展开的文化交流是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友谊，沟通思想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国家对外政治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通过文化交流能够改善和促进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当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正常或遇到麻烦的时候更是如此。文化交流能够通过民间进行，因而可以突破政府间关系的制约，发挥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可以控制和干涉别国的内政。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促使别国的政治经济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此外，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文化交流和文化关系已经日益表现出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文化功能政治化，文化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

最后，文化上的差异和矛盾是导致国际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由于各民族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各自的特点，各民族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造成了对相同问题的不同

观点。这种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歧义是很难改变的，它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感情和民族心理，如果不能及时通过交流加强相互了解并达成共识，那么在特定的条件下，往往会产生隔阂并导致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沙文主义，将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作为普遍的原则来推广，并采用各种强制手段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这已经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反抗，加深了南北矛盾的对抗性。日本历史学家渡部升一在与石原慎太郎等人合著的《日本还要说“不”》一书中说道：美国和西方文化的根基是一种白人种族优越的朴素进化论思想以及企图征服无限空间的利己主义，它已经走向了没落和“末世”，而日本文化的根基则是一种“纯自然文化”，“只要地球不毁灭，日本文化就将永世长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和扩张必然会与日本“迎头相撞”。美国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也认为，“世界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冲突的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也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文化方面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发生”。“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引起，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二、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文化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现实世界中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一种虚幻的和歪曲的反映。宗教自从在原始社会中产生以来，逐步地由部落宗教向民族宗教乃至世界宗教的方向发展。宗教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目前世界上信奉各种宗教的教徒人数已超过了30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大世界性宗教，它们拥有的教徒人数已超过了世界教徒总人数的80%。各大宗教又拥有无数的教派并都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组织。这些宗教组织既有一国内部的，也有跨国的和世界性的，后者如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世界佛教联谊会、穆斯林世界联盟，等等。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又拥有如此众多的教徒和相当严密的组织机构，必然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特别是世界性的

宗教和跨国宗教组织对国际政治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着自己独特的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现代宗教陷入了神学危机，进而开始了其世俗化的进程。因此，当代宗教与人类政治经济活动更加密切了。除了少数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国家之外，宗教更多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自由选择的信仰而存在的。随着国际交往和世界人口的迁徙，各种宗教并存的局面也加深和促进了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同时，一些宗教内部也出现了适应时代发展，并将各自教义中关于原始平等思想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紧密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系列新的思潮和流派。一些国际性的宗教组织也积极地参加到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运动之中。

宗教具有意识形态动员和团结本国人民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个教徒众多、政教合一的国家里，宗教的这种作用则表现得更为强烈，加之宗教具有精神上的麻醉性，其煽动性也比一般意识形态更强。因此，宗教便成为统治阶级麻痹和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极端宗教派别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立性和排他性，使得宗教在加强同一宗教和教派的国家及地区间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加深了不同宗教和教派的国家及地区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和冲突，阻碍了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同时，宗教虽然能在同一宗教和教派的国家之间起到一种加强联系的纽带作用，但是这种宗教纽带与国家利益相比，则是不稳定的。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或部分认同。宗教之所以能够成为某种加强合作的纽带，就是因为同一宗教和教派的国家往往具有历史和文化上的共同性，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民族亲近感，并对当前世界的重大问题和自身的发展道路有着较为一致或接近的观点。所有这些都促使了国家利益的认同，进而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合作。然而，宗教与国家利益相比，其地位只能是次要的，其作用也是不稳定和不牢固的。

宗教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既有过推进作用，也起过阻碍的作用。

首先，宗教和教派争端乃至战争是造成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内

乱与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宗教和教派林立，由于历史上的宗教纠纷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宗教与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往往表现得十分尖锐，以致酿成长期的内乱和战争。

其次，宗教矛盾和冲突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世界热点莫过于中东地区。作为世界宗教的发源地之一，这一地区宗教和教派林立，而且历史积怨较深。特别是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之争已经直接与自己的生存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表现为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一旦与宗教冲突联系在一起，就会和漫长的历史、民族感情、民族传统等结合在一起而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

最后，极端宗教主义势力的抬头助长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是国际政治中的一颗毒瘤，它的恶性蔓延与极端宗教势力的抬头密切相关，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东地区出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泛滥，并出现一大批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他们运用恐怖活动作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手段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主张与西方发展关系的本国政权，试图按照伊斯兰法典重建各种社会制度，规范和净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国际恐怖活动已被他们用来为教派冲突和斗争服务。正因为如此，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层出不穷，十分活跃。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已渗透到国际政治斗争的各个方面。同时，国际恐怖活动热点地区的国外投资和旅游收入大大减少，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敌。

三、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关于某一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根本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价值观念。它是文化因素的一部分，是有关政治、法律、道德和哲学等社会意识的形式。

在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 意识形态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

意识形态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因为一国的对外决策的基础就是正确地认识其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反映了一国统治阶级对本国国家利益的系统认识，对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判

断和评价起着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因此，意识形态成为各国对外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它决定着一国对外决策的性质和趋向。同时，意识形态还决定决策的信息评估，影响对外决策的运行过程。在决策程序中，决策者和决策机构每日每时地接受和处理大量的国际信息，表明本国的态度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决策者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深处的意识形态因素。没有成熟的意识形态的决策者绝不是高明的有效率的决策者，意识形态不同的决策者所作出的决策判断和反应也必然有所区别。

2．意识形态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手段

意识形态的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信念对统一和团结本国人民起着重大的精神作用。一国人民团结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与实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利用政治信仰和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因素来动员和团结本国人民，鼓舞决心和斗志，从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国民士气，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手法。

（2）利用意识形态的宣传，抵制和削弱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

（3）利用意识形态为本国的对外政策做出解释，这是意识形态制约国际政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国际政治中，任何一种政治行为、政治目标和计划都需要政治道德和政治价值这些意识形态因素来为其正当性、合理性进行解释和论证，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得国内民众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从而保障其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

3．意识形态导致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在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实质反映为一国统治阶级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是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对国际政治力量分化和重组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同属一个意识形态体系的国家之间产生亲近感。意识形态成为加强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纽带，促使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同盟和国际政治组织的出现，意识形态产生了超国家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国家之间，没有共同的信念，容易在国家间关系中产生疏远感，引起相互间的猜疑、仇恨、鄙视等，使相

互合作变得困难，从而强化了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当然，在相同类型的意识形态内部存在的分歧与矛盾，也能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对立与冲突。

第五节　相互依存的发展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

一、相互依存与国际一体化的发展

所谓相互依存是指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广泛而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战后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国际分工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市场竞争和国际贸易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应运而生，国际间的商品流通、劳务交换、资金流动、技术转让等大幅度增加，已经把世界上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一国的经济发展日益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全球化潮流席卷全球，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日趋深入，并且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已向政治、生态等领域发展。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更加深入，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的协调作用大大地加强了，这种趋势将促进以国与国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者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格局。在生态环境领域，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二氧化碳的排放、臭氧层空洞等均已超出了一国主权范围，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这些表明，国际社会进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

在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之下，国际政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由于信息时代使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互动成为现实，加速了生产要素、文化等跨国流动，国际行为角色和行为模式日趋发达和多样化，国家利益也相互渗透，日趋复杂。其次，相互依存的政治观念发生变化，军事安全等高级政治问题不再始终居于国际政治议事日程的首位，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日趋凸现。再次，国内政治问题渐次进入国际政治事务领域，一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同国际社会的状况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国内问题日趋国际化。最后，国际相互依存的深入发展一方面有助于国家间相互沟通，增

进了解，消除误解与矛盾，促进国际合作，但同时相互依存条件下的国际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构建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科技霸权地位会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会产生新的矛盾、竞争与冲突。

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状况同时产生的现象是国际一体化，所谓国际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甚或某一区域或全球范围的所有成员在一定领域内聚合为新的行为体的过程、趋势或状态、结果。国际一体化的主要动因是：首先，国际一体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经济一体化直接体现了当代国际生产力的要求；其次，国际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发展，要求新的形式保障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第三，政治、经济利益的需求和文化上的认同也促进了国际一体化的发展。

国际一体化的深化直接推动了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国际一体化顺应生产力超越国界发展的要求，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合作的加强。其次，国际一体化有助于成员国在一体化组织内部通过磋商和协调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加强合作，在维护地区和平和促进地区繁荣与稳定方面作出贡献。再次，国际一体化的发展改变了国际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加速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在国际舞台上，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可以通过一体化组织来壮大自己参与国际竞争的力量，促进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发展，促使国际局势从紧张走向缓和，推动国家间关系从对抗走向对话。最后，国际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从而也推动了国际合作的不断加深。

二、全球问题的出现与发展

全球问题，是全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它具有以下的特征：

（1）全球性。它的规模超过了一国国界，涉及全人类几乎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管这些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居民人数的多寡、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社会制度的性质如何。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与广泛合作。

（2）综合性。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相互之间交叉渗透，环环相扣，每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挑战性。它制约和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引起人类生存条件的退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倒退，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因此，各国在这些挑战面前，找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并由此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合作的发展。

（4）超意识形态性。全球性问题在表现形式上会有民族特点，在解决途径和发展前景上会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但其本身是超民族、超意识形态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诸如寻求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人类生存系统的普遍问题。

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人类社会中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至20世纪80年代末，人类正面临着自己制造的灾难的威胁。根据“核冬天理论”的推算，目前地球上的核武器足以将整个人类毁灭百次。9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争议、资源占有以及其他政治经济的矛盾与对抗等原因，使得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日益频繁。这些局部战争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冷战的结束，世界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太平，反而因为各种力量对比的失衡使原先被掩盖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更加激化，世界热点地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转移，导致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进一步升级。

（2）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贫富分化和南北冲突。由于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加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以及国内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的弊端，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极为困难。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3/4，却只占世界总收入的1/5。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的50倍以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近期内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仍十分严峻，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

发展，创造南北经济“双赢”仍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3）全球范围内的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生态失衡和粮食匮乏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人类在自身的繁衍和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严重问题：① 人口爆炸。目前世界人口过度增长，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使我们这个地球不堪重负。② 资源短缺。由于非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导致了矿物资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日益枯竭。③ 生态系统失衡。自工业文明以来三百多年的人类活动（污染、破坏植被等）导致了地球生命系统面临严重失衡的危险。

当代全球性问题的发展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首先，全球问题的涌现导致了国际政治内容的调整。人们逐渐认识到不仅要从政治、军事角度把握国际政治问题，也要从经济、环境的角度来审视和处理当代国际政治问题。其次，全球问题的发展促进了当代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传统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随着全球问题的凸现，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日趋增强，据统计，全球各类国际组织的数量已超过 3 万个，涉及经济、政治、环境等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并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第三，传统的国家主权正受到全球问题的侵蚀。随着全球问题的发展，原来认为完全是各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国内政策正受到国际条约的制约，或者成为国际谈判的内容，传统的主权观面临着全球问题的挑战。

三、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共同主题

1.“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提出及其依据

世界主题是指世界范围内最重要、最突出、最活跃的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主要课题。20 世纪 70 年代后，美苏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进行军备竞赛，竞相发展核武器，世界核武器达到超饱和的程度，与此同时，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世界和平和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在世界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南北经济关系极不平等，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困境，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受到阻碍。因此，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的带有根本性的两大

问题，只有解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有保证。

邓小平针对战后苏美对抗的东西矛盾威胁世界和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南北矛盾阻碍经济发展这两大世界性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概括，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改变了过去“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从而确立了正确的时代观。

邓小平的论断是建立在对世界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的区分以及对这两种力量消长的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的：

（1）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由于“恐怖的核均衡”，美苏两国都还不会轻易发动战争。

（2）“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

（3）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据此，邓小平得出以下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2.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关系

和平与发展不是彼此孤立的，和平与繁荣，动乱与贫困，从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既各有特点，又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互为因果。一方面，维护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只有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并获得发展。大国间的军备竞赛每日每时都在消耗巨大的社会财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忧外患也同样牺牲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世界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战争和战乱的威胁与严重阻碍。另一方面，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是维护和平的有力保障。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并促使了国际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出现，

形成了制约战争的有利环境。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将促使南北关系的改善,使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为世界和平创造条件。此外,世界经济的发展将相当程度上消除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贫困落后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往往是诱发战争的重要原因。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将是消除这一隐患的有效途径。因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发展问题是两大主题中的核心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关系是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问题。

新世纪里,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普遍要求、世界各国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也是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潮流。“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考题

1. 自然环境作用国际政治的途径与方式。
2. 如何认识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3. 试析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4. 试述科技革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5. 如何认识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与作用?
6. 如何认识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
7. 如何认识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8. 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
9. 为什么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考试样卷及参考答案

考 试 样 卷

考生须知

1. 本试卷共 2 页，满分为 100 分。

2. 一律用蓝色或黑色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上按规定要求作答，凡做在试卷上的答案一律无效。

一、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 所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 _____、共同 _____、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2.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组织功能、参政功能、_____ 功能和 _____ 功能。

3. 政治文化中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因素，即认识性因素、感情性因素和 _____ 因素。

4. _____ 学说的发现，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5.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过程中曾经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斗争形式是 _____。

6. 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是 _____，终点是 _____。

7. 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是 _____。

8.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 _____。

9. 国家在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应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 _____ 手段。

10.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_____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克敌

制胜的法宝。

11.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 _____，_____。

12. 国际政治是由两个层次构成：一是 _____，即国家行为主体的行为、关系及规则；二是 _____，即国际政治体系。

13. _____ 国际会议确立了国家平等的原则，与会国实行 _____ 的制度，各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14. 联合国现在共有会员国 _____ 个。

二、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20 分）

1. 政治决策
2. 科学社会主义
3. 新文化运动
4. 国际合作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1. 什么是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具有哪些基本特点？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哪些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3. 简述国际组织的类型。

四、论述题（每题 12 分，共 36 分）

1. 论社会职能对于政治统治的基础意义。
2. 论述“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3. 如何认识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参 考 答 案

一、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 语言　地域
2. 民主监督　教育
3. 评价性
4. 剩余价值
5. 政治斗争
6.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7. 工农联盟

8.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9. 行政手段

10. 党的建设

11. 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2. 微观层次　宏观层次

13. 海牙　“一国一票”

14. 192

二、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0分)

1. 政治决策

试题答案:政治决策是指国家机构、政党等政治管理主体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制定行动方案的过程。(3分)政治决策的特征是特殊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并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和强制性。(2分)

2. 科学社会主义

试题答案:区别于空想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而言的一种社会主义。(1分)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1分)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仅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1分)它是反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及其相互关系。(2分)

3. 新文化运动

试题答案: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前后时期,(1分)由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陈独秀等人发起,(1分)在全国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反对封建文化,传播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新观念的思想解放运动。(3分)

4. 国际合作

试题答案:国际合作是指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全面或局部的协调、联合等协作行为。它是国际行为主体基于各自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利益或目标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而采取的一种相互配合的行为。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中最一般、最普遍的状态。(3分)国际合作以自愿互利为原则,国际行为主体在各自利益一致的范围和程度内决定可能合作的范围和水平。(2分)

三、简答题(每题8分，共24分)

1. 什么是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具有哪些基本特点？

试题答案：政党制度是由国家法律规定或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有关政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执掌政权或者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的制度性规定。(2分)

政党制度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政党制度是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而设立和规定的，其根本性原则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2分)

第二，政党制度可以是成文法规定的，也可以是依照宪法惯例形成的。(2分)

第三，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它必然与一国政治制度具有相互适应性，并相互发生重大影响。(2分)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哪些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试题答案：

第一，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在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3分)

第二，它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2分)

第三，它是我们防止和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错误倾向，警惕右，特别是防止“左”的强大思想武器。(3分)

3. 简述国际组织的类型。

试题答案：

依据国际组织的宗旨和职能来划分，可分为一般性(或综合性)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组织。(2分)

依据国际组织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可分为世界性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组织。(2分)

依据国际组织的构成来划分，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国家或政府为组成单位，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是民间团体及个人。(2分)两者在国际法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主体，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则不是。

（2 分）

四、论述题（每题 12 分，共 36 分）

1. 论社会职能对于政治统治的基础意义。

试题答案：

统治阶级承担和履行社会职能，是统治阶级掌握、维护和保持其统治合法地位和作用的必要前提。国家权力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但形式上却是全社会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这种双重特性，决定了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合法地位的维护和保持，一方面依靠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依靠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承担。由此可见，统治阶级承担和履行社会职能，是统治阶级权力合法性的必要条件。（4 分）

统治阶级承担和履行社会职能，是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运行，进而维护统治秩序的基础条件。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存在，既是政治统治秩序的社会体现，又是政治统治秩序正常运行的社会基础。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存在，则需要社会事务的正常处理，这就需要通过统治阶级承担和履行社会职能来实现。（4 分）

统治阶级承担和履行社会职能，是统治阶级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进而增强统治力量的根本途径。统治阶级的力量本质上来自于对于社会和政治资源的控制和运用，而社会和政治资源的状况，是随着生产力的状况而变化的。一般来说，发达的生产力往往会提供更强大有效的政治统治资源，而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说，统治阶级和国家承担并履行社会职能是重要的实现条件。就此而言，承担和履行社会职能，对于统治阶级强化自己的统治能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4 分）

2. 论述“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试题答案：

“一国两制”构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新形式。按照这一构想，我国仍是单一制国家，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下属的地方行政区域，但它享有行政管理、立法、司法、财政、关税、发行货币等许多独立权力，这有利于它的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此构想突破了在一个国家内只能允许存在一种社会制度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的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6 分）

这一构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的原则用来处理一个国家内部问题，为一个国家处理内政问题，特别是解决一个国家内部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间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好办法。（4 分）

这一构想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范例。（2 分）

3．如何认识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试题答案：

在当今世界，各国已经把经济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国际竞争的重点也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 分）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南北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决定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南方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南北关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3 分）

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军事因素的作用相对下降，经济实力开始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保障经济利益的实现。在未来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中，经济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3 分）

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发展给当代国际政治带来的许多新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使得一个国家在制定政治、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遵循国际政治、经济的一系列规则，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某些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凭借自身的优势推行“经济霸权主义”。（4 分）

参考书目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李景治、蒲国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俞正梁:《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58581999　58582371　58582488

反盗版举报传真 （010）82086060

反盗版举报邮箱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律事务与版权管理部

邮政编码 100120

防伪查询说明

用户购书后刮开封底防伪涂层，利用手机微信等软件扫描二维码，会跳转至防伪查询网页，获得所购图书详细信息。也可将防伪二维码下的 20 位密码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发送短信至 106695881280，免费查询所购图书真伪。

反盗版短信举报

编辑短信“JB，图书名称，出版社，购买地点”发送至 10669588128

防伪客服电话

（010）58582300